东西方文化比较导论

李新柳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为高等学校通识课程教材。全书分上中下三编，介绍了世界文化格局，提出当代世界文化比较的重点是东西方文化比较。作者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依归，以东西方文化比较为基本内容，理论与实际结合，历史与现实结合，思想性与学术性结合。本书可以帮助学生在学习中获得认识和解决文化问题，特别是东西方文化问题的基本立场、思路、方法等。本书适合高等学校跨专业学生作为选修课程教材使用，也可供广大社会读者阅读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西方文化比较导论/李新柳著.—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8

ISBN 7-04-017840-0

Ⅰ.东... Ⅱ.李... Ⅲ.东西文化-比较文化-高等学校-教材 Ⅳ.G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76017号

策划编辑 徐莉萍 **责任编辑** 吴 伟 **封面设计** 王 雎
版式设计 王艳红 **责任校对** 王 雨 **责任印制** 杨 明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免费咨询	800-810-0598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总 机	010-58581000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raco.com
经 销	北京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http://www.landraco.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版 次	2005年8月第1版
印 张	14.75	印 次	2005年8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270 000	定 价	19.4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物料号 17840-00

郑重声明

购书请拨打电话：(010)58581118

目　录

上编　世界文化格局

下编　中西文化的专题比较

绪　论

第一节　为什么关注文化

一、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

著名的法国史学家兼文艺批评家丹纳（Hipp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在给学生讲授《艺术哲学》时，有一段开头的话：

"诸位先生，我开始讲课的时候，先向你们提出两点要求，第一是集中注意，第二是你们的好意：这都是我极需要的。你们接待我的盛意使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答应我的要求。我为此预先向你们致以热烈的和诚恳的谢意。

今年我预备讲的题目是艺术史，主要是意大利绘画史。未进入正文之前，我想先说明我讲课的方法和旨趣。"①

同学们，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东西方文化比较"，我首先要感谢你们对文化问题的注意和好意。同时，我也要说明这门课程的旨意与方法。我们讨论和探索文化问题，是为了振奋民族精神，防止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容易发生的以信仰迷失、价值困惑为特征的精神退化。这个想法是怎么开始的呢？

1998 年，一位多次赴我国香港高校完成合作科研项目的自然科学教授，向我提了几个问题，包括什么是孔孟之道，什么是基督教，以及二者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什么，等等。我问他为什么对这些问题感兴趣，他说是由于他在香港期间，同一位共事的我国台湾地区的教授之间的多次"辩论"。那位台湾朋友说：祖国大陆的马克思主义不行了，台湾地区的三民主义也不行了，用什么思想来统一中国呢？不能用西方的基督教，只能用中国的儒教即孔孟之道来统一。我们的这位教授不同意台湾朋友的观点，三个月内至少讨论了八次，他认为最能统一中国的只能是马克思主义。但台湾朋友也不服。有趣的是，他们对什么是孔孟之道，什么是基督教，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认识更不一致，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他给我将了一军：你是搞社会科学的，小时候接触过孔孟之道，上私塾读过四书五经，大学毕业后又搞了几年西方文学专业，此后又读

① ［法］丹纳著：《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3 页。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搞思想理论，何不研究研究，同时给青年教师和学生开点讲座？我的回答是：同意试一试。

这就是我开设东西方文化比较课的直接原因。过去，我在学校领导岗位上时，有学生反映意见说：希望老师给我们的不仅有知识，还有真心。我曾把学生的希望转告教师。现在我不在领导岗位上了，是普通教师，更应记住学生的要求，借此机会向大家说点心里话。

儒学（孔孟之道）能解决中国未来的问题吗？或者像我国台湾地区和西方某些东方学者、儒学研究家所预言的未来世界将靠儒学来维持吗？

基督教能给中国带来现代化，能统一世界的信仰吗？

马克思主义能不能做到，既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又照耀人类未来呢？

或者未来中国人的信仰是多元的，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的信仰也是多元的。人类有没有必要都在一个主义、一种文化的覆盖下生活呢？

因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基督教、儒学、马克思主义与未来的人类的关系。这是东西方文化比较、中外文化比较不可回避的问题。

我们将按这样一个思路来探讨：

第一、什么是文化？世界文化地图的概况。为什么现在文化问题突出了？文化“热”了？

第二，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文化传统？中华文化的特点与核心、精华与糟粕。

第三，同样什么是西方文化？它的传统、特征、精华、糟粕……

第四，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与现状。

第五，中西文化比较①与中国现代化。

第六，马克思主义、儒学、基督教（或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与人类的未来。

以上每一个问题都可以写一本书，甚至若干本书，我们只能粗线条地研究。但不能空，大而空，大而不当，或雷声大，雨点小，水过地皮湿，实无收获。因此我们研究的方法，讲与学的方法，自始至终要坚持：一是少而精，注重精神实质，不搞繁杂论证；二是尽可能从具体到抽象，从具体的文化现象出发（包括历史和现实的文化现象），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观念。宗旨是：为学生进一步了解文化，研究文化问题，或者在未来工作中碰到文化问题时，有一个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依托和参照，不至于茫然不知所措；在致力于为学生提高自身文化修养时，有一个可资查阅和回忆的纲目。

---

① 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所谓东西方文化比较，从历史到现状，重点是中西文化比较。

我赞成这样的文化观：文化的实质是人化。万物之灵在于人，万人之灵在于文，万文之灵在于化。就是说，文化是人创造的，只有人才能创造文化；人类社会得以世代延续，就是因为创造了文化；一种文化得以流传下来，就是因为在实践中成为群体、氏族、民族、国家乃至世界性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

我愿坚持的是从懂得世间确有真理那一天就开始坚持的原则：背靠马列主义，面对事实，讲心里话，即使手里没有真理，也同谬误保持了距离。

我的目的是，有助于为未来中国建功立业的青年人：找到精神家园的奠基石，了解怎样建立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大厦，怎样展现人类理性力量的无穷机会；能对传统的和现实的、民族的和外国的文化进行科学的思考，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化的正确的历史定位。

这些就是我所希望得到的注意和好意。

二、为了提高大学的文化品位

大学担负着人类文化先导的责任，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

1998 年 10 月 24 日，教育部在北京成立了全国“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其职责是研究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有关理论与实践问题，为教育部门制定有关方针、政策提供咨询和建议，指导高校深入开展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组织编选推荐文化素质教育主要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研究制定文化素质教育培养目标、基本要求和评价方法，指导和监督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建设工作。

教育部强调，加强文化素质教育，要着眼于提高高等学校的文化品位、提高教师的文化素养，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

什么是大学的文化品位呢？如何提高呢？

品位，本意指矿石中有用元素或它的化合物的百分数，含量的百分数大，品位就高。其他语境中的“品位”是借用。大学的文化品位，应是指大学教育中的文化含量。大学乃“文化之都”，为何还有个“文化品位”问题呢？我认为，大学的文化品位是由三种因素（或元素）构成，这三种因素在不同大学的含量是不同的：

第一，大学的文化历史积淀。通常指有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校龄以上的老大学，为地区、民族、国家乃至人类的发展和进步、为探求真理、为科学宝库、为培养人才特别是杰出人才所作的历史性贡献。这种历史积淀所形成的文化地位和精神，是可以学习而不可以重复，可以交流而不可以转让，可以借鉴而不可以赎买，可以超越而不可以否定的宝贵财富。这是大学的文化品位的重要标志。

第二，大学社会功能的个性。所有大学都要在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上起文

化先导作用，都要以人才库、思想库的职能对社会的现代化、文明进程起发动机的作用。这是大学的共性。但每所大学，不管是老大学还是新大学，综合大学还是单科大学，都必须有个性。举办者和办学者对大学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的定位，大学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定位，即实现自身功能的立足点、方式、效益、效能必须有自己独有的个性，举办者有个性，办学者有个性，教育者有个性，学习者也有个性。教学有个性，科研也有个性。如果一所大学，不明白自己的使命是什么，并自觉地为之奋斗，那就什么品位都谈不上，何况文化品位。这种个性，是大学文化品位的重要基础。

第三，大学教育过程的全面性和创造性，也就是大学文化传承的广度和深度，这是大学文化品位的核心。学校师生面对面的训练与熏陶，是一个传承知识、启迪心智、交流心灵、塑造性格的过程。这个教育过程的广度，不仅仅指我们说了多年的什么“扩大专业面”、“加强实践环节”，“加几门人文课程”，等等。最重要的是教育者要自觉地运用大学教育过程、教育内容和方法的全面性、包容性和民主性，努力把物理、数理、哲理、情理、事理等融会贯通，培养思路广阔、胸怀博大、善于思考的宽厚广博的人格。这个教育过程的深度，也不仅仅指我们说了多年的什么“举一反三”和启发性等，而是要充分发扬和体现科学真理本身具有的无禁区的开放性、无虚伪的严肃性和无止境的创造性，培养创新的人格。这个教育过程的广度和深度，是大学最重要的文化品位，它不仅决定学校功能发挥的强度和效益，而且决定学校的生命力和竞争力，甚至决定学校现实的和历史的文化地位。而这个文化品位的确立和提升，又完全决定于学校的校长、教师和学生特别是教育大师的努力，以及他们在努力中表现出来的文化修养和文化素质。

正好在这个决定性的问题上，我们中国的大学（同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著名的或较好的大学相比），先天不足，后天不良。总的来说，文化品位不够高。笑话很多，危害很大，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关注。到国外去读博士的人不知道孔夫子，也不知道四书五经，数学博士不知道中国有《算经》，学文学的读不懂诗词文赋，学历史的背不出三皇五帝，分不清公元前和公元后，学国际政治的分不清穆罕默德和释迦牟尼……对外国文化知之甚少，对本国文化所知尚不如外国人。不少学校没有本民族和外国的文化元典，更缺乏元典精神的熏陶。没有历史使命感、时代责任感，没有问天问地的探索精神。没有民族灵魂的旗帜、科学思维的品格。这是大学的失误，教育的悲哀。于是人们对技术主义、工具理性主义大兴挞伐，大声疾呼文化素养、文化素质、文化品位。

什么是文化素养、素质呢？素养指平日的修养；素质指本来的品质，常用于心理学上，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的特点，如素性稳重，素性敏捷，等

等。在词义上，素养和素质是互释的。不同之处，可能是素养偏重于后天的养成和修炼，素质偏重于本来应有。讲“教师文化素养”，侧重于教师的自我修养而言；讲学生的文化素质，侧重于学生在大学毕业前应当具有的品质而言。素养也好，素质也好，前面都可以加“提高”、“增强”，看来是经过推敲的，两者既有共同之处，又有区别。

共同之处有两个方面：

一是学科专业之内，教师和学生应具备两种素质：（1）了解和掌握本学科、专业知识体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及其与国计民生的关系；（2）本学科、本专业的思维特性，同其他专业学科相比，在思维方法上的异同，具有对本学科、本专业的实际创造和哲理思考的能力。

二是学科专业之外，教师和学生都应具备做一个真正现代人的两种素质：（1）对国家命运、民族前途乃至人类、地球、宇宙的终极关怀；（2）对人的本质的正确认识，对人生价值的科学思考，懂得现代人应是什么样的，现代人与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和做现代人的根本原则，具有应对现代生活的勇气和良知。

以上两个方面的四种素质，后三种主要靠人文社会学科来培养。至于教师的文化素养要求更高，应通过自我修养，获得思维能力的“活水”、师德的文化底蕴、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时空感”、语言的感染力和穿透力，更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丰富知识和精神营养。

这里还要排除一个天大的误解：好像只有理工科师生需要加强人文修养，提高人文素质，而人文社会科学的师生不需要，或者只需要学点现代科技知识就可以了，就是现代人了。其实大谬不然。技术主义和工具理性精神，对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师生和社会人士的侵犯和危害不亚于理工科，某著名大学社会科学教授“学术腐败案”，就是典型。众多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除了专业知识，严重缺乏人文修养者决不亚于理工科师生。技术和知识成为自己口袋里的货物或钱包，人成为技术和知识的工具，甚至被知识和技术所奴役。这种状况，作为大学教育的缺憾，问题的严峻性，文、理、工、管皆然，概莫能外。加强大学人文教育是一个普遍的课题。

有人将加强人文教育等同于开设人文课程，这是一个误解。开设人文课程（包括文科开设科技课程），是加强人文精神教养，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一个重要措施，但不能画等号。如果我们的社会体制、教育体制，不提倡和保证“以人为本”，人高于一切，人格高于一切，人的自由、民主权利高于一切，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人，为了人的自由和解放，为了人的全面发展，那么学校里不管开设多少人文课程，也会收效甚微。反过来，如果我们不加强人文教育、不开设人文课程，没有人去宣释人的重要性以及尊重人、尊重人格、尊重

人的价值的重要性，人文精神也将付之阙如，是十分可悲的。开设人文教育课程，同时又把人文教育渗透在全部教学教育的过程中，人文精神才有希望在大学落户，在中国大地落户。我开设“东西方文化比较导论”课愿为此尽力。

第二节　为什么要对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

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是文化变革和创新的需要

从中国和世界历史与文化发展来看，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在历史与文化变革和创新的进程中，改革开放加速了这一进程。然而，中国社会所处的国际环境却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在文化环境上，近代中国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境况，特别是西方“船坚炮利”的先进的文化的直接轰击，使中国文化失去了自身变革的历史主动性，也危及了自身的传统文化的传承性，不得不吸取和学习西方文化。不管是民族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不例外。向西方寻求真理，寻求理想的“主义”或理想的社会形态，这是1840年以来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主要趋势。从康有为、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到毛泽东、邓小平都是如此。只是在学什么、怎么学上，各有各的选择。不同文化的交流是文化创新的需要，这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共同的历史规律。

二、“落后”文化与先进文化之间的交流，“落后”者更应特别注意学习和研究先进的文化，才能改变“落后”状态，立于先进文化之林

同发达国家比较，人家是后工业化、后现代化、电子化、信息化，而我们是工业化，现代化尚未完成，电子化是“点子”化而已。

发达国家是高速公路四通八达，数字地球正在绘制，高等教育行将普及。而我们呢，部分地区仍然是“小桥流水人家”。我国县以下城镇还有不通公路的，还有不少文盲不认得数字。

我们落后啊！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不是很先进吗？是啊！但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中国的，是西方的，毛泽东和邓小平学了这个外国人发现的真理，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是为了改变“落后”。我国正在改变，还未完全改变。以后肯定会改变，会先进的，但现在还没有。还要一百年，至少五十年。如果不懂得什么是西方文化，不学习资本主义的好东西、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学不好，那么我们就聪明不了，先进不了，就会继续落后。

就以西方文化两个显著的特征为例：

一是从文化本性上说，虽然基督教文化讲究和平与仁爱，但由于其经典中将世界分为“基督教世界”与“异教世界”，两者又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对“异教世界”的征服就具有“神圣”的性质。

二是近代，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是帝国主义的世界扩张行为的文化意识。在这种意识形态支配下，西方文化视一切其他民族文化为“劣等”。

这两个特征，都是西方文化重要的精神支柱，对西方两三百年来的海外扩张和侵略，在宗教、文化观念上起了很重要的支配作用。

这两个特征，对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否定性，使得中国不可能再像融化佛教那样，或像融化迁移到中国的古代罗马人那样，或像融化古代流亡到中国的犹太人那样，以一种渐进的、温和的方式消融西方文化。

只有打开国门，向西方学习，把我国文化中的糟粕和陈腐的社会制度一起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才能寻求中华文化的再生之路。这就是中国几代先进的、革命的、开明的知识分子和觉悟了的中国人所做的事，包括真正的成熟的共产党人在内。

比较是为了善于学习，善于选择，从而变革和创新中国的社会与文化。

第三节　西方“文化诊断”与中国“文化自觉”

一、什么是“文化诊断”和“文化自觉”

文化诊断——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当代德国的思想家乌尔里希·贝克在《自反性现代化》一书中提出的，是对当代西方文化研究即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的一种概括。

文化自觉——这是东方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即当代中国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是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和研究的一种概括，也是 2001 年 12 月在我国香港召开的“21 世纪中华文化世纪论坛”第二次会议的主题：“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

把“文化诊断”和“文化自觉”作为当代中西文化比较的着眼点和重要主题，这是我提出的中西文化比较的思路和方法。

什么是“文化诊断”，乌尔里希·贝克自己有个解释：“作为一种社会理论和文化诊断，风险社会的概念指现代性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① “风险社会不是政治争论中的可以

---

① ［德］乌尔里希·贝克等著，《自反性现代化》，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第 10 页。

选择或拒斥的选项。它出现在对其自身的影响和威胁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自主性现代过程的延续性中。后者暗中累积并产生威胁，对现代社会的根基产生异议并最终破坏现代社会的根基。"① 一句话，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社会，已进入"风险社会"阶段；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破坏现代化社会的根基的威胁，这就是当代西方社会最基本的自我"文化诊断"。

那么，什么是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呢？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有个解释："'文化自觉'大概也应是如此，比如，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我们必须自觉地把'中国文化'作为'对象'来进行系统的、有创造性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才可以揭示出'中国文化'的真精神，才可以知道'中国文化'的优缺点，才可以自觉发掘'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价值，才可以有目的、积极地吸收和消化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部分，为创建适应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②

在世纪之交，西方"文化诊断"面临的是"现代化人类社会"的风险阶段；中国"文化自觉"面临的是如何适应现代化。两者有可比性吗？有，都围绕着现代化；又不可比，前者要回答的是走出"后现代化"的风险，后者回答的是进入"现代化"的适应；还必须比，因为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谁也离不开谁；不比，既难作出西方的"文化诊断"，也难实现中国的"文化自觉"。从一定意义上讲，本书就是为了解和研究西方"文化诊断"和中国"文化自觉"提供历史的、现实的和理论的纲目。"文化诊断"和"文化自觉"，是本书最重要的主题。

二、中国历史上错失三次国际发展战略的历史机遇同"文化自觉"的关系

第一次机遇：大航海与郑和下西洋。

1500 年是分界线，以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为标志，世界开始相互联系的历史。

郑和于 15 世纪初七次下西洋，同西方比，时间更早，航程更远，航船更大、更坚，人数更多，使用的仪器更先进，显示出比欧洲更强大的航海能力。

但出海的目的是宣扬皇帝的权威和中国的富有，所到之处大量恩赐财物换取"臣服"，缺乏利益的生长，也不能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统治者没有意识到这是发展中国的机遇。一道圣旨叫停，航海事业告终。开始了全面落后于西方的历史。

---

① ［德］乌尔里希·贝克等著：《自反性现代化》，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第 10 页。

② 《新华文摘》，2000 年第 1 期，第 134 页。

这同中国的“内陆文化”自我封闭的传统有关。也就是说，封闭性不除，就没有民族文化的自觉。

第二次机遇，中日洋务运动竞赛。

一百多年前，19世纪末，中日两国学西方。日本的洋务派在振兴对外贸易，推进洋务方面，虽然不是以直接建立现代国家为目标，但试图参考西方国家制度来进行本国国家制度改革的意向是明显的。经历了一段试验之后，从“和魂汉材”转向了“和魂洋材”，迅速确立了“西学为体”的方向，为日本近现代化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中国的洋务派的努力是有成效的，但其底线止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触动封建专制制度的改革举动，胎死腹中。

中国的“伦理政治”文化，渗透了封建、专制对民主、科学的排斥，把民族文化自觉，阻断在黎明之前。

第三次机遇：冷战时期的机会。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苏两霸冷战对峙，科技革命出现第三次浪潮，为许多国家的发展提供了重大的战略机遇。以亚洲为例，在战败废墟上重建国家的日本抓住了机遇，韩国抓住了机遇，新加坡抓住了机遇，殖民地的中国香港地区也抓住了机遇。中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抓住了，奠定现代工业的初步基础，但六七十年代，世界经济科技蓬勃发展，而中国发生了政治内乱，“自我封闭”，丧失了大半时机。

极“左”的文化狂热与自我封闭相结合，使我国建国时开启的伟大的民族“文化自觉”蒙受耻辱和昏暗，坐失发展机遇。

现在是第四次机遇：冷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领域革命全面加速，政治多极化局面正在形成。第四次国际发展战略的历史机遇所需的基本条件是具备的：一是较好的和平环境，主要大国之间没有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二是促进生产力跳跃发展的重大发现和发明（第一次机遇中体现为地理大发现和随之出现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后两次机遇中体现为第二次和第三次科技革命）；三是世界经济持续发展。这是世界历史发展提供的第四次战略机遇。面对这个新的历史机遇，发展中国家要么抓住机遇，奋起直追；要么越来越贫弱、边缘化。而对中国来说，这次国际发展战略机遇比前三次都好。

为了不丧失机遇，要总结前三次的历史教训。民族“文化自觉”是主要教训之一。中国共产党提出要“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专家们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实现“文化自觉”的主张。内陆文化中的自我封闭的精神遗产、伦理政治文化中的反民主反科学倾向，以及极“左”文化中的否定一切和肯定（自我）一切都是民族“文化自觉”的大敌。改革开放的文化精神、民主科学的文化精神，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文化精神，将保证第四次国际战略机遇，不会与我们擦肩而过。中华民族跨越式的复兴大计可期。

总之，中国人一定要搞清自己同世界的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都要搞清。搞得清和搞不清关系重大。搞清了，就知道中国人在世界上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就叫"文化自觉"。

美国著名的哲学家和作家、列马尔克研究所创始人、纽约大学资深学者托尼·贾德特在接受俄罗斯《莫斯科新闻时报》记者叶夫根尼·巴伊的采访时说："'9·11'事件后，美国人在问：怎么发生这样的事情？……怎么防止这类事情发生？这些问题后来淹没在打击'邪恶轴心'的喧嚣中而没有得到回答。搞不清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美国就无法遏制恐怖主义。"他认为："政府班子里最有影响的是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他们是热衷于意识形态的人，不仅宣传极端保守主义，而且鼓吹把世界分成善恶两种力量的基督教保守主义。"这就是哲学家为美国现政府这个"不寻常的政治混合体"所作出的"文化诊断"[1] 且不论这个"文化诊断"的科学性与真理性，至少它有助于美国人头脑清醒，但美国的当权者不会接受这个"诊断"。

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和西方世界的"文化诊断"，同样是不易的，都要付出长期的、反复的历史代价。中国人付出代价的过程，长达数百年，尚未结束，西方人付出代价过程，也会以百年计、刚刚开始。这本身就是东西方文化比较的历史进程。

三、"威胁论"和"文化诊断"与"文化自觉"的关系

文化不是金钱，不是武器，不是石油和粮食，不是富有和强大的标志。国家之间，民族之间，谈论现实的较量和威胁时都不会首先提到文化。

日本媒体近十年来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是中国什么时候成为亚洲第一经济大国，是21世纪的20年代还是30年代？有人为此感到惶恐不安。不安的缘由是中国人手里将要拥有的"金钱"和"武器"，而不是"文化"。

美国人，即使是意识形态色彩最鲜明的鹰派人物，在谈到"中国威胁"时，也是谈金钱谈武器，禁止把可能有利于中国军事技术的"科技"秘密"销售"或"泄漏"给中国。

俄国人更有意思，普京于2002年底访问中国前夕，"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对1 500个俄罗斯人进行了民意测验，以了解公众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印象。调查的结果表明，有2/3的被调查者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是好的"。为什么呢？尽管被调查的人当中53%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但是他们没有人肯定中国的"文化"，67%的人是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比俄罗斯成功"、"中国将变成

---

① 参阅《莫斯科新闻时报》2003年1月28日文《美国仍弄不明白为何自己不受人欢迎》，同时见《参考消息》2003年2月2日。

经济强大的超级大国。中国购买俄国的最现代化的武器，它将变成不仅对弱国，甚至对美国都有威胁的国家"。还是金钱，还是武器，没有"文化"。

显然，从来论国者，很少提到文化是威胁。但有一个人是例外——美国哈佛大学的塞缪尔·亨廷顿教授，他认为个性鲜明的伊斯兰文化，重新崛起的中华文化是对当今或今后的西方世界的威胁，或"潜在的威胁"。同塞缪尔·亨廷顿相同或相近，西方和东方不少政治家、学者都认为国家和民族之间发生冲突的深层原因是"文化差异"。也就是说：归根结底，国际冲突的"罪魁祸首"倒是文化。

说"威胁"时，对文化视而不见，只看到金钱和武器；说威胁的"原因"时，对文化另眼相看。这是当今世界浅薄的、人云亦云的、不负责任的或别有用心的政客和学者的两种"威胁"论。

这两种观点，既不利于西方的"文化诊断"，也不利于中国的"文化自觉"。本书将证明，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

东西方文化比较学，或者中西文化比较学，从纵向研究上来看，是从古到今的世界历史学的组成部分；从横向研究上来看，它又是近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民族、各国人民交往史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对世界历史的研究正是从上述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是从纵向研究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将历史发展揭示为生产方式依次更替的过程；二是横向研究近代以来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将历史的发展概括为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面对今天全球化趋势，尤其要加强后者的研究。对文化的比较研究也是这两个方向，也是要加强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研究。而抓住了西方"文化诊断"和中国"文化自觉"，就抓住了这两个方向的交汇点。

第四节　如何学习《东西方文化比较导论》

第一，假设自己现在站在世界的最高点——喜马拉雅山顶端，环视全球，远望西边是西方，巴尔干、多瑙河、南欧、西欧、东欧、北欧、大西洋，彼岸是美洲，还有澳洲，这就是西方。向底下看，地中海东岸是西亚，南岸是非洲；西亚之东是阿拉伯半岛，西方人称它为近东；伊朗、阿富汗这一带，西方称为中东；印度以东为远东，这就是东方。

在时间上，设想自己站在过去与未来的交通"指挥台"上，看到历史的纵深，看到未来的远景。

这样，你就站到了时间与空间的中心点上，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鸟瞰世界的全貌，考察过去与未来，心中有一个历史与现实的全局。是的，同学们，你们相关的知识不够，这是事实，但没关系，因为这是暂时的。其实，数百位

同学，你们的知识总量要超过我一百倍、两百倍。当然，我在要讨论的这个问题上可能是比你们强点。我的责任是帮助各位走上审视东西方的这个制高点和指挥台。

第二、主要是集中注意力听课，翻开的不光是讲义、资料，打开的不仅是笔记本。要翻开记忆的百宝箱，打开心灵的旷野，启动思维的脚步。喜欢的、不喜欢的，听下去，听进去，潜入智慧的熔炉去分辨、去取舍、去吸收，越是不懂的地方，越要注意力集中，引起兴趣和思考。重要的是每位学生要从课堂里得到启发和思路。中外优秀文化都是智慧的结晶、道德的结晶和情感的结晶。研究东西方文化，就是在人类智慧之路、道德之路和情感之路上游历、体味，启迪未来的人生，探寻未来的人类之路，并非搜奇猎异之旅。

第三、要做有心人。大学生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要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操守，不要随风上下。去实用名利之欲、存沧海横流之心。"功名富贵能长久，汉水亦应西北流"，这是李白《江上吟》的两句诗，为什么呢？还有两句："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千秋。"知识呀，真理呀，美的创造呀，是永恒的，与日月同辉。贵为王者，也是短暂的，经不起时间的冲刷。李白还有一首《行路难》，大家都读过也背诵过，应知道它的精神，人生有很多难处，会碰到至难的时候，"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啊。即使在这样至困至难的时候，也要坚信"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对自己，对别人，对全人类要有信心。人类文化，是教人相信人类有无限创造力的。有为的青年，不要追求满足个人眼前的功利、名声、富裕和地位。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时过境迁就淹没在时间隧道中。当今社会是商品社会，实行市场经济，其好处是经济繁荣，物质生活水平提升很快，但社会、精神领域喧嚣、躁动，到处充满诱惑。短视、狭隘、尖刻、冷漠、蝇营狗苟、淫靡奢荡之风日甚一日。青年人容易堕落，成器难。对此应"看破红尘"，出污泥而不染。至少要自警，把它看得淡一些。古今中外文化的主流，是提倡有理想、有奋斗、有信仰、有信心。要敢为理想而奋斗，相信理想能实现。否则，人类怎么发展到今天，怎么会有过去和未来。

第四，最后，每个同学都要自觉培养自己的"文化感觉"。什么是"文化感觉"呢？马克思说过："不仅是五官的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① 马克思的论述为"文化感觉"提供了理论基石。而江泽民同志的另一番话，则为"文化感觉"作了具体的阐述。白寿彝教授主编的12卷22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

册《中国通史》全部出版时，江泽民写信向他祝贺九十岁华诞，信中说："读一读中国通史，这对大家弄清我国历史的基本脉络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增强唯物史观，丰富治国经验，都是有好处的。同时，我们也要学习外国的历史。历史知识丰富了，能够'寂然疑虑、思接千载'，眼界和胸襟就可以大为开阔，精神境界就可以大为提高。"我们说的"文化感觉"，就是指这个文化"眼界"和"胸襟"。这种眼界和胸襟，是通过知识的积累和缜密的思考获得的高远精神境界——所谓"寂然疑虑、思接千载"的境界。（寂然，佛教语；寂然界，指佛教证悟所达到的最高境界，此处借用）。在"知识爆炸"的时期，知识更新的速度很快，许多知识会过时，但一个人的"文化感觉"不会过时。

第一章　东方与西方

第一节　东方与西方的划分

地球有50亿年历史，人类有300万年历史。

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约有5 000年至7 000年。

人类何时起在地平面上分东西南北？据说最早使用东方与西方称谓的是古代的闪米特人，他们生活在亚洲西部，是当今打了几十年仗的以色列民族和巴勒斯坦民族共同的祖先。他们把太阳升起的一方叫东方，太阳降落的一方叫西方。我们中华民族何时起有东南西北的方位感和概念？无准确记载。但从我们祖先造字来看，“东”字的形象，是日出升到树木上，“西”字的形象是日落在地平线以下。取义与闪米特人是相同的，这叫太阳定向：“日出东方，日落西方”，直至现在人类还继续采用。此外，随着科技进步，还有北极星定向、罗盘定向等。

随着社会生活领域不断扩大和复杂，近现代人类关于东方和西方的划分已具有了多种含义：

政治上分东方与西方。我们反对“全盘西化”，这里指的“西化”是政治上的资本主义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欧出现了与苏联接壤的一大片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越南、朝鲜、蒙古、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在亚洲东部。世界上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对峙的局面。人们往往称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东方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国家。东方和西方，几乎成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代称。毛泽东说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比喻。古代和中世纪欧洲基督教国家对伊斯兰国家多次发动的“十字军东征”，也是政治上分东西方。

经济上分东方与西方，即富裕的西方与贫穷的东方。有人说当今世界，文化分东西，经济分南北。其实这是东方国家的看法，特别是国际上提出了“南南合作”之后。因为不发达国家、很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多数都在赤道以南和北回归线以南。至于西方发达国家或比较发达国家，一直把东方看作殖民地，是国际资本输出、国际掠夺、原料供应、商品推销、军事占领的贫困落后的蛮荒之野。这是不公正的，但却是残酷的现实。中国人忘不了“东

亚病夫”的称号。

制图学的东方与西方。1519 年，麦哲伦率领一支探险队，从西班牙出发，向西横渡大西洋，绕过南美洲，穿越太平洋和印度洋，历经三年，1522 年回到原出发地，证明地球形状是圆形的，自此人类才逐步认识地球的真面貌。经过科学测算，通过卫星照片，人类发现地球是赤道半径（6 378 公里）略长于极半径（6 357 公里）、赤道略鼓、两极稍扁的不规则的球体。为了生产建设、航海航天、行军打仗、交通旅游，人们要为地球绘制各种不同比例尺、不同用途的平面地图。这样的地图应该全球通用，必须统一规定全球的东南西北。到 19 世纪，国际上有了东经、西经和南纬、北纬的规定。1848 年华盛顿国际经度会议规定，通过英国伦敦格林尼治天文台原址附近的经线为 0°经线，也称本初子午线（Prime Meridian）。从 0°经线向东、向西各划 180°，以东的 180°，简称东经，以西的 180°，简称西经。与经度垂直的是纬线，最长的纬线是赤道（Equator），赤道向南、向北各划 90°，以北称北纬，以南称南纬。这就是全世界约定的东西南北，至今也不过一百多年。国际上还规定，以西经 20°和东经 160°的经线圈，把地球划分为东半球和西半球两大部分。以便把亚洲、欧洲、非洲和大洋洲的绝大部分被划在东半球内，南、北美洲被划在西半球内，以避免一个陆地洲划在两个半球所带来的不便。以上便是制图学上划分的东方与西方，它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东西方有较大的不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欧洲、大洋洲，还有亚洲的日本属于现代西方国家体系，而不属于东方。至于文化上的东西方划分则另有异同。

文化学上的东方与西方。世界文化研究领域对如何划分东西方颇有分歧。但对现存的传统文化格局的划分却基本一致，认为可划为四大文化区，即基督教文化区、伊斯兰教文化区、佛教文化区和中华文化区。据我看应为五大文化区，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几十个黑人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可与上述四个文化区并立的“黑人文化区”，但长期被“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所淹没。以上五大文化区，基督教文化区属于西方文化体系，其余均属于东方文化体系。这在全世界文化学界，无重大争议。其中地跨欧亚的俄罗斯，自身与国际上公认其属于西方文化体系；地跨欧亚的土耳其，自身与国际上均认为属于东方文化体系，但它在经济上、政治上要求加入欧盟和北约集团也可以理解；地处东亚的日本，经济上、政治上属西方体系，但文化上国内外都认为它属东方体系；大洋洲虽地处东半球，但国内外都认为经济、政治、文化都属于西方世界。这四大或五大文化区划分的格局，文化学界普遍认为，是在人类社会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也会在今后长期存在下去。在我看来甚至有可能永远存在下去。

现代世界文化精神与文化实力的结构和对比虽然出现了重大改变，但东西

方文化区的平面图并未发生变化。

第二节　东方与西方不平衡的历史发展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

东方与西方，从古到今发展不平衡，而且是大不平衡。对东西方的各种比较，都要了解这一前提。

古代（包括原始社会和奴隶制社会两个发展阶段）。人类建立了有世界意义的埃及王国、巴比伦王国、印度列国与孔雀帝国、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波斯帝国和中华帝国，只有罗马帝国属西方，人类有五大文化发祥地：尼罗河扇形三角洲文化、两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文化、印度河文化、黄河文化、爱琴海文化，只有爱琴文化属于西方。从时间上看，古埃及文化始于10 000年前，而古罗马文化始于公元前2 000年，东方比西方早6 000年。"公元前六至四世纪，古代文明大体已连成三片：从地中海东部到印度河一片，从印度河到恒河一片，中国一片。"[①] 三片中，西方只沾了一个边，几乎全在东方。古代东方社会与文化比西方先进。

中古即中世纪（封建社会阶段）。如果说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在东方和西方的发展，谁更充分、更典型，尚难定论，那么，封建社会的典型在中国应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从上古到中古的过渡是在历史的正常连续进程中实现的，不像日耳曼人在西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封建制度，从而也没有经济和文化的中衰和复兴等带有特殊的现象。中国在中古时代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高度的发展，阶级结构和阶级矛盾也比欧洲复杂，充分解析这样高度发展和结构复杂的封建社会将会加深我们对于发展较低和结构较简单的封建社会的了解，也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封建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②] 无论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先进的，全面充分发展的，就已经发现和遗存的文物、典籍来说，都是其他东西方国家所罕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宝库。这不是中国人的遗憾和耻辱，而是中国人的骄傲和光荣，也是世界东方的骄傲和光荣。中国历史对世界历史的重要性，中国对人类的贡献，到目前为止主要在封建社会阶段领先。近现代以来，为了现代化，中国人习惯于只是批判中国封建社会，这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但是很少提倡总结和吸取封建社会的正面经验和历史精华，倒是令人遗憾的。这对中国和世界都是一个损失，需要尽快弥补。整个世界的中古时期，可以说正是由于中国

---

①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7页。

②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6页。

的伟大文化存在，东方社会文化的发展才比西方先进，世界才更有光彩。

近代至现代（包括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阶段和后现代主义）。以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标志，西方最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成为近现代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在法国，恩格斯在说明马克思为什么特别注重对法国史的研究时指出："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应当只限于欧洲，笔者注）、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的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时期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正在上升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① 在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推动下，西方资本主义兴旺发达，出现了英、法、意、德、俄、美等资本主义列强，主宰了19世纪至20世纪的世界进程，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中心。东方落后了，中国落后了。主要的东方大国都成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何况小国。这才是古老东方的遗憾和耻辱。东方的日本，也步西方后尘在东方最早成为资本主义强国。可惜，它不但没有带动东方国家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之后，还成为西方列强掠夺扼杀东方国家和民族生机的东方首凶，其顽固分子至今不肯走出罪恶的历史阴影。

社会主义的曙光也在西方最先露出地平线。德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创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俄国的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在1917年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第一个实践园地。尽管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已经消亡，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开篇，已经浓墨重彩地写在人类社会的史册上，这是西方人的骄傲，西方文化的骄傲。遗憾的是，现在西方人为此骄傲的人较少，持否定立场的人反而较多。但社会主义的火种仍埋在西方资本主义土壤里，而且是不灭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就是培育社会主义诞生的土壤，是资本家无情地播下了社会主义的火种。社会主义也会无情地占领和继承资本主义园地的一切。否则，除非人类社会的发展突然终止。

不像资本主义的好运总是偏袒西方而把厄运带给东方，社会主义的光荣和艰难没等到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就较早地降临到东方，特别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中国。1840年伴随鸦片战争的炮声，西方人给中国带来了资本主义；1917年十月革命的炮声，西方人给中国送来了社会主义。从1919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2—583页。

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选择了社会主义。在20世纪末世界社会主义经历狂风恶浪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翻船，反而成为人类历史新阶段的航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呼声响彻世界。不管是大国、小国、穷国、富国，不管对新中国抱何种立场，都承认中国在衰落几百年之后的崛起和巨大进步，是全世界历史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历史似乎开了一个玩笑，落后的东方又在推动先进的西方了。是“风水轮流转”，还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是中国一些学者的说法。西方人不这么说，他们叫“后现代时期”。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国家打资本主义国家，导致社会主义革了资本主义的命；20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国家打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打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不管怎么说，资本主义现代化总是出了问题，除了帝国主义战争的自相残杀和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两极分化，还有现代化本身的三个负面效应——人口爆炸、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资本主义社会的前途是什么？难道真要被社会主义社会代替吗？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知识分子们在思考，并作出分析，议论纷纷、著述颇丰，成了思潮，成了主义，就是“后现代主义”。20世纪末，苏东剧变，社会主义发展受挫，他们也高兴不起来，还在思考。德国、法国、美国、英国的思想家、学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风险和出路，又提出了新的“理论概括和文化诊断”，这叫“后现代主义之后”，或继续称“后现代主义”。这不是人类历史的新阶段，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后期症状的思想反映。作为西方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它面对一个重大的历史主题：当代资本主义的命运。这也是东西方文化比较的重大主题。因为这一主题实质是人类的命运与前途。

由于东方和西方之间、东方各国之间、西方各国之间，存在民族历史、地理条件、科学技术、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等方面的不同背景和不同特点，社会历史发展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当我们在国与国之间，特别是东方和西方之间进行宏观比较时，要注重历史规律的探求。东方与西方社会历史的发展、全球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都遵循一个共同的规律：从绝对不平衡走向相对平衡，再从新的绝对不平衡走向新的相对平衡，如此反复多次，最后达到全人类大多数人比较满意的相对平衡状态——世界大同。人类离这个目标还远得很，但是在加速。“全球问题”的提出就是最好的证明。

“广义进化研究是目前正在兴起的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目的是要在20世纪自然科学和系统科学伟大成就的基础上，对宇宙进化、生物进化、社会进化和未来全球社会进化的全过程做出首尾一贯的圆通的科学解释，以指导人类

顺利解决‘全球问题’，进化到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①

在我看来，东西文化比较就是从东西方的不平衡发展中探求历史发展规律，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问题”的系统科学群中的一门。

第三节 关于消失了的古老文化（文明）

这是分析世界文化格局时不可回避又常存疑误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在如何看待世界各个古老文化的历史这一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概念上的错误认识和事实上的理解误区，即当我们说到古埃及文化、两河流域文化之类的历史悠久的古代文化“具有5 000年以上的文明历史”的时候，我们实际上说的是一个已经消失了的古代文明。这些地域曾经在五千多年前就进入了文明时代，但它们很久以前就已经消亡了。它们与今天存在于其发生地的现代文明不但没有一脉相承的继承关系，甚至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例如古埃及文明与现在埃及的阿拉伯文明就是如此——当古埃及文明消失若干世纪之后，阿拉伯文明才进入今天的埃及地区。其他如古代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和今天西亚地区的阿拉伯文明的关系，古印度河文明与今天的印度文明的关系，同样也是如此。所以严格地讲，这些古代文明并不是具有5 000年历史的文明，而不过是曾经在5 000年以前出现过，其后又消亡了的文明而已，它们本身没有延续5 000年。此其一。

其二，文明史长短之争没有必要。中华文明，从远古走来，沿着自身固有的脉络和轨迹不断向前发展，从亘古走到今天而从未中断，始终保持着迥异于其他文明的、独特的文化内涵与文明特色。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实在没有必要与别人去争辩究竟谁的文明历史最长的问题，也没有必要把我们的文明史硬拉到5 000年那么长。因为，四千多年来延续不断的文明史，已是人类持续发展最长的文明，而且长又如何？短又如何？倘若文明史长值得自豪，莫非文明史短的民族就要自卑？显然不是。

其三，最重要的是了解不同文明的特点。与中华文明有着同样历史的古老文明，在近代工业文明远未到来之前便已归于消亡。只有中华文明不但从未中断，而且在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反而焕发出新的活力。何以如此？又如，中国的国家体制发展具有鲜明的特点，世所公认。其发展的早熟性、体系的完备性、组织的周密性以及从未中断而且不断向更高阶段演化的特点，早已为各国的史学家所重视。它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又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这种成熟的国家体制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国家体制为什么能从

① 《多种文化的星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广义进化研究丛书》序言，第1页。

早期的国家发展到成熟的国家？不同的时期有哪些不同的特点？其渐进演化的过程具有何种意义：史学工作者、文化学者应当而且必须回答，至于文明史究竟多长，实事求是就对了。

参考资料

1　世界地图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

2　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1卷（1648　181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4　毛磊，石光荣，郝使君　中西500年比较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

5　钱伯斯．世界历史地图．杨慧玫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6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第二章　文化与文化学

第一节　什么是文化

世纪之交，世界对文化定义取得共识的可能性增加了。美国《未来学刊》1999年1月号发表了国立澳大利亚大学访问学者理查德·埃克斯利《生活真的在变好吗?》一文。他提出："现代西方文化的中心原则是相信进步，相信生活变得越来越好——更健康、更富有、更幸福、更满足、更有趣。"他指出发达国家在文化观念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以物质条件定义进步……把'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画了等号。"理查德·埃克斯利引证美国生理学家的研究阐明：财富与健康并不成正比。财富作为幸福的标准是一个很差的标准。人们并没有随着财富的大量增加变得更幸福。大多数国家，收入和幸福的相关性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只有在贫穷的国家里，收入才是适宜的衡量幸福的标准。影响人们健康和幸福的，"似乎更多受到收入分配方式而不是分配水平的影响；与绝对贫困相联系的物质匮乏对健康的实际影响并不十分重要；相反，社会不平等造成的相对贫穷的心理和社会结构对健康的影响却比较大"。因此他希望"我们不应该仅仅局限于集中精力创造物质财富"，"而应该把眼光放到比增长更远的范围"。我认为，现代西方文化的这个中心原则，东方也是会认可的，全世界都是能取得共识的。但走向共识的时间和路程是很长的。只要人类的文化观念走向统一，那么有没有统一的文化定义就不重要了。但现在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政治家、经济家、科学家、军事家以及一切愿意谈论文化的各类人士，都乐于给文化下定义。出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目的、不同的方法，言人人殊；同一个人，也可以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但都没有形成什么学派，这是为什么？我们与其研究文化的定义本身，不如先了解一下定义的情况。

凡认真讨论文化定义，都会涉及以下三条。第一条是文化一词的来源。西方"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 Cultua，意即"耕种出来的东西"、"人造物"。自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提出"哲学是心灵耕种的产物"以来，人类精神产品就被纳入了文化范畴。德文 Kultur、法文 Culture 俄文 КулъТура 皆从英文 Cultur 演化而来，基本含义都大致包括教养、陶冶、栽培、养育、耕作等。在西

方的原始概念中，“文化”一词既包含人的物质活动，也包括人的精神活动。与中国古代“文明”一词相近。《尚书·舜典》：“浚哲文明”，唐人孔颖达疏解为：“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是从人类的物质创造扩展到精神，兼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意义。而中国古代“文化”一词，汉以前，“文”与“化”分列，汉以后才合成一个词用：“文化不改，然后加诛”[①]“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②]，“文化内辑，武功外悠”[③]。这里的文化有两个意思：或与天造地设的自然对举，或与无教化的“质朴”、“野蛮”对举。只有“教化”这层意思与西方相近。

第二条是近现代第一个给“文化”下定义的是英国文化人类学先驱爱德华·泰勒（1832—1917），他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认为，“文化是一个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从社会上学得的能力与习惯”。后来欧美文化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基本上沿用这一定义，但在“知识”前面加上“实物”一词，使“文化”的定义包含“实物”这一现象。[④]

第三条是20世纪，“文化”这一概念由学术领域进入社会思想领域，以至整个人类的社会生活。各学科的研究者和各界社会人士都在自己的范围内确定“文化”的概念及其内涵与外延，使得“文化”这一概念多义化，文化定义层出不穷。1952年，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和克拉克在所著《文化，关于概念的定义的探讨》一书中统计，从1871年到1951年，文化的定义达161种。现在又过了五十多年，这种状况愈演愈烈，至少已达200种。就连英、美、德、日、苏联、西班牙等各国的《百科全书》也各有文化的定义。目前的情况是，有多少人研究文化几乎就有多少个定义。

据我所看到的几十种定义，其创造者所使用的方法有四种：一是广义的，认为“文化”就是“人化”、“人类化”，人所创造的和习得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成果都是“文化”，“文化”等于“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二是狭义的，不包括物质文明，专指精神文明；三是浅义或常义的，指文化知识，如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语言、历史、文学等人类积累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及其修养；四是深义的，指民族的灵魂和性格。

考察各种文化定义的依据不外乎以下四种文化形态：一是物化形态、又叫

---

① 《说苑·指武》。

② 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

③ 《文选·补亡诗》。

④ 参见孙西文著《社会的文化基础》，世界书局1932年版，第24页。庄锡昌著：《世界文化史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

实物现象，如中国的万里长城、埃及的金字塔，考古学家发现的各种文物；二是意识形态，如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政治意识、道德观念、科学观念等；三是制度形态，如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礼仪、风俗方面的制度，法规、条例、习惯等；四是知识形态，如书面的或行为传授的知识技能及其载体。

中国人现代的“文化”概念，译自日本，日本译自西方。中国人给“文化”下定义的情况也是言人人殊，多人多义。我希望，我们在研究文化时，多注重文化本身，少注重文化定义；在参考多种文化定义时，应取其“义”，而不取其“多”。坚持唯物主义的方法，从实际出发，不盲从，即使没有发明创造，至少离事实和真理不要太远。应力求在模糊不清的局面中，做到别开生面。

第二节　什么是文化学

研究文化产生、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规律的科学叫做文化学。

“文化热”带来文化学的繁荣。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是文化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自身在扩张，如文化学概论，文化学史，国别文化学，民族文化学，高雅或通俗文化学，古代文化学，现代文化学，人类学，民俗学，比较文化学，等等，新领域、新课题、新学科不断扩大；二是其他学科向文化学“攀亲”，如哲学与文化联姻产生了哲学文化学又称文化哲学，还有文化经济学、文化社会学、法律文化学、科技文化学，等等。

文化学涵盖的内容在变化，传统的课题面临新情况，新问题也不断提出。从提出问题的角度来看，主要是：

一、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文化是人创造的，人是动物进化的。“人猿相揖别，只不过几个石头磨过。”“磨石头”就是生产和生产关系，就需要智慧、道德和情感，而这就是文化。动物有生有死，其生命虽有后代，但它没有历史可以延续。因为动物只有本能，没有智慧、道德和情感，没有创造文化“零部件”。人也有生有死，不但生命可以通过后代延续，还有人的历史延续，因为人有智慧、道德和情感即文化的“零部件”。人类历史的延续主要是文化的延续，人所创造的文化“零部件”，不随人的肉体消亡，而一代一代融合在人类文化的整体之中了。

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已经证明，人告别动物之后，不是孤立的单个人，而是社会关系中的人，是生活在一定群体中的人。人所创造的文化，不是个人的文化，而是群体才有，群体所有。最早的群体就是血缘关系组织——家庭、原

始部落和氏族，以后逐步演化为现代民族：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 共同心理素质的民族。民族文化是民族的根本特征和标志，民族性是文化的根本特性。世界上只有民族文化，没有抽象的世界文化。世界文化是由各民族文化共同构成，没有民族文化就没有世界文化。各民族文化的世界性，是民族性的扩展和延伸，是指民族文化对世界其他民族发展的推动力和影响力而言的，推动力和影响力越大，对世界的贡献就越大，文化的世界性越强，反之亦然。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是统一的，正如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是统一的一样。

有一种观点把文化划分为"民族性较强的和世界性较强的"两部分，而且这两部分"各有自己的特色"，民族性较强的文化指的是"表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文化或制度文化，以及表现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精神文化"，具有保守性、排他性、渐变性和相对性；而世界性较强的文化指的物质文化和科技文化，则具有流动性、全球性、速变性。不仅如此，民族性较强的文化部分，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和价值观念，"无法进行比较和衡量"，而世界性较强的文化部分，"它是可比较的，有先进与落后之别"。这种观点的结论更为有趣：为了复兴中华文化，对具有保守性、排他性、渐变性、相对性、没有可比性的"民族性的文化应该保守和弘扬，并大力加以开发利用"。只有这样才能"保留自己的民族性，才有可能长期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平起平坐" 而对具有流动性、全球性、速变性和可比性的世界性文化"应大量引进"，"使之与本民族固有文化融为一体"。这样的观点和结论是正确的吗？请阅《光明日报》2002 年 12 月 24 日 B4 版《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一文，并思考以下问题：

其一，"文化"是否可以分为"民族性较强的和世界性较强的"两部分。制度文化、社会文化、精神文化是民族性较强的文化，物质文化、科技文化是世界性较强的文化，这样定性对吗？

其二，"民族性较强的"文化具有保守性、排他性、渐变性、相对性；"世界性较强"的文化具有流动性、全球性、速变性。这样概括是否准确，举例说明。

思考之后，还得回到什么是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上来。

比较正确的观点和结论是，从文化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来看，民族性是文化的本性，即根本特性，世界性是民族性的拓展和延伸，两性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人文文化和科技文化都是如此。文化的民族性是绝对的，它决定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特点、差异、矛盾和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文化的世界性是相对的，它标志各民族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的推动力、影响力和社会历史发展的相对平衡性。人文文化和科技文化都是如此。文化的可比性、先进性和落后性，不在于它是精神文化还是物质文化，也不在于它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强

弱，而在于它对本民族和世界各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所起推动作用和作用的大小与正负。一种文化，对本民族的存在和发展起作用大，对世界的影响才会大，反之亦然；一种文化，对本民族的存在和发展，其作用是正面的、先进的，对世界的影响也是正面的、先进的，反之亦然，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而中外历史上出现的启蒙主义、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革命民主主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毛泽东思想等文化现象，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也是先进的，是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对各民族和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起正面推动作用的文化。文化的可比性、先进性与落后性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正是由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来决定的。

二、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

传统性与现代性首先是一个时间的范畴。人们对过去总是比较宽容，故人类关于传统性的理解比较一致；而人们对现在和未来比较固执，故人类对现代性各有各的理解。现代世界语境中包括西方与东方，关于现代性总体上有三种不同倾向的解读。我们得从现代性说起。

其一，资本主义现代性。其实质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和资产阶级成为社会历史的主角这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的一切特性。时间上，指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或者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或者英国1640年革命和18世纪产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思想解放运动、社会革命运动、经济奇迹的创造、科学技术进步等所显示出的进步性，如反封建性、民主性、科学性、竞争精神、冒险精神、个性解放，等等。这一历史过程已有500年或400年，至少300年，至今尚未结束，人们头脑里的现代性，都同这一过程中经济、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有关。

其二，社会主义现代性。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以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为标志，或上溯到1870年巴黎公社的斗争为标志，人类历史开辟了新阶段。以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以实现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的生产高度发达的“按需分配、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以实行同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决裂这两个决裂，创立社会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两个全面发展的新社会为旗帜，是一百多年来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这一新的历史刚揭开第一页，显示出了伟大的生命力，给全世界工人阶级、一切劳动者和善良的人们以希望和信心。由于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低潮，有幻灭、有沉默、有反思，更有新的改革、新的探索。社会主义现代性及其文化的现代性将更丰富、更成熟、更坚定。

其三，中性现代性，或称第三种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可以概

括为：既看到资本主义没有出路，又认为社会主义不是出路，要探索第三种现代性、第三种出路或第三条道路。这个中性现代性以全人类现代性正统地位自居，现在盛行于世。他们认为人类现代性的发展可分为五大阶段：第一阶段是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这是早期现代性；第二阶段，从启蒙运动到19世纪末，以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一大批思想家为代表，对现代性的不同层面做了深入细致的思考，这是中现代期；第三阶段，是鼎盛现代期，即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以尼采、马克斯·韦伯、迪尔凯姆、齐美尔、弗格伊德、阿多诺为代表；第四阶段为后现代期，即20世纪60年代，现代性问题置于后现代背景中加以审思和反思；第五阶段，即现在，冷战结束，世纪之交，又称为“后现代之后”阶段，现代性似乎成为全球主要国家学术界最重要的关键词，成为哲学、政治学等各种社会理论、美学和文化研究等领域关注的重大课题。这个后现代主义以社会批判为己任，我们之所以称后现代主义为中性现代性，就是因为在这个旗帜下的知识界和学术界，标榜既不是以社会主义立场批判资本主义，又不以资本主义立场同社会主义对立。他们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繁荣与危机赛跑阶段的产物，既同资本主义对话，又同马克思主义对话。当代中国对这一思潮十分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翻译出版了“广义进化研究丛书”，商务印书馆推出了“现代性研究译丛”等，系统介绍了当代西方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当前国内外对第三种现代性的研究很热，但越热对现代性的认识越不清晰。这是一种只看病不开处方的现代性，表现的是一种有病不吃药的英雄主义。有人评论它政治上“像一个忏悔的斗士”，文化上“以相对主义始而以绝对主义终，貌似激进而实质保守，构成与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和文化状况相共谋的关系”。① 这个评论是正确的。

我们所说的文化传统性与现代性，同上述三种现代性有密切关系。文化的传统性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关系，那就是指资本主义社会以前文化传统同资本主义新文化的关系；文化的传统性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关系，那就是指社会主义以前的文化传统同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关系。依此类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时代的文化，都有文化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其实质是继承性与创新性的关系。同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是统一而不可分割一样，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也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统一不是同一，不可分割不是没有区别。人们像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一样，也不能选择文化传统。对传统只能承受，只能消化，只能改造，只能利用；对创新人们却可以进行选择，选择现代，选择未来。了解文化的传统性和现代性的本性，就是认识把握一个规律：

---

① 参见王川、梁刚：《辩证批判与对话——评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想〉》，《光明日报》，2001年6月7日。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传统，不管怎么变革和创新，都只能建立在一定的传统之上；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现代性，必须改革与创新，否则就意味着停滞和死亡；文化的创新是绝对的，传统是相对的；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

三、文化的人性与阶级性

文化学上，人性是指人所具有的正常的感情和理性。阶级性是指有阶级的社会里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所必然具有的阶级特性。

是人就有人性，人创造的文化必有人性；没有人性的文化，没有文化的人性，都是不可思议的。人性是文化的根本特性之一。灭绝人性、反人性的文化现象是有的，那是在不正常的社会环境条件下产生的，不具有正常感情和理性的人之所思所为。这是人所共知的。

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文化必然有阶级性，因为文化属于不同阶级的人所共同创造。在阶级矛盾尖锐、阶级斗争激烈的社会发展阶段，文化的阶级性更为鲜明。这也是人所共知的。

反思两个世纪以来，特别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诞生以来，在人性与阶级性的理论和实践（特别是文化）领域所发生的曲折，是耐人寻味的。似乎人性、人道主义的大旗总是由世界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高举着，而阶级、阶级斗争的旗帜总是由世界无产阶级高举着。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内部，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总是同"修正主义"联系在一起，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总是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对这一事实反思之后，也许可以冷静客观地分析人性与阶级性的正常状态。问题不在于文化有没有人性和阶级性，而在于认为人性和阶级性似乎可以机械地分开来，让一些人或阶级单独把人性拿去当武器，另一些人则单独把阶级性拿去当武器，从而陷入了形而上学的盲目性。实际上人性与阶级性，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分的。正因为有人性——处在生产关系中由于占有生产资料和获取分配方式的不同社会集团中的人，都具有正常的感情和理性——才有阶级性，阶级性就是人性的具体表现。以为自己可以只讲人性而不讲阶级性，或者以为自己只讲阶级性而不讲人性，在理论上是自欺欺人，在道德上是虚伪。在当代中国，以为坚持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就是极"左"派的徒子徒孙，以为反对极"左"就必然反对阶级和阶级斗争，更是愚蠢可笑的。在这个问题上，不需"韬光养晦"，而要旗帜鲜明：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人性是绝对的，阶级性是相对的，人在有阶级和无阶级的社会里都有人性；在有阶级的社会里，阶级性就是人性，阶级性是绝对的，人性是相对的。认为强调人性的重要性使

自己很难堪的人有之，认为强调阶级性使自己很被动的人有之，这两种人实际上自觉不自觉地表现了自己的阶级性和人性的本质。在文化问题上，更是如此，比其他问题更敏感、更鲜明、更难掩盖、更难伪装。这就是文化的人性和阶级性的底线。

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传统性与现代性，人性与阶级性，是文化的三组根本特性。各组内部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三组之间也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共同构成和体现现代各民族文化的本质。正确分析本民族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关系、人性和阶级性的关系，准确认识本民族文化的本质，才能坚持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作出正确的“文化诊断”和实现真正的“文化自觉”。

第三节　文化与文化学面临的问题

当今世界，从西方到东方，从国家元首到平民百姓，从将军到学者，从教师到学生，从企业家到消费者，都关注文化，为什么？在他们那里，文化摆在什么位置？文化建设和文化研究面临什么新问题？

一、文化冲突论

这是西方国家政界、学术界当前普遍流行的研究世界格局的新论点。代表人物是塞缪尔·亨廷顿。在他所著《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和1999年发表于美国《外交》双月刊3—4月号《孤独的超级大国》等著作和文章中，反复论证以下观点：冷战结束以后的世界，在过去的十年中，“全球政治根据不同的文化和文明重新进行了组合”，代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峙、美苏对峙、政治和军事对峙的，将是文化上价值观念的冲突；西方世界在冷战中取得了胜利，但在价值观上没有取得胜利，“世界正在迈向各种文化的冲突”，而且在这种文化冲突中，西方的价值观受到了自我意识越来越强的东方文明的挑战，特别是东方强势文化——以儒学为核心的华夏文化的挑战；“力量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今后若干年中，将决定性地勾画出联盟和敌对的形式。就文化而言，合作更可能在两个文化相同的国家之间进行，而对抗更可能在两个文化截然不同的国家之间产生”。在他们看来，文化冲突将影响甚至决定未来世界的格局。

与此同时，西方世界流传对中华文化的“恐惧论”。而我国一些学者，世界各国华裔学者关于弘扬中华文化优秀遗产的研究，特别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论者也认为：西方文化主导世界数百年已经逐渐呈现自己的弱点，并非如一些人想像或希望的那样它是通向真理的唯一之路，西方文化已是

"技穷力尽"，济之之法只有东方文化。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华文化将代替西方文化主导世界，在继承西方文化精华的基础上，使人类文化发展到更高的水平。这本来是科学的探索，却使得"文化冲突论"者和"恐惧论"者似乎找到了更多的论据。

二、文化幻灭论

这种文化幻灭论，主要发生在冷战后的俄罗斯、东欧和西亚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所在地，最典型的是俄罗斯。在共产党人丢掉了政权，社会主义制度被抛弃，人们经历了连续十年的经济下降和文化动荡之后，有一种不愿说出来的文化悲凉和迷惘。西方人称之为"十年的幻灭"，主要表现在：

文化人（特别是艺术家们）和老百姓为曾经渴望享有的文化改革带来的自由，付出了痛苦的代价。人们曾希望得到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文化自由和自由文化。得到了没有？得到了。原来被禁止的书刊、绘画，可以出版了；原来被禁止的展览，不仅在莫斯科而且到巴黎、纽约、柏林展出了；原来不让进口的西方文化包括好的、不好的、黄色的、灰色的统统都可以进来了。但西方对俄罗斯"艺术文化"很快就厌倦了，而俄罗斯对西方文化也领教了。一个英国人这样描述："俄罗斯很多艺术家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受到共产党统治瓦解后那种困境的影响：犯罪率不断高升，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国家拨款被取消。自由造成的问题和它能解决的问题一样多，非共产党人已不再是英雄。"一些人从这个自由里得出的结论是令人震惊的，俄国诗人霍卢布说："如果当时知道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即使我们的作品不能出版，绘画不能出售，我们也愿意忍受。"他们后悔了、失望了、迷惘了，不知如何是好了！

文化人和老百姓曾经预测的"创造真正当代文化的努力走进了死胡同，走向危险的极端"。文化创造陷入"三无"状态：一无动力了，文化与市场力量冲突的后果是文化的贫穷，38 岁的年轻而有天分的画家费鲁别利的作品，"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给出版商，人家一转手就赚了 15 万美元"，著作权不知如何夺回；二无方向了，文化艺术的灵魂"失控"了，艺术家亚历山大·布雷纳在别人的作品上画一个绿色的美元符号算是创作；三无资金来源，原来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每年生产 40 部影片，现在只能生产几部，俄罗斯大剧院和艾米塔什博物馆没有资金维持现有的收藏，以致他们以"文化消亡"警告政府。

幻灭带来了反思，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文化曾有什么优势，有什么弱点？为什么在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压之下，如此没有抵抗力？资本主义文化那么令人向往，为什么又那么快令人感到幻灭与失望？十年中，两次幻灭，双重幻灭，告诉世人什么？

反思之后是沉默，沉默之后呢？……一个伟大的现代民族及其文化不会长

久沉默。

三、文化先导论

当代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

世界的普遍和平实现了吗？没有。世界城市首脑会议秘书长瓦利先生统计，从冷战结束到1999年，世界经历了10场局部战争和30场冲突（以死亡达千人以上者计），全世界每年的军事费用平均为8 000亿至9 000亿美元。冷战结束了，热战未断，“柏林墙的倒塌马上就会导致世界持久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的梦想已经破灭”，只是没有爆发世界大战。为什么人类没有停止自相残杀的战争行为？据说“和平观”、“战争观”、“安全观”出了问题。岂不又是文化问题？

发展问题解决得怎么样呢？不怎么样。发展是硬道理，中国和世界都是如此。怎么发展，发展的结果怎么样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分析和预测办公室主任热罗姆·班德于1998年12月1日发表一篇题为《发展无国界》的文章，提供了一个统计资料：20年来，从1980年至1997—1998年金融危机为止，全世界有15个国家的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增长，约有占世界1/4的人口（15亿左右）收入增加，与此同时，有100个国家的经济恶化或者停滞，从而导致另外1/4的人口（约16亿）收入减少，全世界处于绝对贫困的人口已达13亿至20亿（中国有多少？）；20年来，“地球村”贫富差距在扩大，世界20%最贫困的人口可怜地占有世界收入的1.1%，（而10年前）1991年所占的比例为1.4%，（30年前）1960年所占的比例为2.4%。世界前10位巨富的资产已达1 330亿美元，相当于全世界所有不发达国家国民年收入的1.5倍。解决全世界绝对贫困人口饮水和基本卫生设施的钱只需用1 300亿美元，比世界十大首富的财产还少30亿。现在有8亿人遭受饥饿或者营养不良，10亿人不能享受医疗服务、基础教育和自来水，20亿人用不上电，45亿人没有基本的电讯工具，无法接受对远程教育来说至关重要的信息技术（这意味着45亿人未踏进现代文明的门槛）。热罗姆·班德提出：“21世纪人类面临的第一大挑战是，会进一步出现日益加剧的空前的贫困和空前的富有现象共存的局面”。这是为什么？是科学技术没有进步？物质财富总量没有增加？不是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啊！物质财富迅速增长啊！那么到底为什么？不平等！国与国、民族与民族、阶级与阶级、人与人、地区与地区不平等！是发展模式问题，是发展观问题，是社会制度问题，是价值观问题？岂不又是文化问题！

因此，解决和平与发展的问题，需要有能够引导人类走出困境的文化——价值观为先导，这就是文化先导论的代表。无论国内外，尤其是西方世界，不断有人发出警告，和平与发展面临四大挑战和三大威胁。四大挑战是：

(1) 贫富悬殊加剧；(2) 经济全球化的后果是经济危机全球化，不少发展中国家迷失了发展方向；(3) 地球环境恶化，科学家预言，按传统工业化模式（西化模式）再搞一百年，人类将无法在地球上生存（由于环境的影响50%的男性精子在减少）；(4) 始终没有停止的局部战争和冲突。三大威胁是：(1) 人口爆炸；(2) 艾滋病蔓延；(3) 地下水层枯竭，人均耕地减少。这些挑战和威胁也全球化了，而且对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不分肤色、不分种族、不分年龄。对付这些挑战和威胁，都离不开正确的文化引导。值得注意的是，经济、政治、战争都没能解决问题，人们寄希望于文化。显然文化的定位被人为地提高了。

四、文化素质基础论

文化素质即文化素养，也就是人文素养。人文是什么？主要是指文、史、哲三方面的知识和素养。知识和素养有很大的差别。知识是外在于人的东西，如材料、工具，可以量化地掌握；素养必须让知识进入人的本体，渗透人的生活行为。人文素养，是指人涉猎了文、史、哲之后，认识到有一个终极关怀，对"人"的关怀，即对他人生命的热爱，对人类命运和前途的关怀，否则就谈不上人文修养。

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说。政治家、经济家、企业家应该懂得：政治家和政客之间一个重大的差别就是人文素质的高低；伦理是经济的灵魂，只讲钱不讲伦理的经济学就会变成贪得无厌的经济家，经济越"发达"，精神和伦理受到的损害越大；没有文化建设的企业，就像种在小花瓶里而不是扎根在沃土里的盆栽，是长不大的。当代世界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事实证明："文化不是过去遗留下来的静止的遗物，文化正好处在发展的核心。文化价值决定一个社会为自己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确定的优先发展的事情。必须想方设法使经济发展与保持和发育独特文化的必要性保持平衡。每个社会最终必须以独特的文化为基础。"[1]

从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说，19世纪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的"三大发现"即能量转化与能量守恒定律、生物进化论和细胞学说，使人们称它为"科学的世纪"；20世纪自然科学的"四大成就"即相对论的建立，原子结构、基本粒子的发现和量子力学的建立，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与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的创立，分子生物学特别是核酸的分子结构与遗传密码的发现，使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转折点；加上20世纪"三大技术工程"即原子弹工程、登月工程、生物工程，描绘出了宇宙、地球、生命、人的认识和大脑的图像，不仅

① 纳伦·普拉萨德：《我们不能忽视它》，《曼谷邮报》，1999年1月31日。

是科学技术的伟大成果，也是人类文化的新阶段。它给人文社会科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带来新的论证、新的课题和新的生命力。而在西方世界，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科学家和思想家所指出的）同人文主义的分离—对立—复归的过程。最终人们认识到，科学同人本主义、人文主义——这些曾使科学获得发展的巨大动力的人文精神，决不可以对立。

从人的教育与人才培养和成长的角度说。全世界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获得了更加一致的共识：只有自然科学才是科学，人文科学被贬低、被遗忘，人文精神的失落，教育被当作提供工业化人力的工具，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西方的反思，俄罗斯对前苏联教育的改革和中国现代教育的教训是：不具备人文精神的人才，不是健全的人才，也不可能真正成才。出路在于把科学技术的教育同人文教育相结合，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而不是工具。教育家、政治家、经济学家、科学家，尤其是“第四产业”论者，把人文教育、人文精神、文化素质，作为一切教育和一切人才培养的基础的呼声，达到了空前的历史高度。

五、文化产业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文化产业界定为：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文化活动。①

国际贸易中，文化商品在过去二十年中（以2000年为计）的贸易额是几何级数增长。英国文化产业年产值600亿英镑；美国文化产业更发达，产值占GDP约1/5，音像制品出口超过航空业，成为全美第一大贸易出口产品，占据40%的国际市场。

我国文化产业起步晚，经过二十多年的培育已初具规模。包括新闻出版业、广播影视业、音像业、演出业、娱乐业、艺术培训业、文化旅游业、群众文化业、图书馆业、文物业、博物馆业、会展业、广告业、咨询业、博彩业、竞技体育业、网络业等在内的综合型文化产业体系，已经成长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当前国际国内文化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理论和实践上都提出如下问题：(1) 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关系；(2) 文化产业结构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关系；(3) 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4) 文化产业全球化趋势与各国文化产业民族性的关系；(5) 综合国力（含文化力）竞争与国家文化安全的关系。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各类文化事

① 参见殿鸣《文化产业：全球新兴产业》，《光明日报》，2002年9月12日。

业和文化产业都要贯彻发展先进文化的要求，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①]把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作为两个概念提出，对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都有突破意义。公益性文化与非公益性文化、非经营性文化与经营性文化相对分离开来，其投资、管理机制、经营方式、运作方式、考核标准也就分别开来了。澄清了理论上的误区和减少了工作上的盲目性，有利于完善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道路。

文化产业是文化还是经济？文化产业是精神还是物质？发展文化产业是为了利润还是为了人们精神健康？理论问实践，实践也在问理论。

六、文化生态论

人类面临生态危机，普遍要求减少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实行新型工业化，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要抢了后代的饭碗，断了子孙的生计。有人以此为喻，提出了文化生态问题，提出人类需要文化的绿洲，每个人也需要美好的精神家园。在文化污染的环境里，人的精神会发生变态；在文化的荒原里，人的精神要枯萎；在文化沙漠里，人的精神也会扭曲、异化。大概这就是“文化生态论”这个看似时髦的理论产生的背景。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个理论的面目和形象是模糊的，在“文化是什么?”的问题尚且“言人人殊”的情况下，这个模糊是必然的，但它提出了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

其一是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文化。若婴儿一生下来就被狼叼走并在狼群里长大，他就是狼孩，没有“人的文化”；猫呀、狗呀长期生活在人群中，但却没有“人性”，因为没有“人的文化”。只有人类，才有文化、才需文化生态。没有文化生态就没有人和人类。

其二是人类延续和传承的不仅是生物意义上的生命（这与动物无异），更重要的东西是文化延续和传承，它是人类延续和传承的本质。因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的本质是文化。

其三是人类精神疾患的病因在于文化“气候和土壤”变坏所致。1999年9月14日《每周文摘》转摘《中国妇女报》载：中国精神病的患病率已从70年代中后期的3.2%至7.3%，上升到目前的15.56%。公认的原因有：（1）人们生活方式在不断变化，由此引起的社会心理矛盾增多；（2）几种主要的功能性精神病，如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神病治愈率低，复发率高；（3）酒消耗量大幅上升，酒精依赖和酒精中毒精神障碍患者增多；（4）环境

---

①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

污染是精神病发病的危险因素；（5）滥用毒品及安全类药物。此外老人孤独等多种精神问题，也导致患病率的增加。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伟大成绩，但精神病人大幅上升，文化问题亮起了危险的信号：预防精神灾难的风暴。而世界上许多先发与后发现代化国家，问题比我国更严峻。

其四是保护和建设良好的文化生态。各种各样的、系列的文化口号、文化战略、文化创新、文化基金、文化使者等纷纷登台亮相。

如果人类的“文化绿洲”得到保护和扩大，有没有“文化生态论”就无关紧要了。但愿这一天早日到来。

第四节　确定世界文化格局的依据

如何划分和确定世界文化格局：文化圈（又称文化大区、中区、小区），这也是文化研究中长期观点不一致的问题。我认为以下两种理论可作依据：

一、分析文化格局的几个范畴

1 文化层 —人类活动遗留下的痕迹、遗物和有机物形成的堆积层。这是德国考古学家和文化学家海因利希·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1822－1890），从他在1870年起长期发掘九层文化遗迹终于在第十一层发现古代特洛伊城遗址而轰动世界时，首先使用的范畴：文化在历史发展上存在不同的层次，每一层次反映不同时期由各种文化要素连结起来的平面分布特征。

2 文化丛——在一定时间、空间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组功能相互整合的文化特质丛体。人们往往根据文化丛来确定文化层。如马文化丛标志人类学会驯马，以及农业文化丛、畜牧文化丛、石文化丛和竹文化丛等。文化丛标志着人类依据一定的自然条件进行创造性劳动的能力和水平。

3. 文化圈 —许多地带的类似的文化丛相连接，其主要文化特质的内容相似或基本相同，这种文化现象叫做文化圈。人类总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生活、创造、迁移。文化圈标志人类依据一定的自然条件进行创造性劳动或迁移的法则、秩序和信仰，在时间和空间上含有广阔的地带和漫长的历史过程。通过文化圈，我们可以对文化现象做深广的研究，观察人类文化的全貌。

4. 文化区 —主要是地理学的文化概念。它同文化圈包含时间和空间不同，主要是文化空间分类概念。

5. 文化类型——历史上形成的各种文化共同体的最本质特征，标志各种文化共同体的差异，这一最本质的特征，不是指某一文化共同体全部特征的总和，而是文化共同体中最有特色、最能显示与其他文化共同体的差异、最能实

现自身本质属性的特征。

6 文化模式——不同文化的构成方式及其稳定特征。文化模式不是主观设计出来的，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有简单模式与复杂模式、普遍模式与特殊模式、东方模式与西方模式等等。

运用以上文化范畴，可以帮助我们从时间和空间上掌握文化格局形成的历史进程。

二、形成文化圈（文化大区）的主要因素

1 自然环境 主要是地势和气候。首先是河流与水，对形成文化圈（区）发挥重要作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与河流关系密切：埃及古文明在尼罗河，巴比伦文明在“两河”、中国古文明在黄河与长江、印度古文明在恒河与印度河……水是文明（文化）的源泉，有水才有草木和野生动物，有水才有畜牧业和农业，才有文化和文化的发展。文化中心，总是伴随农耕中心。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认为：“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埃及文化是尼罗河的恩赐，埃及是尼罗河的女儿。”其次是气候，世界四大古老文化（文明古国）都诞生在亚热带和温带地区；再其次是地貌特征，如海洋文化、大河文化、内陆文化、草原文化 丛林文化，都带有地貌特征。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自然环境对文化的影响可归纳为三个方面：（1）对经济的决定作用，如种什么，不种什么；（2）对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的影响，如骑马的游牧民族和不骑马的平原民族就有不同的制度；（3）对人的性格的影响，如南方人和北方人不一样，山里人和海边人不一样。

2. 宗教信仰——宗教是人类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起着巨大的作用：一是促进甚至决定一定类型文化的适应过程；二是促进甚至决定一定区域文化的稳定过程。因为，人们的宗教信仰指导和左右其思维方式、行为方式 风俗习惯和道德观念。世界四大文化圈中三个是以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为标识和纽带命名的，儒学是不是宗教有争论，但它肯定也是一个信仰、伦理观念的博大体系。而儒、释、道相融合的体系中，释与道是公认的宗教。

3. 语言文字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基础和载体。文化与语言共生，语言与文化共存。四大文化圈是以不同语言文字为基础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通用阿拉伯语，《古兰经》是阿拉伯文字和语言，信徒们均用阿拉伯语记诵，是最优美、最典范的阿拉伯语。佛教文化大区皆以古梵语、梵文为基础。印度次大陆语言有150种，有代表性的12种，主要是三种：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其中印地语、孟加拉语都是由古梵语衍变而成的。佛教早期经典是用梵语、梵文记诵的。基督教文化圈，覆盖面广，语言文字复杂，但实际上是一

个拼音文字区，所使用的语言基本上是罗马语族、日耳曼语族、斯拉夫语族，这三大语族又都属于印欧语系，这些语言使用的字母都是同一渊源即腓尼基字母衍生而来的。儒学文化圈实际是汉字文化区，中国、朝鲜、越南、日本、新加坡都是“汉字文化圈”。四大文化圈，语言文字截然有别，可以证明语言文字是形成文化圈（区）的重要基础。

4. 核心国家——每一种文化圈都有一个或数个核心国家和民族。核心国家的影响巨大，它决定文化的稳定性、凝聚力和创造力。文化比较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这些核心国家综合实力的比较，其中包括文化实力。

根据以上文化范畴和形成文化圈的主要因素，我认为世界和各国文化格局三级划分是比较恰当的：

一级：文化圈（又称大区）即四大文化圈。

二级：文化中区。以中华文化大区为例可分中国文化中区、朝鲜中区、日本中区等。

三级：文化小区。以中国中区为例可分：中原、吴越、齐鲁、巴蜀、岭南、荆楚、东北等文化小区，也有小区下面再分“点”，如少林寺文化点、杏花村文化点等。但“文化点”一般不会成为比较文化的课题，往往属于文化类型和模式相同的文化现象的范例。

参考资料

1 （英）理查德·D 刘易斯．文化的冲突与共融．关世杰主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2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3 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4 季羡林，周一良，张芝联主编．世界文化史知识．总序．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

5 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6 （美）欧文·拉兹洛编．多种文化的星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的报告．戴侃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7 中央党校编译 文明和文化 国外百科辞书条目选择．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

第三章　佛教文化圈

第一节　佛教的产生与传播

现在属于佛教文化圈即多数居民信奉佛教或佛教信仰占主导地位的共有10个国家，占世界国家和地区的5%，它们是斯里兰卡、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人口已超过十亿，占世界约17%；国土面积约占全球陆地的14%。全部是农业国，没有一个世界经济大国。印度有志成为经济大国，但近代史上的数百年间，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长期处在被侵略、被征服的地位。有的国家曾是大国的附属地，有的当了数百年的殖民地，就连印度这样的地理、人口大国也是如此。正如现代著名的印度历史学家、《印度通史》的作者恩·格·辛哈和阿·克班纳也坦率地写道："政治统一并不是印度古代和中世纪史上的正常特征。"其实，其他佛教国家也大多如此。这些国家直到20世纪，才先后走上了真正独立、统一、发展的道路。被一些人称之为"悲观主义"和"神秘主义"的佛教和佛教文化，同这些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生死与共。

佛教出于印度。古代印度应包括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锡金和不丹等印度次大陆的所有国家。

印度次大陆早期的历史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史前时期（约公元前2300年以前），指文明史前的时代；二是印度河文明时期（约公元前2300年至1750年），指进入文明时代的"哈拉巴文化"时代。这是依据考古资料编写的历史。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侵入印度之前，尚无可靠的编史依据，且与佛教无关。

印度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从雅利安人到来开始。最早的文字记录是《吠陀》（*veda*，意为知识），被称为雅利安人的"圣书"，共分四部：《梨俱吠陀》（又称《赞诵吠陀》）、《娑摩吠陀》（又称《歌咏吠陀》）、《耶柔吠陀》（又称《祭祀吠陀》）和《阿闼婆吠陀》（又称《禳灾吠陀》），故公元前13世纪至前6世纪佛教产生之前，称"吠陀时代"。这个时代的印度社会实行的是奴隶制种姓制度。"种姓"是"Varna"（色）的汉译，雅利安是白种人，印度土著是黑种人，有着两种对立的颜色。随着社会的分化，雅利安人内部出现了不同职

业和等级。"Varna" 就变成了等级。第一等级是婆罗门教主管祭祀和宗教事务以及教授吠陀的人，称为婆罗门。第二等级是武士等级，包括部落首领和专业武装集团，称为刹帝利。这两个等级垄断军政和文化大权。第三等级为从事农、牧、商、缴纳贡赋的居民大众，称吠舍。第四等级绝大部分是遭受压迫和奴役的奴隶和下等居民，称首陀罗。前三个等级为雅利安白人，第四等级为土著印度人。据《梨俱吠陀》记载："当诸神为了献祭分割一个原始巨人普鲁沙时，由其身体的不同部分转化为四个不同等级，即'其口为婆罗门，由其双臂造成啰惹尼耶（刹帝利），其双腿变成吠舍，从其双脚生出首陀罗'。"意即，四个等级由神注定，生来如此，万世不变。这一种姓奴隶制度，为反婆罗门教和反种姓制度的沙门思潮和佛教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条件。

佛教产生于印度"列国时代"。公元前6世纪，印度次大陆的各个部落大部分已过渡到建立国家的阶段。历史记载有16国，或22国，也有37国的，故称"列国时代"。据分析实际上是少数主要国家，大约10个左右，其余为二等或附属国家，有如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不仅城邦国家普遍发展，经济社会也取得巨大进步，文化思想上还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了各种反宗教迷信的学说和众生平等的口号，总称"沙门思潮"或"沙门新思潮"（沙门是多数之意）；还涌现了一批思想家和自然科学家，如无因论者富兰那·迦叶、邪命派代表末伽梨·拘舍罗、唯物论者阿耆多·翅舍钦婆罗、宿命论者婆浮陀·伽旃那、怀疑论或诡辩论者散若邪·毗罗梨子、耆那教创始人尼乾子·若提子等，被称为"沙门六大师"。其共同特点是反对婆罗门教，否定因果报应和今世后世的谬说，倡导朴素的唯物论思想。但他们的影响都不如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

释迦牟尼（约前565—前485年）意为"释迦族的圣人"，名悉达多·乔答摩，出生在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的国王家里，过着富贵安乐的生活，19岁时父王为他娶了一个美貌的妻子，深居宫中十载，并生一子。传说，在他29岁时，四次出宫游玩。第一次看见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第二次看见一位病人，第三次看见一死人，第四次看见一位行乞者。连续的刺激，使他顿生感悟，要寻求人世解脱之路。于是在一个满月之夜，悉达多·乔答摩同一马夫出走。他走了一段路后让马夫回宫，独自一人前行，把华丽的衣服送给山中猎人，自己成了赤贫的乞讨苦行者，日下曝晒，枯坐终日，抑制呼吸，控制饮食，有时一天只吃一粒米。如此六年，身心疲殆，终未得道。他一气之下想另寻解脱之路，继续前行，来到菩提伽耶的一棵菩提树下坐下来，发誓如不觉悟，决不起来，沉思良久，终于大彻大悟，明白了宇宙人生的最高道理

他成佛了。"佛"是意译词，又可以译为"佛陀"，其原意为"觉悟"或"觉者"，他创立的宗教就叫佛教。后来也称"如来佛"和"薄伽梵"，有尊

敬的意思。在印度比哈尔省，释迦牟尼成佛故迹至今犹存，为佛教徒朝拜的胜地。释迦牟尼35岁得道，活到80岁，到全国各地传道45年，其间回家一次，把妻子和儿子带出来一起传道。信徒、僧人、居士由5人到54人再到500人，最后发展到成千上万，使佛教三宝齐全（佛、法、僧）。佛教后成为国教。

释迦牟尼传教布道的足迹遍及恒河流域诸国，最后在末罗国的拘尸那城外的婆罗双树林中去世——称为涅槃。相传释迦牟尼遗体火化后结成珠状物，称之为“舍利”（后来也指德行较高的和尚死后烧剩的骨头），由邻近七国国王和该城国王分得，共八份；主持并斡旋舍利分配的婆罗门教人士独楼那从八王手中匀来一分，共九份；该城百姓又在火化处收集木炭灰一分，共十份。分别在十处修建了十座舍利宝塔。以后辗转供奉，流入各地，有真有假。真身舍利在中国确有保存者，1981年北京云居寺发现两粒粟米大小的白色佛舍利，1987年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地窖发现保存完好的四枚佛指舍利，为世界上仅有的文化珍品。

佛教从产生到传播，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大体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公元前6世纪到前5世纪，为期约100年。这是原始佛教“和合一味”时期。在释迦牟尼涅槃后不久，全印度信仰佛教的教徒搞过一次大集会，是佛教史上的大事，称为第一次“集结”，教徒们“合诵”、“会诵”释迦牟尼生前的口头说法，并记录下来。言论称为“经”，即佛经；戒律称为“律”，即佛律；专门讨论教义的叫做“论”，又称“经藏”、“律藏”和“论藏”，后世对通晓“三藏”的僧人称为“三藏法师”（我国的玄奘和尚，被后世佛界尊称为“唐三藏”）。这一时期，信徒们团结一致，对“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基本教义教规，维持佛陀在世时的解释，保持以人生问题为中心、“中道”为教、无神的信仰为特征的“哲学之宗教”的基本精神。

第二阶段，公元前5世纪至前1世纪，为期约400年。这是大弘佛法的时期。公元前518年波斯帝国从伊朗高原入侵印度，占领了印度河流域。公元前327年，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帝国侵入印度西北部。在内忧外患、动荡不安的局面中，印度崛起了一个“孔雀王朝”（因创建者旃陀罗笈多出身孔雀族而得名），建立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孔雀帝国。王朝第三代国王名阿育王（Asoka,？—前232），其名之意为无忧，故又称为“无忧王”。阿育王同佛教的关系，就像中国汉朝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样。阿育王带兵南征北讨统一印度之后，目睹战争惨状，放弃武力，皈依佛教。他虽不排斥其他宗教，但崇奉佛教，大加弘扬，传播到全国各地，还派传教士到中亚、北非、希腊传教，使佛教成为世界性宗教，被佛教誉为“转轮圣王”。据传说他在全国大兴土木，建佛塔八万四千多座；两次朝拜（又称巡礼）释迦牟尼故乡，开朝拜佛陀诞生地之先河；召集长者千余人，举行了第三次集结，向国

内边远地区和国外派遣传教师。总之，像汉武帝使孔子思想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主导和精神支柱一样，阿育王使释迦牟尼成为印度圣人，使佛教成为皇帝控制广大帝国的文化主导和精神力量之一。在阿育王之前，佛教僧团曾举行第二次集结，发生分裂，印度西部比丘700人集结，东部比丘尼10 000人集结。分歧是布施所得金钱，西比丘认为不可用来购买僧众所需之用品，东比丘认为可以，互不服从而分裂。西部集结者多为上座长者，后称"上座部"，东部集结者人数众多，后称大众部。这根本二部以后又分裂为许多派别，是为佛教派别之始。但当时分歧不涉及基本教义，不影响佛教上升时期大局。

第三阶段，公元1世纪至3世纪，为期300年左右，称南派北派时期。阿育王去世后不到五十年，孔雀王朝被巽伽王朝代替，其国王富奢密多罗的国师是婆罗门教师，因而排斥佛教，中印度出现了佛教的黑暗时期。南北佛教依然盛行。公元前28年，巽伽王朝被达罗维荼人所灭，中印度佛教又起。同时月氏人灭了西北印度大夏王朝，创立贵霜王朝，印度从此进入南北朝时代。南方佛教从此不知其详，北方佛教在2世纪迦腻色迦王时期达到鼎盛，有阿育王第二之称。期间，到处修塔造像；又召集比丘500人，历时十二年，纂辑佛经三十万颂，计九百万字，其中《大毗婆沙论》，我国有新旧两种译本。同时，大学者龙树（2世纪至3世纪）弘扬佛道，使大众部佛教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第四阶段，公元3世纪到6世纪，约400年，称统一时期。公元320年左右，印度史上同孔雀王朝相媲美的笈多王朝建立，月护王的第二代统一了印度，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各教都兴。佛教也有重要建树，一对兄弟大学者无着（Asaṅga）和世亲（Vasubandhu）创立了瑜伽学派，在龙树"性空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三性三无性"的唯心论体系。佛教的逻辑学——因明学也有很大成就。可以说，这是佛教理论化时期。

第五阶段，公元6世纪至12世纪，约五百多年，是佛教由盛而衰的时期。5世纪末，笈多王朝被入侵印度的白匈奴族所灭，印度又处于分裂状态，佛教遭到破坏。同时，东印度一王国西侵，使中印度佛教也遭破坏。6世纪，中印度伐弹那王朝在戒日王领导下打败入侵者，又使佛教复兴。笈多时代开始兴建的那烂陀寺得到增建，规模宏大，学者云集，蔚为印度最高学府，6世纪至7世纪达到鼎盛，维持100年昌明。我国唐朝派遣玄奘法师于7世纪30年代在此留学。戒日王死后，中印度又陷入混乱，佛教逐步衰落。印度分据各地的王国都信奉婆罗门教（非原始的、吸收了佛教内容改造后的婆罗门教），西方世界称婆罗门教为印度教，唯独东印度的婆罗门王朝统治着摩揭陀以东的地方，那烂陀寺在其境内，从7世纪到11世纪，历代坚持崇奉佛教，并在那烂陀寺旁边另建规模更大的超戒寺，成为著名的佛教圣地之一。

这一时期，佛教大乘派中的密宗兴起（其他各派称显宗）。密宗又称真言

陀罗尼宗。真言陀罗尼就是秘咒，被密宗认定为佛陀内证的智慧和语言，是能显示诸法相的真实语言，所以又叫真言，并称来自秘密经典。陀罗尼（dharani）的意义是“总持”。既然秘咒含着无量法理，持着无量威力，那么信众念咒就能获得比显宗更大、更迅速的成就。密宗按一定的仪轨结坛、设供，身结手印，口诵真言，意作观想，以求将自己身、口、意三业，转成佛的身、口、意三秘（佛的身、口、意微妙不可思议，故称三秘），得到智慧、神通，乃至即身成佛。修炼密法还有息灾、增福、降伏魔怪的作用。故密宗佛像和菩萨多头多手，有的面目狰狞。咒语本是假的，假的真不了，偏要说是真的，否则别人不信。这是违背佛教本义的，是在同政治上占优势的婆罗门教长期对立中，又吸收了婆罗门教一些东西，以适世俗之需，实际上它标志佛教走向衰落。

从7世纪中叶到10世纪末，突厥族逐步入侵。所到之处，毁佛教，建伊斯兰教。12世纪末佛教在印度本土近于绝迹，只在斯里兰卡及周边其他南亚和东亚国家存在和发展。法师多数避难于尼泊尔和中国西藏等地。

综观佛教从产生到成为世界性宗教及其在印度本土的衰落与复兴，可以看到：（1）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原本无神，是代表社会进步势力的“哲学宗教”。（2）通过四次集结，佛教实现了同政治结盟、同理论结盟、同群众结盟，成为印度帝国的国教。没有帝国王朝的崇奉，就没有佛教的中心地位。帝国强大佛教兴，国家分裂佛教衰落，国亡佛教亡。（3）从孔雀王朝建立第一个统一的印度国家开始，到19世纪，印度统一强大的时期少，分裂、分散、被征服的时期多。即使阿育王那样强大的帝国，也是松散的。人们有理由认为：政治、经济上的松散和佛教思想文化，既相得益彰，又互相影响，是互为因果的。

第二节　佛教的基本教义、教规

佛教的教义、教规是通过佛教经典传承下来的，经典是释迦牟尼的弟子们记录整理的，前面已经提到共称为“三藏”（Trī-pitaka）：经、律、论。“藏”指收藏的筐箧。把佛经分为三藏，同我国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差不多。现行于世的佛教经典有各种文字，最全的是三个系列：（1）巴利文；（2）汉文；（3）中国西藏文。梵文经典反而残存很少。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老挝、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我国云南傣族等用的是巴利文佛经；我国汉族、朝鲜、日本，越南用的是汉文佛经；我国西藏、蒙古，俄国西伯利亚，印度北部用的是藏语系佛经。

巴利（Pali）是古代印度一种语言，是佛陀时代摩揭陀国的大众语，释迦牟尼用它说法，弟子们用它记诵经教。现巴利语已不通用，靠佛经保存下来。

巴利文字母也已不存，现在的巴利文佛经是有关国家用本国文字母记录的巴利语。巴利文经藏分五部：（1）长部，相当于我国的长阿含经；（2）中部，相当于我国的中阿含经；（3）相应部，相当于我国的杂阿含经；（4）增支部，相当于我国增一阿含经；（5）小部，我国缺。阿含（Agama）字义为集，是释迦牟尼的言教集录。巴利文律藏分三部：（1）分别部，是戒的条文；（2）犍度，是僧团中一切生活制度；（3）附篇，是戒条的解释。巴利文论藏有七部：（1）法聚论；（2）分别论；（3）界论；（4）双论；（5）发趣论；（6）人施设论；（7）论事，是关于人间心理状态，宇宙万有的分析和因果论等重要论著。

中国汉语系列佛经翻译事业持续十个世纪（2世纪至11世纪），共译三藏一千六百九十余部，六千四百二十余卷，佛教各派各系统的学说都介绍到了中国，形成中国佛教巨大宝藏。内容不止佛书，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药、建筑以及气功保健等诸多领域。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长期没有一部完整的、权威的佛教全集，佛教研究不得不用20世纪30年代日本编印的错漏很多的《大正藏》。1982年，国务院批准北京大学教授任继愈主编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已于2000年出版。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汇集九种不同时代《大藏经》为一编的一部佛教全书，是收录最全的中国佛教百科全书，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宝贵文化财富。

我国西藏翻译佛经的历史曾有五百年之久（从8世纪至13世纪），共译出三藏经籍五千九百余种、合三百万颂，约当汉译一万卷。由于重译甚少，内容超过汉译，特别是晚期密宗佛论，为汉译所未有。由于藏译文照顾到梵语的词尾变化和语法结构，容易还原为梵语（巴利文为俗语，梵语为雅语），更受现代佛学研究的重视。

经籍万种，经义一宗，万种不离其宗。中国著名佛家人士、原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先生认为："佛教教义的基本内容简单地说来，就是说世间的苦（苦谛 Dukkha-sacca）和苦的原因（因谛或称集谛 Samudaya-saca），说苦的消灭（灭谛 Nirodha-sacca）和灭苦的方法（道谛 Magga-sacca）。佛教经籍非常繁多，其实不超出这四圣谛（Cattāri-ariya-saccāni，谛的意义就是真理），而四谛所依据的根本原理则是缘起论（Paṭiccasamuppāda），佛教所有教义都是从缘起论这个源泉流出来的。"[①]

释迦牟尼给"缘起"下的定义是："若此有则彼有，若此生则彼生。"缘起，又称因（Hetu）缘（Paccaya），即一切现象一切事物生起的关系和条件。佛教的缘起论以人生问题为中心，一般说有十二因缘：（1）无明缘，即愚顽

① 赵朴初著：《佛教常识答问》，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无知状态。不懂得“造物无主无我、无常”的道理，自己不了解自己的身心，以为有一个“作主宰的我”而产生各种追求和烦恼，造成种种善恶的后果。(2) 行缘，由无知产生的行为及其后果。(3) 识缘，指人出生之前在托胎时的心识，有可能带来苦难之因。(4) 名色缘，人出生之前在胎中的精神和物质状态。名指精神，色为肉体，有可能带来苦难之因和善恶之果。(5) 六入缘，眼、耳、鼻、舌、身、意，生长完备，来到人间，有了苦难之因、善恶报应的机会。(6) 触缘，出生之后接触事物，接触造就苦难之源和善恶之源。(7) 受缘，感受人间的苦与乐、善与恶，并造成一定的后果。(8) 爱缘，产生各种爱欲、愿望，这些不同的欲望使人有不同的选择。(9) 取缘，追求、索取自己所欲的，不同的选择就有不同的追求和索取。(10) 有缘，由不同的欲望、追求，不同的选择，形成（你的、人的）不同的存在和不同的占有。(11) 生缘，来世之生。(12) 死缘，来世之老死。这十二因缘是佛教解释人生苦难的典型的三世轮回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理论，(1) 和 (2) 是（生前）过去因，感现在果；(3) 至 (7) 是现在果；(8) 至 (10) 是现在因，感未来果；(11) 和 (12) 为未来果。显然，这是人对自己的肉体和精神获得科学认识之前的世界观、人生观。

既然人生即苦，人生皆苦，那么如何摆脱苦难呢？只有现世修来世，修炼可得道，得道可成佛，成佛就超脱了一切苦难。如何修炼呢？佛家提倡“戒、定、慧”的方法（道谛）。所谓“戒”就是“三戒”、“五戒”、“八戒”、“十戒”等清规戒律，如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等；所谓“定”，就是不昏沉、不纷扰、远离爱欲、身心轻安、宁静安稳不受扰乱的状态；所谓“慧”，就是分别一切法相（现象和事物）的自相（特殊性、个性）和共相（一般性、共同性），认识事物本质，获得智慧。“戒、定、慧”称佛教三学，三学之中具体包括“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正道”等修行法门共称三十七道品。常见者为八正道：(1) 正见，明四谛之理以为己见；(2) 正思，正确地思维；(3) 正语，不作一切非理之语；(4) 正业，住于清净之身业；(5) 正命，正当地生活，不可邪命地生活如坑蒙拐骗等；(6) 正精进，使身、口、意努力朝正见方向前进；(7) 正念，正确的思想，经常不忘正见；(8) 正定，进入六根清静、脱俗超尘的无漏清净的禅定状态。

凡是按照四谛（苦、集、灭、道）、十二因缘、三学的原理去修行的，最低境界可以脱离人间苦海，最高境界可以成为救人救己的菩提萨埵（Bodhisattva），略称“菩萨”，从而被称颂、被供奉、被顶礼膜拜。这就是佛教的基本教义。

从以上经籍和基本教义可以看出，佛教作为思想文化对社会人生具有积极

意义，也有消极影响。早期佛教思想代表的社会阶层和势力，主要是弱者、无助者，而不是高层统治者，提倡在“苦”的面前人人平等，代替“种姓制度”的不平等，具有进步意义。从社会功能来看，佛教提倡“尚善”、“远邪”，有利于道德建设；提倡“明智”好学，如“五明”之学，“声明”即声韵学和语文学，“工巧明”即工艺技术美学、历数之学，“医方明”即医学，“因明”即逻辑学，“内明”即佛学，而且要求学习者“学处广大，悲心恳切”，有利于社会教育发展和人才培育。从佛教教化的方式来看，是自省式的，是内向式的，非外向扩张式的，有利于社会稳定。从佛教组织形式来看，是松散的，非强制的，僧团虽有“剃度”，亦是公开的，无秘密结社的危害性。从最高信仰来看，是无神的，只信因果报应，其因果观固然属于唯心主义认识论，但本质上与怪力乱神有别。这些都具有积极意义，对印度和佛教国家精神文明的建设，国家的统一和进步，曾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至今也有一定的积极借鉴作用。但是佛教文化的积极意义，过去和未来都是有限的，其消极意义却非常明显。无论哪一个宗派，其根本的观念是“空”和“无”。不管对“空”与“无”作哪种解释，如何玄妙，总是一切皆“空”，一切皆“无”，人世间只有“苦”，必须“涅槃”、“超脱”。尘世是毫无意义的，一切坚定的操守、执著的追求都是“迷误”。其善行苦修，特别是出家修行，不过人的正常生活也有悖人体科学的一面。因此，佛教佛理中的消极因素，有时会被各种社会恶势力用于组织反社会、反人类的活动。

第三节　佛教文化与中国

传到中国的，与其说是佛教，不如说是佛教文化。对世界文化来说，佛教的中国化比中国的佛教更为重要。

第一，佛教来中国有两路，一路来自中亚，一路来自南海。唐朝高僧义净还发现有第三路，是云南一带。不必细究佛教最早在何时传入中国。传说与印度阿育王（约前272—前226年在位）同时的秦始皇时代（前246—前210年在位），已有印度的沙门室利房等18人来到我国咸阳传教；也有传说，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之后，早已传到中亚的佛教可能通过旅游往来东渐中国。即使这两个传说被证实，也是佛教创立百年成为南亚文化之后才开始问津中国的。有文字可考的佛教最早传入我国的记录是《三国志·魏书》卷三十裴松之（372—451）之注所引用的、鱼豢撰《魏略·西戎传》所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豆之误）者其人也。”世界史学界和佛学界都认为，伊存口授佛经（浮屠经）给景卢，是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史实。公元250年，从印度来华的昙柯迦罗于

洛阳白马寺正式建立戒坛传戒，出现了第一批如法如律的比丘即出家和尚；公元429年，在来自斯里兰卡的铁萨罗为首的19位比丘尼的推动下，才出现第一批如法如律的比丘尼即出家尼姑。先有佛教文化，后有佛教教事，这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重要特点。

第二，同中国求福求仙的思想融合，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又一重要特点。日本宗教学家镰田茂雄研究中国佛教数十年，从汉明帝的异母弟楚王刘英和汉桓帝信佛的事实和过程中，得出结论，中国早期佛教是“兼信黄帝、老子和浮屠”，是把佛教“当作以祈求现世利益和长生不老为主旨的宗教来信仰的。这种早期佛教的信仰内容贯穿于中国佛教史，反映了中国佛教史最基本的性质。”在中国，不仅达官贵胄，许多黎民百姓也是把佛教、佛事当作可以“禳灾招福、长生不老之灵力”来信奉的。甚至还有“老子化胡”说这类近乎“笑话”的理论。这已同释迦牟尼创立的原始佛教的教义和超脱凡尘的宗旨相去甚远。

第三，把佛教当作社会人生的一种理论、一种与中国学术思想相异的知识和智慧，甚至一种玄妙的真理，加以追求、探索和研究，进行理性的思考。这是中国佛教界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高僧以及开明的君主对佛教的理解。这是佛教事业在中国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成为东亚佛教中心的原因。中国的佛经翻译和研究事业，持续时间之长、所译典籍之系统、全面、保存之完好，研究著作之多，为世界之冠而且绝无仅有。东晋高僧法显（约334—约422）于公元399年从长安出发，渡流沙，越葱岭，历尽艰苦到达天竺，走了三十余个国家，传授中华文化，巡礼天竺和师子国（今斯里兰卡），于公元412年从海路回国，他65岁起行，历经14年，古稀之年学梵语，80岁高龄翻译大量佛典，成为中外交通史、旅游史、文化交流史上划时代的人物，所著《佛国记》已被译成英、法、日等国文字，成为世界佛学、史学名著。唐代高僧玄奘西天取经的事迹和《西游记》在中国、印度都广为流传，甚至家喻户晓。玄奘所著12卷本的《大唐西域记》的意义，更甚于《佛国记》。他对佛教事业的贡献亦无需细说。《大唐西域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历史文化巨著，记载了所经各国的地理位置、疆域范围、居民数目、物产土质、天文历法、风土习俗、种姓制度、军事力量、田制赋税、历史传说及各种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情况，现在已译成英、日、俄、德、法等国的文字，成为世界史学家、考古学家、民俗学家、佛学家的“瑰宝”。英国印度史专家史密斯说：“玄奘对印度史的贡献是怎样也不会估计过分的。”此外，唐高宗咸亨二年（671），高僧义净从广州搭乘波斯商船，从海路到达印度求法的史迹及其新的发现与贡献，也名垂史册。以三位高僧为代表的中国佛学，与其说是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不如说是中国佛学文化在对印度、对人类作出伟大的贡献。

第四，佛学、佛教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佛教中国化或佛教化的中国的主要表现，是佛教精神对中国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的浸染与渗透。首先是促进了中华民族思维能力和思维方法的发展、6世纪至9世纪的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的极盛时期，印度佛教各部派的思想同中国民族文化思想接触，经过吸纳融合，产生了中国佛教的许多流派，流行的有法性宗、瑜伽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和密宗等八个宗派。去除其神秘的因素，无非是在认识事物和修身养性两件事上，引进和创造了一些新的范畴，如法、名、相、色、空、观、无悟等等。不同的是佛教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它是一个独特的体系，以独特的方式接近和阐述社会人生的真理，其独特之处，就是寓动于静，重在感悟，所谓禅心独到。我认为这对于提高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感受能力和理解能力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在哲学和艺术领域影响重大，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哲学和文学艺术的禅味很浓。唐以后的唐诗、宋词和程朱理学中的禅味，使文学和哲学论著，无论在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也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更加丰富多彩。我认为其主要影响是积极的、可以冲淡儒家认识论的偏重"政治伦理"的儒气，使人们思维能力和方法崇尚坦荡与自然。其次，佛教所到之处，佛寺、佛塔、佛像必备，又大都在山灵水秀之地，从中国的名山大川到小桥流水，从名胜古迹到闹市村头，焚香顶礼、或祈求平安幸福，或享受大自然的恩惠，品味人生甘苦，思考过去未来等等，佛教对社会的休养生息，民风尚善，也起过好的作用，而且对中国的建筑学、绘画艺术、雕塑艺术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敦煌石窟、洛阳伽蓝、云冈石窟、长江石门大佛、已成世界雕塑艺术的珍宝。至于佛教在逻辑学、医学、数学等方面的影响也有，虽然影响不大。中国是一个有自己博大文化传统的国家，崇佛没必要，也行不通；贬佛灭佛，更是没必要，历史上"会昌灭佛"证明，对佛教、对人民都没好处。中华文化的自信力，就在于不惧怕任何文化的影响，而是在接受影响中，给它以影响，又在互相影响中更好地发展了自己。至于佛教的消极影响，我认为不仅是人们所常说的什么消极避世、一切皆空的观念、损害人们健康向上的朝气、以及封建迷信得以利用之便，等等。我认为佛学、佛教是一种甜蜜的唯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和感情模式，在梦幻中求得现实的苦难之解脱，对科学的现代的社会人生，仍然是一种麻醉剂；对浮躁的见利忘义的社会人生，是一种不起根本安定作用的安慰性的安定剂。

第四节　中国的藏传佛教

佛教与中国的问题之一是佛教与西藏，或中国的藏传佛教问题。

佛教是何时传入西藏的呢？赵朴初先生在《佛教常识答问》中写道："我国藏

语系佛教开始于7世纪中叶，当时的西藏王松赞干布（Sron-btsan gam-po）在他的两个妻子唐文成公主和尼泊尔王毗俱胝（Bhṛkuṭi，藏名尺尊 Khri-btsun）公主共同的影响下皈依了佛教。他派遣了大臣端美三菩堤（Thonmi sambhoṭa）等16人到印度学习梵文和佛经，回来后创造了藏语文字并开始翻译了一些佛经，到了8世纪中叶藏王持松德赞（Khri-sron-lde-btsan）迎请莲华生（Padmasaṃbhava）由印度入藏，折服了原来盛行的本教（Bon-po），佛教于是得到弘扬。"[①] 8世纪佛教兴盛，显密两宗经典738种译为藏文；9世纪"朗达玛灭法"，佛教遭破坏而沉寂；10世纪由西康地区再度传入；11世纪孟加拉佛教大师阿底峡（Atisa）入藏，又大弘佛法；13世纪，印度本土佛教因突厥族入侵被毁，大批佛师入藏避难，使藏传佛教因而很盛。从梵文所译藏文佛经达6 000部。"西藏的佛法以密宗最为普遍，最为突出。"[②]

许多佛教经典传入西藏，西藏的佛教同藏教——本波教相融合，形成"藏传佛教"。长期以来，藏传佛教一直被称为"喇嘛教"，但是我国佛教界人士、很多藏族同胞和一些学者均认为这一名称不妥，最好不再使用。"喇嘛"一词意为"上师"、"师长"、"上人"。弟子对自己依奉的、学行高深的"格隆"（比丘），也可称为"喇嘛"。在这种意义上，"喇嘛"一词又和汉语中的"和尚"原来的语义相同。一般把藏传佛教中的僧人统称"喇嘛"本来已不确切，进一步把藏传佛教称为"喇嘛教"就更不适宜了。它容易被人误解为"喇嘛教"是佛教之外的一个宗教，而不是佛教中的一大支派。更重要的是，这一称谓刺激西藏佛教界和藏族人士的宗教和民族感情。总之，藏传佛教就是佛教，不是有别于佛教的其他宗教。[③] 藏传佛教在传播中，曾形成红派、花派、白派、黄派。明、清两朝中央政府支持黄派，教主被称为"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实行活佛转世制度，这是佛教其他支派所没有的。1959年以来，西藏社会实行的民主改革，政教分离，改的不是宗教，是奴隶主强加在宗教上的那副枷锁。

在佛教鼎盛的阿育王时代，印度佛教也没有取得像儒学在中国的地位，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多数印度人不信佛，13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印度本土佛教遭受重创而藏传佛教与印度本土佛教相比已有较大差别。

参考资料

1 （英）渥德尔．印度佛教史．王世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

① 赵朴初著《佛教常识答问》，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

② 赵朴初著《佛教常识答问》，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页。

③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室编《佛教文化面面观》，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101页

2 吕徵．中国佛学源流．北京：中华书局，1989

3 季羡林，周一良，张芝联主编．世界文化史知识．第1卷．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

4 赵朴初．佛教常识答问．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5 任继愈选编．佛教经籍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6 方立天．佛教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7 常任侠选注，郭淑芬点校．佛教文学故事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8 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第四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9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6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文化的发展．光明日报，2000－03－23

第四章　基督教覆盖下的西方文化圈

第一节　西方文化圈的界域

在基督教文化圈，或称之为《圣经》覆盖下的西方文化圈，大多数居民信奉基督教的约有13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信奉天主教的60个，基督教新教41个，天主教和新教两教并重的21个，东正教10个，犹太教1个。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分布在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较少，亚洲更少。在欧洲44个国家和地区中有41个；北美37个国家和地区中有33个；南美14个国家和地区中有13个；大洋洲24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2个；非洲5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0个；亚洲49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4个。约占全世界国家和地区（约215个）总数的58%。人口约16亿，占全球人口（60亿）的28%左右。所属陆地面积占全球陆地面积的45%　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使用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语言较统一、交流较方便。到目前为止，地球上最优越的自然条件（如平坦广阔的平原和曲折的海岸线等）、最发达的经济，最雄厚的工业基础，最先进的科技，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最有渗透力的思想文化，都在这一文化圈内。它还有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中的4个。

文化圈的形成是历史的过程，已有千百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信徒可能有增有减，但多数居民信仰同一宗教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格局，不会有太大变化，因为全人类都在控制人口增长。美国《新闻周刊》2003年3月上旬公布了一个统计数字：全世界约有13亿伊斯兰教徒，现在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基督教徒为23亿（这个数字肯定有夸大），每年以1%的速度增长。其目的是说明由于世界范围贫富差距拉大，穷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数增多。但传统文化圈的地图不会改变。

第二节　古犹太民族的命运与基督教的产生和传播

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在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写的序言中认为："宗教与文化是孪生兄弟。"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认为："人类历史上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被基本等同于世界上的伟大宗

教。”尽管对此也有不同意见，但我认为符合文化史发展的实际。

要了解西方文化，必须首先了解基督教。在世界三大宗教中，基督教是信徒最多、地域最广的第一个古老的宗教。基督教的产生、传播和改革的历程十分清晰地显示出西方文化发展的脉络。

基督教最初是古代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它的诞生同古犹太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公元前586年，巴比伦王国征服并灭亡了犹太王国，犹太教圣殿被毁，俘虏4万人被带到巴比伦囚禁，史称“巴比伦之囚”，其余众多的犹太人逃亡埃及。这是犹太人第一次当亡国奴。公元前538年，巴比伦王国被波斯帝国征服，犹太人中上层臣服，波斯帝国让“巴比伦之囚”返回西亚故地，重建圣殿，埃及流亡者亦长途跋涉，历尽饥饿、疾病、流离失所（《圣经》中“出埃及记”有载）。这是犹太人第二次当亡国奴。公元前334年，波斯帝国被马其顿王国吞没，犹太人又接受马其顿人更为残酷的统治，这是第三次被奴役。公元前30年，罗马帝国征服马其顿王国所有领土，犹太民族受到了比马其顿王国治下更严重的压迫和剥削。绝大部分沦为奴隶，或驱散到世界各地流亡，包括中国的甘肃与河南（现在有罗马人的后代，已汉化）。这是犹太人第四次当亡国奴。小小的犹太民族，600年里当了四次亡国奴，面对强大和不断变换的占领者、征服者、压迫者，希望有“救世主”带给他们爱、自由和幸福。犹太民族本来笃信以信仰救世主弥赛亚为上帝的犹太教，《旧约》就是犹太教的经典。在反对民族压迫，特别是反抗罗马帝国统治者的斗争中，统一的犹太教逐渐产生分裂，出现四个不同的派别：（1）撒都利派（祭司、民族上层分子）主张妥协，服从罗马帝国统治；（2）法利赛派，这是中层，主张与罗马统治者保持距离，称“隔离者”派；（3）艾赛尼派，意为“敬虔派”，相信“弥赛亚”总有一天救民族出苦难，对罗马统治者不屈服；（4）吉洛特派，意为狂热派，又称奋锐派，激烈地反对罗马帝国的统治。在艾赛尼派和吉洛特派两派中，又走出一个“拿撒勒”派，意为“持守教义教规的人”。创始人是约翰，继承人就是传说中的耶稣。这一派开始是秘密组织，坚信弥赛亚，团结下层人民，多次举行反抗罗马帝国统治的起义，遭到失败，并被犹太教驱逐出圣殿，称为耶稣基督教。基督教就是这样来到了人间。基督，英文是Christ，音译为基利斯督，意为救世主，它是英语民族从犹太语（希伯来文）Mashiah演变而来。而弥赛亚一词的拉丁文是Christus。汉语从拉丁文译过来，最早译为基利斯督教，后简化为基督教。耶稣，希伯来文为“耶和华拯救”之意。基督教到2世纪成为主流宗教派别，建立了公开的和秘密的教会。耶稣基督，两位一体，圣父圣子合一，实际上是教派斗争的结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基督教“在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

奴隶和被释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被驱散的人们的宗教"，[1] 同社会主义一样，最初是"伟大的群众运动"，在罗马帝国的范围内流传。

如果说基督教的产生同犹太民族的命运生死攸关，那么，基督教的传播和成为普世文化，则同罗马帝国统治者紧密相连。

罗马共和国（建于公元前509年，罗马人统一意大利）变为罗马帝国，始于公元前27年1月13日授予终身执政官屋大维"奥古斯都"（至圣至尊）称号。屋大维于公元前43年出任执政官后，集公民大会、元老院、执政官于一身，并兼任"大元帅"，改执政官为"元首"，把共和国变成了帝国。称帝之前16年，屋大维征服了波斯帝国所有领土（包括犹太民族），称帝后10年，又南征北战，把罗马帝国的版图扩大到多瑙河的上中下游。此后二三百年间，基督教处于非法状态，屡禁不止，在整个帝国内蔓延壮大。

公元284年，近卫军长官戴克里先发动政变掌握最高权力，改"元首"为"君主"（dominus），与中国皇帝完全一样，皇冠皇袍，被奉若神明，臣民觐见行跪拜之礼。戴克里先实行四帝共治，公元305年去世。在争夺皇位的混战中，君士坦丁战胜对手，成为唯一的君主。君士坦丁为了巩固统治，不再迫害基督徒。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发布《米兰敕令》规定宗教自由，实际上使基督教完全合法。公元330年，迁都拜占庭，改其名为君士坦丁堡，称新罗马帝国。君士坦丁还亲自主持"宗教大会"（尼西亚会议），统一对上帝和基督属性的理解：上帝与基督都是神，圣父、圣子两位一体，以后发展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还规定每年春分月圆后第一个星期日为复活节。宗教会议上得势的一派，称自己为正统信仰，也称"正教"派，即以后的"东正教"派。

从此，基督教不仅合法化了，而且神学研究也开始了，教义也系统化、理论化了。修道院、教堂、教会、教徒遍及整个罗马帝国，基督教普及化、世俗化了。公元392年，罗马皇帝拉奥西多又宣布并下令，严禁基督教以外的其他一切宗教，使基督教成为唯一合法的宗教，地位不仅法律化而且神圣化了，这就是基督教从非法到合法，从秘密组织到公开，从产生于西亚到传播欧、亚、非三大洲的过程，并为以后走向全世界作好了准备。

第三节　基督教的理论化、制度化和世俗化——普世化

历史表明，没有帝国就没有普世文化。没有孔雀帝国阿育王朝，佛教不会成为普世文化；没有罗马帝国君士坦丁皇帝，基督教不会成为普世文化；没有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7页。

阿拉伯帝国和前四任哈里发，伊斯兰教不会成为普世文化。同样，没有汉唐以来的中华大帝国，儒学也不会成为普世文化。然而，没有文化的帝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有历史地位和功绩的帝国。没有堪称普世文化的帝国，即使建立了也是短命的，如成吉思汗帝国式的貌似强大的、"只识弯弓射大雕"式的中外王朝不少。帝国是普世文化的经济、政治条件，普世文化是帝国的精神支柱和灵魂。然而帝国不存在了，文化还在，而且还在继承中不断创新，为什么？因为文化中含有的真理是永存的。

基督教的理论化、制度化和世俗化，使之成为渗透在亿万人生活方式、理想信念和道德修养中的"普遍真理"。《圣经》，包括《旧约》、《新约》和《后典》，是基督教一切教义、教规的最高典籍和源头。各种神学研究和著述，归根结底是对《圣经》的解释、演绎和再创造。从最早的神学理论家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的著作《上帝之城》、《忏悔录》，论证"天国"的存在，"天国"的永恒，"天国"高于"地国"，到中世纪英国经院哲学家安瑟伦（Anselmus，1033—1109）、法国经院哲学家洛色林（Roscellinus，约1050—1125）和意大利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omas Aquinas，约1225—1274）等，不管是唯实论还是唯名论者，不管是神学和哲学直到近代的思想家和宗教改革家，除了彻底的无神论者以外，他们的立论和争论，都以不同的立场、观点，不同的方法和形式，说明上帝是真实的存在，上帝是万有万能的。基本的理论框架就是：

一、创世论

源于《圣经》"创世记"：上帝六天之内创造了世界：第一天，创造了光；第二天，创造了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第三天，创造了陆地、海洋、树木、菜蔬和草；第四天，创造了日、月、星辰；第五天，创造了水里的鱼和空中的鸟；第六天，创造了野兽、牲畜、昆虫。然后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于是造男造女。第七天，上帝休息。（人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上帝。但宁肯说：上帝按他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人）。

二、原罪论

人之有罪，与生俱来。原因是人类始祖亚当被诱惑偷吃了禁果，违背了同上帝的约定而犯罪。此罪传给子孙后代，绵延不断，所以叫原罪（见旧约《创世记》）。亚当之罪，扭转了人类的命运。上帝造人之初，赋予人类以超自然的状态，是永生的、永远幸福的。亚当之罪，使人类永远丧失了超自然的恩典。人类因亚当之罪而堕落了。所有的人都有原罪，都有贪欲，都要死亡。

三、救赎论

人类因堕落而有罪，因有罪就呼救。谁来救，是耶稣。人类是可救的，因为原罪不是每个人所犯的，人的本性还是自由的。人的自由决断能力，并未被摧毁，只是失去了永生。因耶稣的“赔补”可以消除原罪。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上帝为了爱人类、爱人类生活的世界，献出了独生子，让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替人类赎罪。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惨死和第三天的复活是人类得救的基础。这叫以死亡解脱死亡的奴役，带生的希望给人间。

四、三位一体论

人类千万亿计，上帝（圣父）只有一个，圣子又是独生，怎么来完成救赎人类的伟大事业，只有靠圣灵。圣灵无形，圣灵无数，圣灵无所不在。所以，天主之内有三个“位格”，即圣父、圣子、圣灵。灵者神也，三个位格统一于唯一的神的本性。圣父——圣子、圣灵的原则；圣子——永恒的生于圣父；圣灵——由圣父、圣子作为唯一原则而共同生发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参见《圣经·以赛亚书》第53章）

在多灾多难的人间，这是一个带来福音的理论；在很不完善的人间，这是一个多么完善的理论；在很不美妙的人间，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理论。谁能不信，谁又不愿意相信呢？信其无，不如信其有啊。到哪里去找这个理论，两千年来，数以千万计的神学家、思想家和神职人员以各种庄严无比的著述和说教告诉人们，去读《圣经》包括《旧约全书》、《新约全书》和《后典》吧。

《旧约全书》——原为犹太教经典，后亦为基督教经典之一。“约”是指上帝与人立下的“契约”。共39卷，929章（篇）。内容分三部分，主体部分是摩西五经，成于公元前5世纪；其次是先知各书，成书于公元前2世纪初；三是圣书，成书于公元前100年左右。摩西五经，包括《创世记》，介绍宇宙人类起源的神话传说；《出埃及记》记述犹太人在埃及遭受的迫害，进行反抗，最后走出埃及渡红海，于西奈山上创立犹太教的历史；《利未记》为祭司法典；《民数记》记录犹太人在西奈沙漠的流浪生涯；《申命记》重申犹太教法律，实行宗教改革、反对多种信仰。《旧约全书》本是一部历史著作，记录了犹太民族两千多年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变迁史，又是在民间传说、口头文学基础上经祭司们加工的文学宝库。但为了宗教的目的，加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色彩，变成了神与人的“契约”。

《新约全书》——基督教自身的经典，产生于公元1世纪下半期至2世纪上半期。原文为希腊文，内容有耶稣的言行录福音书4卷，使徒书信21卷，《使徒行卷》1卷，《启示录》1卷，共27卷。《新约全书》虽在2世纪定型，

但由于教派林立，未获各地教会公认。随着教会当权派向罗马统治者投靠，原始基督教思想被摒弃，逐步成为法定经典。直到330年，君士坦丁命令主教犹西比主持编定《新约全书》，抄写50部，以皇帝名义颁发各地，才成为法定经书。397年第三次迦太基宗教会议又以教会名义作出决议，确认《新旧约全书》的内容和目次。至今被世界基督教会公认的权威版本，是5世纪罗马帝国神学家哲罗姆（Jerome，约347—419或420）根据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圣经原文校订的拉丁文本，于420年公布的《通俗拉丁文本经典》。直到20世纪中期，圣经学者又根据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原文对各种文字译本进行了校订，并译成现代文字。许多中国留学生特别是文科学生到西方国家，学习当地规范现代语，常以《新旧约全书》为教材，因为它不仅是宗教经典，而且是历代西方众多学者推敲润色的语言规范。

《后典》——又称《圣经后典》，成书于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前100年之间，共14卷，前几卷用希伯来文，其余全用希腊文。其内容主要反映早期基督教徒的生活状况。天主教认为《旧约》、《新约》和《后典》都是正典，都是《圣经》的组成部分。中世纪后，新教不承认《后典》的地位。在思想上《后典》与《旧约》一脉相承，主张血洗仇敌、以暴力反抗压迫，与《新约》博爱思想不同。这大概是争论至今犹存的实质。但《后典》的历史文学价值却举世公认。中文版《圣经》不包括《后典》，但有单译本，张久宣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出版。

基督教不仅理论上丰富、系统、严密，而且组织上也比较健全有序。教会被认为是天主与耶稣亲密结合的圣事之地。教会建筑教堂顶上都有十字架。人们为了赎罪，为了得救，就要定期到教会去祈祷、忏悔、做圣事，这是上帝与人类沟通，救赎人类的最好的形式和途径。从教皇国的教皇（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到各国各地的主教、神父、牧师、助祭各级专职神职人员，是上帝与人类沟通、引导人们接近上帝的导师。加上各种仪式、节日、戒律，使基督教的信徒们约定俗成，有规可循，有矩可守，习以为常，信以为真，世代相濡，潜移默化，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在人生过程的始终，成为西方世界各民族和国家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形式。

基督教在产生、传播、理论化、制度化和世俗化的过程中，把产生于西亚的犹太民族的文化，同古希腊、罗马文化融合起来，同欧洲各民族文化的形成过程结合起来。基督教文化在中世纪以前，成为欧洲奴隶制社会的主流文化；在中世纪成为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在文艺复兴以后，经过宗教改革，又成为资本主义的伦理精神，并随着生产、贸易全球化和殖民主义的步伐走遍全球。所以虽不能说基督教文化就等于西方文化，但基督教产生、传播和改革的过程，突现了西方文化演变全过程的轨迹，也是西方文化的基本内容和形式，是

符合文化史实的。

第四节　西方文化的源流与基本特征

西方人应以中国人的视野，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出发，才能理解中国文化问题；同样，中国人应以西方人的视野，从西方的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出发，才能理解西方文化问题。理解才能互相容纳，进行平等的交流、选择和吸收，而不是盲目地相互排斥、冲突和敌视。

从语义学的逻辑上讲，西方文化应包括西方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就像中国文化包括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现代主流文化一样。然而实际上正好相反，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中国还是外国，在使用“西方文化”这一概念时，所指往往限于文艺复兴以后500年来西欧、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近现代文化，地域上不包括东欧和苏联所属各国，时间上也不包括中世纪和古代欧洲文化，信仰上不包括信奉东正教的各民族。《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作者塞缪尔·亨廷顿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西方文化”这一概念的。只是在讲到西方文化的历史时，他们才提到欧洲古典文化。这不符合西方文化史的实际，也同他的下述观点自相矛盾。

本书所使用的“西方文化”的概念，时间上包括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地域上包括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的几乎全部国家，信仰上包括信奉耶和华、耶稣、圣母玛利亚的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东正教的所有国家和各民族。换句话说，即包括《圣经》覆盖下的西方世界的从古到今的全部文化。因为不少西方学者和塞缪尔·亨廷顿的下述观点我认为是正确的观点，同历史唯物主义可以相容：“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文化实际上是所有文明定义的共同主题”，“人类历史上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被基本等同于世界上的伟大宗教”，“人类群体之间的关键差别是他们的价值观、信仰、体制和社会结构”。

这样，我们所指的西方文化的主要载体、主要结构和历史发展的源流就应包括：

1. 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古希伯来文化；

2. 古代基督教文化同古希腊、罗马文化和欧洲各民族文化的交汇与融合；

3. 中世纪欧洲的宗教文化和民间文化；

4. 文艺复兴时期以意大利、西班牙、英国人文主义文化和德国宗教改革为代表的欧洲文化；

5. 17世纪以法国、德国古典主义文化为代表的欧洲文化；

6. 18世纪席卷全欧洲的启蒙主义运动、产业革命、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

伟大文化成就；

7. 19世纪是以改变人类命运的、以三大发现即能量转化与守恒定律、生物进化论、细胞学说为标志的自然科学的伟大发现，德国古典哲学，法国和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化成就等；

8. 20世纪（从19世纪末开始），相对论的建立，原子结构、基本粒子的发现和量子力学的建立，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的建立，分子生物学、特别是核酸的分子结构和遗传密码的发现等四大发现为标志的自然科学的划时代的伟大成就，以及欧洲、北美、拉丁美洲、大洋洲的现代文化；

9. 19世纪至20世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标志的西方文化的伟大创新；

10. 后现代主义文化。

诚然，我们要进行的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主要是两种传统文化的比较。但出发点和归宿是如何加强中国现代主流文化的建设。通过比较，更加清醒、更加自觉地认识“古今中外”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弘扬什么、扬弃什么；对西方文化吸取什么，拒绝什么。正因为如此，中西文化比较的重点，又不得不是西方近代文化。

如果说，弄清源流，是为了弄清两种文化“比什么”，那么，掌握特点，则是掌握两种文化“如何比”的问题。

西方文化的基本特点是：

一、民主资源的积累比较丰富

从文化发展的社会政治背景来看，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在绵延两千年之久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央集权主义的制度下扎根、生长、成熟的，西方传统文化则经历了雅典民主政治为代表的古希腊、罗马城邦奴隶主民主制度；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只有1000年左右，在人类历史上最早被摧毁，而且摧毁得最彻底；文艺复兴以后民族国家林立，最早建立了政治体制多样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因此，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强调多元政治和民本主义，强调法治是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传统。历史上独裁和法西斯也有发生，但为多数人所唾弃。总的来说，具有丰富的民主思想、民主制度和民主意识的资源积累，是西方文化的第一个基本特征。

二、商品意识源远流长

从文化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来看，不同于中国自给自足的农业一直居于经济的支配地位的传统，古希腊、罗马城邦经济繁荣，海陆交通便利，城市内外贸易繁盛。中世纪欧洲各封建王国之间，各国内部的采邑封地之间的贸易亦居

重要地位，封建行会的束缚突破最早，更不用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商品意识渗透在西方文化的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现代文化的各个领域和社会关系的一切方面，最后走到人与人之间以“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代替一切，是西方文化的又一个基本特征。

三、宗教意识很浓，文化冲突频繁

从文化发展的源头和文化交往的过程来看，不同于中华文化发源、生根、成长都在同一疆域、同一宗法思想体系、同一祖先崇拜之内，儒、道、墨、法等各家的碰撞和融合是“兄弟阋于墙”；西方传统文化是多源的，主要源于西亚传播到南欧的基督教文化，又吸收了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古希伯来文化的营养；在帝国轮替、民族迁移、宗教争端、军事远征、殖民扩张的社会交往和动荡中，又吸收了西亚、北非各民族和伊斯兰文化以及西北欧和美洲本土文化的一些成分。在这个漫长过程中，“文明之间最引人注目的和最重要的交往是来自一个文明的人战胜、消灭或征服来自另一个文明的人。这些交往一般来说不仅是暴力的，而且是短暂的”。[①] 由于在不同文化之间，同一文化的不同派别或不同种族之间，以“异教徒”相待，发生过甚至多次反复发生过这种残酷的、毁灭性的冲突和残杀，所以西方传统文化圈内，文化冲突频繁，宗教斗争激烈，一些民族历史积怨很深、仇恨甚大。两次世界大战发源于欧洲是有其文化历史渊源的。

四、科学探索和控制自然的意识强烈

从文化发展的哲学思考来看，在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上，不同于主导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自然观，西方传统文化强调以人为中心，人可以认识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科学探索和控制自然的意识比较强烈。从古希腊泰勒斯的自然哲学开始，欧洲哲学思想的主流就是探索、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基督教信奉的上帝，创造人的目的是让人管理自然。文艺复兴的伟大成就，就在于否定了千年的教会统治之后，重新发现了人，使人成为世界的中心，大大推进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的革命性进展。科技进步又进一步增强了西方人对自身力量的信心，认为人完全可以控制自己的命运，地球为人类提供了无穷的机会，地球的资源即便枯竭，也将有人工制品代替。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都可以从科学技术和社会进步两个方面得到解决。这种观点，直到环境问题日益尖锐，环保主义兴起，科学主义和人文精神相互

---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5 页。

分离和对立的后果越来越严重，才略呈颓势。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观，则重新受到全世界关注和青睐。

五、以个人为社会伦理本位

从文化发展的伦理思想来看，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不同于中国文化以家庭为社会伦理本位，西方文化以个人为社会伦理本位。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在脱去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中在“人”的观念上那层“神”的纱幕之后，“人”变成了大写的：人成了“精神的个体”，[①] 即个人或自我是独立的，是和他人相分离的具有“个人精神”的个体，个人的自由、独立和人权是神圣的。这样的个体是扩张的、外化的。个人要追求自我完善，通过自我奋斗、取得自我成功，以促进社会的发展。西方文化普遍的、典型的以个人为本位的伦理观念是，只有个人得到充分的发展时才能有社会的充分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在人与人之间总是提倡通过“修身齐家”达到“治国平天下”那一套礼教。要求“克己复礼”，以服从、忍让、和谐为美德，也曾维护了长期的社会安定，也曾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于己于家于国都具有“浩然正气”的杰出人物，但却沉淀了自我封闭、拒绝开放、内向保守的精神遗产，造成了压抑个性发展、压制个人自由和民主的种种悲剧；西方文化提倡为了个人的自由、进行冒险、生死抗争、无情竞争的精神，既造成了社会前进特别是社会现代化的强大动力，造就了不少在品格、意志、才能方面的文化伟人和科学巨匠，也产生了很多为个人利益不择手段、为个人野心而癫狂、人性扭曲的悲剧。存在主义者鼓吹“人是绝对自由”的，“他人就是地狱”，把西方以个人为本位的伦理观念推向极端。

六、建立在“人性恶”观念上的法治意识

从关于人的本性的原理来看，不同于中国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人性本善的“性善论”，西方文化沿袭基督教的原罪说，主张“性恶论”。基督教教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圣经·创世记》中所讲的亚当和夏娃在蛇的诱惑下偷吃了禁果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为基督教的教义奠定了基础，也是西方主流文化关于人的本性理论的基础。人在一生中必须不断地忏悔自己的罪过，灵魂才能得救。这个以神为中心的人性原理，看起来同以人为中心的观点矛盾，其实并行不悖。以人为中心的观点，鼓励人的创造性、竞争性和冒险精神，以神为中心的“原罪说”则用上帝的惩罚来制约人的恣意妄为，

---

① 参见［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二篇和第四篇

起着行为规范的作用。故有人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文化史，就是一部以人为中心和以神为中心之间，或者说是以鼓励人的创造性和规范人的行为之间相互角逐和妥协的历史。在西方文化传统中，这一"人性恶"的基本原理始终没有改变。宗教改革后出现的路德教、加尔文教、英国教均以此为出发点，只不过赎罪的方式不同。这一原理，在法国启蒙主义者著作中，社会契约成为控制"人性恶"的办法；在北美富兰克林那里是世俗化，以勤奋和简朴作为响应天启、进行赎罪的最佳方法；在美国的宪法制定者那里，则是采取联邦制和三权分立来防止"暴民"和野心勃勃的政客大权独揽。从"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走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理论基础是"人性恶"。

七、为艺术而艺术

从文艺观来看，不同于中国文化的"诗言志"、"文以载道"的文艺价值观。现代西方文化特别倡导"为艺术而艺术"，有一个演变过程。在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文艺的社会功能这两个基本问题上，西方古典作家，包括俄国19世纪古典作家的观点，同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是一致的或接近的。从康德提出艺术的无限与自由和"美只是形式"的观点以后，纯粹的美感不应渗进任何愿望、任何需要、任何意志活动的观点在现代西方文艺界和美学理论中，逐步取得支配的地位。进而发展到主张直觉就是艺术，艺术既无功利目的，也无道德动机，更无社会教育和服务功能；艺术是一种独立于现实之外的存在，衡量艺术的标准只有一个，即艺术标准，从而产生了掩盖和否定文学艺术的社会本质的倾向。

八、扩张与渗透

从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方式来看，中国文化重渐进、重整合、重生长，而剧烈变化的时期少；西方传统文化重改革、重扬弃、重否定，剧烈变化次数多。中国文化的主流文化，始终主要是士大夫文化，历代知识阶层是文化人的同义语，具有贵族气，广大劳动者参加文化创造的机会往往被剥夺，长时期内，民间文化或通俗文化难登大雅之堂；西方文化的主流文化——基督教文化，一开始就是一个反抗奴隶主统治的"伟大的群众运动"，以后的宗教改革也是动员深广的社会运动，其文化更富有平民性和大众性。中国传统文化是内向型的，具有守成性，以安土重迁为特点；西方文化特别是现代西方文化，是外向型的海洋文化，具有扩张性和渗透性。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两种文化个性越来越明显。从发展趋势来看，西方文化可能从多元化走向以民主政治、商品经济、个人主义为普遍特征的一元文化，越来越具有排他性，因而也引起其他文化对它的阻遏，受到局限，走向顶峰之后的下坡路；而中国现代主流文化，

如能兼收并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博采众长，使中华文化的和合精神和整合功能，越来越得到加强，在各种文化的碰撞、融合中，创造巨大的文化业绩，将出现新的辉煌。

第五节　正确对待西方文化

正确对待西方文化问题，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要掌握第一手资料

无论对西方文化的某一领域（如西方文学、西方哲学、西方史学、西方经济等）发展史的研究，或者断代研究和专题研究，都应该系统全面地掌握有关研究对象的第一手资料。即使不作专门研究而只作一般了解，也应读点西方文化的名著，从第一手资料起步。绝忌人云亦云，更不要跟风。要如实地看清、看懂西方文化的本来面貌。第二手的资料即前人的和外国的研究成果，可以参考，可以借鉴，可以比较，但不是基础，基础是第一手资料。因此，掌握一两门外语是十分必要的。不懂外语的外向型人才，在过去是跛脚的，在今后是不可能的。

二、要十分注意文化的社会实践品格和思维品格

任何文化现象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和一定的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不是神，不是先知，也不是圣人头脑里固有的。但又不能把思想文化现象同社会经济、政治基础的关系，进行简单的“对号入座”式的图解。有神论与无神论，科学与迷信，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绝不会像幼儿园“排排坐吃果果”那样简单。那样，就会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自己置于愚蠢可笑的地步。

三、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善于学习

要丢掉“大中华帝国”的傲气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奴性。然而在反对这两种倾向时，都不要简单化。鸦片战争以后的国粹派和晚清民主革命高潮之前的国粹主义，既有保守、自大、排外的褊狭心理，又有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保护、挚爱和崇高评价；五四运动以后的“全盘西化”论者，既有妄自菲薄、崇洋媚外全盘照搬西方的成分，又有学习先进，尽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良好愿望的成分。何况在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出现之前，早已有人提出折中主义的文化论，主张把一部分西方文化同中国固有的文化融合起

来，兼收两者之长而去两者之短，成就一种中西合璧的文化。我们对前人的局限性和错误不可苛求。重要的在于现在是否正确，或基本正确，或少犯错误。关键在于有没有现代中国人的骨气与胸怀。事实告诉我们，当代中国人，能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理性态度对待西方文化者是有的，鲜明和坚定者不多；现实生活中，在洋人面前奴颜婢膝者不比过去少、其奴才相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公开拒绝学习外国先进者可能没有，但对古代和外国文化无知，又把无知当作光荣，认为中国文化比外国文化高明而盲目自大者则大有人在。这些人忘了毛泽东提出的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外国的方针：向外国学习，不是一时一事，而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仅贫穷落后时要学习，就是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这些人也忘记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政策，把向美国、日本、西欧国家学习先进科技、先进管理、有益的文化，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面。因为这些人没有毛泽东、邓小平提倡和培养的那种骨气和胸怀。所以，要做到正确对待外国文化，首先要正确估价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要做什么样的人！

参考资料

1 冯承伯等编著．西方文化要义．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

2 王喜绒等编著．比较文化概论．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

3 李长春著．基督教笼罩下的西欧．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

4 李新柳著．高教问题探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5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6 罗可群，伍方斐主编．中外文化名著选读．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 中国基督教协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印．新旧约全书．南京：南京版，1982

9 圣经后典．张久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0 圣经故事（增订本）．张久宣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11 黄心川、戴康生等编著．世界三大宗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编，单新平主编．中国基督教基础知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13 任延黎主编．中国天主教基础知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14 杨昌栋．基督教在中古欧洲的贡献．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第五章　伊斯兰文化圈

第一节　伊斯兰文化圈的范围

这里要区分三个历史地理概念：

一是阿拉伯帝国——西方史籍称之为萨拉森帝国，中国史书称之为大食国，7世纪崛起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国家。阿拉伯人在穆罕默德领导下完成统一后，即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迅速向外扩张。8世纪中叶，已征服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非洲北部及西班牙等地，深入中亚细亚，占领阿富汗、印度西北部，并一度进入印度河流域。领土横跨欧、亚、非三洲，形成封建军事大帝国。伊斯兰教也同时传布各地。帝国的政治、宗教中心在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麦地那；倭马王朝时（661—750）移到大马士革，阿拔斯王朝（750—1055）又移到巴格达。从8世纪到9世纪，封建关系已逐步形成，政治、经济势力达到鼎盛，科学文化也有重大发展，并对东西文化交流起了很大作用。但因缺乏统一的经济基础，封建割据局面出现，帝国陷于分裂。西班牙和北非国家相继脱离巴格达哈里发而独立。同时，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不断，国力渐衰。1055年，塞尔柱突厥人乘机占领巴格达，东阿拉伯帝国灭亡。不久，西方各哈里发国家相继覆灭。这个地跨欧、亚、非，上下四百年的阿拉伯帝国，是现存伊斯兰文化圈的历史基础。但帝国中的少数国家先后脱离了伊斯兰文化圈，如西班牙；也有不属阿拉伯帝国管辖的地域后来进入了伊斯兰文化圈，如马来西亚。因此，阿拉伯帝国与伊斯兰文化圈在地理上不能画等号。

二是阿拉伯国家——人口结构以阿拉伯民族为主的国家，包括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约旦、沙特阿拉伯、南也门、苏丹、利比亚、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科威特，巴林、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北也门、毛里塔尼亚、巴勒斯坦、卡塔尔、吉布提、索马里等22个国家。这是阿拉伯帝国崛起和发祥的基地，也是伊斯兰文化的基地。但不能说伊斯兰文化就是阿拉伯文化，还有许多非阿拉伯民族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土耳其等也是伊斯兰文化圈的重要国家。

三是伊斯兰会议组织——这是1971年5月正式建立的伊斯兰国家组织。20世纪70年代，先后有四十多个国家参加，1976年时就拥有42个国家，以

后又有增加。除前述28个国家外，还有乍得、几内亚、马尔代夫、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塞拉里昂、几内亚比绍、加蓬、冈比亚、喀麦隆、科罗莫、乌干达、孟加拉等。伊斯兰会议组织宗旨是：促进各成员国的团结，加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合作，努力消除种族隔离和歧视，反对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支持巴勒斯坦人民重返家园和恢复自己权利的斗争；支持一切穆斯林人民保障其尊严、独立和民族权利的斗争。伊斯兰会议组织比阿拉伯国家广泛得多，但也不是伊斯兰文化圈的全部，例如欧洲的伊斯兰国家就没有包括在内，亚洲、非洲也有部分伊斯兰国家未包括在内。

对以上三个概念作了澄清、梳理之后，就从地理上把伊斯兰文化圈的历史与现实基本弄清了，就不会把阿拉伯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等同起来，也不会混淆非洲文化与阿拉伯文化了。

在伊斯兰文化圈内，现在约有66个国家和地区，占世界的30%，人口14.9亿，占27%。所属陆地面积占全球22%。所属国家和地区分布在非洲的有34个，亚洲有29个，欧洲有3个。非洲总人口有七亿三千万，其中有七亿一千八百万人生活在多数居民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但非洲民族成分最复杂，有近800种民族语言，而国语是阿拉伯语、法语、英语和葡萄牙语。亚洲34亿人口中，七亿七千万人是穆斯林，其语言分属南亚语系、阿尔泰语系、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等九个语系。穆斯林是世界上语种最多的地区。这里的自然条件较差，有最高的山、最深的海、最大最多的沙漠、还有世界最热的苏丹克土木。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和经济大国，大部分长期是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直到20世纪末，非洲34个穆斯林国家中，农业国有21个，牧业国有4个，渔业国有1个，农业和工业并重的国家有4个（埃及、塞拉里昂、扎伊尔、几内亚），工业国只有1个（津巴布韦），石油国有3个（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利比亚）；亚洲23个穆斯林国家中，石油国有11个（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巴林、卡塔尔、叙利亚、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文莱、沙特阿拉伯），工业国只有3个（塞浦路斯、约旦、新加坡），农业国5个，工业和农业并重的国家有3个（土耳其、塔吉克斯坦、印度尼西亚），商业国有1个（黎巴嫩）。所以穆斯林世界，总的来说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不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绝大多数在这里。石油国家的人民虽过着富裕的生活，但石油带来了财富，也带来了灾难，工业时代石油是工业的血液，石油国成了列强"兵家必争之地"，富裕而难强大，富有而难独立，成了畸形经济国家。伊斯兰教被称为"最富有个性的宗教"，保存原始教义教规最多，宗教意识也很强烈。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穆斯林国家体系成为当代世界不稳定的区域，民族分裂、内战频繁，外来干预不断。国家地区之间的冲突、局部战争，几乎没有间断。

第二节 伊斯兰教的创立与传播

阿拉伯人是打着伊斯兰的旗帜征服世界并建立阿拉伯帝国的。伊斯兰文化圈的基本特征就是这里的人们都信仰伊斯兰教。

“伊斯兰”一词原为“皈服”之意，伊斯兰教的信徒称为“穆斯林”，意为“顺从者”，即信仰安拉、服从先知的人。

伊斯兰教产生于7世纪的阿拉伯半岛的麦加城和麦地那城。这两座城市，加上耶路撒冷，是伊斯兰教的三大“圣城”。

大约在6世纪，半岛中的一部分贝都因人脱离游牧生活，定居、务农、经商，兴建了塔伊夫、耶斯里布（麦地那）、麦加等城镇。其中麦加坐落在群山环绕的河谷，是南去也门、北到地中海、东至波斯湾、西抵红海的交通枢纽，占有突出的商业地位。在麦加城经商的古莱什部落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商业集团，由经营家、高利贷者、企业家、商人和商队头人组成了商业贵族阶级。古莱什部落和其他部落宗教主义盛行，崇拜各自的偶像。在麦加禁寺里供奉着三百六十多尊各种偶像，朝觐成为阿拉伯人最重要的宗教仪式，特别朝拜麦加禁寺那立方体建筑物克尔白。克尔白墙上的黑色陨石被奉为神物膜拜（后为伊斯兰教圣物）。这一切使麦加日益成为半岛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中心，为未来创立阿拉帝国和伊斯兰文化打下了基础。

半岛西有拜占庭帝国，东有波斯王国，既是东西商人的途中站，又是军事必争之地，成为长期战争拉锯区，遭到侵扰、统治和破坏，特别是半岛中南部，在伊斯兰教创立前夕，大片土地荒芜、人口锐减，道路湮没，商路难行，已失去东西商路坦途的作用。商业贵族和农民、牧民和手工业者以及奴隶赖以生存致富的基本条件受到严重威胁，社会动荡不安。阿拉伯贵族为了加强控制，夺取新的商路和土地，需要建立一个联合各部落的强大统一的国家。伊斯兰教的产生正是这些经济变动和政治统一要求在意识形态中的反映。

正在这个阿拉伯民族史上的重要时期，半岛的物质与精神中心麦加出现了伟大人物穆罕默德（Muhammad，约570—632）。

穆罕默德青少年时期生活坎坷。出生前，父亲阿卜杜拉在去叙利亚经商归途中，病故于麦地那。穆罕默德出生后8天，按民族习惯送到沙漠居民中哺育，5岁回到母亲身边。母亲带他到麦地那拜祭父亲的坟地，回家途中病倒，客死他乡。穆罕默德成了父母双亡的孤儿，由祖父抚养。8岁时，祖父去世，跟着家境贫寒的伯父过日子，当过牧童，长到12岁，就开始长途跋涉到叙利亚学经商，从小接受磨炼。由于他天资聪敏，观察力极强，记忆力很好，增长了许多知识，受到同辈青少年的爱戴，被称为“艾敏”（意为“忠实可靠的

人")。

25 岁时，穆罕默德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先受雇于富商的遗孀赫迪哲，不久与其结婚。婚后，穆罕默德有了充足的时间思考自己感兴趣的问题。面对阿拉伯半岛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一度隐居到郊外的希拉山洞，昼夜苦思冥想，为创立伊斯兰教作准备。广泛的阅历、坎坷人生的磨砺、深湛的思考使穆罕默德精神振奋、意志坚定、思想成熟。于是，在 610 年穆罕默德创立了一个不同于阿拉伯本土的原始宗教，也不同于外来的犹太教、基督教的崭新宗教——伊斯兰教。

穆罕默德创立和传播伊斯兰教的事业得到了忠实的妻子和内兄瓦格纳（通晓《福音书》的基督教徒）的全力支持。首先在堂弟阿里、释奴宰德、好友艾卜·伯克尔等小范围中秘密传教，继而得到古莱什部落上层人士奥斯曼、阿卜杜、泰勒哈、萨阿德、祖拜尔等的归顺，从而在麦加各阶层中迅速传开。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伊斯兰教，引起了麦加贵族的严重不安。以伍麦叶家族为代表的贵族顽固势力，以嘲笑、谩骂、经济制裁、断绝商业交往、拒绝通婚、甚至凌辱、杀害等各种手段，反对传播伊斯兰教，镇压、迫害穆斯林。为了保存实力，穆罕默德曾让奥斯曼带领部分信徒去埃塞俄比亚避难，自己坚持在麦加传教。就在这严峻时刻，620 年、对穆罕默德有养育之恩的伯父和贤内助赫迪哲相继去世，饱经沧桑的穆罕默德，忍受意外的不幸，沉着冷静地思考对付日益残酷的迫害。于是出现了奇迹般的夜间耶路撒冷之行。传说穆罕默德在耶路撒冷上了天，受到真主安拉的召见和亲启。因此耶路撒冷也成为后世伊斯兰教的又一个圣地。正在这个时候，半岛南部麦地那城的阿拉伯人于 620 年和 621 年，先后两次派人去会见穆罕默德，表示皈依伊斯兰教，宣誓保护先知及其家属和信徒。622 年，穆罕默德放弃麦加，南迁麦地那，在这里建立了世界第一座清真寺，顺利开创他的传教事业。这一年后来被定为伊斯兰教历元年。麦地那从此成为伊斯兰教又一个更重要的圣地。

在麦地那，穆罕默德以和平和武力两手传教，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并在 624 年、625 年、627 年，先后同麦加的贵族军队交战并获胜。628 年双方签订和约，穆斯林得到回麦加自由朝觐的权利。629 年，麦加军队两位上层指挥官（阿慕尔·本·阿绥和哈立德·本·韦立德）归顺穆罕默德，这两人以后成为阿拉伯帝国著名的远征军司令。630 年 1 月，穆罕默德亲自点兵，出征麦加。商业贵族不战而降，首领苏福扬出城请罪，君臣和居民全部加入伊斯兰教。

穆罕默德在麦加，下令摧毁各部落供奉在禁寺的三百六十多尊偶像，只留下克尔白房的黑石作为伊斯兰教的神物；通令各部落自毁和收缴各自的偶像；派兵镇压半岛上敢于反抗的势力。631 年半岛全部统一于伊斯兰旗帜之下。632 年朝觐月，穆罕默德怀着胜利的喜悦，面对浩浩荡荡的信徒队伍，发表了

长篇演说，宣读了最后的启示，重返麦地那后三个月，身染重病，这位使阿拉伯各部落团结起来、成为一个坚强民族的伟人，于6月8日，溘然长逝。

第三节 伊斯兰教的经典与教义、教规

一千三百多年来，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亿万人民，每天吟诵同一部经典——《古兰经》（又译《可兰经》），始终尊奉同一个言行楷模——《圣训》。这是全人类发展史上，继佛教、基督教之后又一壮观的文化现象。

“古兰”为阿拉伯文音译，原意是“诵读”、“讲道”。《古兰经》又译《可兰经》，有的穆斯林把它叫“读本”、“训诫”、“真理”。

《古兰经》共30卷，114章，6 236节。其中的麦加创教时期的十三年有84章，内容主要是关于宗教本身的事，如劝人行善，反对偶像崇拜，警告末日来临，预言末日审判，要人们相信安拉是唯一的真主，相信穆罕默德是伟大的先知，号召世人皈依。在麦地那十年建教时期有29章，这时有了根据地和政权，有了宗教组织，穆罕默德成为宗教领袖、政治领导人、立法者和军队统帅，经文的内容多是针对当时发生的事情发表宗教社会主张，宣示各种规定，如礼拜、斋戒、天课等礼仪与规章；财产、婚姻、杀人、报复等民事和刑事法律；戒酒禁赌等禁忌。全部经文被认为是真主的语言，是通过天使加利伯传授给先知穆罕默德的天启，包括610年在希拉山洞隐居时接到的最初的启示（《古兰经》96：1—5）、632年在麦加辞别朝觐时接到最后启示（《古兰经》5：3）。

穆罕默德青少年时期生活坎坷，没有机会上学读书，不会写字。他每接到天启，立刻传授给身边子弟，会写字者记录于石板、骨片、兽皮或棕榈叶上，不会写字者记忆于心上。穆罕默德去世后，欧麦尔向在任哈里发艾卜·伯克尔建议系统整理《古兰经》，由曾任先知秘书的宰德负责收集、编纂和重抄经文，武伯郎、阿里、奥斯曼作为他的助手。651年完成了《古兰经》定稿，被称为“奥斯曼定本”，共抄七部，送往麦加、巴林、也门、库法、巴士拉和大马士革，是后世通行世界的唯一定本。由于当时尚未产生阿拉伯语的标音符号，也无排版印刷条件，对抄本的读法不一。直至933年，经七位神学家标明读音符号，才最后确定《古兰经》读法至今。

在《古兰经》之前，尚无阿拉伯文书。《古兰经》是阿拉伯语的典范，它统一了半岛阿拉伯人的语言，也规范了阿拉伯语的写作，是最早的阿拉伯语读本和第一流的散文作品，不仅是信徒们每日五次礼拜诵读的宗教经典，也是伊斯兰文化史上和阿拉伯文学史上具有奠基地位的杰作。

《圣训》的地位，仅次于《古兰经》。它集录了先知在创立伊斯兰教过程

中除接受天启之外的言论、举止和活动，被穆斯林世界奉为教义、律法和道德规范的重要依据。穆罕默德去世后二三百年间，多位学者做过《圣训》的编写、整理工作。有不同的版本，其真伪程度各派有争议。最负盛名的是《布哈里圣训实录》，作者布哈里（Bukhārī，810—870）周游波斯、伊拉克、叙利亚，埃及等地，搜集到6万多条先知的传述、又花费16年时间研究校订，筛选出7 397条，认为确实可靠，按礼拜、朝觐、圣战等条目，分门别类编辑成书。因而这部书在信徒中影响大，具有权威性。

根据《古兰经》的规定和《圣训》的指导，以及穆斯林宗教生活实际履行的情况，伊斯兰教的教义、教规的基本要求可概括为“七信”、“五功”。

“七信”是：

一是信真主。“真主”的阿拉伯语译为“安拉”。相信真主是创造万物的唯一的主宰，这是伊斯兰教信仰的核心。真主完美无缺、无所不在，无色相、无声臭，天地、光明、黑暗、人间宇宙万物都是他创造的。人赖以生存的一切是真主所赐。信仰真主的人将进天堂，不信者将入火狱。

二是信“天使”或“天神”，阿拉伯语音译为“麦俩依克”。他是真主用光创造的精灵、圣洁无邪，无性别，无形体，无生死，不吃喝，数目无限，布满天上人间，只听候真主的命令和差遣，管理天国火狱，观察人类言行作为末日审判的依据。每个人身边有两位天使，右边的记录善行，左边的记录恶迹。人们必须信仰天使，但不可崇拜，以免干扰“万物非主，唯有真主”。

三是信“使者”。相信穆罕默德是真主派遣到人间的最后的最伟大的先知，相信使者同相信真主是一致的。真主向使者启示了《古兰经》，用它开导世人，恩典众生；启迪信士，创造奇迹；团结教化阿拉伯民族，建立强大帝国。

四是信经典。《古兰经》是真主降示人间的众多经典（传说有104部，如《旧约》、《诗篇》、《新约》等）中最后的经典，它所包含的真理足以证明以前所有的真理和经典。它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伊斯兰教的唯一经典，虽已译成多种文字，但未经神学家审定，是供其他民族理解《古兰经》用的。在伊斯兰世界诵读《古兰经》时均用阿拉伯语，信徒们包括许多儿童，能从头至尾背诵洋洋数十万字的经文。

五是信末日。伊斯兰教认为真主创造一切，也将在世界末日毁灭一切，用更好的一切来代替。末日来临时，真主将审判每一个人，按其善行恶迹发配，善者去乐园，永居其中，得享最高品级幸福；恶者下火狱，不死也不活。

六是信“前定”。每个人的生、死、福、祸、善、恶、美、丑等都是真主事先决定好了的。

七是信“后世”。认为今世短暂，后世永存，是人们的真正归宿。

以上七大信仰，前五条是《古兰经》明文所列。后两条是宗教生活中形成的。故也有讲伊斯兰教“五大信仰”的。

“五功”（五项功课）是：

一是念功。是信仰的表白，用阿拉语诵读“我作证：除真主外别无神灵；我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一个人只要当众念此证词，就被认为接受了伊斯兰的信条，成为一个穆斯林。人出生时首先听到的、人临死前自念或他人代念的、每天五次礼拜时念的、宣礼员高声朗诵的都是这两句。

二是拜功。就是礼拜。黎明的晨礼、正午的晌礼、午后的晡礼、傍晚的昏礼以及夜间的宵礼，是每个虔诚的穆斯林必做的礼拜：面朝麦加克尔白天房的方向，每天五次。事前小净，然后立正、鞠躬、跪拜、诵读《古兰经》首章《法谛海》。每周五聚会清真寺，事前大净身，听伊玛目演讲，为大礼拜。

三是斋功。伊斯兰历九月为斋月。按规定，除老弱病残、孕妇、哺乳婴儿的母亲和长途旅行者，要过斋月。期间，封斋的穆斯林在天亮后到太阳落山前，清心寡欲、不吃不喝、不行房事、修身养性、磨炼意志。此谓“天命斋”，以别于信徒自定的其他戒斋日。

四是课功。阿拉伯语音为“扎卡特”，本意为“清净”，表明交付“天课”可以使自己的财产更洁净。“天课”是伊斯兰教的法定施舍，是奉真主之命而定的赋税，也是一项经济制度。在阿拉伯帝国时期，是每个信徒按自己财富的比例（一般为5%）交纳的国家税收。用于修建清真寺，救助有困难的穆斯林。

五是觐功。凡成年男女，身体健康、理智健全，有人身自由、没有债务的穆斯林，一生之中要去参加朝觐一次。（《古兰经》3：37）

强烈而虔诚的宗教信仰和严格而规范的宗教生活给阿拉伯带来了团结和力量。穆罕默德及其继承者能从阿拉伯半岛走向四方，建立强大的阿拉伯帝国，与伊斯兰教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是分不开的。

第四节　伊斯兰教的派别

伊斯兰教在传播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内部的教派斗争。人类社会产生的大小宗教特别是三大宗教，内部分派是普遍存在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但伊斯兰教的教派斗争不同，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宗派林立，派系多，派斗剧烈；二是有些派斗相当狂热，以至野蛮；三是内部派斗甚至采用军事斗争的形式，武装斗争甚至是宗教领袖的特长，有的派别甚至认为“杀死政敌、教

敌是安拉喜悦之事"。[1]

632年伟大的穆罕默德——先知国王、阿拉伯神权国家的缔造者和军事统帅与世长辞了。最初的教派分歧，是围绕继承权发生的。四派之间展开了明争暗斗：自称享有优先权，创教时期先知最早的信徒，追随他南征北战的移民派（又称迁士派）；麦地那建教时期，善待先知，辅助他，为伊斯兰提供了新家园的辅助派（又称辅士派）；相信君权神授，认为最适合的继承者只能是先知的堂弟和阿里的嫡系派；曾在麦加显赫一时的贵族，坚信自己是最有统治才干、最晚归顺伊斯兰的倭马亚派。经过激烈而迅速的活动，移民派获胜，先知的至交，59岁的令人尊敬的艾卜·伯克尔当选为首任哈里发，在位两年于634年亡故。他的得力助手欧麦尔，一个有着强烈个性和铁的意志的卓越施政者任第二任哈里发，在位10年（634—644），功勋显赫，使穆斯林成为跨欧、亚、非的大帝国，但却在麦地那清真寺死于一次波斯奴隶的刺杀。欧麦尔临终前，召集最受教徒尊敬、最杰出的六位长老，推选先知的另一位女婿、出身倭马亚贵族的奥斯曼担当第三任哈里发，他虽年近七旬，却在位12年（644—656），是一位正直、沉稳、有文化修养、酷爱学问的人。他主持编写的《古兰经》是一部准确无误的版本，至今从未改动过一个标点。他也在一次内部教徒的暴动阴谋中死于暗杀。第四任哈里发是阿里，在位5年（656—661），打了三次内战，都是胜利者，不仅宽厚仁慈，为人正直、志趣朴素，而且具有伟人的品格——勇气、智谋和学识。可惜生不逢时，死于本派系的叛徒——哈瓦立及（意为分离）派的毒剑。这前四任哈里发时期被赋予"正统哈里发"的称号，被称为伊斯兰的"黄金时代"、"共和时期"，其实也是伊斯兰教内部派系斗争从产生、发展、公开到残酷恶斗的时期。大小派别在分离组合的过程中，基本形成两大派别，延续至今。

一是什叶派——是阿拉伯文Shī'ah的音译，意为"同党"，专指拥护阿里的人，同逊尼派对立。只承认阿里及其后裔为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者，称之为"伊玛目"，认为他们是"超人"，受安拉的保护，从不会犯错。他们以阿里为第一代伊玛目，对《古兰经》有自己的解释，也有自己的《圣训》。10世纪至12世纪，该派曾在北非建立法蒂玛王朝（909—1171）。什叶派之内又有十二伊玛目、伊斯玛仪勒和栽德等派别。主要分布在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印度和阿拉伯半岛西南部。

二是逊尼派——全称为"逊奈和大众派"（Ahl al-Sunnah wa'l-Djamā'ah）。阿拉伯语Sunnah（逊奈）意为"行为"，原指穆罕默德的行为，后被认为是穆斯林生活和行为的准则。逊尼派是伊斯兰最大的教派，与什叶派不同，承认四大

---

[1] 参见《伊斯兰教派历史概要》，宁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页

哈里发都是先知合法的继承者，获得历代哈里发的广泛支持，流传甚广，有“正统派”之称。除《古兰经》外，还根据“逊奈”行教。在神学方面有侧重经典明文的经典派和侧重个人见解的也兼顾经典的艾什阿里派。在教法学方面有哈乃斐、沙斐仪、马立克和罕百里四个支派。全世界穆斯林约70%属此派，中国的穆斯林绝大多数也属此派。

以上各派中后来又分裂出大小教派，根据苏联宗教专家研究，已达二百四十余派。大信仰、小宗派成为伊斯兰教发展的一大特征。为什么呢？如果说最初是为了争夺权位，后来派斗的原因就更为复杂。巴基斯坦的历史学家赛义德·菲亚兹·马茂德认为：阿拉伯人是独立的，甚至是难以驾驭的民众；他们热爱个性自由，长久以来，只忠于他们的氏族。现在他们破天荒地统一在一个宗教领袖之下，高贵者和卑贱者一律平等，并非所有的阿拉伯人都不无反抗地接受了新的生活方式。这个分析是符合实际的。苏联学者引用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对宗教战争的社会性的分析，指出伊斯兰教派斗争反映了相互斗争的各个阶级和阶级集团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则更深刻地揭示了教派斗争的社会本质。

第五节　伊斯兰文化的成就与特点

列举伊斯兰文化的成就比较容易，也足以让阿拉伯人和进步人士自豪的。数学上的阿拉伯数字、文学上的《一千零一夜》在全世界、全中国都已妇孺皆知了。在自然科学领域里，阿拉伯医学、化学、物理学、天文学在理论与实践上作出的贡献；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在文学、音乐、建筑艺术、史学、哲学方面的建树，都使中世纪的欧洲望尘莫及。美国东方学者希提教授承认：“中世纪用阿拉伯语写成的各种著作，比用其他任何语言写成的还要多。”① 这足以概括伊斯兰文化的丰富性。

如果从人类文化史发展的广阔、深远的背景来看伊斯兰文化的深刻性，则其具有以下的特点：

一、文化振兴是民族振兴的前提

在穆罕默德领导下阿拉伯人征服欧、亚、非，创建的是帝国，也是文化，或者说首先是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教相对于阿拉伯的各个部落的带有原始拜物教性质的偶像崇拜，不仅是先进的宗教观念，而且是先进的宇宙观、先进的政

① 黄运发、黄民兴著《中东画卷》（《世界文史知识》第4卷），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0页

治信念，它鼓励阿拉伯民族团结起来，相信一种新的人类社会秩序的合理性。这是一种全新的智慧、道德和感情，是阿拉伯民族建立统一国家的强大动力，是一次文化精神的历史性的跨越。相比之下，阿拉伯帝国缺乏与文化齐辉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实力，这是帝国较快分裂并逐步衰亡的重要历史原因。阿拉伯帝国兴衰史充分证明，先进文化是驱动历史的伟大力量，但必须以先进的经济基础为依托，才有持久的生命力。

二、东方与西方的文化熔炉

至今仍然鲜活而典雅，并带有几分神圣感的清真寺建筑艺术，是伊斯兰文化既普遍而又独特的象征。它以交叉的弓架结构和可见的相互交叉的弯梁为基础的圆顶体系，是吸收希腊、波斯、印度、两河流域和古埃及建筑的特色，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伊斯兰哲学体系颇具盛名，它是阿拉伯人巧妙地把希腊、印度、波斯等东西方哲学思想与伊斯兰教观念融合在一起创立的。有趣的是，既努力吸取亚里士多德的唯物主义因素，又不背离伊斯兰教义。法拉比是阿拉伯哲学体系的真正创立者，传之后世的著作有《论灵魂》、《论超然和差异》和《哲学问答》等，但他在获得“哲学亚师”尊号的同时，还获得“哲学大师亚里士多德著作注释者”的称号。

阿拉伯医学对世界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拉齐是中世纪伊斯兰最伟大的医学家，发明了外科串线法。享有“医生之王”的拉齐，知识渊博，医学造诣很深，所著《医典》，从 12 世纪到 17 世纪，一直是欧洲各大学的医学教科书。而阿拉伯医学和卫生事业又是在吸收古希腊、印度、波斯和中国成果的基础上得到迅速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

在化学领域，阿拉伯人吸收中国炼丹术和希腊炼金术的成就，广泛运用实验方法并应用于制药、制革，并有新的发展。

三、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桥梁

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一文中说：“火药、罗盘针、印刷术——这是预兆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的工具。”我们应该承认，伊斯兰文化的闪光之点，恰恰不在于自身的辉煌，而在于它在人类历史的古代与近代之间，成为人类文化火炬的传递者。因为，古希腊、罗马文化遗产毁灭殆尽时，赖有阿拉伯文版本将其保存，并在中世纪的后期又翻译成拉丁语等西方语言输回欧洲，唤醒欧洲，促进了文艺复兴的早日到来。因为，正是阿拉伯人在 8 世纪至 12 世纪先后把中国的伟大发明传人欧洲，才使

欧洲有了提前进行远洋航海冒险、发现新大陆、进行产业革命的基础。也许人类应当把穆罕默德关于“求学乃我男女穆民之天职”，“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的圣训，永远当作座右铭。正是这种精神，使成千上万的穆斯林不惜远途跋涉，含辛茹苦，用阿拉伯语创造的文化奇迹，在东西方之间，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建立了永不断绝的历史链条。

第六节　伊斯兰文化与中国

伊斯兰在中国，与其说是宗教，不如说是文化。或者说，文化意义大于宗教。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说法大同小异。大都从隋唐说，只是隋朝何年，唐初何年，所据不同。对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来说，这无关大局。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民族调查和民族识别，确定我国境内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共有十个。至2000 年，伊斯兰教信徒总数已近 2 000 万人。他们是回族约 860 万人，维吾尔族约 721 万人、哈萨克族约 111 万人，东乡族约 37 万人，柯尔克孜族约 14 万人，撒拉族约 8 万人，塔吉克族约 3 万人、还有乌孜别克族、保安族、塔塔尔族各 1 万人左右。

回教，又称“回回教”，是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旧称。回族主要分布在宁夏、甘肃、河南、新疆、青海、云南各省，回族人口均超过 50 万，山东、河北、安徽、辽宁、陕西也不少，北京有 22 万。回族是说汉语的穆斯林，主要由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中国的后代构成。唐宋时期阿拉伯、波斯商人、传教士经海陆两条丝绸之路来我国，起初是经商、传教和朝贡，后来不少人在广州、泉州、扬州、长安定居，称为“番客”，即侨民，久而久之变为本地人，成为中国的第一批穆斯林。到了元代，成吉思汗征服半个地球，西亚、中亚各族的部分穆斯林作为军士、工匠驻屯内地，还有少数官员、天文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也应聘东来，共达数十万众。他们与唐宋时期定居的穆斯林后裔，与维吾尔族、蒙古族、汉族居民融合，学会使用当地的汉语作为交际工具，以伊斯兰教为联系纽带，以清真寺为中心形成社区，经过数百年的发展，逐步在中国的土地上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回族。他们是中国穆斯林的核心群体，也是中国穆斯林文化的主要传播者和载体。

新疆的伊斯兰教传入较晚。10 世纪维吾尔族人，即从卡拉汗王朝的萨图克·包格汗开始由信佛教改信伊斯兰教，传播中动用了武力。全疆各地包括吐鲁番、哈密一带的维吾尔族人都改信佛教是 15—16 世纪。塔吉克族信仰伊斯兰教较早。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信仰伊斯兰教较晚，直到 17—18 世纪才全部皈依。

新疆的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是从境外迁入中国的，他们迁入前已是穆斯林。

伊斯兰教从以上三个渠道、三种方式传入我国，不是阿拉伯帝国征服的结果，而是以和平的方式传入。传入的不仅是宗教，而且是文化。伊斯兰教同信众所在民族文化结合，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又把自己的文化同汉族文化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或“中国化了的伊斯兰”，为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除了七大信仰、五大功课、主要禁忌和习俗节日与世界各国穆斯林相同外，根据中央民族大学最新研究，中国伊斯兰民族文化还具有以下特征和杰出贡献：

一、我国明清时代开始的经堂教育及以儒诠经和《古兰经》、《圣训》的翻译

随着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回族中的一些有知识的人，为了使伊斯兰教及其文化在中国内地得到更顺利的传播和发展，便仿效中国古代就有的办私塾和新疆维吾尔族早在11世纪就开始的举办经文学校的办法，开始创办经堂教育。最先是由陕西著名经师胡登洲倡导的，这在中原和西北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维吾尔族、回族经堂教育中规定的课程及教材，也都应看做是中国伊斯兰教民族文化中所包括的内容。此后又出现了汉文译著活动，回族中一些经汉两通的学者便对有关伊斯兰文化方面的经注学、教义学、教法学、圣训学、典礼制度及习俗等方面的典籍进行了著述及翻译。其中有的是以著为主，以译为辅，有的是以译为主，以著为辅。他们都是以儒诠经，用中国古代汉族哲学中的某些概念和思想来解释伊斯兰教教义，从而形成了中国回族的哲学体系。

中央民族大学的学者胡振华认为，构成中国伊斯兰教民族文化中有关宗教文化的最重要内容的应是《古兰经》和《圣训》的汉文译本和维吾尔文译本，我认为是正确的。

除《古兰经》、《圣训》外，我国内地的穆斯林学者还翻译了不少宗教性的其他著作。我国内地的穆斯林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和“教育救国”的思想影响下，也传播了一些进步思想，为弘扬中国伊斯兰文化作出了贡献。

二、中国伊斯兰教的教派

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十个民族中，除塔吉克族属什叶派中的依斯玛仪勒派，居住在新疆沙车县境内的部分维吾尔族属十二依玛目派外，其他各族穆斯林都属于逊尼派。逊尼派中又分不搞道乘、宗教功修的和重视道乘、宗教功修的两派。前者包括格底木、依合瓦尼、西道堂、以及新疆各族中的逊尼派、圣

训派等，后者是苏非派（神秘主义修道派），即西北回族、撒拉族等中的门宦教派和新疆境内的伊禅教派。

中国伊斯兰教的教派中门宦的分化时间不长，都是从国外传进来的，是流，不是源，它们彼此在理论上没有多大差别，差别多半在仪式或对一些事情的解释上。

三、中国伊斯兰教的清真寺

清真寺，是穆斯林礼拜的场所。中国的清真寺有两种建筑风格，一种是阿拉伯式的建筑，一种基本上是中国寺庙传统风格的建筑，但在室内也吸收了一些阿拉伯特色。清真寺中除了有礼拜的大殿外，还有沐浴室和为穆斯林办理丧葬的屋子。比较大一点的清真寺中，还设有进行经堂教育的教室。清真寺既是穆斯林礼拜的场所，又是穆斯林青少年习学经文和宗教知识的地方，它还是为穆斯林办理婚丧嫁娶和屠宰禽畜的地方，也是举行集会，商议有关本地区穆斯林事务的地方。有的还在清真寺中办武术班，这里也是锻炼身体的地方。

历史上，清真寺在凝聚其周围的穆斯林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有的清真寺在反清回民起义和抗日战争中成了指挥部所在地。我国现有三万多座清真寺，其中以北京牛街礼拜寺、广州的怀圣寺、泉州清净寺、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等最为著名。

四、中国伊斯兰教民族在天文历算、医学、建筑、造船、航海、语言学、文学、史学、哲学、书画、音乐、武术及烹饪等方面为丰富中华民族文化所作出的贡献

在天文历算方面，维吾尔族11世纪的古典诗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在他的长诗《福乐智慧》中就谈到“整个宇宙运转不停”，“太阳是七大行星唯一发光发热的天体”，“月亮距地球最近，绕地球旋转”这些观点。在内地，元代回回人加巴刺丁为我国制造了七种天文仪器。到了明代，回族马沙亦黑译出了不少阿拉伯文天文历法书籍，他们都为我国天文学的发展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另外，在数学方面，也是如此，我国从元代开始使用阿拉伯数字，这也是由回回人介绍到我国的。

不论是维吾尔族，还是回族，都把阿拉伯—伊斯兰的医学成就和经验传承下来。中国伊斯兰教民族中还有过不少著名的大夫和药材专家。

在建筑学方面，中国伊斯兰教民族也有不少贡献，例如全国各地清真寺、“麻扎”（陵墓）的建筑，都有突出的伊斯兰特色，如今民族地区的一些新的建筑物也吸收了拱门、圆顶的形式，并成为表现伊斯兰教民族建筑的一种民族

形式了。另外，众所周知的元大都城——北京，也是回回人亦黑叠儿设计的。

在造船、航海方面的贡献，只要提一下云南回族郑和率船队七次远洋出海的事迹就够了。

在语言学方面，人们应当知道世界闻名的《突厥语大词典》，这是宋代维吾尔族著名语言学家马合木德·喀什噶里（约1008—1105）编纂的一部包括突厥语族诸语言词语、谚语、民歌的大辞典，它是包括分布在中亚及新疆一带广大讲突厥语族语言的各民族人民的语言、民间文学、民俗、地理、农业、医学、天文等多方面资料的一部百科全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明代回族马沙亦黑等编纂的《高昌馆杂字》、《回回馆杂字》是汉语、维吾尔语和汉语、波斯语对照的分类辞汇集，它们对研究当时的维吾尔语及波斯语都有一定价值，都丰富了我国语言学。历史上回族人民曾使用阿拉伯文字母来记录所讲的汉语，这也是对中文拼音化的一种实践。

在文学方面，我国伊斯兰教民族的贡献更是非常突出。以维吾尔族为例，除了诗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之外，还有撰写了哲理诗《真理的入门》的艾合买特·尤格纳吉及翟里力、诺奥比提、阿布都热衣木·纳扎里、毛拉比拉勒、黎·穆塔里甫、铁衣甫江等许许多多的诗人、作家，也有像《阿凡提故事》那样非常吸引人的丰富的民间文学作品。哈萨克族中除了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多部长诗和“阿肯”（民间游吟诗人）弹唱外，像唐加勒克·焦勒德一样的诗人、作家也不少。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共8部，长达二十多万行，史诗《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能全部背诵下来。在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族中广泛流传的“花儿”（一种民歌）和宴席曲及一些民间传说、故事，也丰富了中国民间文学宝库。回族使用了汉语，使回族诗人作家们能以汉语文创作，其中也出现了萨都剌、丁鹤年等一批著名的人物。

在史学方面，中国伊斯兰教民族也保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历史文献。就以当代中国历史学家来说，维吾尔族的翦伯赞和回族的白寿彝两位教授都是中国历史学界中的泰斗，他们所作出的贡献是世人皆知的。

在哲学方面，除了明代回族哲学家李贽撰写了《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书以外，还有更多的内地回族学者是把伊斯兰哲学介绍到我国，并用伊斯兰哲学来丰富和补充中国的传统哲学。他们“以儒诠经”，自觉地吸收儒家思想，使伊斯兰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伊斯兰哲学。

在书画方面，历史上回族中除了出现过瞻思、萨都剌、高克恭、赵孟頫、董其昌等一大批书法家、画家外，还有不少阿訇擅长用各种阿拉伯文体书写条幅、匾联、中堂等。

在音乐方面，新疆各族穆斯林都是能歌善舞的，一些维吾尔族的民歌，不仅流传到内地，而且也传到了海外。维吾尔族的大型套典《十二木卡姆》是举世闻名的，它丰富了我国音乐宝库。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等民族的乐器主要有都它尔、热瓦甫、考姆孜、冬不拉、手鼓、木琴、笛等，其中有的乐器是我国内地民族所缺少的，用这些乐器演奏的曲目特色鲜明，受到国内外听众的欢迎。

在烹饪方面，中国伊斯兰教民族中经营餐饮业的人不少，他们办的都是清真饮食，在菜馔和小吃方面都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如今新疆的羊肉串、烤包子及回族的牛肉面等，已成为各族人民都非常喜欢吃的家常便饭了。

参考资料

1　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　李兴华等．中国伊斯兰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　胡振华．中国伊斯兰教民族文化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5）

4　赫伯特·戈特沙尔克　震撼世界的伊斯兰教．阎瑞松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5　赛义德，菲亚兹·马茂德．伊斯兰教简史．英云贵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6　叶·亚·别利亚耶夫．伊斯教派历史概要．王怀德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0

7　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8　项莫杰等．中亚：马背上的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9　纳忠等．传承与交融：阿拉伯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10　唐宝才等　光辉灿烂的阿拉伯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1　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穆罕默德生平．王永方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

12　季羡林，周一良，张芝联主编．世界文史知识　第4卷．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

13　古兰经．马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第六章　黑非洲文化圈

第一节　为黑非洲文化圈正名

2001 年 6 月 19 日，对南非来说是划时代的。在南开普敦，一条船把一条电缆从海底铺到岸上。到年底，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 37 个国家和地区将拥有与全球电话网和因特网联系的一流线路。这条线沿非洲西海岸北上，在尼日利亚、加纳、科特迪瓦和另外几个地方登陆，终点在西班牙，全长 9 000 英里。沿线传送的资料从西班牙可进入欧洲和美国。这条线从开普敦沿非洲东海岸连接南非至印度和马来西亚，沟通非洲与亚洲，长 7 800 英里。①

黑非洲，终于拥有了在世界多数地方被认为很普通的通讯基础。大撒哈拉沙漠以南六亿多人开始结束基本上与世隔绝的状态。

据国际电信联盟统计，非洲在世界电话线中所占的比例不到 2%。每 100 个美国人有 70 条电话线，但是每 100 个非洲人只有 2.5 条。整个非洲大陆只有 600 万台计算机，每 100 人不到一台，伦敦使用因特网的人数比整个非洲还多。另据统计，非洲 1/3 的男性和 1/2 的女性是文盲。因此，非洲与世界联网，其革命意义是巨大的，而非洲真正进入现代社会，道路仍然是艰难而漫长的。

非洲是不是有史以来，就是人类社会的落后地区呢？黑人文化是不是一开始就被人歧视，并永远注定是如此的命运呢？

必须注意这样一种思想方法：对传统思想的解释讨论和申发，都必须建立在对其现代价值属性的判断上。也就是说，讲传统，不是要青年们去皓首穷经，猎奇玩古，而是让人们特别是青年切实感受到自己灵魂深处与传统息息相关的部分，明白现代社会里应当在传统中吸取力量，丰富自己生命的活力。

现存的黑人文化中，关于生命的哲理（如丧葬仪礼中……），看似荒诞，但有其科学的成分。其实，西方人今天在生命科学中的成就，包括在基因科技中的成就，从南方古代生命观念中继承的东西，比在神创论中继承的要多得多。

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中有阴阳家，有阴阳五行之说，后为迷信巫术所利用，其实是古代的科学假说，同现代许多尚未被证实的科学假说一样，是人类

---

① 参见美国《波士顿环球报》，2001 年 7 月 22 日

认识的一个阶段。

以历史的客观的态度观察和发掘一切过去的、现存的、一切民族和种族的文化现象，不用今天的科学水平衡量古代的科学假说，不用自己的先进去歧视别人的落后，应是中华民族的胸怀。

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应把黑人文化妖魔化。

第二节　黑非洲文化圈的界线

非洲可分为三个部分。分界线是：撒哈拉沙漠南沿，从塞内加尔河口向东经过巴克图到苏丹首都喀土穆，再向南向东划到北纬 12°埃塞俄比亚边界，再沿着埃塞俄比亚的西部和南部边界划到朱巴河，接着从朱巴河划到印度洋，这样就把非洲分成南北两部分：北部非洲和南部非洲。

北部非洲又可分西北和东北两部分。从苏丹共和国和埃及在努比亚沙漠的边沿画条线到红海，西部为西北非洲，包括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西撒哈拉、毛里塔尼亚七国以及苏丹、乍得、尼日尔及马里四国的北部，面积九百多万平方公里，人口1 3 亿，人种属地中海型高加索人种，皮肤淡白色和浅棕色，通行阿拉伯语，属伊斯兰文化区，大多数居民属信仰伊斯兰教的逊尼派。东部为东北非，包括苏丹东北部、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吉布提、索马里、肯尼亚北部，涉及六国，面积 190 万平方公里，人口 5 600 万，属埃塞俄比亚型高加索人种，一部分人信仰基督教，语言属亚非语系；一部分人信仰伊斯兰教，用阿拉伯语。这是一个混合文化区，有的学者称其为“索马里文化区”。

南部非洲为黑人文化圈。共 37 个国家，500 个部族，约 6 亿人，面积占非洲 2/3（非洲面积 3 020 万平方公里，56 个国家，800 个部族），称“黑非洲”。大多数居民为黑人，另有 500 万白人，100 万印度人，3 万华裔，还有 300 万欧、非混血和欧、马（来西亚）混血人，相加不到 1 000 万，只占 1/50。所以是黑人文化区。居住形式、社会组织、经济体系、语言、宗教和仪式，都体现黑人文化的特点。

第三节　黑非洲文化的特点

一、种族无字文化，黑非洲种族有三个谱系

1. 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谱系，又称赤道人种，居住在尼罗河上、中游乌干达、坦桑尼亚一带，身高（平均 180 cm）腿长，皮肤色素深，深褐色或

巧克力色，约有300个部族。

2. 尼格利罗人种谱系，分布在赤道雨林地带，居住在扎伊尔、刚果等国，皮肤为棕褐色，平均身高为158 cm，故称矮黑人。

3. 科桑伊人种谱系，肤色较浅，古铜色，黑中带黄，居住在纳米比亚、博茨瓦纳一带。

以上三个谱系的黑色人种，都以自己的黑色而自豪，他们认为自己是"骄阳赐予肤色的人民"。是太阳在炎热多雨的气候中赐给人们富有黑色素、防日晒紫外线、毛细血管较多而扩张、易散热、很薄的皮肤；黑色的皮肤又赐予黑人在炎热多雨的自然条件下特有的生存能力。

黑人文化的主体是部族共同体。部族有大有小。1 000万人以上的部族有4个，如豪萨人，居西部；500～1 000万人的部族有11个，如刚果人，居南部；100～500万的部族约有74个，在东部、南部、中部均有居住。黑人文化区有1 100种语言（非洲共1 650种语言），分属于亚非语系（闪含语系）、尼日尔语系、班图语系、科伊桑语系。大部分种族只有口头语，没有书面语言，故黑人文化是口头文化、无字文化。

二、狩猎、农耕文化

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来考察，这种文化大约有以下七种模式。

1. 狩猎——采集文化。主要是东非各部族。不事农耕，不知畜牧，临时居住，集体流动，每次为20～100人群体而行，首领为年长者或有经验的人，实行一夫一妻制。

2 原始畜牧文化。主要是班图人各部族，17世纪开始用铁器，流动性放牧，茅屋结构是蜂窝状，穿兽皮，实行夫方居住婚和兄终弟及制，故兄弟姐妹一旦成年单独住房以互相回避。父母给每个孩子配一头专用母牛吃奶。

3. 沙漠畜牧文化。主要在高原地带，饲养骆驼、山羊、驴子；经营绿洲农业，种植高粱、大麦、小麦。实行一夫一妻制。

4. 农业文化。主要在尼日尔河曲一带的各部族，具有发达的热带锄耕农业，并有织布、制陶和金属加工等手工业和工业。11世纪以后改信伊斯兰教，用阿加米文字。19世纪以前，已普遍建立了国家。实行胞族婚姻制度。

5 西苏丹农业文化。主要是生活在加纳、马里的各部族，是热带作物发源地，具有最发达的农业，各部族群体均密集居住，大型村镇和城镇遍布。社会分层明显，多数人皈依伊斯兰教。可一夫四妻。

6. 尼日利亚高原农业文化。与西苏丹农业文化相同。

7 南非农牧混合文化。（与前述3、4、5大同小异）。

根据历史学家、文化学家的考察，撒哈拉沙漠以南，350万年以前就进入

了旱石器时代。就是说，从初经斧凿的大自然到解放了的人类，直到金属工具出现以前，黑非洲一直站在人类技术发展的前沿。在欧洲为冰层所覆盖，没有任何早期石器时代工具遗迹的长达20万年左右的卡格拉时期，黑非洲产生了石器时代三种赓续相接的越来越高级的工具。从公元前3300年开始，红铜的冶炼和使用从埃及传播到整个尼罗河流域（今苏丹共和国境内的铜矿，当时已得到开采）。公元前2000年这里有了青铜工具。

在公元前7世纪尼罗河上游已使用铁器。公元前1世纪，铁制生产工具已十分普遍。到5世纪以后，整个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随着工具与技术综合体的演进，形成三种获取生活资料的传统文化系统，即狩猎—采集文化、畜牧文化和农业文化。这三种共存的获取生活资料的基本方式和传统的文化系统，一直以完整的形态持续了1 500年，直到19世纪末。其残存的形态则一直存留到今天。也就是说，当铁器出现以后，黑非洲落后了。但在此以前，非洲创造了辉煌的远古文化，代表当时人类社会的先进文化。

通观非洲古代文化（技术文化）具有三大特征：一是生活的科学。远古传统的技术文化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综合体系，几乎不具有专门的性质，铁匠、冶炼工、制陶工、织布工，不仅是匠人，而且是“一般的通才”，是什么都懂、什么都做的“生活的科学”。二是神秘性。工匠的工作被想像为重复上帝创世的秘诀，来自“天启”；工匠的工作因而是神圣的，每种技术的作用都同一代代传袭下来的秘密知识相连，因此，工匠们干活时，要伴之以礼仪性的歌唱或神圣的韵文吟诵。三是封闭性。每一种技术都在同一血缘的群体内世代相传。各种工匠通常都得遵守不同外族通婚的禁令，从而形成了类似印度种姓制度那样的工匠等级群体。

同时，黑非洲的技术文化，同后来发达的其他远古技术文化相比，还具有自身的缺陷：（1）无轮。任何黑非洲传统社会，都没有学会使用轮子，都没有利用轮轴原理产生的机械能。（2）无畜力。任何一个黑非洲传统社会，都没有学会使用犁耕地，耕作过程中也不存在对畜力的使用。畜牧业与农业是分离的。畜粪也不用来肥田。（3）无大船。只会造独木舟而不会造大船。居住在大河大海之滨的黑人也不例外。（4）无砖瓦。任何黑非洲传统社会都没有学会烧砖制瓦，从民房到王宫、从乡城到城镇，未出现过砖瓦结构的住房。这个“四无”的缺陷，阻碍了非洲传统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结构向更高阶段的发展。

三、思想文化

其一，巫术观念深深扎根于黑非洲人的意识之中，渗透在生产、生活、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有保卫型、生产型和破坏型三种。有心理巫

术、政治巫术、生产培训式巫术等功能。由于黑非洲交通、通讯、经济发展长期落后，以及巫术文化中也有科学实用的因素，使巫术得以流存和影响至今。

其二，无哲学著作的哲学观念。口头流传的神话；由群体世世代代生活习惯、风俗、社会规范中形成的理念；少数记忆力、表达力超群的智者传播、解释、弘扬的精神和思想，是黑非洲传统哲学思考的三大积累。其哲学理念的核心是独特的“实体论”：世界上的一切可分为上帝（造物主）、人类、精神实体与物质实体。上帝是人类的创造者；人类是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存在物。精神实体包括神灵、精灵、亡灵三种；物质实体包括有生命的动植物、无生命的自然物。上帝操控一切，但人是中心，人通过巫师、祭司、雨师等同上帝沟通也可知道一切，操控一切。但非洲人的时间观念只有“过去”和“现在”，没有“未来”。创造的、操控的一切，不是过去的，就是现在的，没有未来的。

其三，黑非洲的政治意识。对血缘共同体的忠诚，对首领和君主的崇拜，是黑非洲传统政治文化的两个基本内容。因为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统治确立以前是普遍存在的社会共同体，个人对共同体的忠诚是绝对的。在殖民统治时期和独立之后的今天，部落和氏族的认同和忠诚，又演化为部族主义。奴隶贸易、殖民侵略和统治、现代工矿和种植园经济的兴起、乡村人口向城市和现代经济发达地区的集中，破坏了原生状态的部落和氏族。但次生形态的氏族、部落组织依然普遍存在，某个城镇、某个村庄、某种职业可能是某个氏族、某个部落的全部成员。政党、政府、军队、边界都与此有关。表现为新的部族主义，常常被人利用，不得安宁。

其四，宗教。从统计数字看，黑非洲37个国家中，多数人口信仰基督教的有13个国家，信仰伊斯兰教的有8个国家，共21个国家；信仰传统宗教的只有16个国家。其实这是表面现象。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信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21个国家，其中任何一国都未取代传统宗教，而是融为一体，本土化了。黑非洲传统的自然崇拜（对自然现象和自然物的崇拜）、图腾崇拜（对动物植物、器物的崇拜）、祖先崇拜、部落神崇拜并未受到削弱，仍然盛行。现实状况是向一神教发展：同伊斯兰教结合，既信安拉又信自己的神，仪式礼拜合一；同基督教结合，既信天主又信自己的神，形成黑人基督教。非洲国家纯伊斯兰教、纯基督教、纯本土宗教反而很少，正在经历“自然宗教”向“人为宗教”的演变过程。

第四节　黑非洲独特的审美节奏

中国人和世界各国对黑非洲文化的审美特征，感受最深的是节奏——非洲鼓、非洲歌、非洲舞的强烈奔放的节奏。

非洲传统乐器有三类：一是打击乐器，如鼓、木琴、响板、铃、桑加琴等；二是吹奏乐器，如羚羊角、犀牛角、象牙号角、喇叭、笛子、“葫芦笙”等；三是弹拨乐器，或称弦乐器，如独弦琴、多弦琴等。三类之中以第一类为主，第一类中鼓最重要。黑非洲各族的传统音乐大都以鼓为基础。这是因为整个非洲悠久的历史中，鼓的用途最广泛——驱逐死人的灵魂、激励杀敌的勇士、组织生产和狩猎、抵御外敌时传递信息等都用鼓。生活是这样，艺术也是这样。演奏用鼓，唱歌用鼓，跳舞时更少不了鼓。一听到猛烈擂击的鼓声，远在森林，近在草原，分散孤寂的、聚集一起的人，都会闻鼓而起，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在黑非洲的任何乐队里，打击乐都占中心地位，鼓又是打击乐的中心。可以说，强烈奔放的以鼓点为中心的节奏，是非洲艺术最突出的特色。

同强烈奔放的节奏成为鲜明对比的，是口耳相传的文化形式：（1）口述历史；（2）口述文学；（3）谚语。口述中史官、祭司、巫师、长老和民间说唱艺人是主角。从帝国王宫的历史、南征北战的故事、久远的往事和身边的生活到扑朔迷离的神话宗教祷文传说和凡人的命运，有长篇史话，也有短篇传诵。讲述者可以在白天讲，也可以在黑夜讲，听众可以是国王、官员，也可以是普通人，但往往只限于成年男子。说唱艺术虽不像非洲鼓那样奔放狂热，但绚丽多彩、娓娓动听，使黑非洲文化创造的智慧、经验、美德、功绩、喜怒哀乐和对民族、对个人命运的思考，记录在心中，流传在口头，像太阳和月亮永远照耀着黑人的生活。

黑非洲的视觉艺术（主要是造型艺术）也独具特色。它包括：（1）刻在岩石上的“岩石艺术”。有刻画、绘画两种。有10 000年历史，几十万件作品，反映了公元前7000年至前2000年黑非洲的历史社会，具有高度的社会和艺术价值。（2）刻在木头上的艺术，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主要在南部非洲，但由于热带气候的影响，保藏作品年限只有150～200年，遗留下来古典风格的木雕作品极少。木雕有人物、舞蹈面具、生活设施三类。以西非、中非和南非的人物雕像最富有表现力。（3）陶塑艺术，始于公元前900年。（4）铜雕和骨雕。铜雕艺术最早是保密的，始于公元前后，在黑非洲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16世纪贝宁青铜作品《母后头像》，表情庄重，豪华威严，为传世之作。骨雕较为少见，主要是在西非和中非塞拉利昂、科特迪瓦、加纳、扎伊尔一带的象牙雕刻。贝宁王国有一个象牙雕刻家族。15—16世纪相当发达。（5）人体装饰艺术，文身具有审美和图腾崇拜两种目的。

强烈奔放的节奏、绚丽多姿的画面、神秘的色彩、粗放浪漫的情调、传奇的构思，构成了非洲黑人审美文化的独特个性。

第五节　黑非洲文化的影响与贡献

非洲黑人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和贡献，在黑色人种的逆运中更显出其生命力。

“非洲黑人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与贡献，基本上不是依赖非洲黑人文化产品的外传，而是随着作为文化主体的非洲黑人个体外迁而造成的。从本来的意义上说，文化只是人类的各个群体特有的生活方式、社会规范、思维方式、价值尺度、审美情趣和心理素质。因此随着文化主体的移动，即人群体的迁徙和个体的流动，必然发生文化的播迁。就撒哈拉以南非洲与外部世界的文化交流和文化的相互影响来说，作为文化主体的人的交流活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非洲黑人的外迁，自远古时代迄今，都不是以群体（家族、氏族、部落、民族）形式，而是以个体形式进行的。”①

黑人外迁可分为四个时期：

1. 远古时期。公元前 4000 年，黑人中的尼格罗人到埃及，与来自西亚、欧洲的其他人种一起创造了古埃及文明。有共同的制陶技术、丧葬仪式、死后灵魂的信仰可证。此外，与古希腊、罗马和北非也有一定的交往。

2. 中世纪。公元 900 年左右，输往阿拉伯港口的少量非洲黑人奴隶被转运到印度的西北地区。由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国人参与的印度洋贸易推动了撒哈拉沙漠以南东非海岸文化的形成。

3. 近代。15 世纪中叶以后，大规模的奴隶贸易造成黑人大迁移。主要是葡萄牙（15 世纪以来）、加勒比地区和北美（17 世纪以来）、英国（18 世纪以来）、巴西（17 世纪以来）、沙特阿拉伯、印度、土耳其等。从 1518 年至 1873 年 4 月，355 年间，迁至南美的黑人达 950 万。②

4.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欧经济快速发展时期，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吸收大批外籍工人，黑人也为数不少。仅英国 1983 年统计，有来自西印度群岛的非裔黑人 51 万，来自撒哈拉以南前英国殖民地的黑人 9 万。

黑人到哪里，黑人文化的烙印和影响就到哪里。受黑人文化影响较大的，一是地中海沿岸国家，二是阿拉伯国家，三是美洲，特别是加勒比地区和南美。欧洲和亚洲许多国家黑人人口最少或没有。黑人的影响基本上是同人口比例成正比。

从 19 世纪后期到 20 世纪 50 年代，整个非洲沦为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殖

---

① 宁骚主编：《非洲黑人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86 页。

② 宁骚主编《非洲黑人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17 页。

民地。欧美人类学界和苏联的学者们，不断发现了非洲特别是黑非洲令人惊异的文化成果。但种族优越感又使他们得出了颠倒历史的结论——含米特人（类似或接近欧洲白人的一个假定）创造了黑非洲文化。

非洲黑人精英们，呼吸了现代化空气的非洲人民开始新的觉醒，思索黑人文化价值，审视它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致力于确认黑非洲文化的独特性和伟大性。一大批黑人学者和为黑人悲惨命运抗争的战士，掀起了黑人文化复兴运动。他们认为“西方文化是一个死于机器大炮之下的世界，要用黑人文化那种天赋的生气和生命力来挽救它”①。

最值得注意和令人兴奋的是“南方世界”的觉醒。2001年7月16日，西班牙《起义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世界债务谁欠谁”的文章，强调：发达国家总以为南方国家欠它们的债。但在加拉加斯举行的社会债务峰会提出，社会债务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生态债务，发达国家历史上在对环境不合理利用过程中对南方国家欠下生态债务，它们应给予南方国家公平的回报。

我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还有其中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对世界的压迫、剥削和侵略，对不发达地区欠下的生态债务，也包括文化生态。最严重的“文化生态”灾难区就是黑人文化圈。延续五百年的黑奴贸易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罕见的文化生态灾难，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黑人文化圈同其他四大文化圈并立的原因。

参考资料

1 宁骚主编．非洲黑人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2 刘祚昌，光仁洪，韩承文主编．世界通史．近代卷（上）第十五章第一节．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 季羡林，周一良，张芝联主编．世界文化史知识．第4卷．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

4 张汤璇主编．世界文化知识精华．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5 刘文龙．墨西哥：文化碰撞的悲喜剧．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6 本杰明·伊夫里．非洲裔美国人逐渐打入白人乐队．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2-07-05

7 希雅瓦萨·希雷．非洲终于与世界联网．波士顿环球报，2001-07-22

8 世界债务究竟谁欠谁．西班牙起义报，2003-07-16

① 宁骚主编：《非洲黑人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第七章　中华文化圈

第一节　东亚封贡体系和中华文化圈的形成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亚封贡体系和中华文化圈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自公元前2世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汉王朝建立亚洲唯一的、只有西方罗马帝国可与之并立的拥有广大领土和众多人口的封建大帝国，其经济发展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又建立了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体系。中华帝国边疆各民族又和近邻各国保持着久远的文化联系。在中国与邻国调整边界领土或解决民族矛盾的过程中，自然形成了封建的国家关系　边境小国依附于中国统治王朝，定期纳贡称臣，文化上或先或后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这个封贡国家体系一直到明朝（1368－1644）中叶，在郑和下“西洋”以前，达到鼎盛，此后逐渐衰落。

时至今日，这个文化圈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中国、朝鲜、韩国、蒙古、日本五个国家，其中蒙古部分居民信仰藏传佛教，但同西藏的藏传佛教有所不同，多数人曾长期接受儒家思想的指导。日本历史以明治维新为界经历了“和魂汉才”与“和魂洋才”的两大阶段，但长期接受汉唐以来儒家文化的传授和指引，大部分日本人和世界各国仍认为他们属于儒家文化体系或儒家文化的变种。这五国，虽无统一语言，但汉语、汉字曾被其他四国当作语言或文字或被借用，日文中至今保留一千多个汉字。五国陆地面积占全球陆地的16%。第二个层次是儒家文化的辐射圈，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等国，为儒佛融合，或以佛为主，儒佛并重，人口约两亿一千万。第三个层次是世界各地的华人、华裔。无论在哪个国家和地区，华人、华裔都保持着儒家华夏文化的传统，人口数千万，但影响很大。经济上，第一层次的五国之中，日本是经济强国，韩国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中国、蒙古、朝鲜三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很快，综合国力增强。2002年已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实体，而且经济发展的潜力很大，前景光明。在世界60个港口城市中，五国拥有23个，中、日两国占15个，中国占8个（大连、秦皇岛、天津、青岛、上海、广州、高雄、香港），日本占7个；可比的是美国也是占8个；而佛教文化圈只有1个（印度加尔各答）。全世界

12 个集装箱港口，五国拥有 4 个，日本占 1 个（神户），韩国占 1 个（釜山），中国 2 个（香港、高雄）；而佛教文化圈没有；伊斯兰教文化圈有 1 个（新加坡）。全世界 28 个主要国际机场中，五国拥有 5 个，日本占 3 个（羽田、成田、大阪），中国占 2 个（北京、香港）；也只有美国可比有 6 个；而佛教文化圈只有 1 个（印度德里），伊斯兰教文化圈只有 1 个（埃及开罗）。军事上，中国是世界上少数拥有核武器的军事大国之一。文化上，中华文化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绵延数千年没有中断的文化。各种文化同中华文化碰撞，都被接受和融合。有世界文明以来直到 18 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以前，中华文明领先了世界数千年，只是近一百五十多年落后挨打，历经了长期的磨难、探索、奋斗，现在又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振兴图强。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又具有强大生命力、凝聚力的中华文化，引起全世界的兴趣和关注（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这是正常的和必然的。当今世界，所说东西方文化比较，主要也就成了基督教覆盖下的西方文化和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的对比，这也是正常的和必然的。

第二节　中华文化思想形成的历程

以儒学为中心、儒道佛相融合的中华文化思想（思想意识）是在漫长的岁月里演变而成并独树一帜的。

先秦时期：公元前 21 世纪黄河流域出现了第一个朝代——夏朝；公元前 17 世纪黄河流域下游的商部落灭夏建立商朝；商夏两朝出现了一元神宗教、祖先崇拜和原始宗教。公元 11 世纪渭水流域的周人灭商建立起奴隶制的周朝，宗教思想有所创新。出现了“天命”可以转移的观念，出现了“德”、“孝”的道德范畴，出现了阴阳观念和包含辩证思想的阴阳说，集中体现于《周易》之中。春秋时代（前 770 -前 476）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一页，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出现和社会矛盾的尖锐，以鲁国为中心出现了“私学”学派，孔子开创了儒家，墨翟开创了墨家，随后出现了兼采儒墨又批评儒墨的道家。战国时代（前 475 -前 221），土地私有发展，社会矛盾剧烈化，出现了儒、墨、道、阴阳、法、名、纵横、杂、农等诸子各家互相争辩，互相吸取的“百家争鸣”的局面，造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第一个繁荣鼎盛的时代。

两汉时期：汉接受秦王朝“短命”的教训，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缓和社会矛盾。在汉初诸子之学有过短暂复兴之后，至汉武帝消灭郡国，奠定中央专制，罢黜百家，儒学才定于一尊，经学兴起。两汉之际，经学内部出现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还出现了内容离奇荒诞的“谶纬”思想。东汉思想家王充对经学和“谶纬”的虚妄之言，进行了细致的考订和深刻的

批评。东汉末年，道教在民间流传，佛教也开始得到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儒家礼法观念始终在社会上保持一定的地位。但经学已在汉魏之际衰落，魏晋时期玄学兴起，以《老子》、《庄子》和《周易》——号称“三玄”为思想资料，从儒道两家的综合中走向抽象的思辨。由于同玄学结合，佛教得到较大发展，反对玄学和佛学的理论也得到了发展，出现了南朝著名思想家范缜的《神灭论》。

隋唐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过渡。旧宗族门阀的特权和声望下降，功臣勋贵和庶族地主势力上升。思想界儒、佛、道并立，以儒为主。唐实行科举制度，以“九经”取士，儒学正宗地位也有所上升。同时，佛学盛行，佛教各宗派（三论宗、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等林立而不相侵，其中禅宗教义简易，是中国化的佛教，为普通百姓接受，对唐代和封建社会后期文化思想和文学艺术有很深的影响。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关于“天人之际”的理论探讨，给儒学增添了丰富的理论思维资料。唐代社会开放，中华文化善于吸收外来文化，获得了高度发展，出现了盛唐气象，造就了中华文化史上第二个繁荣鼎盛的时代。

宋元时期：经过唐末五代的割据动乱，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王朝，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此后三百年间，几个民族政权并立。北边和西边，有辽、西夏、吐蕃，以后东北有金。宋金对峙，直至南宋。南宋末年，漠北蒙古政权兴起，后建立元朝。宋代理学兴起，主要讨论“性与天道”为中心的哲学问题，也涉及政治、教育、道德、史学、宗教。理学建立在儒学、佛教、道教相结合的基础上，以儒学思想为主。理学看重研究儒家经典，通过对《易经》的注疏，阐述对宇宙和人生的见解。借用《春秋》微言大义，强调“尊王攘夷”，又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提到经书的地位。至元代，理学在文化思想上取得统治地位。此外，北宋王安石的新学有一定的影响。元代重宗教，道教、佛教继续流行，藏传佛教受到尊重。同时，由于欧、亚交通增加，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有流传，但由于元朝短暂，未发生大的影响。

明清时期：农民起义的领袖朱元璋于1368年建立了明王朝。理学继续被奉为官方思想。明代所用的八股制度，是明太祖朱元璋与刘基所定，也以理学家的传注为主。明成祖永乐十三年（1415）将《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颁行天下，作为钦定教本。明代中叶，曾出现了背叛理学的“王学”（以学者王守仁为代表），提倡“心本”思想，在明末得到发展，包含有独立思考与个人解放的若干因素，显示晚明社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微弱的市民阶层意识的出现。明末清初出现了以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陈确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潮，但在残酷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没有

生根、成长、壮大，学术界仍然走上了考据学的道路。直到18世纪，依然是汉学、朴学盛行。中华文化思想走上成熟，走向转型。

近代：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主题是：民族独立（救亡）和面向世界近代化（启蒙）。乾嘉汉学由盛而衰，具有忧患意识的新人物龚自珍、魏源等出现在文化思想舞台上。太平天国后期政治家、思想家洪仁玕提出了中国近代化的方案。清王朝上层统治出现分化，洋务派主张“时务、“洋务”、“西学”，提出“自强”、“求富”的口号。戊戌变法标志着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出现。20世纪初，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领导人民多次起义，最终推翻清朝统治。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理论建树也为中国文化思想揭开了新的一页。加上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如进化论、天文学、天体力学、物理学（电、磁、光、热）等理论的传入对中华民族文化更新、思想觉醒，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第三节　以儒学为中心的儒、道、释相融合的中华文化思想

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华文化思想体系的基本框架奠基于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中华文化的全面开拓创新时期。儒、道、墨、法、兵、纵横、阴阳等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各自提出了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涉及经济、军事、教育、科技等各个领域。这是中国古代一次思想大解放、大飞跃，涌现了孔子、荀子、孟子、孙子、韩非子、老子、庄子等一批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哲人。他们迸发出的原创精神和智慧，谱写了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的光辉篇章。中华文化为什么绵延两千多年而历久不衰，并且随着社会变迁，在同各种文化的交流中具有强大的融合力，采各家之长补己之短，日益丰富，不断创新而博大精深呢？首先应得益于中华文化思想的基本内容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包容性。

一、探索天人关系的学说源远流长

先秦时代，“究天人之际”主要就是对神与人、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之间关系的探索，其中又以探索自然与人的关系为重点，由此形成了“天人合一”、“天人之分”和“与天地参”等天人关系的三种主要学说。

1. 天人合一说，阐发此说的主要有孟子和庄子等，强调的是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的息息相通。孟子提出“尽心知性知天”的命题，认为人性天道是统一的，人心是能感通的主体，人们只要尽量发挥自己的本心，就能了解自己的本性。而人的心性又为天所赋予，因此知性也就能知天。他认为人的善良本心是与生俱来的，只要加以扩充，就能成就善性，就能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精神境界。与孟子强调扩充与发挥人的本心与本性不同，庄子主张

人们应当收敛心性，“常因自然”，“不以人助天”，要求人们克服知识、理性引起的狂妄自大，使自己的欲望顺应自然的法则；提出消除一切人为的建构，重新回到自然的怀抱，恢复天人关系的和谐，达到“天人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最高精神境界。庄子对人的社会存在意义评价未免失之消极，但强调顺应自然，同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对当代人类反思现代文明的负面作用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重视。

2. 天人之分说。阐发此说的代表人物是荀子。他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而主张“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明确指出天和人各有自己的规律和功能，不能互相代替，应当“明于天人之分”。人们应当发挥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制天命而用之”，控制自然，为人所用。

3 天地相参说（“与天地参”）。此说有代表性的观点见之于《周易·说卦传》和《中庸》，肯定天道与人道既有区别又相统一，强调人可参与自然界的变化。《周易·说卦传》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指天地人“三才”之道，既有所区别又互相联系。处于天地之间的人，其使命是“裁天地之道，相天地之宜”，即依靠人的主观能动性，调节自然的变化，使万物各得其所，人自身在这一过程中也能实现“与天地合德”的人格理想和精神境界。《中庸》称：“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更明确地表述了“与天地参”的思想。

上述三说，各有侧重，又不互相排斥。持天人合一论者，实则以天人有别为前提；持天人之分论者，并不否认天人之间的联系；前者强调人应适应天道或回归自然，后者强调人应掌握天道，改造自然。持“与天地参”论者，既承认天人相区别，又看到天人相联系，在此统一的基础上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倡人类积极进取，在生生不息的洪流中实现人与天地万物的共生共处与和谐。这三种学说注重天人之间的辩证统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处理天人关系的根本原则和主导思想。

二、重视人伦和谐的思想宽厚博大

人总是生活在群体之中。正确处理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是先秦诸子百家十分关注的课题，儒家最具有代表性。

1. 以“仁”为核心。孔子确立的最高道德准则是“仁”，其核心是“爱人”，即对人关心和尊重。《论语·颜渊》称“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的内容包括忠、恕、孝、宽、信、敏、智、勇、惠等，以“爱人”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以“忠恕之道”为基本原则和方法，即“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继承孔子的仁学思想，并发展为儒家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提倡施行"仁政"，强调只有实行重视百姓利益、以仁义治天下的"王道"政治，才能得人心，得天下，才能长治久安；反对凭恃武力、权术治天下而不顾百姓死活的"苛政"，并斥之为"霸道"。

与儒家有所不同的是墨家，提倡"兼爱"，主张爱人如己，普遍地、平等地爱一切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又把"兼相爱"和"交相利"结合，"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强调"爱人"必"利人"，爱利结合。

儒家和墨家，仁爱与兼爱，都肯定自我与他人同类，都主张人与人应当相爱，是中国古代文化中光辉的人道主义思想。但儒家的仁爱是推己及人、由近及远，由亲及疏，是差等的爱，又重义轻利，以感情和伦理为本位，同封建社会很协调，其思想影响日益增大；墨家主张不分远近亲疏，平等地爱一切人，又以实利为标形，带有功利色彩，与封建社会结构不相协调，其思想影响日趋衰绝，只是到了近代和当代，中外学术界才重视其价值。

2. 以"德"为基础。孟子对基本伦理关系及其相应的准则有一个简明的权威的界定："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其中"长幼"包括兄弟。后世按此说以"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为基本的五种伦理关系，称为"五伦"。这五伦中，十种角色都有其应当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就是"十义"。《礼记·礼运》说："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儒家特别重视五伦十义，即父子、兄弟、夫妇、长幼、君臣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并以适当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确定下来，而不是像汉代以后那样要求一方绝对服从另一方。

3. 以"礼"为规范。"礼"是思想文化的制度，故称"礼制"。政治制度、法律准则和道德规范是"礼制"的三个重要方面。孔子强调"克己复礼为仁"，"不知礼，无以立"。个人要发展完善，社会要稳定安宁，没有礼的约束和熏陶不行。"礼"要有连贯性和连续性，又要根据时代改变而调节其具体内容。战国末，荀子也曾作《礼论》，观点与孔子一致，并强调"礼"与"法"兼用："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荀子这一主张对后世统治阶级影响更大。

4. 以"和"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和"原意为相应，引申为和谐，特别是多种事物之间的和谐统一。西周末年的史学家史伯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并解释说"以他平他谓之和"。用现在的哲学观点来说就是：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矛盾及其平衡、统一才能产生新事物，而简单的重复、绝对同一则不可能推动事物的发展。孔子也主张"和而不同"，又把"和"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孔子的学生有若说："礼

之用，和为贵。”把“和”视为全部社会制度的价值指归。孟子强调“人和”是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提倡“群居和一”，人们各守本分而彼此和睦，以免纷争。“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

“和”的思想，积极看待社会和自然的差异、分歧和矛盾，提倡发挥不同个体各自的不同作用，实现整体的和谐与发展。“以和为贵”的思想，几千年来是中华民族核心的价值理念。儒家的大力提倡和各阶级、阶层的实践，使其融化为全民族的民族性格的一部分，孕育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宽容博大的胸襟，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生存智慧，从而化解了一次次社会危机、民族矛盾和战争创伤，以健朗豁达的态度正视过去的苦难和教训，立足现在的实际需要，开创未来的美好生活。

三、儒学辩证思维影响人类

先秦诸子的思维方式是当时世界的先进思维方式，既有直观思维、形象思维，也有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特别是具有辩证思维的特色，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1. 整体的观点。儒、道、名、阴阳各家都强调宇宙是一个整体，人和物也各都是一个整体。必须从整体的角度去把握部分的实质。《庄子·天下》篇载，名家惠施提出：“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命题，对宇宙万物从大小两个向度作出高度的概括，并肯定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庄子·齐物论》更宣扬齐是非、齐彼此、齐物我的相对主义理论，强调从“道”的观点来看，一切事物都是平等无差别的，是一体的。《周易》的天人协调说，认定天、地、人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阴阳家则以阴阳五行的思维模式来解释宇宙间的一切现象，以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来说明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

2. 变易的观点。先秦诸子认为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孔子感叹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老子》认为：“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人乎？”《庄子·秋水》也认为：“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周易》更是通过对卦爻象和爻辞的解释，总结和阐扬阴阳变易说，成为中国古代哲学中论述事物发展规律学说的代表。《周易》的中心内容就是讲变易，认为变易是宇宙万物的基本规律，变易的实质就是生而又生，不断地产生新的事物，即“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周易》还赞扬社会政治的变革。《革》彖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这种变易思想，为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和中国社会的改革奠定了哲学思想的基础。

3. 对立统一的观点。对事物变化的根源和规律，先秦诸子是用“对待的观点”来解释的（近似）认为任何事物包含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互相依存，互相转化。《周易》：“一阴一阳之谓道”，道是指规律，即对立双方的联系、依存、排斥、转化是宇宙一切事物的普遍和根本的规律。《老子》提出“反者道之动”，认为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都是讲对立面的互相转化规律。《孙子》中强调：治与乱、勇与怯、强与弱、众与寡、安与动、劳与逸的对立，并非一成不变，也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首先提倡“矛盾”说，他强调对立面的斗争，认为双方“不可同世而立”，但也认为双方的对立，也可在一定条件下化解。

4. 中庸的观点。孔子认为“中庸”是最高德性，又是最好的思维方法。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强调“时中”、“用中”。子思作《中庸》予以继承和发挥，认为：“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人们若能把中和的道理加以推广，天地万物就各安其生，各得其所了《周易》也强调“中道”、“中行”、“中止”则吉，反之则凶。主要是强调适度，凡事要有个度，“过”和“不及”都不符合事物的标准，都会损坏事物的稳定性。特别强调勿太过，以免适得其反。千百年来，中庸思想在中国，有利于事物发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但不利于事物的变革。

对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先秦文化奠定了思想基础，决定了发展方向，影响了演变轨迹达两千年，一直在塑造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中发挥重大作用，其智慧至今依然是中国现代化的财富：天人合一的高远境界，以和为贵的价值理念，仁者爱人的博大胸怀，克己复礼的谦恭自牧，生生不息的变易观念、执两用中的中庸思维。这些无不闪烁着先圣先贤的睿智之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应当批判继承，培养民族求真、行善、崇美的品格，增强开创精神、协作精神、超越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四节 中华文化与现代化

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功能与局限性问题。对此，中外学术界认识基本一致又有分歧，除了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人们都肯定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重要作用，其正面和负面的作用都不可忽视。分歧在于什么是正面作用，什么是负面影响，如何发挥或限制。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中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整合功能：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古今中

外”的关系，具有巨大的整合作用。因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特别是主流文化的建设，即所谓实现中国文化的转型，既要反对全盘西化和文化激进主义，又要反对民族保守主义，必须从实际出发，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发挥其重视伦理的人文精神。同时，要吸取西方文化中追求科学民主、发展人文个性、崇尚创新精神过程中的优秀成分，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行文化整合，以创立现代中国新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在其发展和形成的过程中，既有炎黄子孙天下一统、爱国主义的鲜明的个性，又有对异质文化在合流交融中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宽广胸怀，特别是在近、现代革命和建设中的巨大发展和进步。

二是认识功能。现代化是革命，是创新，包括经济创新、政治创新、文化创新。归根到底是人的创新、人的思维方式的创新。中国传统文化在认识论方面，既有很强的思辨性，又有明显的务实性，既有问天问地的宏观观测，也有探微索隐的缜密思考。这样的思维品格同现代科技相结合，将焕发出无穷的创新力，实现民族和国家现代化的超越。

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局限性及其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

一是封建糟粕。光辉灿烂的另一面是黑暗腐败。封建制度两千年创造的中国传统文化，无不打上历史的烙印，也是一柄双刃剑。阻抑现代化最严重的消极作用来自封建意识，突出的是官文化。官贵民贱，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官富民穷、重征暴敛，取之于民、用之于官；官本位，以官阶定尊卑，官大一级压死人，官管一切、一定听命于官；官场学盛行，官场通万事通，官场不通万事皆空。

二是虚伪——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黑洞。千百年来，封建制度包括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存在一种制度性的虚伪；儒面法心或儒表刑里，宣扬的是“仁道”，实施的是“霸道”；口诵“仁者爱人”，手里拿的是“格杀勿论”；说的是“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行的是君为臣牧、官为民牧；要求老百姓“男女授受不亲”，统治者则实行多妻妾制。

以上两方面都给当今现代化事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参考资料

1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 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

3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 赵馥洁．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5 宋耀廷主编．中国传统文化通论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8

6 张海曼 近年有关儒学的讨论．光明日报，1999 01－01

7 万斌，郁建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规律探索．光明日报，1988－

12 - 11

8 陆震. 虚伪：当代中国的精神黑洞. 南方日报，1999 01 25

9 杜维明. 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

10 朱诚如，王树森主编 中国古代文化基础知识. 沈阳：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1 赵杰 东方文化与东亚民族 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

第八章　中西文化交流

“中华文化”一词作为一个独立的有实质性意义的概念出现在鸦片战争以后，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有了初步了解之后。在中国，“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同时产生的两个对举的概念，二者的意义是在彼此的联系和区别中形成的，二者是互相发明的。换句话说，二者是在交流和比较中才有实质性的意义，而比较是为了交流。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所谓东西方文化比较，从历史到现状，重点是中西文化比较，特别是当代文化比较的关注点。

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对西方意味着什么，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今后的交流如何发展？

第一节　中华文化流向西方的概况

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一般来说，发展层次高些的文化居于优势和主流，处于相对主动的地位，另一方则处于被动地位。17世纪以前，中西文化关系以“东学西渐”为主，到19世纪，中西文化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倒转，以“西学东渐”为主。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在科技、哲学思想、文学艺术、教育等各方面，出现了只有古希腊可与之相比的成就，且在3世纪至15、16世纪，在这些领域中国一直居领先地位，而西欧、北欧各民族仍处于文化的落后状态。

中华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既有物态文化方面（科技与工艺成果），也有制度和思想意识与心态文化方面。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经河西走廊至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凭借文化和经济的优势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制其先机。但中国对西方的影响远不止人们耳熟能详的“丝绸”、“瓷器”、“竹漆”、“茶叶”等，闻名遐迩的四大发明对西方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塞缪尔·亨廷顿这样叙述：“公元8世纪中国发明了印刷术，11世纪发明了活版印刷，但直到15世纪这一技术才传到欧洲。造纸术公元2世纪出现于中国，7世纪传到日本，8世纪向西传播到中亚，10世纪到北非，12世纪到西班牙，13世纪到北欧。中国的另一项发明——火药，产生于9世纪，几百年后它才

传到阿拉伯国家，14世纪才到达欧洲。"[①] 赫·乔·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中写道：说纸使欧洲的复兴成为可能并非过分。马克思断言："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②]

中国古代的制度文化和思想意识文化对西方影响也很大。《马可波罗游记》风行于14、15世纪的欧洲。对文艺复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13—18世纪，西方来华传教士渐多，他们的通信、笔记和译介文献向西方社会大量地传播了中国典章制度、天文地理、科学技术、礼仪习俗以及文化教育。其中根据利马窦札记编成的《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史》、杜赫德主编的《中华帝国全志》、冯正的《通鉴纲目》以及法国耶稣会士编撰的《海外传教士关于中国人的历史、学术、艺术、风俗习惯》等论从最有影响。18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主义者伏尔泰接触了上述文献后，在他所著《风俗论》中说：欧洲王公及商人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世界。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发现，对思想界来说，同哥伦布在自然界的发现同等重要。他还从打击和否定法国专制制度出发，认为中华民族是地球上无论在道德方面或治理方面最好的民族，主张从中国引进道德和法律。不少法国思想家把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当作幻化的理想，产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历史事实：中国封建时代的制度和文化，成了17、18世纪西方世界抨击封建制度、鼓吹资本主义的有力武器。

中华文化对西方哲学、文学、艺术方面的影响更为明显。法国的泰·戈蒂耶写的诗篇《中国风》和小说《水上亭》，均以中国为题材。德国文学家歌德在求学期间阅读过中国的"四书"，他在日记和书信中多次谈到中国的元代戏曲《赵氏孤儿》，他未完成的悲剧《爱尔倍诺言》在主题与素材上同《赵氏孤儿》类似，有人说是《赵氏孤儿》的改编。中国的艺术对欧洲也有普遍影响。有人研究认为，达·芬奇的名作《蒙娜·丽莎》的背景是一幅中国山水画，而中国的瓷器和贝雕艺术掀起了18世纪风靡西欧的"罗可可"运动[③]，一度影响西方绘画、园林建筑、雕刻艺术，乃至日常生活的审美追求。

美国人加入"对东方淘金"的队伍，比欧洲晚，但也不逊色。美国冒险家华尔（1831—1922）、理雅格（1815—1892）、哈同（1847—1931）和斯坦因（1882—1943）等来华的目的是攫取文化宝藏。但理雅格却在人文科学方面成了西方"第一个系统地在中国淘金的学者"。1843年理雅格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很快就投入到对孔夫子的研究，在华三十年，著作等身，他把

① 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7页。
③ 罗凡等著：《法国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页。

"四书五经"等中国典籍全部译出，共计28卷，后来成了英国牛津大学的首位汉学教授。他的多卷本《中国经典》、《法显行传》、《离骚及其作者》、《中国古代文明》、《基督教与儒教之比较》和《中国编年史》等著作，在西方汉学界占有重要地位。

第二节　西方文化流向中国的概况

古今中外学者公认：五四运动以前，外国文化对中国文化发展进程影响最大的交流是两次：第一次是从汉到唐的数百年间，南亚佛教文化的传入；第二次是明清之际到近代，欧洲资本主义文化的传入。这两次交流足以构成中国文化史分期的两座重要的界碑，但这两次交流的性质和作用则大不相同。

佛教文化的输入，其影响遍及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促成了中国文化内容与形式的重大变化。由于本土文化根深蒂固，政治、经济、文化处于领先地位，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的主导地位未发生动摇。对佛教文化的传入，中国朝野虽产生不少纷争，引起过多次冲突，但总体上，体现了不同文化交流的互补作用。中国文化因为吸取了佛教文化的精华，而进入了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繁荣的新时期。

近代欧美资本主义文化的传入，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如果说，3世纪到16世纪，中国一直保持了西方各国所望尘莫及的科学文化水平，甚至在17、18世纪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仍大于世界对中国的影响，而当历史之页翻到19世纪时，中西文化关系发生了历史性颠倒。大体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从16、17世纪之交到鸦片战争之前是第一阶段。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文化突飞猛进，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同资本主义经济向外扩张相适应，文化也进入了向外主动开拓、大力传播的新时期。一批耶稣会教士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抱着传教的虔诚，陆续来到中国。为传教的需要，带来了欧洲科学技术的新成就，拉开了中外文化史上第二次交流的序幕。194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徐宗泽编著的《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一书，全面搜集、介绍了明末清初（1548—约1758）西方传教士在华译著（只录存上海徐家汇藏书楼即今上海图书馆所藏之书，而大量保存在巴黎图书馆和罗马图书馆的书稿和刻本，因条件所限，只将书目附录于该书后以备参考），可以说是明末清初二百年来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的一次较为全面的总结。西方文化在中国的翻译传播涉及：（1）天主教；（2）宗教哲学；（3）伦理学、政治学；（4）教育学；（5）语言、字典；（6）文学艺术；（7）心理学；（8）地理、图；（9）天文、数学；（10）水利、物理；（11）地质、矿冶；（12）生物、医学；（13）军事科学；（14）汉字；（15）杂录。据统计：宣扬天主教教义、教规、仪式及耶稣

活动的书，有162种，占总数的42.9%，是第一位的；天文、数学有89种，占总数的23.5%，是第二位；汉学有49种，占总数的12.4%，是第三位。传播者负有双重任务：一是传教和传播新的科技，二是了解中国。同鸦片战争后在大炮掩护下的文化侵略有本质区别。然而，从交流的实际成果来看，一是范围有限，主要集中在宗教、天文、数学、历法、地理等方面，也有造炮技术，而其他方面的科学成就未引起中国足够重视；二是有心研究西方文化的人只是上层有识之士，即使在士大夫阶层的学者之中也远未普及，对中国社会和文化没有构成重大影响；三是为时短暂（不到二百年），而且清朝初年虽较为开放，但很快就实行排外主义的闭关政策。康熙王朝因礼仪习俗和罗马教廷发生纠纷而“禁教”，发展到雍正王朝，“禁学”、排外成了清代文化政策的基调，乾隆虽有“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的松动政策，实际并未学到西方什么技术，最多喜欢自鸣钟、大水法之类的器械玩物和园林技艺。因此，明清之际拉开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又很快落下。不幸的是这一落就是一百年，拉大了中西文化的差距，而中国人还没有觉醒，在自我封闭、愚昧和黑暗中付出了更多的代价。

从1840年到1949年的一百多年间，中国才真正进入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但这一百年的文化交流已失去了平等均衡、长短互补的格局，而变成了落后的中国接受不接受、如何接受先进的西方文化影响的过程。鸦片战争的炮声宣告：历史把两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尖锐地摆到了全体中国人的面前：一是救亡图存；二是中国现代化。中国前进的每个阶段、各种政治力量，特别是知识分子对这两个问题作出了各自的回答，对中西文化交流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和态度，得到了不同的结果。

顽固派——坚决拒绝西方文化，认为“蛮夷之学”不适合中国，也没有什么可学，其各种学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已有之。但历来的顽固派，都顽而不固，被历史潮流淹没。

洋务派——打破顽固派的重压，理直气壮地承认中国落后：“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以及“船坚炮利不如夷”（《校分庐抗仪制洋器议》，光绪戊戌本），从而勇敢地提倡“不耻师学”的精神，断然主张“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认为这是中国自强之路：“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尽管洋务派目的在于巩固清王朝，但开中国实实在在学西方之先河，功不可没。

维新派——统治阶级内部的一批仁人志士，在洋务派主张的基础上，探讨如何从西方文化的启示中，改良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社会制度。他们失败了，但震撼了中国和西方国家，留下了唯一的成果——北京大学，它一百年来始终与中国革命、改革和现代化共命运。

革命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接受洋务派、维新派的遗产，总结太平天国的教训，要在中国实行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辛亥革命胜利了，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余年帝制历史，但革命的成果被军阀混战和“一盘散沙”的局面所代替。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剧了中华民族的危机，也加剧了中西传统文化的碰撞。

“学西方，学什么，怎么学”，已经没有统一目标，已经具有全新的意义。五四运动举起反帝反封建和科学、民主的大旗，中华民族爱国救亡和实现现代化的悲壮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西文化交流也具有了新的特点：

其一，在救亡图存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主题上，明确地加进了国际化、全球化的内容。同解决中国问题从此离不开世界格局一样，中国文化也融入了世界文化的大格局。

其二，五四运动中涌现出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化”的代表，同五四运动以前的林则徐、魏源、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相比较，有根本的差别。他们不是拥有很大政治权力的官僚知识分子，他们的文化思想已不是政治统治者的文化战略的一部分。他们多数是大学教授，他们的职业是从事文化生产，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进身于统治者的宝座，而是为了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需要，他们标志着中国现代独立的知识阶层的伟大发展。没有他们作为新文化的先驱，就没有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钱学森、李四光等20世纪为中国新文化作出杰出贡献的知识文化群星。这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其三，五四“新文化”这个概念诞生的同时，“旧文化”这个概念也诞生了，历史永远不会逆转了。什么是旧文化？就是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什么是新文化？就是以学习西方为特征的、以反帝反封建救亡图存和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文化。如何认识和处理新旧文化的关系，成为数十年来文化纷争和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

其四，五四运动以后的三十年中，中国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实践，在文化保守主义、文化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作出了选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成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文化的主流文化。这也是不可逆转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文化的精华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世界东方文化的奇迹。

第三节　中西文化交流的启示

各国各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创造的独具个性的文化，是全人类的共同财

富。中国古代的文化辉煌，随着中国的现代化，愈来愈属于全世界；就像古希腊、罗马文化，随着欧洲文艺复兴的脚步走向世界一样。我们要捍卫这个古代的辉煌，不能数典忘祖；捍卫中国古代的辉煌，也就是捍卫全人类的文化史。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永恒的骄傲。

文化不以地域分优劣，但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就是说，文化的优势，不取决于产生的地理环境，而取决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水平。中国近现代面对的中西文化交流，总体上是中国落后、西方先进。中国人应具有古老文明的失落感和现实落后的危机感。仅仅懂得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迫使我们中国人改变关于世界秩序的古老观念，但却远远没有反观自身的传统格调是不行的；新的时代迫使我们面对的，决不是过去那种粗蛮古朴的、很快就被中华文明同化的、马背上的胜利者，而是高度发达的、必将对我们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先进的西方文化。

要做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无疑，我们要建设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现代化。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筛子”，而不是一堵墙。我们要把那些落后的、腐朽的东西筛出来，拒之门外，不管是封建的还是资本主义的。但一定要给我们的人民保留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不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不透风的墙，只从风洞里选择那些看起来很顺眼、令人愉快的东西，结果进来的都是“好看不好吃”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无益的东西，而人民依然在自设的“墙内”，故步自封，不能借海外的眼光来审视自己，也不能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考量自身。若这样，中华文化将难以转型，也难以找到现代形态的入口。

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五十多年中，中西文化交流影响之大，涵盖面之宽，群众性之广，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变化之深刻，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外国也罕见，正像在中国唐宋以后社会生活中严格区分儒、佛、道的思想文化界限很不容易一样，要想从中国现代生活中严格区分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也变得很难。中国现代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既继承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又广泛吸取了外国的主要是西方的优秀文化成果。已经坚定明确把“对外开放”定为基本国策的中国人，对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趋势是乐观的。当然，世界不会平静，文化领域里的“欧洲中心论”、“中国威胁论”、“儒学救世论”等还会干扰全球文化交流的健康发展。但是，多元化和全球化同时并进的、平等互利而又和谐互动的文化交流大趋势不可改变，中国人会更加坚定而机智地处理好“古今中外”的关系，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新文化。

参考资料

1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9

2 王喜绒，李新彬编著．比较文化概论．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

3 成中英．论中西哲学精神．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6

4 郝伟君，毛磊，石光荣主编．中西五百年比较．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

5 庄锡昌等．世界文史通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6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中　编

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与中西文化的一般比较

第九章　中西文化不同的自然环境与经济背景

第一节　不同的自然环境

中华文化的自然环境，当然主要是指中华文化核心国家——中国的自然环境。其主要特点可概括为四个方面。

土地面积最大：中国是世界上土地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土地曾被“刀砍过、火烧过，列强分割过”。中华文化是泱泱大国的文化。

人口最多：占世界人口1/4。90%以上的中国居民是汉族，汉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2300年前，中华民族就统一了文字，300年前，就开始推广普通话，是一个方言虽多，少数民族语言虽多，但95%以上使用同一语言、同一文字的大民族。汉语是人类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中华文化是大民族文化。

地形最多样：地球上的一切地形中国几乎都有，但以高山大河为标志。自西向东分为三级阶梯：西南部海拔4 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是最高一级，世界第一峰珠穆朗玛峰（海拔8 882米）在此；第二级，海拔4 000米以下，1 000～2 000米以上的高原和盆地，包括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四川盆地、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第三级，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及云贵高原东缘以东，海拔1 000米、主要是500米以下的丘陵和平原交错的地区，以及沿海海拔50米以下的平原，主要有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和东南丘陵。三级地势，西高东低，大山大河体系构成了我国地形的骨架：由西向东，从帕米尔高原延伸出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昆仑山脉、喜马拉雅山脉、横断山脉、祁连山脉、秦岭、阴山、大兴安岭、长白山脉、南岭、台湾山脉，巍峨屹立；由北而南，黑龙江、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澜沧江东流入太平洋，怒江、雅鲁藏布江南流入印度洋，还有新疆西北部的额尔齐斯河向北出国境流入北冰洋，洪波滔滔。大山大河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山河图。中华民族的衣食住行、治乱兴衰、喜怒哀乐，都与千山万水相连。“大好河山”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自然景观，“气吞山河”成了中国人文韬武略的英豪之气，“还我河山”成了民族英雄面对侵略者的誓言。“黄河之水天上来”、“轻舟已过万重山”、“山，万马奔腾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中华文化的

生命、性格就孕育在大陆的万里河山之中。

气候最复杂：从赤道到极地，从海洋到内陆，各种气候都有。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南北温差大，黑龙江省北部全年无夏，海南岛长夏无冬，淮河流域四季分明，云贵高原南部四季如春，青藏高原终年积雪，西北内陆夏热冬冷，日温差大。年终降水量从东南1 500毫米以上向西北递减到50毫米。真是春夏秋冬，气象万千，冰冻三尺与春风杨柳同时，戈壁沙滩与万顷良田俱存。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山上山下不同春，河南河北不同秋。一国之内，瞬息万变，千变万化，不离其宗。中华文化的多彩多姿、蕴含深广、胸怀博大以及适应性和包容性很强源出于此。

以上自然环境的四大特征，造就了中华文化为大国文化、大民族文化，中华文化是雄奇如山与秀丽如水相结合、大统一与丰富多彩相结合的内陆性大文化。

西方文化的自然环境主要特征正好相反：欧洲43个国家中有33个面海，占欧洲边界线的五分之四以上。整个欧洲大陆就是一个半岛。整个美洲就像浮在海上的大小船只，36个独立国家和十几个地区，仅乌拉圭是一个内陆国家，其余全部面海。大洋洲（澳洲）更像飘在海中的浮萍。海洋是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的摇篮，也是西方文化的摇篮。

欧洲是西方文化的发祥地。西北面隔格陵兰海峡、丹麦海峡与北美相望；北临北冰洋；西向大西洋；南濒地中海与非洲相望；东南以黑海和里海与亚洲相隔。乌拉尔山、乌拉尔河和大高加索山是欧亚相邻的陆界，约占欧洲边界的1/6。欧洲主流文化的发展总是同海洋紧密相连。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500年的巨石文化出现在南欧、西欧的沿海一带。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6世纪的爱琴文化诞生在爱琴海沿岸；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3世纪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生长繁荣在地中海沿岸；1世纪基督教诞生，3—4世纪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同古希腊、罗马文化相结合，5—15世纪传播、覆盖了全欧；15世纪以后至19世纪，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和海洋冒险事业的推动，西方文化通过传教、通商和战争，乘风破浪传播到世界各地，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后，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几乎成为西方世界的内海。西方文化因为西方列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像包围陆地的海浪一样浸染全球。世界上未受到西方文化影响和冲击的地方大概只剩下海风吹不到的杳无人烟的原始森林和原始人群了。

欧洲自然环境的另外两个特点是：大陆地形以平原为主，是平均海拔最低的一个洲，全洲平均海拔300米，2 000米以上的高山仅占2%，200米以下的平原占60%以上；大陆大部分地区气候温和湿润，是海洋性气候分布最广的一个洲，没有月均高于30℃的高温区，也没有平均温度低于－25℃的严寒区，真是得天独厚。欧洲文化除了拥有最辽阔的海洋，还有世界最好的陆地。欧洲

是全世界的“鱼米之乡”。生活在欧洲的人，种族单一，都是欧罗巴人种（白种人）；但民族多，有70个左右；绝大多数民族人口均达到一定数量，超过一亿的只有俄罗斯族，但千万以上的有德意志、法兰西、英格兰、苏格兰、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匈牙利、乌克兰、白俄罗斯、捷克、塞尔维亚等12个民族，人口100万以上的有二十多个，除了俄罗斯和瑞士，多数国家民族单一。欧洲是强大民族最多、强手并肩而立的洲，自古以来，各民族争雄于陆、争霸于海，征战不已。欧洲也是民族大迁移的时期维持数百年，历史地图改变最多，边界争端最多的洲。古代希腊、罗马文化毁于战争；中世纪仅十字军东征就打了几百年仗；近代列强争夺市场和殖民地打了300年仗；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主战场在欧洲。如果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春秋战国”时代，那么欧洲的全部历史好像是一部“春秋战国”史。而且，大部分战争离不开海洋，谁拥有海上优势和海上霸权，谁就是最大受益者和胜利者。

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由于自然环境殊异，带来文化品性的不同也十分明显。几乎与世隔绝的封闭的和半封闭的中国边界，使中华民族长期不受外来干扰，从而养成了独立自主的精神，也养成了排外的心理；而频繁的海内外交往，使西方各民族培养了很强的开放精神。与此相联系，中华文化具有保守性和稳定性，自守、睦邻；西方文化具有扩张和冒险性，排他、傲慢。中华文化具有居高临下的自尊心，自称“中心之国”，认为“世界以我为中心”；西方文化具有世界皆属于我的攻击性，“我在哪里，我就是中心”。在交通不发达的漫长岁月里，自然环境对民族政治、经济的进步，智慧、道德、心理的养成起着巨大的作用。在交通日益发达的现代和经济全球化的未来，“地球村”这一概念和人类各民族生活日益贴近，自然环境对文化的制约冲淡了，削弱了，但不会完全消失。经济上的交流合作，文化上的融合碰撞，不会改变各民族自然环境的基本构造，不会使人种与语言差异消失。文化的自然环境对人们文化素养的影响依旧，只是各文化之间的对待关系，会更为理性而已。而且由于人类正义的进步、人类成熟度的提高，一种文化毁灭另一种文化的现象发生的几率越来越少。文化的民族性的保留与发扬是必然的。

第二节　不同的经济背景

中华文化的经济背景是重农主义的农业社会，西方文化的经济背景是重商主义的工商社会。

四千多年前，中国就进入了农业社会，自然环境适于农业，人们热爱农业。既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城邦社会，更不同于日耳曼、西亚、中亚的游牧社会，也不同于阿拉伯古代商业游牧社会和古埃及商业和农业并重的社会。

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形态有更替，但农业一直是社会基础，种植、水源水利、观测天象以及春夏秋冬的农事农序，是文化的重要支柱和推动力。重农抑商是历朝的基本国策；重农轻技（工技）是一贯的科技思路；民以食为天、民为邦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既自强不息又墨守成规的积极务实心理是文化心态的主心骨；以变易求不变，"不易为体，变易为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循环论的哲学观念十分普及；依赖土地、安土乐天、男耕女织、丰衣足食、老守田园是普遍心态；渴望安宁、厌弃动荡和战争、向往太平、反对暴力的主张，极易引起共鸣并具有号召力；讴歌田园生活是文艺极具魅力的题材和主题。概言之：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民为邦本的政治思想，依赖土地、丰衣足食的务实心态、以变易求不变的循环论的哲学观念，追求和谐自然、安土乐天的审美情绪，渗透在中华文化的古往今来和五湖四海。利弊得失，千秋功过，由此可察其由。

重商主义的工商社会是西方文化的经济背景，这是无需论证的历史事实。商业的流通性，商路天南海北的流动性，同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的稳定性形成对照；追求商业利润的竞争性，不断提高生产效益的冲动和创新精神同自给自足的安于常态的农业社会的保守恰成对照；商业的风险性、特别是海上贸易的风险性，以及对占领新的原料产地，新的商品市场，新的交通要道，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以战争流血为手段的扩张性，同农业社会春夏秋冬年年如此的循环论的自我封闭恰成对照；商贾生涯成功与失败具有强烈刺激性的冲动境界，同农桑日子追求自然和谐的自赏性的意境追求恰成对照。总之，流动性、竞争性、冒险性、刺激性的追求也渗透在西方文化的古往今来和五湖四海。利弊得失，千秋功过，也可由此见其端。

参考资料

1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古代、近代部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 崔连仲主编．世界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 中国地图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

4 世界地图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

5 钱伯斯．历史地图册．杨慧玫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6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册．第1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

7 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8 埃里克·罗尔．经济思想史．陆元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第十章　中西文化不同的社会结构基础与治理理念

第一节　不同的社会结构与管理形式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时，东西方选择了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管理形式。印度是种姓制度，欧洲是宗教制度，中国是宗法制度。

如古代印度，文明社会的建立是伴随着雅利安人的入侵和征服完成的，形成了各个奴隶制村社内部的种姓制度，人们被划分为婆罗门（僧侣）、刹帝利（军事贵族）、吠舍（平民）和首陀罗（奴隶和征服的土著）四大种姓。种姓界线分明，极不平等，是古印度婆罗门文化的基础，佛教文化产生于种姓制度的对立物——反对种姓制的沙门思潮。种姓制度与改变种姓制度，是印度几千年社会生活重要的课题，印度文化深深打上种姓制度的烙印。

古代欧洲，私有制得到完善的发展，各氏族内部产生了明确的阶级划分和尖锐的阶级对抗，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制度被彻底摧毁，贵族（奴隶主）、平民和奴隶三大社会阶级和阶层等级森严，建立了典型的奴隶制社会。奴隶制下的城邦，各以不同的神灵崇拜为旗帜团结在一起。4 世纪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之后，以教皇、主教、神甫和牧师为神职的四级宗教组织，代表上帝管理着所辖宗教社区的上帝的子民。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形态发生了多次大转型。但社会的宗教结构和管理，不但未发生变化，反而得到改进和加强。西方文化始终贯穿宗教文化的性质。

不同于印度，也不同于西方，中国古代社会，是在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关系得到保存的条件下发展的。原始社会后期，黄河流域的夏族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代。父系家长有支配一切的权力，氏族的世系以父亲计算。人们聚族而居，集体生产，按血缘远近分配。血缘关系是维系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纽带。公元前 21 世纪建立的第一个奴隶制夏朝政权的“大禹”，在黄河流域兴修水利，是依靠氏族公社组织的集体成员修建的。各氏族内部没有发生古希腊、罗马那样鲜明的阶级分化和对立，保留了氏族内部的凝聚力和排他力，血缘关系仍起着维护各阶级、阶层社会关系的纽带作用，成为社会全体成员认同的社会管理和心理基础。西周王朝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的社会管理和心理的基础上建立了

完善的宗法制社会。

所谓宗法制社会就是国家政权实行和依靠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管理制度，它规定同一宗族内部各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其中有君统和宗统的区别与统一、大宗与小宗的区别与统一以及嫡出与庶出的区别与统一。嫡系长子特权是天赋的、神圣的，以嫡统庶是核心。同一宗族社会成员要按嫡庶不同、血缘远近拥有不同的地位、权利和义务。西周王朝依靠宗法制度巩固了政权，稳定了社会，发展了生产，创造了新文化。

春秋以后，严格意义上的宗法制度已不存在，但从战国时起一直到清王朝，以血缘为根基的家族和宗族组织，仍以不同形态延续下来，对漫长的封建社会生产、生活、社会心理，以及学术理论、文学艺术、宗教信仰，一直发生深刻的影响。所以说，把中国古代社会称之为宗法社会，把中华文化称之为宗法文化是符合历史真实的。这种文化在伦理上、心理上一直影响到现在，主要表现是：

敬祖——尊敬本族共同的祖先，认祖归宗，述祖德、叙宗绪的社会风尚和个人心态，至今依然。

亲亲——以孝亲、睦族、联姻的亲情和友谊营造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的和谐、脉脉温情来冲淡和粉饰现实的冷酷无情。

睦邻——远亲不如近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仍可作为现实社会道德建设的借鉴。

重友——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仍是大丈夫行为，受到赞扬。对朋友背信弃义的卑鄙行为受到人们的鄙视。

排外——非亲非故非邻非友，被称为“外族”、“外乡”、“外人”，一般排在感情信任的差序格局的外圈。

远神——无需建造一个超越祖宗、父母、亲情的上帝或真主来引导我们的灵魂达到彼岸。此岸的亲情可以信赖、可以依靠来渡过人间一切磨难。所以外来的宗教和本土宗教与神灵，从没有凌驾政权和亲情之上，也没有出现过大规模和持久的宗教狂热。

第二节　不同的社会治理理念

在社会治理的理念上，中华文化是伦理政治文化，西方文化是法理政法文化。

人类各民族有政府以来，社会治理治什么？怎么治？治什么大都一样：一是治“犯上”，即与政府对立的集团或个人反政府的集会、游行、示威、造反、起义和革命等；二是治“作乱”，即扰乱社会正常秩序和生活的越轨和犯

罪。怎么治也都一样，都是两手：一手是文治，即规范、规劝、教化；另一手是暴力，即卫队、警察、监狱，甚至军队。

中西方不同的是治理理念。为什么而治？靠什么来治？什么是比较好的治理？这是理念问题，是文化问题。所以埃尔曼先生说："法律移植是将某些制度和规范从一种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① 不同的法律体系根植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法律理念。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各国法律相互有更多的借鉴和移植。但简单的移植是不可取的。因为法律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同传统、习俗、心理特征等文化因素密切相关。法律文化依赖于一种久远的历史习惯和传统，是一个民族长期的生活方式、宗教伦理、思维方式的沉淀和凝结，深深融积于人们的观念和意识之中。

法律及法律所维护的社会秩序是社会政治的核心。中西法律文化基于两种相对立的模式，中国是基于义务本位，西方是基于权利本位。中国经历几千年自然经济和封建政治，法律文化中融入了"家国不分"、"礼法并用"、"重刑轻民"、"重义轻利"等内容，并包含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西方法律文化成熟于彻底摧毁了封建制度的工商社会，融入了"主权在民"、"法律至上"等思想观念。两种法律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承认这种差异。如果全盘引进西方法律，无视社会主体的承受力，不但不能加快法治的现代化，还可能冲击现有社会结构，使人抵触。正确的做法应当是：（1）弘扬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有价值的因素，为现代化服务。如一贯主张和为贵、强调社会和谐、"家国相通"，这是符合现代社会中国广大群众的价值取向的。它可以使大量社会矛盾纠纷通过亲戚、朋友、熟人及基层组织的调解得以缓和与解决，这不仅减轻了司法机关的压力，更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人民的团结。这种朴素的民风对国泰民安的作用是任何一种国外的法律制度都难以比拟的。（2）移植西方法律与我国法律文化创新同步进行。基本适应我国国情的法律制度，可用"拿来主义"的办法；基本不适应国情，但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有利，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要加以消化，可以"洋为中用"，逐步使之中国化，成为中国人新法律文化的生长素。（3）对于外国法律必须扬弃，不一定外国的法律，一切皆好，古今皆好。此时此地，吸纳什么、终止什么，才有利于中国现代化法律环境，应审视、明辨，博采精华，弃其不可用和无用的部分。

其实，中国的法律文化如此，哲学、美学、文学等文化形式也是如此。其"土壤"都是"家国同构"——宗法制社会中家庭、社会、国家在组织结构上的一致性。这些文化形式都根植于"达则兼济天下"的人格最高理想，"穷则

---

① 埃尔曼著：《比较法律文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0页

独善其身”的最低的人格追求，成为“内圣”、“外王”的“完人”。这就是伦理政治文化的实质、认识和处理中西法律文化的原则和做法、也适应于哲学、美学和文学等文化形式。

这种伦理政治文化的评判标准，甚至体现在中华民族对待宗教的态度上。

唯一由中国人创立的宗教——道教，不像其他宗教那样，创造出一个超越现实的彼岸世界，由神来引导、安慰现实社会受到尘染和伤害的灵魂，使其走出家庭，逃离现实，远离政治和社会。道教的教义主要是“吸纳导人”，达到“长生不老（死）”，而不是到冥冥世界中去求得“永生”和“超脱”。道教不仅不否定富贵、荣华和宗亲、伦理，而且在供奉的“神谱”中，还有专司功名利禄的神——文昌帝君，以满足教徒的世俗愿望。

传入中国的佛教，若坚持主张出家出世，岂不是不孝双亲、不忠君王、大逆不道吗？故在唐代遭到儒家的尖锐批评，韩愈就批判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提出对佛教要“人其人（僧还俗）、火其书（焚烧佛经）、庐其居（把佛寺改为民宅）”（《原道》）。面对强大的文化压力，佛教改变了自己，允许祭天、祭祖、屈服于宗法；中国的佛教允许僧徒参政，成为国师；又把佛家的生死轮回同儒家的孝道结合；把佛家的禅定、诵经同儒家的实际生活（修身养性）结合，也可达到“觉悟”；有的干脆修行，出现了“居士”这一特殊的佛教僧徒。这都是佛教修改教义，以适应取容于中国文化——本土文化。其他宗教也有类似情况。如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之后，出现过“以儒诠经”的时期或学派，使伊斯兰文化与儒学相适应。

只有西方的基督教传到中国后，没有儒化，甚至没有产生过类似儒化的倾向。不是基督教的传教者没有适应本土文化的愿望，最早到澳门传教的利玛窦等儒化的愿望是很强烈的。然而，这不取决于主观愿望，包括中国教徒的主观愿望。社会完全不同构、文化完全不同型，只能并存，互相借鉴，互相学习。对于中国，以权利为本位的西方法理政治文化，最值得学习的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说来容易做来难，这需要有文化脱胎换骨的精神才可真正到位；对于西方，以义务为本位的中华伦理政治文化，最值得西方人学习的是“克己”，不要“自我扩张”，也是不容易做到。中西两难，不可勉强融合，只可交流磨合。

参考资料

1 何怀远．欧洲社会历史观：从古希腊到马克思．济南：黄河出版社，1991

2 翦伯赞，郑天挺．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82

3 吴于廑主编．外国史学名著选（上、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第十一章 中西文化不同的“文化基因”与思维定势

第一节 不同的“文化基因”

中华文化的“文化基因”是“天命观、人和观、气节观和公理观”；西方文化的“文化基因”是人性、神性、理性、公民性。

什么是“文化基因”？“文化基因”是指“内在于各种文化现象中，并具有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得以传承和展开能力的基本理念或基本精神，以及具有这种能力的文化表达或表现形式的基本风格”①。“人们的一切社会实践活动的精神形态的产品或活动过程及其结果中的精神‘烙印’，都可称之为文化或‘文化现象’。”② 这两个界定，与我对文化现象和文化基因的理解相近，可以认同和参考。

我认为文化现象是人类各民族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包括自然和社会）的长期实践中，创造、表现和积累的智慧、道德和情感的结晶。而“文化基因”则是贯穿和渗透在文化现象中，各民族千百万知识分子和人民，永远认同、普遍认同的，自身生生不已、不断创新的、为民族提供永不衰竭的动力和人生观、价值观中的核心理念，以及弘扬和体现这种理念的基本形式和基本风格。这个“文化基因”，是民族文化现象的灵魂，是区别不同文化现象的根本标志。

赋予中华传统文化以基本特色的“文化基因”有四个方面。

1. 天命观，又称“天命论”或“天命律”，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世界观之“本”。天命观主要有三个层次，一是“天”，大意指客观存在，类似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二是“天道”，类似于“客观规律”，人可认识它，做到“替天行道”，而不可改变它，天道不可违。三是“天意”或“天工”、“天机”，承认天有无比巨大的意志，无比神奇的技艺和

① 参见毕文波文，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② 参见毕文波文，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神秘的玄机。天意不可测，但公正无私，"天道无亲，常与善人"，[1] 因而天意可求。对于天命，人要做到知天、畏天、乐天、不可怨天。"乐天知命，故不忧"[2]，"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3]，"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4]。中国人的"天命观"与西方的"神性"、"神本论"有明显区别，它是在"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条件下起作用，不同于西方的宗教和神话，至高无上、无所不能的神，独立地创造一切、左右一切，人也是神的创造物。

2 人和观，又称"和德论"，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的最高理念。人和观大体包含两论：一是"和德论"，即"和为贵"，"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谐、和平、和顺，具有最高价值，没有比"和德"更重要、更有价值的；二是"人伦论"，"人和"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有级有序、社会稳定的基础上的。因此，以"仁"为核心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五伦有序、十义相成，人人尊礼守序，社会就能稳定，才能达致"人和"，故伦理道德又是"人和论"的前提和基础。人和观的实质是社会伦理政治。

3 气节观，又称"气节说"或"气节论"，是中华传统文化人生观的核心理念和人格的最高境界。渗透中国历代社会生活的人生哲理的"气"，有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作为人生观的理念，主要是用其精神。中国人做人、论人历来论"气节"，如正气与邪气、大气与小气、朝气与暮气，阳气与阴气，此外还有才气、志气、勇气、豪气、意气、士气、骄气、娇气、霸气、王者之气，等等。气从何来？"天地有正气"，[5]"天地之气流行不已，生生不息"，[6] 气是客观存在的（近似唯物主义的解释）。人的"气节"从何而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后天的，因为人在社会实践中，其气可养、可夺、可治。所谓"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也"[7]，"三军可夺气，将帅可夺心"，"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8] 正因为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能依靠主观努力去养气、夺气、治气，又由于所下的功夫不同、条件各异，其结果相殊甚远，从而产生了人的气度、气概、气宇、气魄的差异，最终分出人格的高下，决定气节的有无。

4. 公理观。公理是中华传统文化国是民生的最高准则和治乱兴衰的最终

---

① 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
② 《周易·系辞上》。
③ 《论语·季氏》。
④ 《荀子·荣辱》。
⑤ 文天祥，《正气歌》。
⑥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
⑦ 《孟子》。
⑧ 《孙子·军争篇》

裁判。同西方主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文化传统不同，中华传统文化的公理观是“在公理面前人人平等”。公理是什么？公理就是“天下为公”之理，本质是一个“公”字，即代表国家、民族、阶级、时代的全社会绝大多数乃至全体大众最大利益和愿望的“道理”。有理与无理，讲理不讲理，对中国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而且是小理服从大理，家理服从国理，私理服从公理。作为公理，理高于法、理大于权。法不责众，理能服众，“刑不上大夫”低于“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之理；皇权最高，但若是无道昏君，那么“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就是公认的至理；以孝治天下曾是中国特色，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忠孝不能两全时，忠先于孝，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

在中国历代文化精英那里，以上文化基因，则体现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德目”上。八德目是孔子提出来的，后人整理记录于在春秋战国时期《礼记·大学》中。实际上，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从最高统治者到普通百姓，为人处事，为文、为政，行道修德，认的就是这八德目。从《周易》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主张，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至于毛泽东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邓小平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江泽民的“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无不体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伦理、外交、科学和教育事业中，无不渗透着这八德目所涵盖和宣示的忧国忧民的基本理念和浩然正气的基本风格。这一基本理念和基本风格，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道德和情感特征，具有超时代、超阶级的真理性，是中华文化当之无愧的文化基因。

相比之下，西方各主要民族几千年来，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实践中，逐步积累和表现出来的智慧、道德和情感，真、善、美的基本理念和基本风格，都渗透着人性、神性、理性、公民性。

1. 人性。从神话传统中的人到生物进化着的人再到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都是人。人的生存和发展，人性善恶的弘扬和扭曲，人的欲望和利益，人的冲突和命运的悲喜剧，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人性，都是人性的优点和弱点造成的。离了人性不说人。

2. 神性。人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了人。上帝最后要审判一切人，毁灭人类，再创一个新世界。人是伟大的、人性的创造力是无穷的，但人在上帝面前是渺小的，是子民，是选民，是忠顺的奴仆。天主、基督、圣母、圣子、圣灵是救世主，是主宰一切的……离了上帝不说人。

3 理性。在西方哲学史上，不同学派对理性有不同概括，如唯理派认为

理性是可靠的知识源泉；斯多葛派认为理性是神的属性和人的本性；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理性就是合乎自然和合乎人性。但对理性的理解，总是或多或少同科学的进步相联系。人对理性的追求，越来越走向科学性。科学性同神性或宗教性是不相容的，正如太阳中心说同地心说不可调和。然而在西方，理性和神性妥协了。人，是上帝创造的，人的理性也是神赋予的。上帝在创造了万物之后，又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人来管理万物。为探索万物的奥秘，驾驭自然规律来为人类服务，人可以无限制地征服自然，利用自然、主宰自然。从古希腊、罗马的数学、物理学、哲学到现代的信息科学，西方世界取得了巨大的科学成就，理性展现出无穷的力量和机会。但伟大的科学家可以是无神论者，也可以是宗教徒，甚至是虔诚的宗教徒。理性和神性不仅是可以调和的，甚至有人认为科学和理性可以证明神（上帝）是真实的存在。宗教生活，也是西方人的基本生活内容。

4. 公民性。是人，就有人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科学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平等、自由、民主是天赋的人权。人人要自由是绝对的，每个人的自由又必须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原则。人与人之间就要有契约、有法律来保障平等和自由。人人都要成为遵守法律的公民。从古希腊、罗马的城邦公民权到 18、19 世纪英国、美国、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独立宣言》，坚持和提倡的就是这个公民性。未成年者是未来的公民，成年人必是公民，不是公民不是正常人、合格的人。

在西方各主要民族文化中，这“四性”无时不在，无所不在。在他们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乡风民俗等一切领域，从古到今，一切反人性、反神性、反理性、反公民性的思想言行，都会被认为是邪教异端，被排斥和攻击，甚至被驱逐和消灭。“四性”也具有超时代、超阶级的真理性，成为西方文化的“文化基因”。

无论是中华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其“文化基因”都具有超时代、超阶级的真理性，正是它，标志着中西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差异。这个道理也适应于其他各种文化。这岂不是公然宣称真理的超阶级性和超时代性吗？岂不是反马克思主义吗？不。应当说真理的时代性和阶级性是毋庸置疑的，真理的超时代性和超阶级性也是无可怀疑的。两者都承认才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以文化史实为证吧。在中国，即使两军相对，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年代，在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书房里，摆着相同的中华文化典籍，只是各有各的读法。20 世纪 70 年代，当中苏军队鏖战珍宝岛时，克里姆林宫和中南海的决策者，手里捧的经典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是各有各的读法。外国也是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和反法西斯的，都是耶稣基督的信徒们。在上述历史事实中，真理的时代性、阶级性和真理的超时代性、超阶级性都有了。不同时

代、阶级集团打着同一文化的真理的旗帜，更不是罕见的。

人类创造文化的初衷是善，是为了真、善、美。而文化一旦确立了自己的普遍认同的地位和品格之后，经常受到假、恶、丑的亵渎。根植于人类美好理想、纯洁灵魂和健康生活的文化旗帜，为什么常常变成罪恶企图、肮脏躯体和变态生活的残忍之剑？人类历史什么时候走出这个自我折磨的怪圈呢？这也是我们探讨文化问题的原因之一。漫长的人类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之路的最终目的，就是折断这残忍之剑。

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基因”，决定了两种不同的文化个性。由于两种“文化基因”都具有超时代、越阶级的真理性，两种文化个性也都具有极强的稳定性。这种强势文化的并存、交流、竞争和融合是长期的，但永远不可能互相取代。

第二节　不同的思维定势

在思维定势上，中华文化倡导中和主义，西方文化遵循扩张主义。

什么是思维定势？思维定势是指一定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内化。它不仅包含思维形式和思维方法，而且是包含致思方向、思维内容和思维程序的有机整体。作为社会的思维定势，一是人们的习常思维，它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思维习惯，二是经过哲学家的提炼、运用概念表述的系统化的思维模式。前者与生活经验相联系，处于世俗化形态；后者与宇宙观、历史观相联系，是理论形态。

马克思说：“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① 中华民族传统的思维定势“中”、“和”、“中和”就是这种精致而珍贵的哲学思想，它产生和发展于中华民族成长的过程中。

先说“中”。帝尧传位给舜时，谆谆教导舜，要“允执其中”。就是要舜实实在在照顾各方面的利益，保持在舜统治下的各个部落的平衡。“执其中”就是保持平衡。

“中”就平衡。这条简短的传说材料，具有发生学的意义，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原初基质，是古老中华初民的观念，生发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之中，贯穿于中华文化的漫长过程。

再说“和”。历史发展进入西周宗法制时代，出现了“和”的范畴。西周末年，史伯回答郑桓公时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0页。

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①

春秋末年，孔子继承了前人关于"中"、"和"的观念，而且有所创新，基本确立了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并且在政治、思想各个领域做了确切的表述。

在政治上，孔子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②。孔子认为礼义规范的价值就在于协调统治阶级内部和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实现矛盾统一、社会平衡。

在个人修养和学术上，孔子提出"和而不同"的原则。"君子和而不同"，就是吸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是互相融通、沟通、吸取、包容，不是简单的相同或一致；"小人同而不和"，就是固持己见，排斥他人不同的意见和思想，内部（少数几个人）表面上意见相同，实际上勾心斗角，不能互相包容、吸纳，不能求同存异。

孔子在伦理道德上提出了"中庸"。"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③ 他对弟子的评论中强调，所谓"中"就是无过，无不及。所谓"庸"，就是运用。过和不及，既是主观意向的两种偏向，又是客观事物的两个极端。所谓"中庸"就是防止两种偏向，避免两个极端，遵正道而行，力求做到恰到好处。

后世儒学把这种政治上、学术上、伦理上、个人道德修养上的求中、求和的思维方式，总结概括为："执两用中"，符合孔子原意。这种求中、求和的思维方式，符合客观辩证法矛盾统一的一面，既有认识意义，又有实践意义。再加上孔子在封建社会的圣人地位，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既是民族心理的提升，又规范民族的思维方向、思维内容和思维程序，基本定型为民族思维方式，陶冶着民族的文化精神。

老子与孔子不同，强调矛盾双方的互相依存和互相转化，他从"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④ 阐述矛盾双方的依存关系，又揭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⑤，阐述矛盾双方相互转化。但他的结论是："保此道者，不欲盈"⑥，"盈"是转化的条件，要设法阻止这个条件的出现。这又和孔子的"中和"殊途同归，都是维持现存事物。

继承老子又别立一宗的庄子，看到客观世界普遍存在差异，矛盾、冲突不可避免，但又认为主观精神世界是可以避免的，办法是"齐一物我"，达到

---

① 《国语·郑语》。
② 《论语·学而》。
③ 《论语·雍也》。
④ 《老子》第二章。
⑤ 《老子》第五十八章。
⑥ 《老子》第十五章。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① 在精神上泯灭差异、消除矛盾、缓解冲突。最后，也是走向“中和”。

这种中和主义的思维方式，在《中庸》中得到最精要的概括：“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西方的传统思维方式与此大相径庭，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人向自然扩张，人生来是管理自然界，不断向自然界索取的。人的使命就是无止境地让自然人化。自然界要服从人的意志，为人服务。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从《圣经》到各类经典都宣扬，人间是罪恶的渊薮，每个人都要力争跳出这个罪恶的人间，达到彼岸。利己主义，是天经地义的，因为除了上帝没人能救你，你努力救自己时，你就是支配自己的上帝。要么以恶抗恶，以暴抗暴，要么人家打你左脸时你把右脸也送上，爱自己、爱敌人，就是爱上帝。伟大仁慈的主都会降福给你。

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上，西方文化总是陷在灵与肉的矛盾中，精神与肉体的矛盾中。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天赋的；人的权利也是无穷的、天赋的。天赋的欲望和权利左右人的命运。人的生活就是抗争，与命运抗争，不断地进行自我扩张。

第三节　对非本土文化的不同态度

文化基因和思维定势决定对非本土文化的态度。

在同非本土文化的关系上，中华文化是以吸纳、宽容为主，极端排斥很少发生；西方文化自主性强，但傲慢，排他主义严重。

在非本土文化中，佛教最早传入中国，已有两千年。中华民族对待佛教的态度如何呢？日本当代著名佛教史家镰田茂雄在其所著《简明中国佛教史》的“序”中如是说：“佛教起源于印度，经中亚细亚传到中国，并以中国为中心，传到渤海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东亚佛教文化圈。其中，中国佛教的教理体系最发达。研究印度佛教史，必须掌握西藏佛教的资料；理解南北朝以前的印度佛教史，必须具备中国佛教的知识；研究直接以中国佛教为母胎的日本佛教和朝鲜佛教，缺乏中国佛教的知识也是不行的。”这段话比中国许多学者说得更客观、更有说服力。中国不仅接纳了佛教，而且成了东亚佛教的中心。

中国佛教和佛学界对佛教经典和佛学文化的传译、典籍、师说、宗派及思

① 《庄子·齐物论》。

想渊源的介绍与研究，全面系统、穷原竟委，甚至超过了印度本土，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所没有的。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先生统计记载："中国汉语系佛教翻译事业持续了十个世纪（2—11世纪），翻译过来的经、律、论三藏共有一千六百九十余部，六千四百二十余卷。著名的本国和外国来的译师不下二百人。……通过这样多的人持久不懈的辛勤努力，把佛教的声闻乘、性、相、显、密各系统的学说都介绍到中国来，从而形成了中国佛教的巨大宝藏。"此外，"西藏译出的三藏经籍……部数五千九百余种、分量约合三百万颂，约当汉译一万卷。"① 还有傣族中和西夏族文献中都发现完善的大藏经译本。由此可见，我国各族文字大藏经是人类文化史上极为罕有的文化丰碑，其中凝聚了多少代人的聪明智慧和辛勤劳动，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坚韧精神和伟大气魄。而中华文化吸纳佛教文化、进行文化创新也是其他文化所罕见的，以至不了解佛学和佛教就不可能深刻了解中国哲学、历史、文艺、美学、建筑学以及医学。儒、释、道相结合，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和核心。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主要在十个少数民族当中，汉族中伊斯兰教几乎没有，因此同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相结合的特点不明显，主要具有十个少数民族的形式。在汉族地区和城市，穆斯林主要从事商业活动，并不要求汉族人民服从伊斯兰教的信仰。伊斯兰文化同中华文化可以和平共处。穆斯林对中华文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是以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信仰作出的，不是以同儒道结合的方式作出的。但穆斯林出现了不少精通儒学的杰出学者、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属于个人造诣和才华，而不是以穆斯林的宗教智慧和传统身份。唐宋两朝，在伊斯兰的传入初期，人们是从世俗的角度把它看成一种制度和法律②，这种认识大概到了元代才改变，在元代，对伊斯兰教有过歧视，主要是蒙族和回族生活中的饮食习惯不同所致，而不是儒家文化对伊斯兰文化的排斥。清朝末年，清朝统治者对回族人民起义的镇压，并非出于文化的原因。中华文化对伊斯兰文化，一千多年来，是包容的、接纳的。解放后，穆斯林获得宗教信仰的自由，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成为国家的主人，改革开放以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发挥自身的作用。

唯独基督教和基督教覆盖下的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曲折而复杂。传说1世纪耶稣门徒圣多默从印度到中国传教，但可靠资料不多。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基督教中的聂斯脱利派传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从波斯来长安，译经传教盛极一时，称为景教。唐武宗会昌五年（845）下令禁佛教，株连景教同时被禁，基督教在中国内地消失400年。13世纪，罗马教廷派遣传教士方

---

① 赵朴初著：《佛教常识答问》，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110页。

② 《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济各会士把罗马天主教传到中国，信徒发展到6万人，大多在少数民族中。元朝政权消亡，天主教也在中国消失。16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西方殖民主义，天主教再度传入中国，大批传教士先后来华。耶稣会教士利玛窦于明万历十年（1582）来中国，逐步深入内地，打开传教局面，使天主教在中国扎根。这次天主教传入中国的方式有三个特点：一是努力把天主教教义与儒家伦理相结合；二是同时传播西方新的科学知识；三是争取朝廷的信任，参与修订历法。宫廷贵族入教者达五百余人。清朝初年，天主教大发展，据康熙四十年（1701）统计，全国13个行省共有西方传教士117人、传教士住院114处、大小教堂250处、教徒多达30万。可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清政府下令禁教，历雍正、乾隆、嘉庆、道光诸朝，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即鸦片战争后四年被迫解除禁教为止，共127年，史称“百年禁教”。为什么禁教呢？所谓礼仪之争和传教士各派各区的领导权之争不是根本原因。乾隆朝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对天主教丛书《天学初函》的评论代表了统治阶级的看法：“西学所长在于测算，其短在于崇奉天主以炫惑人心。所谓自天地之大以至蠕动之细，无一非主所造，悠谬姑不深辩，即欲人舍其父母而以天主为至亲，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为国命，悖乱纲常，莫斯为甚，岂可行于中国哉?”这个百年禁教时期被天主教称为“中国天主教史上最悲惨的时代”。教徒人数由18世纪初的30万，减少到19世纪的20万，由公开转入秘密，或半秘密状态。但一方禁止，另一方禁而不止，引发无数教案。

反观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华文化对异质异域文化是宽容的。这个宽容的底线在于只要不危及本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就可互相并存、互相吸纳。否则不可宽容。天主教的异端派聂斯脱利派，主张神、人不同格，不同意说基督的神性与人性结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本体”，其观念与中华文化的价值观无根本冲突，因此能在长安立足，“法流十道”，“寺满百城”。明清以后，当天主教的教义可能导致无君无父、冲击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威胁“国命”和“纲常”时，则遭禁止。基督教要适应儒家伦理政治，只是改变传播方法，利用先进科学知识，并不修正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也就不可能融入中国社会。而改变核心价值观，无异于放弃自己的生命，对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来说都是做不到的。

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随着殖民主义强权和侵略战争的炮火，强加于中国。1899年前后，全国已有外籍教士886人，教徒74万，代牧区37个。这与其说是承认一种文化，不如说是屈服于一种宗教的政治地位。而帝国主义列强又利用教案进一步侵占中国的领土，如光绪二十三年（1897）德国利用山东巨野教案侵占了胶州湾。这样，基督教文化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不仅打上了帝国主义侵略的烙印，而且打上腐朽的封建统治的印记。对此，不但中国人民不能

接受，中国爱国的基督教徒也不能接受。这不仅远远超越了中华文化宽容的底线，而且已改变了早期来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的初衷。基督教文化与中华文化的正常交流，中西文化的正常交流，在中国必须推翻反人民的一切政治统治（新中国已经做到了），在西方必须彻底抛弃一切侵略企图。在对待异质异域文化上，中华文化的宽容精神是举世公认的。

参考资料

1 四书五经．沈阳：沈阳出版社，1996

2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 朱熹．大学章句．北京：中华书局，1983

4 朱熹．中庸章句．北京：中华书局，1983

5 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6 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7 高师宁，何光沪编．基督教文化与现代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8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振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9 成中英．论中西哲学精神．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1

10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11 镰田茂雄．简明中国佛教史．郑彭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第十二章　中西文化不同的载体与传播渠道

第一节　中华文化的载体与传播渠道

中华文化的载体包括：甲骨文；金石简帛；经、史、子、集；丛书类书；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亭台楼阁；墓陵殿堂；天文、数学、医典；四大发明等。其中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光辉成就和对世界文化作出的贡献者，是经、史、子、集、戏剧、小说、天文、数学、医典和四大发明。这里着重介绍表现中华文化的独特个性，显示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的经、史、子、集。

经是指儒家经典，俗称"十三经"。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同《圣经》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相仿。为了对儒家经典有个概括的印象，现将当代经学专家杨伯骏先生撰写的《经书浅谈》导言第二部分摘录如下：

《十三经》的完成经过

无论《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好，《易》、《书》、《诗》、《礼》、《乐》、《春秋》也好，统称为"六经"，《乐经》亡佚，变为"五经"。《后汉书·赵典传》和《三国志·蜀志·秦宓传》都有"七经"之名，却未举"七经"是哪几种，后人却有三种不同说法：（1）"六经"加《论语》；（2）东汉为《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孝经》；（3）"五经"加《周礼》、《仪礼》。这三种说法不同，也不知道哪种说法正确。唐朝有"九经"之名，但也有不同说法：（1）《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论语》、《孝经》；（2）《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唐太和（唐文宗年号，827—835）中，复刻"十二经，立石国学"。这十二经是《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到宋代，理学派又把《孟子》地位提高，朱熹取《礼记》中的《中庸》、《大学》两篇和《论语》、《孟子》相配，称为《四书》，自己"集注"，由此《孟子》也进入经的行列，就成了"十三经"，这便是《十三

经》成立的大致经过。

《十三经》长短大不相同。长的如《春秋左氏传》，连“经”带“传”，合计十九万六千多字；其次是《礼记》，有九万九千多字。最短的是《孝经》，仅一千八百多字。《孝经》自汉朝以来，一般不用它为科举考试的书。唐朝科举，沿袭隋炀帝的制度，有明经科，专考九种经书。因经书有长有短，便规定《礼记》、《左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为小经。宋朝虽然废除了明经科，但没有废除以经义考士人，便以《诗》、《礼》、《周礼》、《左传》为大经

“经”字的本义是织布机上的“纵丝”，其引申意义是“恒常”和“不变”。儒家把主要经典称为“经”，取其“恒常”、“不变”的意义，认为“经书”讲的是永恒的真理。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教授国子，中国文化史上出现了专事解说经书文字、阐释经书义理的学问，名为训释，实则深广，几乎笼括了中国古代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历史学、文艺学、训诂学、民俗学和宗教学诸多领域。从两汉时期的今文经学、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到清代的朴学，经学成为中国学术文化的代表。

史不是指现代意义上的历史科学，更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以后的史学，而是中国的史书、史籍。中国历朝历代有史官，这是世界罕见的。《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中国史籍，以纪传为正史，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被称为正史之祖。历代都学司马迁和班固，著有史书。清代乾隆年间，钦定《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新五代史》、《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 共二十四部史书为“正史”，称“二十四史”，在此之前，至宋有“十七史”，明代有“二十一史”，此外还有“十三史”等。

除了正史，还有编年体史籍，如孔子编定的《春秋》，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等，此外还有“纪事本末”、“政书”、“别史”、“杂史”、“实录”。由于中国传统史学对人才十分重视，要求具有史才、史学、史识和史德。史家把著史当作大事，学习孔子“寓褒贬、别善恶”的春秋笔法；遵照司马迁“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精神；模仿司马迁“年经事纬，举撮机要，因果昭然若揭”的方法。中国绝大部分古代史书，不仅是史学瑰宝，而且具有杰出的思想价值、艺术价值，是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文化珍品。

子是指子书，《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叙》说："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其内容涉及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军事学、逻辑学、语言学、美学、医学诸多领域，涵盖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共十家（七个学派）的知识分子的学术著作。他们"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不含小说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① 班固把分别属于不同学术领域的著作，在治国方略这一政治学的聚光镜下，统摄于"诸子"一类，深深打上了伦理政治文化的烙印，几千年浸润不没。直到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传入我国。人们重新审视"四部"分类法，对"子书"给予了新的界定，认为"子书"是先秦以来在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军事学、逻辑学等学术领域有建树的一家之言。故20世纪30年代由世界书局出版的《诸子集成》，收录了《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列子》、《墨子》、《晏子春秋》、《管子》、《商君书》、《慎子》、《韩非子》、《孙子》、《吴子》、《尹文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新语》、《扬子法言》、《论衡》、《申鉴》、《盐铁论》、《潜夫论》、《抱朴子》、《世说新语》、《颜氏家训》。它包括了上自周秦下至南北朝诸多思想家的著述，而且把《论语》、《孟子》并列于"诸子"，多少体现了学术平等。《诸子集成》是"子书"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的重要基本资料之一。

集是除小说、戏剧外古代文学类图书的总称，分为别集、总集、选集和诗文评四小类。别集，指某一作家的全部作品或某一作家某种体裁的全部作品的总汇。如李商隐自编《樊南文集》、白居易自编的《白氏长庆集》、南宋人王伯大编的《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总集是以选取佳作，提供创作规范或收集零散、防止亡佚或分门别类为目的所汇集的某一时期或同一题材、体裁的文学作品的集子，与别集、选集是相对的概念。如《诗经》、《楚辞》、《文选》、《玉台新咏》是南北朝时期爱情诗歌总集，《文苑英华》是梁、陈、隋、唐四代文学总集，《唐文粹》是唐代文学总集一百卷，《宋文鉴》是北宋文学总集一百五十卷，《乐府诗集》一百卷、《万首唐人绝句》、《花庵词选》是唐宋词总集，《元曲选》为元杂曲总集一百卷，等等。至于选集和诗文评，较常见好理解，与现代同义，不赘述。

像"经史子集"这样丰富、系统的文化典籍，是中华文化载体所独有，

---

① 《汉书·艺文志》。

世界其他文化现象所罕见的。

至于中华文化的传播渠道和形式，更是灵活多样。从王朝圣旨到乡俚门联；从庙堂决策到婚姻家庭；从经时济世到饮食起居；从国教官学到民办私塾；从科举取士到家规家训；从驰骋疆场到纵情山水；从雕梁画栋到龙凤麒麟；从抽象思辨到悲欢离合；从学坛雄文到格言谚语；从鸿篇巨制到三字经，无不载言载德，传经布道，耳濡目染，以风以化，使中华文化成了民族生命与性格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批判，可以革新，可以再创造，而不可割断，不可倾覆。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科举制度和教育。据说世界上最重视教育的民族有两个，一个是犹太族，一个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每一个家庭都把教育子弟成才的费用，作为家用支出的首选。没有教育就没有儒家文化。儒学创始人孔子是教育家，儒家文化的传承，主要是几千年来的官学和私学。而中华民族之所以特别重教育，又同科举制度紧密相关。早在汉代，中国就实行了察举制，但无考试，不定期。科举制度是隋以后封建王朝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于分科取士而得名。科举制度完善于宋，延续至明清，直到1905年才被废止，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科举制度曾造就十万余名进士大军，是中国独特的文化景观，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科举制度不仅完善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官政治，巩固了“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的核心地位，而且有力地促进了教育的发展。科举制度打破了世家贵族对权力的垄断，为庶族知识分子实现抱负开辟了道路。唐宋以来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如陆贽、裴度、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曾巩、苏颂、沈括等人，绝大多数都是进士出身，文天祥还是状元。不少读书人一旦及第，飞黄腾达，平步青云，强烈地刺激了教育的需求。国家公办的有国子监，州府县有官学，还有书院、塾馆等私学，形成了勤奋好学的风气，出现了头悬梁、锥刺股、囊萤映雪、凿壁偷光等苦读的典型。这使中国自古具有重视教育、勤奋学习的传统，中国社会自古以来成为考试的社会，中国文化成为考试文化。不仅中国无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和知识结构，是由科举制度和教育制度塑造出来的，而且影响到世界和西方，促成了西方文官选拔制度的形成。18、19世纪的许多西方学者，热心研究中国文化教育，正式主张仿行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法国于1791年首先试行，英国于1853年推广。孙中山在《五权宪法·民权初步》中说：“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利玛窦等早期来华的西方人，非常注重中国的科举和教育，利玛窦曾把科举制度的秀才、举人、进士译成学士、硕士、博士。伴随中国两千年的察举、科举制度和教育

制度，功过利弊，精华糟粕，应有公允之论。

第二节　西方文化的载体与传播渠道

西方文化的载体和传播渠道与中华文化大不一样。它虽然同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都是宗教文化，但它的载体和传播却不同于佛教的主要依赖佛事，也不同于伊斯兰教主要依赖军事征服。西方文化，特别是近代西方文化的载体和传播，主要依靠的是传教、商贸和战争。科学技术也是为商贸和战争所推动，又为商贸和战争服务。传教控制思想，商贸控制经济，战争使对手屈服，变成殖民地或变相的殖民地。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爱"，在上帝的爱，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下进行的。这不是对西方文化的批判，而是客观描述。西方的学者也是这样描述的。

传教本来是温和的，许多人最初还是善意的。传教有四宝：《圣经》、教会、圣事和神职人员。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后，4世纪至5世纪，《圣经》被译成拉丁文。16世纪宗教改革前后，已译成欧洲各国文字，既普及了宗教世界观，又对各国语言文字的形成和统一起了奠基的作用。至今《圣经》仍然是西方各国最规范、最优美的文字。西方文学艺术作品，尤其在中世纪，多取材于《圣经》故事。18、19世纪世界各国都有《圣经》译文。教会是基督教各派组织形式的总称。各国、各地区具有分级管理的教阶体系，具有教会法律、教会学校、教义教材，是有领导、有组织的以《圣经》为纲领的文化网，也是思想政治网。神职人员有从教皇到主教（又分枢机主教、大主教和一般主教）、从主教到神甫、助祭的职位体系，分级管理宗教事务。每一个教徒都要在神职人员主持下，参与圣洗（洗礼）、坚振（由主教敷油于信徒头上，称可坚定信仰）、告解（教徒向神甫告明所犯罪，由神甫代天主赦免）、圣体（东正教称圣体血）、终傅（信徒临终前由神甫敷圣油，为之祈祷，赦免罪过，得到善终）、神品（祝圣神甫主教）、婚配（主持祝福教徒的婚姻）。一种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一种生活方式，就随着这宗教"四宝"渗透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成为人们思想言行的准则，灵魂的寄托和精神的主宰，成为强势的普世文化。

商品成为文化使者并非始于西方。古代中西丝绸之路就曾通过丝绸、陶瓷等商品把中华文化带到中东、阿拉伯，又通过中东、阿拉伯带到欧洲。西方人以商品为载体向东方传播文化，是向东方学的，老师还是中国。只是学生大大超过了老师。尤其是近代，商品贸易战，既是西方文化走遍全世界的"前哨战"，又是巩固西方文化成果的"阵地战"。且不说殖民地，只要稍为清理一下半殖民地的中国，有多少"洋"字头的商品：洋油、洋布、洋火等不下百

种，最后是“洋奴”；有多少“商”字头的商务：商会、商埠、商舶、商馆、商路、商业代办处、商业银行，以至于商业新闻、报刊广告、商业美术，等等。西方世界就这样同传播基督教一样，又同时向全世界输送了一个新的宗教——商品拜物教。马克思第一次揭示了“商品拜物教”的秘密，认为它是商品交换的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一种幻觉。这种幻觉，就是一种观念，一种文化。它是西方文化中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商品的生产、贸易、竞争、战争可以决定个人的命运、企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为商品而战，就是为命运而战。商品观念就这样成为西方文化的核心观念。甚至自由、民主、平等、博爱都统帅在商品拜物教的旗帜之下，并同基督教的神的崇拜结成神圣联盟。

以战争传播文化，甚至毁灭其他文化，以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人，取而代之，也不是西方所独有的。阿拉伯帝国传播伊斯兰文化就是以战争征服为主要载体。西方文化这种做法也是古已有之，只要提到一些东方国家以西方人的统帅、元首命名的都市就会明白，如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等。西方文化与别的文化不同之处，在于近代战争往往是基督教与商品拜物教神圣同盟的产物。以战争来强化自己的宗教观念、思想理念，推销自己的商品、追逐超额的利润，满足膨胀的利欲，因而更为残忍和野蛮。15世纪至18世纪，葡萄牙、西班牙、尼德兰、英国、法国的“商业战争”打了300年，英国取得了胜利。推销的不仅有商品，还有鸦片，还有“维多利亚港湾”，还有东印度公司，还有印第安人几乎被杀戮殆尽，还有玛雅文明的毁灭，等等。19世纪至20世纪以至到现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传媒，使西方人以无与伦比的超级力量向世界传播自己的信仰，推销商品和战争。宗教、商品、战争，创造了西方伟大的文化辉煌，造成了人类深重的文化灾难。现在辉煌与灾难并存，成就与危机赛跑，地球污染、资源短缺、人类生存受到威胁，正在惩罚西方为代表的现代文明。明智的西方人开始反思，进行自我“文化诊断”。

中西文化两种截然不同的载体和传播渠道，带来两种不同的文化走势、两种不同的文化运行和两种不同的文化前途。人类可以庆幸的是，现在可以在两大强势文化之间，进行观察、选择、分析与综合。人类文化能不能在老路上走下去，还要再看多少年？历史最后是公正的，人间的不平是永存的。

参考资料

1　杨柏骏．经书浅谈．北京：中华书局，1984

2　二十五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　朱诚如，王树森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基础知识．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4　圣经故事（增订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5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2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第十三章　中西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不同主题

第一节　中西现代文化的不同主题

现代中华文化的主题是启蒙、救亡和革命；现代西方文化的主题有两个，一是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二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世界现代化、现代性、现代主义是指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化、世俗化、市民社会、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社会主义等为标志的世界历史进程。这个历史进程如果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至今有三百六十多年，可分为三个大的阶段。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确立以前，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蒸蒸日上取得世界性胜利的阶段。资本主义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和自由、平等、博爱等文化旗帜，作为人类进步的标志高高飘扬。中间一百多年，即马克思主义确立之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这140年左右，人类出现两种现代化即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比较和竞争，两次世界大战暴露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现代化不可克服的矛盾和灾难，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曾经显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旗帜——人类彻底解放的旗帜作为人类进步文化的标志高高飘扬。可惜，这140年中的后40年，世界资本主义阵营内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对稳定，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却从20世纪50年代起出现分化，美苏两霸在世界范围内的冷战争夺最终美国取胜。这40年可称之为“前现代化”向“后现代化”转变的过渡期或酝酿期。80年代以来，人类现代化的历史转入了美国以超强实力独霸天下、世界经济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时期。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三个阶段是：前200年资本主义现代文化的上升时期；中间140年资本主义现代文化和社会主义现代文化的激烈竞争期；冷战结束后的最近20年来，资本主义现代文化重新主导世界文化主流，社会主义现代文化在低潮中重新探索。当代西方世界的学者，许多人把前两个阶段称为“前现代”时期，把冷战后的世界称为“后现代”时期。我们可以借用。

这里要说的现代中华文化是世界现代化前两个阶段的中华文化。第一阶段世界现代化走过200年的辉煌、现代化国家的名单里找不到中国。第二阶段资

本主义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激烈竞争阶段里，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资本主义列强以屈辱的条件和方式给中国带来现代化的阴暗早晨；80年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中国送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阳光；一百多年后，中国人在1949年站起来开始掌握自己现代化的命运，自主地进行现代化的探索。这个探索直到毛泽东去世，历经一百三十多年，在世界两种现代化的激烈竞争的过程中，中国人经过反复比较，付出惨痛代价，坚定不移地选择了资本主义开辟的工业化道路和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指导。走上了一条既不同于西方传统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又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新的独特的现代化道路。这条独特的道路，这种独特的文化实际上是西方人逼出来的一种“文化觉醒”。启蒙、救亡和革命的“文化觉醒”。

启蒙，以民主和科学的先进思想启专制、愚昧之蒙。追求民主、追求科学，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坚强的灵魂。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谁在民主和科学面前不老实，就要冒天下之大不韪。

救亡，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先进文化，团结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为中国的独立解放和自由而战，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可歌可泣的伟大篇章。

革命，包括推翻清朝皇帝的辛亥革命和以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为指导，胜利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化历经磨难而不衰的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的民族会永远记住为创造中华现代智慧、现代道德、现代情感的先驱者的名字，是他们创造的先进文化使中国人避免了印第安人那样的命运，避免了长期沦为完全的殖民地、完全丧权辱国的灾难。

至于西方世界，三百多年来，既创造了前人无与伦比的把人类领入现代化历史的现代文化的奇迹，又带来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现代化的种种人类灾难的畸形文化的奇迹，也孕育了指引人类走出现代灾难、彻底解放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文化奇迹。对创造了这“三大奇迹”的西方现代文化，中国人能说些什么呢？中国要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能做什么呢？取其利、避其害，是明智的文化选择。如何选择呢？

第一，珍惜选择的机遇。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同意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在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国目前还有这种现实的可能性，其他国家如东欧、苏联以及非洲等大体上都已踏上‘全盘西化’的不归路了。在中国的这种现实可能性，大概也只有20年左右。如何把握住这个要害时机，走出一条对人类前途都至关重要的新路，是非常值得珍视的。因为经济上的‘全盘西化’即全盘资本主义化未必好。美国社会的暴力、吸毒、贫富悬殊、种族歧视、家庭破碎、变态色情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固然有政治、文化方面的原因，但跨国公

司、垄断集团的经济利益也起了基础的重要作用。因此，千百年来有关‘社会主义’的种种美丽、健康的思想，是不是可以不通过乌托邦的整体工程和革命实践，而通过局部制度的不断创造、积累、摸索、改善而缓慢地逐渐实现呢？为什么中国要向美国看齐，重复资本主义的道路呢？12亿人如果有一天都处在今日美国的境地中，那么将是人类的一大灾难。为什么人类不能有更好的理想呢？……政治上也是这样。”

第二，停止选择的争论。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反对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延续了一百多年的“中西体用”之争，已经过时了。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中体西用”论、以谭嗣同为先声的“全盘西化”论、以康有为代表的“西体中用”的自由主义论，以及后来的“体用之争”的种种，都发生在中国人没有掌握中国现代化命运之前，都是没有西方——仅仅是资本主义的西方——的榜样就没有中国现代化的思维模式。中国人经过一百多年奋斗掌握了自己命运之后，没有必要再向后看。在如何学习西方的问题上，已经有比“体用之争”更先进、更深广、更全面的思想理论和实践经验。因此，李泽厚先生的新“西体中用”论（又称“转化性创造”）也无新意，即使针对“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人权”、“民主”也起不到借古喻今的作用，至多是隔靴搔痒；即使对“体”、“用”作新解释，用这个办法引导人们回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典、孔子儒学的原典，也是故意迂回，可能也只是对牛弹琴而已。不是任何“新酒”都用“旧瓶”好。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体用之争，反而不利于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和思想解放。

第三，掌握选择的根本。根本就是创新。创新是中国人、中国文化在21世纪的唯一纲领。创新的根本又是有利于发展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有利于克服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弊端，有利于防止中国私有制的灾难；只要符合这三条的文化思想，不管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古代和现代，都可拿来，都可借鉴，都可融会，为我所用，用在创新。一百多年来，为了救中国，“主义”多得很，一个“主义”就有一个纲领、甚至很多纲领。本意也许不坏，但今天一个纲领，明天又是一个纲领，纲领不断创新，国家和人民的富强却没有创新，这是一种腐朽文化，连“新权威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资格都不够。但愿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对中国人——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国人，多给一些创新的“主意”，即智慧。开启智慧的文化，才是先进的。

中国现代文化坎坷一百多年，中西文化关系坎坷数百年，该清醒了——现代的清醒。

第二节 中西后现代文化的不同使命

后现代主义时期，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觉”；西方文化面临的课题是进行世界性的后现代“文化诊断”。

这里说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商品生产和销售市场世界化进入了新阶段；这里说的后现代主义时期，是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世界现代化几百年达到了鼎盛，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遭到惨败后，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末期，全人类面临着现代化社会的共同风险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清楚和突出的阶段。这些风险是：贫富不均、苦乐不均、压迫剥削加剧、巧取豪夺升级、盗匪横行、无安全感、种族歧视和灭绝时有发生、恐怖主义升级、吸毒贩毒猖獗、瘟病肆虐、精神空虚、信仰危机、道德沦丧、腐败滋生、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大国和小国、富国和穷国、强者和弱者、正人君子和卑鄙小人、智者和白痴、正常人和疯子、大款和乞丐以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面对这些共同的威胁和灾难，谁也无法躲避这个人类生死存亡的问题。只有在解决这些问题上表明自己的文化本性。

上述两类社会历史现象突现在同一时期即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最后二三十年。以此为界，此前，为世界“前现代”时期，此后，为世界“后现代”时期。我这一观点的可靠性，在一位西方学者——美国的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著作中得到了佐证，他说：“因为在很多方面，对全球化的描述与对后现代化的描述相呼应。后现代化理论（也伴随着“狂热”）比全球化理论早几年出现。我们确实有理由认为这两个现象根本上是完全相同的一回事。我们现在称之为全球化的经济组织形式，其上层建筑中的文化层面就是后现代化。”①

前文已经提到，对于中国人来说，“前现代”时期就是从鸦片战争（1840）起到1976年止，总共136年，解决了一个问题：中国人自己掌握了中国现代化的命运。不是由封建统治阶级的开明人士、洋奴，甚至也不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霸权主义者，来掌握中国现代化的命运。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党和人民成功地解决了这个中国现代化“谁主沉浮”的问题。

中国人的“后现代”时期，是从中国改革开放开始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敏锐而准确地把握了“经济全球化”即“后现代主义”时期

① 参见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三好将夫编：《全球化的文化》，马丁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的历史机遇，作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回答：从理论到实践对新的历史时期的中国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文化现代化作出了及时、科学的历史选择。

这一历史选择，在中华民族的智慧、道德和情感里注入了新的“文化基因”，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理念和新的精神支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发展是硬道理”的新观念，由此引出的发展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振兴中华的第一要务，社会主义就是解放、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关键，教育是基础，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等一系列新观念风靡全国；二是社会正义即社会公平的新理念，由此引出的对政治正义、经济正义、文化正义的追求，对民主与法制的重视，对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和共同富裕的辩证关系，对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新理解，对人本主义的新认识，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和尊重个性发展的新肯定深入人心；三是社会改革的新思想，不断改革我们自己在革命和建设中已经建立的和将要建立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教育、科技）体制以及社会保障体制等。一切过时的、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利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东西，无论是过去的、现在的或将来的，都在改革之列。改革也是革命，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这些新观念、新思想既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的社会理想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文化基因的继承，又是对西方传统的“人性”、“理性”、“公民性”等文化基因的吸纳。它代表了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追求的文化创新和“文化自觉”。

与此相反，西方文化似乎缺乏这样朝气蓬勃、稳步雄跨的坚定性和自觉性，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后现代时期即资本主义鼎盛阶段的“风险”和“混乱”，似乎多了些茫然、困惑与徬徨，少了些清醒、坚定和明确的选择。

美国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把“后现代主义”当作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之一，它们是：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很显然，他首先是从文学、艺术，其次是哲学的角度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西方后现代主义”的，重点不在冷战结束之后。但他介绍“后现代主义”提供的资料，对我们有用：

“我们从这一历史中得知的是，早期在美国使用后现代主义一词的是些诗人，诸如兰德尔·贾雷尔和约翰·贝里曼，或更具有预言风格的查尔斯·奥尔森，他们在关于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新诗歌’的讨论中有限地用到该词。贾雷尔也许是第一位谈论后现代主义的美国人，在1946年，他把罗伯特·洛威尔的诗歌说成是‘后现代或反现代主义，并因此肯定是有影响的’，很有可能贾雷尔独立地创造了该词，未受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影响；大约在同一时期，汤因比（通过他的概述者D. C. 萨默维尔的绘声绘色）向广大读

者宣告了西方历史的一个新时代，他把它称为‘后现代’（Post-Modern），并暗示它有可能是最后一个时代。”①

不管西方世界对“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时代”的历史考证和现实描绘是怎样的莫衷一是，分歧似乎没完没了。但半个世纪来，以下几点认识是人们认可的：（1）“后现代”与“前现代”是不同的时期或时代或历史阶段。（2）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主义”反映两种基本倾向：一种是“悲观主义的焦虑”的阐释，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其史无前例的野蛮与破坏，以其对居于高技术文明核心深处的残暴的揭示，可以说是作为一种恶魔现代性的顶峰出现的”，这一倾向的代表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另一种是“乐观主义一天启式的阐释”，主要是美国诗人，“把后现代概念从汤因比附加于它的悲观主义焦虑中解放出来，把新时代作为一个崇高的时代来为之欢呼。”（3）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主义”则同西方世界出现的“无政府主义、反律法主义和‘新诺斯’（new gnosis）倾向”不可分解地联系在一起。（4）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现代主义”从诗人和学者的圈子走出来，得到了国际承认的地位，普遍回到汤因比的历史—哲学的解释。②

“后现代主义”作为现代性五副面孔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在世纪之交，在21世纪已经开始的头几年中，又是一副什么面孔呢？它给西方文化，带来了什么样的新观念、新思想、新理念呢？给西方人特别是主导西方世界的美国人的智慧、道德和情感带来了什么精神支撑和精神刺激呢？这个“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当代状况，在西方至少有以下几种面孔：

第一，胜利陶醉的“后现代帝国主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把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惨败看作自己意想不到的胜利，并在胜利的陶醉中洋洋自得，以为全球化就是全球资本主义化，就是全球美国化，要把西方文化价值观，强行普及到全世界，成为普世文化。这种文化已经远不是观念形态的东西，而变成了一种现实力量，凌驾于国际经济、政治之上。各种跨国公司的运作，社会必需资料的生产、流通和分配的新形式，还有不同目的与形式的经济制裁和战争，使许多国家（特别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经济决策力和政治文化主权受到威胁。这是一种“胜利陶醉”中的霸权主义面孔，推行的是“后现代帝国主义”思想。

法国《世界报》2003年4月25日发表题为《后现代主义》的署名文章指出：“后现代帝国主义——美国是其主要甚至唯一的倡导者——所追求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土地占领——从本土派人在殖民国建立据点。……这种帝国主

① 马泰·卡林内斯库著：《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86—287页。

② 参见马泰·卡林内斯库著：《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85—289页。

义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它所追求的是将民主作为一种最佳的制度加以推广。……在科索沃战争时期，英国首相布莱尔支持过'新国际主义'的构想。"“9·11”事件后，"布什总统的自由帝国主义带有强烈的后现代主义色彩"。

第二，对多元文化世界的反文化意识。世界文化是多元的。对多元的民族文化有两种相反的基本态度：一是丰富多彩，相辅相成；二是此消彼长，互相冲突。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文化冲突论"占上风。而且，这种"文化冲突论"为反文化的各种倒行逆施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人，实行文化霸权主义提供了旗帜（详见第二章）。

第三，对恐怖主义的"恐怖心理"。反恐怖主义从"9·11"事件开始成为美国主导的"后现代主义"时代的"普世文化"。恐怖主义思想起于何时，行为起于何时，好像是一个不解的秘密。其实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并没有把野蛮全部抛弃。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不同群体对什么是"野蛮"、"残忍"和"血腥"的恐怖主义是有不同标准的。全人类对恐怖主义的完全统一的认识标准还没有出现，统一认识的时代也没有到来。这个文化现象在"后现代"时期和"前现代"时期，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有区别的是"后现代"时期关于恐怖主义的标准变得更快，对立更明显，更多了一些"无耻的英勇"和"狡猾的谦虚"。所以当代世界，既有对恐怖主义的憎恶和恐怖，也有对反恐怖主义的奇怪逻辑的惶惑：恐怖主义是坏东西，一切坏东西都是恐怖主义；对于恐怖主义我是要反对的，我要反对的一切东西都是恐怖主义。这种文化现象是"前现代时期所没有的"。

第四，科学"后现代主义"，或者叫"后现代主义"与"大科学"时代，它同"知识经济"时代的说法同类，但不同一。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在《信息方式》一书中说："利奥塔将'知识'视为科学，尤其视为自然科学，将这类话语的巨大重要性注入当代事件及制度的所有维面。今天的科学不仅仅是一系列学科，分门别类地存在于高等教育机构的不同院系中，而是一种为经济、军队和国家提供基本知识的力量。甚至社会科学学科也是按它们的方法与'严密科学'学科的方法的接近程度来衡量其合法性，衡量其种种努力的地位。正如劳丽·安德森所赞颂的那样，我们已处于'大科学'的时代。"① 在这个"大科学"时代，科学具有越来越显著的意义，出现了"新的科技阶层"，它将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因而两个世纪的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和社会主义的现代性都结束了，让位于"大科学"时代带来的"后现代性"。它同"知识经济"不同的是，这个"大科学"时代是"一个新的政治纪元"、"这

① 马克·波斯特著：《信息方式》，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90—191页。

个纪元结束了长达两个世纪的雅各宾主义和列宁主义，两个世纪的现代性”。[1]“后现代”时期科学成就是伟大的，科学时代是真实的，但科学开辟政治新纪元则是一个真实的幻觉。这个真实的幻觉，同大科学后现代主义，两者都是值得重视的后现代主义的重大文化现象。

第五，冷静的“文化诊断”。这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最值得注意和最有出息的根本特点：一方面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后现代”社会的社会问题的“文化诊断”，另一方面是对“后现代主义”自身的“文化诊断”。简言之，前者是诊断，后者是对诊断进行诊断。这是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标志性的特点。

乌尔里希·贝克在《自反性现代化》一书中说：“孟德斯鸠认为，‘制度毁于其自身的成功’。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然而又颇受关注的论点。西方正面临着挑战其社会政治体系的根本前提的诸多问题。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关键问题是，具有西方特色的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历史性共生现象能否在不耗尽其物质、文化和社会基础的情况下在全球范围内普及？……既然工业化社会的旧体制正在其成功的过程中解体，那么在冷战结束后‘常规’战争又重新被发现的痛苦现实中，难道我们不该得出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乃至再造我们的工业文明的结论吗？新的社会契约不正在待产之中吗？‘自反性现代化’指创造性地（自我）毁灭整整一个时代——工业社会时代——的可能性。这种创造性毁灭的‘对象’不是西方现代化的革命，也不是西方现代的危机，而是西方现代化的胜利成果。”[2] 这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积极的乐观主义。

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在《后现代主义的幻象》中写道：“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这些社会既是自由主义的又是权威主义的，既是享乐主义的又是压抑的，既是多元的又是单一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难发现。市场的逻辑是快感与多元性的逻辑，短暂和不连续的逻辑，某种巨大的失去中心的欲望之网的逻辑，个人仅是这种欲望的稍纵即逝的效果而已。……”[3] 如此种种，令人失望或给人希望的对西方后工业社会、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文化诊断”，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核心部分。在这里，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都不明显，明显的是“冷静”

特里·伊格里顿又说：“‘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复杂和范围广泛的术语，它已经被用来涵盖从某些建筑风格到某些哲学观点的一切事物。它同时是一种文化，一种理论，一种普遍敏感性和一个历史时期。……从哲学上说，后现代

① 马克·波斯特著：《信息方式》，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9页。
② 乌尔里希·贝克等著：《自反性现代化》，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5页。
③ 特里·伊格尔顿著：《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49页

思想的典型特征是小心避开绝对价值、坚实的认识论基础、总体政治眼光、关于历史的宏大理论和‘封闭的’概念体系。它是怀疑的、开放的、相对主义的和多元论的，赞美分裂而不协调、破碎而不整体、异质而不单一。它把自我看作是多面的、流动的、临时的和没有任何实质性整一的。后现代主义的倡导者把这一切看作是对于大统一的政治信条和专制权力的激进批判。后现代主义的批评者则倾向于把它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秩序下的真理、现实和身份的概念的犬儒主义抛弃，这个资本主义秩序感到这些东西是它获取利益和进行统治的冲动的障碍。关于如此复杂的一种文化现象，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①

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及其使命是什么，让西方人自己去回答吧——他们的“文化诊断”以及“对诊断的诊断”。

参考资料

1 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郭国良，徐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 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 高湘泽，冯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4 乌尔利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5 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 吉姆·麦克盖根．文化民粹主义．桂万先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7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三好将夫合编．全球化的文化．马丁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8 约翰·菲斯克．解读大众文化．杨全强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9 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 认同的空间．司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0 马克·波斯特 信息方式．范静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1 尚·布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① 特里·伊格尔顿著，《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致中国读者”，第1 2页。

下　编

中西文化的专题比较

第十四章　中西文化与“人”

人在加速自我生产、繁衍、发展！

世界人口1999年10月2日超过60亿！

1999年2月12日在欧洲荷兰海牙召开了国际人口论坛会议。主持论坛的联合国人口基金组织公布了一组数字，引起与会的180个国家和地方的极大关注：全球人口1804年只有10亿，经过一百多年，1927年增长到20亿，随后的72年中快速增长，1999年第四季度要突破60亿大关；目前平均每年增加7 800万人，等于法国、希腊和瑞典人口之和；由于未来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口增长速度将放缓，预计2050年人口约为90亿。联合国1946年设立人口问题的附属机构时主要担心的是，由于战争和疾病造成的死亡可能导致世界人口下降，而如今面对的现实是，60亿人口中有45亿是20世纪增加的。全球人口增长速度过快已严重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人又在不断两极分化和自相残杀：战争、犯罪、欺诈、压迫和剥削……“占世界总人口20%的最富有的人享有全球86%的商品和劳务，而占世界人口20%的贫穷人口仅占消费全球1.3%的商品和劳务。”①

人也在慢性自杀：破坏森林植被，污染环境包括地球和太空……

人到底应当如何认识自己、对待自己，人与人应当怎样互相对待？

创立、提倡、奔走呼号了数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人道主义、人文主义、人权至上等，到哪里去了？

几千年来，每一种文化思想都首先面对：人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人类的正确道路是什么？怎样获得真正的解放和幸福？

人的问题，是一切政治、一切经济、一切文化面对、思考、研究、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应当说，东方和西方（主要是中国和西欧国家）文化都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其中有多少值得研究和继承，以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使世界变得更美好？

从来没有救世主，不靠神仙和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这就是对人类数千年、特别是近五百年人类命运的总结，也是文化史的总结。

① 参见《光明日报》，1999年2月14日

第一节　关于人性与人的本质

是人，都讲人性。人类的学者，更没有不研究或不涉及人性的。正如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所说：人之为人的特征就在于他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①。试问，谁可以跳出这个“人性的圆周”？所以，人类文化典籍之中，关于人性的资料汗牛充栋，而最有代表性的可能是东方儒家的“人性善论”和西方基督教的“人性恶论”。

一、儒家人性理论

“性善论”是儒家人性理论的核心。当然，不是所有的儒学大师都主张“性善论”。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②，认为人性是十分相近的，差异产生于后天不同的学习。孔子之后，告子提出“性无善无恶论”。确立“性善论”的是孟子。针对孟子性善说的缺点，荀子曾提出“性恶论”。但儒学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性善论”始终占主导地位，影响最大。

针对告子的观点，孟子认为：“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③ 在孟子看来，人性尚善如水向下，出之自然，确定无疑。因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④ 这是儒家“性善论”的基本理论，要点是：（1）仁、义、礼、智作为善端人人都有；（2）善端是固已有之，非外力所致；（3）善端是生而有之的自然倾向。这一基本理论经宋明理学家程、朱、陆、王等的弘扬，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其积极作用是：第一，它塑造了以“善养浩然之气”的圣人、贤人为代表的理想人格，垂范于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第二，它维护人的尊严，主张通过对善端的不断补充，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其消极影响是：第一，它必然导致贤人政治，忽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⑤ 就是说，治理国家，

① 恩斯特·卡西尔著《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87页。
② 《论语·阳货》。
③ 《孟子·告子上》。
④ 《孟子·告子上》。
⑤ 《孟子·离娄上》。

重要的不是制度措施，而是治理者的道德修养。第二，它必然导致道德意识的强化和法律意识的淡化。本来，道德的内在良心自律，法律的外在强制他律，二者共同维护社会稳定，不可偏废。但按照"性善论"的逻辑，法律可有可无。即使制定法律，强调的也只是作为德政辅助手段的刑法，而绝对不可能沿着现代意义上的、以维护公民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民法的基本精神相契合的方向去制定法律。"人性善论"是中国人治社会的理论基础，消极影响也很大。

二、基督教人性理论

"性恶论"是基督教人性理论的核心。基督教人性理论与原罪说联系在一起。根据《圣经》"创世记"的叙述，耶和华在创造了世界之后，用地上的尘土造出了亚当，把他安置在伊甸园中，并吩咐他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上帝又从亚当身上取下一根肋骨造成夏娃为亚当的配偶。在化身为蛇的魔鬼的引诱下，夏娃和亚当偷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禁果。"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就用无花果树叶编作裙子"。耶和华得知他们同自己一样能分辨善恶，就把他们逐出伊甸园，任凭他们在大地上繁衍生息。后来又发现"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①。耶和华后悔了，决心用洪水把人类消灭掉，只把挪亚及其后代保留下来。

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而堕落，这被称作人类的原罪。在这里，原罪是一个隐喻，它表明：人类作为亚当和夏娃的子孙，生来就有作恶犯罪意向。而原罪和原罪的解脱之说，就构成了基督教的基本理论和内核，是基督教教义的核心内容，是基督教的伟大真理，"而其他的一切大半只是这内核的包皮和外壳的附件"②。自然，原罪说也是基督教人性理论的基础，主张人的本性是恶的。就是说，原罪不是偶然的，是人的本性恶的必然结果。正因为这样，上帝的存在和上帝对人类的救赎才是必要的。这种性恶论的优点是：第一，既然人人都有作恶的本性，制约人的戒律就是必要的，耶稣对他的信徒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③ 这种对戒律的近乎崇拜的肯定，极易转化为对维护每个人权利和现代民法精神的认可，所以法国《人权宣言》第二条写着"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自然的和不可让与的人权"，就是顺理成章的了。第二，既然人性本恶，一切有权力的人必然滥用权力，政府必须受到权力的制衡。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

① 参见《圣经》，中国基督教协会1998年版

② 叔本华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56页。

③ 参见《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中国基督教协会1998年版

的精神》中写道："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1] 也是顺理成章了。此外，既然人性本恶，上帝和宗教都是不可或缺的。"性恶论"为我们理解《圣经》覆盖下的西方社会的法制传统和西方文化特色提供了一把钥匙。

三、正确认识人的本质

构建新的人性理论　性善论和性恶论，把人的社会属性和人的自然属性混淆起来了。人跳不出动物这个种的概念，正如人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人性（human nature）是指人的自然属性，指人与其他动物所共有的属性，如"食色"方面的自然欲望，是与生俱来的。善恶不能用在人性上。人的本质是后天的，是社会的属性，这种属性才有善恶之分。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社会的动物"、"政治的动物"。能够显示人和动物区别的，不是人的自然属性，而是人的社会属性。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性和人的本质的关系应当是：一方面，蕴涵着人的自然属性的人性是在社会生活中进行创造的强大内驱力，推动人类历史不断向前发展；另一方面，人的社会性，即人的本质要求人类总是要按一定社会秩序关系和文化背景创造出道德、法律、宗教、信仰和政治的规范，给人的自然欲望以及这种欲望在人的社会行为中的体现划出一个适度性。人的行为保持在适度性之内，即是"善"，超越了适度性，即是"恶"。这种适度性的突破和创新，推动人类历史的不断发展。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性善论和西方文化的性恶论，带给我们的启示应当是：改造和超越这两种人性理论，创造新的人性理论，创建新的人类文明。

第二节　关于"人类中心论"及其超越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传统文化自始至终把注意力关注在主体人身上，这就使"自我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中国传统文化，以老庄思想为代表，主张"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宇宙和人生态度，其"非人类中心论"思想，也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

人类中心论的基本含义是站在人的立场上，以人的价值和利益去评判世界。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执著于人而疏远自然，认为人对自然（主体对客体）绝对拥有逻辑上的先在和价值上的优先地位，认为自然世界自身毫无独立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它只因满足人类感官欲望而为人类提供物质材料才获得

---

[1] 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51页。

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而人类中心论，从不重视至少是忽略了自然界与人类在本体论上是平等的生存伙伴，甚至是先于人类存在和哺育人类的母亲；自然界只是人类的实用对象，可资利用的工具，而不是审美的对象。总之，人类中心论评价人类比其他自然物有更高的甚至唯一的价值，因此而被许多学者称之为“生态唯意志论”和“人类沙文主义”。从古希腊、中世纪到近现代，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都坚持“人类中心论”的思想，只是形成的观点不同。想摆脱也摆脱不了。《圣经·创世记》第一章26—27节中写道：“上帝说，我要照我的形象，按照我的样式造人，叫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爬虫牲畜。”人之受造，便是作万物之主。谁敢违抗上帝呢！

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上帝，只有“道”“天”和“命”。《老子》最早论及宇宙的由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①。人的出现包括在“三生万物”之中，“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人居其一焉”，人与天地，勉强平等，而且“排行老四”。老子还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②。人在自然面前要谦卑自持、顺乎自然。不像西方文化中“知性为世界立法”（康德），“自我创造非我”（费希特），“我思故我在”（笛卡尔），人在自然世界面前是那么显赫，那么狂傲。庄子则进一步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③的物我交融的胸襟和境界。老、庄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直接导出了与万物和睦共处的生活态度。人与万物在生成论、价值论上是平等的，无贵贱尊卑之说。人与万物皆取法于“道”，故宜彼此谦恭自持、虚静礼让，最后，又共同归根于“道”。这同达尔文“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残酷竞争大相径庭。

对“人类中心论”的反思和批判已成为当今世界的理论热点。因为近代工业化时代是人类征服自然、获取物质财富光辉灿烂的时代，同时又是“人类沙文主义”狂热的时代，伴随着机器的轰鸣、火车的奔驰、科技的突飞猛进，人类付出的代价是：覆盖地表的森林将被砍伐殆尽，江河湖海将被污染无遗，臭氧层遭破坏，南极冰雪融化、海洋水平面上升，全球气温升高……蓝色的地球被弄得遍体鳞伤。

当然，全盘否定“人类中心论”，就同全盘否定工业化的伟大进程与成果一样是荒谬的。但是，看不到工业化的负面影响，看不到狂妄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肆意掠夺已遭到自然界的严厉反击和报复，更是非常危险的。以为中国老庄思想绝对好，没有历史和现实的消极影响，那也是不对的。但当人类超越

---

① 《老子》第四十二章

② 《老子》第二十五章

③ 《庄子·齐物论》

"人类中心论"时，中国传统文化中老庄思想的资源，作为西方文化对立面，可提供极有价值的启迪和借鉴。

第三节 关于"人权"问题

美国学者费正清（1907—1991）被誉为"西方现代中国学之父"，他在评价中国文化时认识到：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既不同于俄国又不同于美国的社会，是按照它自己的传统和环境在发展的。他还指出：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特殊、最与众不同、最古老，最自成体系、最平衡和伟大的文化。例如对美国当局和西方世界某些人喧嚣不止的"人权问题"，费正清就指出由于东西方文化不同，对人权有不同的定义。他认为：人权的概念，虽然在一个自我标榜的全球宣言中被神化，实际上是受着文化制约的，对中国的谴责，反映出来的是"美国的新宗教"行为。费正清的论述标志着西方人对中国文化认识的成熟。可惜，不少西方人和中国人对此都不甚了了。

"文艺复兴时代提出了人性，法国大革命提出了人权，从文化史的角度看，这无疑是人类自我认识发展的一个新高度。"① 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1789 年法国制宪会议通过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简称《人权宣言》）共 17 条，1791 年经多次修改成为宪法的前言。这个《人权宣言》，在庄严性和世界性方面，大大超过了 1689 年英国国会颁布的《权利法案》和 1776 年北美 13 州议会代表联合发表的《独立宣言》。两百年来，它对世界各国的影响更大、更深远，成为近代和现代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制定宪法时不可缺少的重要参考文献，成为争取和维护基本人权的理论依据。

《人权宣言》首先声明：考虑到对人权的无知、忘却或者蔑视，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而人权是天赋的（自然的）、神圣的，不可让与的，不可消灭的。

《人权宣言》列举了人权的具体内容："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权、安全和反抗压迫。""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动"，它只以保证他人的自由为限度。人是其自身的主人，享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人的自由也表现在获得和占有方面，财产权是天然的永不失效的权利，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人权宣言》强调的另一重要原则是社会平等。"人们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任何人无论出

---

① 罗芃等著：《法国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59 页

身如何都能平等地担任一切公职；必不可少的赋税应该在全体公民之间按其能力平等分摊。

《人权宣言》强调法治，以法律保障自由、平等，以法律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为。为了实行法治，法律可规定必不可少的刑罚，但刑罚不可滥用。除非依据法律，不能处罚任何人。

《人权宣言》的精髓是人民主权原则，贯彻宣言的始终。主权在民，公民整体才是至高无上的。国家的目的是保障公民享受其权利，违背了，公民就反抗压迫。"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全体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由其代表去参加法律的制定。"为了保障人民主权的原则，《人权宣言》规定了下列原则：首先是分权，没有分权就不会有宪法；其次是公民对国家财政和行政管理亲自或由其代表行使控制权，社会有权要求机关公务员报告其工作；最后是国家武装力量的设立乃是为了保障人权的需要。

由此可以看到，《人权宣言》的核心内容是人权和法治，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宣布的新原则，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主义的王权、皇权、神权和种种特权。这是人类文化史上在上层建筑领域的一场伟大的革命。通过这场革命，现代社会、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确定下来了，不可逆转了。这就是"人权问题"的历史真实。《人权宣言》诞生以来的两百年，尽管它在政治上、理论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在实践上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但各阶级、各民族、各现代国家都在根据本身的历史特点实施、完善这些基本原则。没有任何人公开反对《人权宣言》。任何践踏人权的行为都会遭到指责和反对。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人才知道有"人权问题"。此前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中，只有皇权、王权、神权、族权、夫权、特权。我们落后了一百年。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和中央集权制度，我国历史上缺少民主和法治的精神资源。在我国现实生活和文化环境中，还有缺乏人权意识和法治意识的事例，还有过文化大革命践踏人权的惨痛教训。

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依法维护人民的各项权利，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严峻课题和紧迫任务。但来自西方的以下指责和批评则是不符合中国历史特点和现实社会实际的。

其一、不对称的比较。把从孔子到当代的2 500年的中国文化同《人权宣言》以来的西方200年比较或文艺复兴以来的600年比较是不妥的。欧洲经历过由基督教神权和皇权统治的中世纪黑暗时期（6世纪到11世纪初期）①。政教合一、什一税、宗教裁判所等的存在说明那时根本没有民主。

---

① 参见海斯、穆恩、韦兰著《世界史》(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75年版，第4，7页。赵敦华著：《基督教哲学1500年》，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页。

其二，不符合事实的批评。"中国直到近代始终没有形成类似意大利文艺复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那样的人道主义思潮"（一位西方学者在1996年北京"国际人权与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这是不客观的。五四运动是伟大的以"思想解放，人权觉醒"为特征的新文化运动，中国革命是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从1919年到1949年，中国革命进步的知识界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欧洲500年的路，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思想观念的伟大的不可逆转的革新。

其三，殖民主义还是人道主义。在中国，损害西方自由、民主、人权形象的正是西方列强的所作所为。他们每次侵略中国都举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帜。西方人和中国洋奴认为这是向中国输送现代文明和人道主义，我们认为这是侵略，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殖民主义。

其四，人权与主权。"中国人为什么要强调主权?"综观欧洲历史，争人权就是反对教士、国王、封建贵族的特权，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旧中国与欧洲中世纪不同，除了中国的王公贵胄、地主资本家，还有西方国家在中国享有的特权（领事裁判权，也叫治外法权），西方人在中国犯了罪，不受中国法律管辖，上海外滩公园和法国公园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了"三等公民"。西方人经常忘记这一点，中国人忘不了：没有主权，哪有人权！塞缪尔·亨廷顿认为："西方军队的组织、纪律和训练方面的优势……也促进了西方的扩张。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①

其五，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中国人为什么总强调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我们强调国家、人民、民族要团结。我们强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结合"、"权利与义务结合"，以巩固团结和稳定的局面。在理论上，这是弥补了《人权宣言》只讲个人的人权，而不讲集体的人权、只讲权利不讲义务这个缺陷。从自身经验出发，"一盘散沙"的中国只能任西方列强和日本军国主义者任意欺凌和宰割，独立解放之后如不团结一致，也难摆脱贫穷落后，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我们承认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或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我国出现过不尊重个人自由、不尊重个人利益的问题，这是事实，必须改革。今后，要在不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的前提下，更多地尊重个人自由和权利。至于我们反对的"个人主义"，是指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利己主义的思想行为，这在西方也是被反对的，它同《人权宣言》所昭示的不损害他人的

①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个人自由平等和人权，完全是两回事。而以此为据，谈东方文化是集体主义的，西方文化是个人主义的，那是南辕北辙，至少是不准确的。

在人性、人类中心论和人权问题上，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其优势与不足也是明白可见的。沟通、交流对话，做到真诚和平等，是唯一正确的途径。西方人心存偏见把中国当作“异教徒”的时代应当早就结束了。只有这样才利于东西方在人性、人权等问题上的相互促进与发展。

参考资料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李庆 中国文化中人的观念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3 罗芃等．法国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道主义．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

5 李泽厚 世纪新梦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6 不要用中世纪对待“异教徒”的方式对待中国．文化研究．1997（1）

7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特点 文化研究．1998（11）

8 霸权主义的理论根据 评所谓“人权高于主权”．光明日报，1999-05-28

第十五章　中西文化与人的思维方式

这里的思维，是指理性思维的过程，即人脑对客观事物间接的和概括的反映。思维包括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通常指逻辑思维，即人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把丰富的感性材料加以分析和综合，认识不能直接感知到的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思维是反映客观事物的能动过程，它既能动地反映客观世界，又能动地作用于客观世界。这是人类思维过程的共同规律。这一规律本身并不因为国家、地区、时代、民族和文化的不同而改变，但它起作用的方式，却随着国家、地区、时代、民族的不同，特别是随着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传统文化给予人们思维方式的不同影响十分明显和突出。

第一节　"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

贾长臻在其《中国理学史》的"序言"中生动地描述了中、西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特点："总而言之，中国人和西洋各国人不同，中国人看见鸟反哺、羊跪乳，而想到怎样事亲？看见鸿雁行列，而想到怎样敬兄？看见鸳鸯交颈，而想到夫妇爱情怎样？看到迅雷烈风，而想到怎样敬天之怒？看到地震山崩，而想到怎样修省斋戒？他的'格物致知'是属于理学的。西洋各国人不是这样的，他们看到果子从树上落地，就发现地心引力；看见热水壶盖蒸而掀动，就发明蒸汽机关；看见摩擦生电，就发明电气机关；又从枪炮战争而发明毒气战争；从海陆战争而发明天空战争；他的'格物致知'是属于科学的。双方怎能相提并论呢？"[①] 这里的"格物致知"就是指思维。这段话生动地说明了"天人合一"和"主客二分"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差别。在这篇"序言"中，作者还列举了从孔子到明清之际中国思想文化倡导"天人合一"的这一特色，并强调说："拿西洋的哲学史来比较，什么叫宗教派、神学派、经验派、形而上学派、观念论派、实在论派、直觉论派、功利论派、进化论派，无论怎样说法，天道和人道终究说成两橛，不能合拢一起，

---

① 参见贾长臻著：《中国理学史》，上海书局1937年版，"序言"

怎能和中国理学相提并论呢?"① 他着重指出从中世纪到现代，西方思维方式一直坚持“主客二分”的历史事实。

199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大学教授张世英所著《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一书，及学术界的其他研究成果，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哲学方面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使得人们的认识可以进入更科学、更清醒的新阶段。

一、人类思维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基本方向

根据目前已经达到的研究水平来看，大体上可以说，人类思维发展史的基本线索和基本方向是从主体与客体浑然一体（如“天人合一”），经过二者的对立（如“主客二分”），到要求达到二者统一以至更高级的主客浑一的历史。因为人的思维发展史首先是人脱离动物的历史。人之不同于动物从某个角度来说，在于动物不能区分主体与客体，在动物那里主体与客体浑然一体，故动物无主体可言。把主体与客体分离开来，对立起来，才能意识到自我，才谈得上主体，而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个人从出生达到自我意识的时间只不过以月计，从婴幼时期、青壮时期到老年时期，毕竟是短暂的、有限的，而整个人类思维的发展，或一个国家、民族思维的发展，由无自我意识或不自觉的阶段到有自我意识或自觉的阶段则往往要以百年计或千年计，是长期的。

二、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

整个人类思维的发展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好比一棵永不枯朽、永远欣欣向荣的大树。各国、各民族思维的发展是这同一棵树上的枝、叶、花、果。对各国、各民族思维发展，既应作横向的比较，又应作纵向的比较。横向比较主要是静态地比较各国、各民族思维方式的特点和异同；纵向比较是动态地考察各国、各民族思维发展在这棵大树上所处的历史地位、发展阶段及其贡献与不足。而纵向比较比横向比较更有意义：（1）只有纵向比较才能找出思维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基本规律；（2）只有把各国、各民族的思维发展（哲学思想）放在整个人类思维发展长河中，才能看见各自的生命力和价值，反之，抽象静止的比较研究很难确定其生命力和价值；（3）比较研究不是为比较而比较，而是应当指出各国、各民族今后思维发展的方向，只有纵向比较才能做到。

三、中西思维方式发展的纵向比较

笼统、静态地讲中华民族思维方式以“天人合一”为基本特点，西方各

① 参见贾长臻著《中国理学史》，上海书局1937年版，“序言”。

民族思维方式以"主客二分"为基本特点，是不够准确的，没有意义的。

在古代，中国的先秦、两汉和西方的古希腊、罗马时期，人们的思维方式都同时具有"天人相分"和"天人合一"的特点。（这里的"天"指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世界，人指认识的主体。）

中世纪（相对于中国的隋、唐、宋、元时期），基督教哲学统治欧洲，长达1 000年之久，这种哲学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是分裂主体与客体，重视的是彼岸世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表现为天（神）和人的对立、灵魂和肉体的对立、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的对立。人的精神 灵魂在天国中、在宗教生活中与神合一，构成主体的一方；反之，人的自然和肉体的方面以及外部自然界则构成客体的一方、而与神处于对立的地位。但中世纪神权统治了人权，统治了自然，人作为思维的主体被压制了，自然科学也因而被压制了。这种主客分裂和神的无上权威，有一个符合逻辑的、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使它足以提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与此同时，中国仍以儒学为正宗，虽有道教、魏晋玄学和隋唐以后的佛学渗入，创造了新的文化辉煌，但都缺乏彼岸世界的观念，追求的都是现实世界的不朽。佛教虽有把肉体和精神分离的观念，但遭到了儒家的反对。人的思维仍然束缚在"天人合一"的观念和"君君臣臣"的礼教之中。

文艺复兴使欧洲各民族先后从基督教哲学的冬眠状态下觉醒，神权统治下的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同时解放。两者互相为用、互相促进。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从此获得了完全的意义。人、作为思维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和独立自主性的主体，高高站起来了；自然也重新被重视了。人对自然的研究（不是对神和天使的研究）重新被重视了。不仅对人直接有用的应用科学，而且纯科学、纯知识也被重视。作为思维的主体，人的主体性丰富、发展了，自然科学和其他科学也丰富、发展了。由于人利用自然能力丰富、发展了，经过数百年的曲折和奋斗，欧洲各主要民族同时站到了人类思维和科学技术的两个高峰上。与此同时，在中国，程朱理学仍居统治地位。主张"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①]，"当处便应取，更不可外求"[②]。反对外求于天，外求于自然，并无主体与客体、精神与自然二分，并进而克服客体之意；还主张"天地人只一道也"，"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③] 不求知天，但求知人，知人即知天，这实际上是闭目塞听，与自然隔绝，当然也就抹煞了人的主体性。而且程朱理学讲的理，实际上是封建社会所说的道德原则、天人合一就是叫人顺从封

① 《正蒙·诚明》。

② 《朱子语录》二十。

③ 《朱子语录》十八。

建道德原则的天理，束缚了人的主体性。明清之际，虽有王夫之、颜元、戴震等思想家，提出了“重人为、重形体、重事功”的观点，他们倡导“以人道率天道”，人能“官天府地，裁成万物”，反对专事虚静养性、绝情去欲，主张达情遂欲，认为欲而不私，则遂己之欲亦遂人之欲，达己之情亦达人之情，具有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以后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思想色彩，具有西方近代哲学中思维主体性的特征，但论证很不详密，没有完成和走到“发现人”、“发现自然”的地步，没有能够突破“天人合一”的束缚。中国人要突破这一束缚，只好向西方去寻求真理。

只是到了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才真正出现了相当于欧洲的文艺复兴，五四运动时期“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口号颇似欧洲文艺复兴中人的发现与自然的发现：唯其发现了自然，才注重科学，注重“赛先生”，唯其发现了人，才注重民主，注重“德先生”。八十多年来，中国人抛弃“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接受西方“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在人的解放、社会解放、科技创新的道路上速跑，缩短了同西方的差距。有些方面，还走到了西方的前面。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中国思维方式“西化”的过程就是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进程。

四、“西化”和“东化”以及人类思维发展的新超越

当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接受“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的时候，又正是西方人“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优越性走到顶点，出现弊端的时候。“主客二分”思维方式和主体性原则使人一味向自然过分索取，与自然作战，无穷追逐，遭到自然界的反击和报复，最后还得不到心灵上的安宁和自由。有了科学，也有了民主，但却失却了自由，这是为什么？就是说，“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给西方人带来了好处，也带来了弊病。好处是：抛弃了教会神权控制一切的局面，使西方世界科学昌明，物质文明发达，民主得到弘扬；弊病是，它又另外铸造了一个“上帝”——“超感性的形而上学的主体世界”，这个“上帝”以新的形式压制了西方人的自由和个性发展。后现代主义者已开始批判“主客二分”。于是，当中国人强调抛弃“天人合一”的时候，西方人却反而悟到了类似中国人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悟到了人与物、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如果，把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自明清之际，经五四运动，对西方“主客二分”的学习和召唤叫做“西化”，那么，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发生的转变，是在向中国传统思想方式靠近，就可以叫做“东化”。

面对这个“西化”与“东化”同进并存的人类思维发展阶段，中国人怎么办呢？哲学家们的结论是：“中国哲学的发展前途是既要召唤主客二分和主体性，以发展科学，发扬民主，又要超越主客二分和主体性以达到天人合一、

人与自然交融的高远境界。没有主客二分和主体性精神，就没有科学，没有民主，没有现代化，但若停留于主客二分，则终因主客彼此外在，彼此限制而达不到心理上的自由。这种自由只有在人与人的交融、人与自然交融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中才能获致。这种自由高于政治的民主给予的自由，高于获得科学上的必然性的自由，也高于道德上的自由。这里的关键在于超越，即超越主客二分，超越主体性。……中国传统哲学既需要向西方近代哲学西化，又要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东化'联盟。"超越"是哲学的最高任务"，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需要。

人们可以预期，在思维与存在关系上，由于中西文化不同而形成的差异，在未来人类思维发展的过程中，因为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必然互相取长补短，实现融合与超越。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有可能促进这一超越。但民族性、民族国家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不会消失，不同文化对思维方式的影响也不会消失。超越之后，又产生新的差异，出现新的超越。各民族将长期面临着如何站在时代思维的高峰的竞争。为此中国人具有双重的任务，也会有双倍的收获，只是要付出双倍的努力。

第二节　情—理—法与法—理—情

社会心理学、法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表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的特性、程序和旨趣是情—理—法；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特性、程序和旨趣是法—理—情。两者正好相反。

社会学家认为：人与人的互动过程中，自我调节与作用过程乃是行动者的思维过程。在思维过程中，行动者将文化模式与本我契合，有选择和一定程度地将文化模式之价值内化于人格的需要——性情结构，并且，在思维过程中，行动者不断地表达源自本我的动机，相互满足各自的需要，彰显各自的性情，并将本我衍发的内容不断取得共识而纳入文化模式之中。简言之，一定的文化模式通过内化于人的性情结构而影响人的思维方式；人的思维方式通过行动的衍发体现一定的文化模式。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精耕农业的生产方式使家族成为维持生存必要的、基本的社会单位，家庭成为中国人生活圈中的社会环境的主要部分。家庭成员与家庭经济利益上是一致的。这种经济利益上的一致，为家族主义提供了第一个基础：利益基础。发之自然的，并且经过长期共同的生活而日益深厚的血缘亲情，为家族主义提供了第二个基础：感情基础。在利益基础和感情基础之上，经历长期的发展与文饰，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家族伦理。家族伦理蕴涵很广，涉及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其基本思想是：宣扬家族为重、为主、为先，个人

为轻、为从、为后的集体主义。这种限于自己家族之内的集体重于个人的伦理，是一种内团体的（in-group）非普遍性的集体主义　有的学者称之为"家族集体主义"。家庭以外的团体，如私塾、诗社、会馆、村庄、乡党、郡县、国家、天下等，为数较少，而且大多数人一生之中参与这些团体活动的时间远远少于家庭活动的时间。因而在参与家庭以外的团体或组织活动时，他们会自然地将家庭中的结构形态、关系模式及处世方式推广或带人家庭以外的团体组织。也就是说，在家族以外的团体或组织中，中国人会参照家族主义的法则而动。这种延展到家族以外团体组织中的家族主义被学者称之为泛家族主义。在传统中国这种社会组织的背景之下，中国人以家庭中的经验为基础，并经过家外组织中与人的交往和契合，形成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合理性（reason）是情理，这种思维方式的合理模式可概括地表述为："发乎情，止乎礼义"。这是一种情理交融的思维方式。

在情理化的家人之间的互动中隐含着交换的公平。而且正因为家人之间经济利益的长久、稳定的一致性，有家人之间的亲情为基础，极能淡化彼此之间的利益的算计，强化彼此之间的安全感、归属感和信任感。人们在这种温情脉脉的体验中完成可能是冷冰冰的交换。

在情理思维和行动中，对自己家人，这扇门是敞开的。对家外人，有了接触的机会，经性情契合与利益权衡的"熟悉"的过程，这扇门可以一定程度地打开。这时，双方有一定程度的家人似的情感沟通，亲切地称为"自家人"或"自己人"，相互间体验到某种程度的家人的安全感、归属感和信任感。对任何无直接和间接交往机会者，感情的大门关闭，彼此以"陌生人"或"陌路人"相待，互相没有安全感、归属感和信任感。这样，由家人到熟人再到陌生人，人们的情感程度不同，关系亲疏有别。这种以自我（ego）为参考点向外一圈圈扩散（愈向外愈疏）的类似同心波纹的人际关系网，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称之为"差序格局"。根据这种情理思维的旨趣，情理体验的实质高于规范、准则的形式，认为法律、法规只适合用来与陌生人之间的理智交往，而在家人、熟人之间依情理交往时，法律、法规就可以例外，可以"灵活运用"。也就是说，中国人与亲人、熟人交往时依据的是情理思维，以特殊主义原则来对待；无论从交往机会，还是从交往的重要性上，亲人、熟人都是传统中国人交往的主要对象。既然对交往对象采取了特殊主义的对待原则，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就少有可以实际地运作的普遍主义的对待原则。当一个人被以"公事公办"的方式对待时，他已经被置于不公平的境地。

西方传统思维不是情理思维，而是理性思维，或称认知思维。这种思维重视的不是情感，而是理智。这种西方理性思维起源于古希腊城邦的公共生活之中，首先表现为政治理性。因为古希腊城邦中的"公民"　私有财产所有

者，经常要举行全体会议或“代表会议”，讨论城邦公共生活的重大问题。城邦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成为人们思维的一个实证对象。“智者们”试图为这种公共生活找到公众可以理解的秩序规范，而且是具有数量和尺度的规范，从而形成了古希腊的政治理性。这种政治理性，是古希腊社会组织形式的必然产物，也是一种城邦群体生活的伦理，它把公共生活视为人类活动的最高境界。没有这种政治理性和群体生活的大众的伦理，人们之间的交往就无法进行。这种理性和伦理，促进了西方哲学、数学和科学的发展。文艺复兴后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西方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过程，现代西方社会中的合理性就是手段—目的合理性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这种工具理性体现于规范和制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形式，就是法律和制度。人们在交往中，首先要思考的是合乎法律和制度与否，这既是西方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又是人们的信仰和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从古希腊的政治理性到科学发展，直至现代西方社会的工具理性，贯穿和渗透在西方人思维方式之中，故称之为理性思维方式。

这种理性思维方式同中国人情理思维方式最大的不同是，在思维过程要求把主观感情、意愿排除在外，做到感情中性（affection neutral）和价值中立（valuefree），将思维对象客观化或数量化，并依据客观化和数量化的程序去加工和处理思维对象。计算机就是这种思维的模拟和产物，计算机的信息加工过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思维的过程。

这种思维过程有着三个明显的特点：（1）思维对象客观化是前提。无法客观化的东西不可能成为理性思维的对象。在人际关系领域里，法律和制度可以客观化，感情不可以客观化。因为客观化的典型和极至方式是数量化。（2）思维过程的程序化（即思维对象客观化和数字化的程序），是进行思维的道路和依靠。（3）思维结果的衡量标准是效率，即提高程序处理信息的效率。

从上面描述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偏向是，将融合一体的情感体验本身当成一种合理性追求；西方人思维方式的偏向是把逻辑化和数字化的程序本身当作一种合理性追求。当然，两种思维方式的异同不是绝对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还有《老子》的道家智慧、《孙子》的兵家智慧和《韩非子》的法家智慧，他们倡导的清醒冷静的思维过程，所追求的旨趣与情感体验的追求有所不同；而西方世界从古到今也有倡导重视意志、情感的思想家。

问题在于现代中国人，要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和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对我们的经济变革、制度变革、思想变革所起的作用，对于塑造现代中国人的性情结构——民族性格所起的作用，包括起作用的领域和方式、正面与负面、过去与未来。总结和研究的重点应该是道德与法律。

第三节　道德化的法律与法律化的道德

关于中国与西方道德法律文化之间的比较，有的学者指出，中国的传统是“道德化的法律”，以道德为本位，将法律纳入基本道德规范系统；而西方的传统是“法律化的道德”，以法律为本位，一件事是否道德取决于是否合法。中华文化或东方文化强调的是群体性利益，通过道德规范强调个人不能为私利损害群体利益或他人的利益。西方文化重视的是个人权利与利益，运用法律手段保护人们的“自由”不被他人侵犯、维护的是个人权利的“正义”。这是各自延续了千百年的文化与社会传统。今天这两个不同的传统之间相互简单的抄袭引用是不可能的，而且在我国体制改革和文化重建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冲突。所以，寻求法理社会中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和谐，把中国传统道德与产生于西方且已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现代法律之间的矛盾，在中国的新社会场景中妥善地予以协调，这才是我国法治建设的真正基础。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现代化法治建设，决不仅是在立法机构通过一些抄自西方而我们自己并未深入理解的法律条文那么简单。

西方文化崇尚个人的自由，而“建立自由的仅仅是法律，甚至仅仅是基本的法律”，“自由是做法律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这种观念随着西方的小说和电影也正渗入中国一些民众的意识当中，“只要我不触犯法律，就无可指责”，这种观点就是西方法律文化进入中国社会的表现，而这种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互相抵触的。但是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与深化，西方法治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渗透是不可避免的，简单地对之批评排斥也解决不了问题，比较明智的做法是对中国和西方两种传统法律文化和道德规范都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历史地看待它们的发展，寻找两者之间的共性与各自的特点，从中探讨两者之间沟通对话的途径。例如我们在分析美国社会、美国政治和外交时不能使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与思路，否则一系列文化误解必然会导致不必要的外交冲突，所以需要理解美国文化、法律与社会制度，反之亦然。这是在与美国打交道、进行外交与文化交流时需要关注的。但是最为重要的，还是对中国社会内部传统道德规范和法律文化的重新整理，对外来法律文化的影响、中国道德与法律在未来发展的前景等问题进行系统的深入的调查研究。这是今后一个时期内中国社会特别是法律和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从事的重要工作之一。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知道我国传统道德规范与法律文化在今天还保留了多少、其内容和形式有无重新恢复或部分恢复的必要与可能性；建国以来实行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未来将如何发展；西方法治文化在我国影响到了什么程度。同时，需要在动态中观察与分析二者之间如

何互相作用，分析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

但是无论如何，已经发展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将会延续，在今天如此广泛深入的对外文化交流中，这个传统文化需要深刻地检讨自身，需要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既不能墨守成规，也不能“全盘西化”。当前中国社会体制（各种体制）处于迅速的变革之中，利益群体的重组、社会财富的分配、人们的社会流动等也都随之处于动荡与迅速变化之中，由于对外文化交流所引起的文化与观念的冲突，使这一切更加复杂化。为了社会的稳定和人们心理的调整，我们需要重建中国社会的主体文化，需要重建在国家法律和习惯之外的、根植于广大民众的内心的一种民间的道德规范，来引导和约束人们的日常行为。这一民间道德规范，可以通过探索其历史根源而再生，因为历史地、客观地分析中国传统社会道德的内容、形式和精神，对建立新的道德规范和约束机制，是一个重要的借鉴；这一民间道德规范，也可通过外来文化的进入而嫁接。不管是哪种情况，政府为其提供的生存空间和选择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

参考资料

1 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2 贾长臻．中国理学史．上海：上海书局．1937

3 徐冰．情理与审查——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之社会心理学阐释．社会学研究．1999（2）

第十六章　中西文化与战争

战争是生死存亡的较量。国家、民族、阶级和各政治集团的力量、意志、智慧和性格，在战争中得到充分的检验和发挥，所以，人们把对待战争的态度和观点，以及军事著作和理论等，称之为战争文化。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美国经历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之后，对东西方战争文化的研究，愈来愈成为各国军事家、政治家、文化学家不容忽视的课题。

第一节　《孙子兵法》与《战争论》

有史以来，在世界各民族中，中华民族的兵书最多，军事理论最丰富、最完善。仅日本国就保存了我国兵书一千一百多部，比中国人自己保存的还要多。但中华民族又是民族性格最内向、最坚忍、最不好战的民族。中华文化是人类唯一的没有被战争毁灭而中断、绵延达数千年之久的奇迹。

享誉世界的《孙子兵法》(《孙子》)，已成为全球一切有修养的军事家、政治家的必读书，其哲理甚至也为有成就的经济家和企业家所倾心。20 世纪下半叶，抗美援朝战争和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结束之后，《孙子兵法》同《毛泽东军事理论》一起，成为美国西点军校和各国不少军事院校的必读教材。《孙子兵法》一书已译成英、法、德、俄、日、捷等三十多种文字，达四百余种版本，流传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公元前 5 世纪问世的《孙子兵法》，2500 年后，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何以还能风靡世界军事界？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关于战争性质的界定和"用兵之法"准确、深刻地阐明了战争的普遍规律。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①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② "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

---

① 《孙子·计篇》。

② 《孙子·形篇》

兵，善之善者也。"[1]

知战、善战、慎战，这是贯穿《孙子兵法》全书的光辉思想，是中国传统军事理论体系的核心，是中国军事文化或战争文化的奠基石，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

如今，伴随军事高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奇怪地发现，一直迷信高技术武器装备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古代兵法的研究兴趣愈来愈浓。对此，一位美国陆军准将解释说：《孙子兵法》是世界最古的兵典，言简意赅，以阐述基本原则为主，其中许多战略、战术在两千年后的今天，即现代战争条件下仍能适应，对指导战争的实施很有价值。[2]

美国的军事家们承认，正是《孙子兵法》一书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让他们这个军事强国改变了核战略的发展方向。因为自广岛扔下第一颗原子弹以后，他们发现自己犯了致命的错误：发展核武器的目的，不是消灭人类，而是威胁对自己有威胁的人，达到不战而胜的结局。因此，他们在认真研究与自己相抗衡的苏联核武器发展后，制定出所谓"孙子式核战略"——"不付代价取天下"。中国传统的军事文化在西方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在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各国，还有一本军事经典——19世纪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所著《战争论》。在西方，它与《孙子兵法》齐名。可以说是西方战争文化的最高成就。但在东方国家，除了现代军事专家和指挥官，人们对它所知甚少。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usewitz）1780年6月生于普鲁士马格德堡附近布尔格镇的一个小贵族家庭。12岁时当步兵，13岁参加普法战争，15岁升为少尉，21岁至23岁被送入柏林军官学校深造，毕业后成为奥古斯特亲王的副官，并开始研究军事理论。26岁时，即1806年10月他随亲王参加同法国作战，退却时被法军俘虏。1807年他被释放回国，力主军事改革，1809年进总参谋部，次年30岁升为少校，并与一位伯爵女儿玛丽结婚。1812年他去俄国参加反拿破仑战争，在俄军参谋部任职。1815年他回国，任军参谋长。1818年他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致力于《战争论》的著述工作达12年之久，尚未修订完毕，即调任炮兵总监，同年又调任军团参谋长。1931年克劳塞维茨因霍乱逝世。他死后，其妻玛丽整理出版了《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遗著》，共十卷。而《战争论》是其中的第一、二、三卷，本书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1978年译出，始有中文版，共73万字。

《战争论》是一部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经典著作。在军事思想上反映了资

---

① 《孙子·谋攻篇》

② 《中国兵书在国外》，《解放军报》，2000年1月、转引自《羊城晚报》，2000年1月27日。

产阶级初期的进步倾向和革新精神。对战争的本质等问题提出了正确的见解，对军事思想的发展曾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至今《战争论》仍被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所研究和推崇。

恩格斯在1858年1月7日致马克思的信中说："目前我正在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哲理推究的方法很奇特，但书本身是很好的。"① 列宁曾多次引用该书中的一句名言："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列宁同时还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一向公正地把这一论点看作考察任何一场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就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察各种战争的。"② 因此，《战争论》不仅对我们了解西方资本主义时代军事理论有很大帮助，而且也是研究一般战争问题的必读书。

把《孙子兵法》和《战争论》相比较，可以看出东西方两种战争文化异同的基本点：两者都对战争作了全局性研究，但《孙子兵法》从"道"，即人心向背、"天"（天时）、"地"（地利）、"将"（指挥）、"法"（法纪）等诸方面进行综合考察，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而《战争论》则重在考察战争本身，只强调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两者都强调军队建设，但《孙子兵法》要求以"智、信、仁、勇、严"五个标准衡量将帅，带好军队；而《战争论》则重在操练方案、方法和物质装备方面。两者都重视战略、战术，但《孙子兵法》多论普遍原则和普遍规律，提倡"兵贵速，不贵久"，"知己知彼"，"不战屈敌"，"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兵以诈用"等；而《战争论》则突出"军事艺术"、"胆量"、"坚忍"、时间和空间上的"兵力集中"，"主力会战"的战术，包括"会战失败后的退却"和"夜间战斗"的特征，等等。在论述风格上《孙子兵法》十三篇，共五千九百字，简明而深刻，为学者和运用者留下了思考和创造的广大空间；《战争论》三卷八篇，一百二十四章，卷帙浩繁，论述细致，便于具体运用与操作。虽然这两部军事经典，都研究了战争的一般规律，都富有哲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孙子兵法》并不因为时代久远令人感到生疏，反而令人神往、受到启迪；《战争论》因接近现代战争，使人易于亲近，感到实用，但由于军事技术的重大革新，其许多具体方案、规定和原则，局限性反而愈来愈明显。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共留下了约三十万字的关于战争、军队和战略战术等方面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珍贵遗产，而在传统上仍属于西方军事文化。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遗产，集古今中外东西方军事理论之大成者是毛泽东。全世界和全中国人民，包括朋友和敌人、政治家和军事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4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5页。

都承认：在实践上，没有人像毛泽东指挥过那么多、那么长时间、那么大规模、那么复杂、那么残酷的战争并夺取最后的胜利；在理论上，也没有人像毛泽东那样在关于战争的性质和规律，关于战争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关于战争与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关于军队建设与作战的指导思想，关于战略战术的基本原理，留下了富有系统性、包容性、批判性、深刻性的科学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英军统帅蒙哥马利多次访问新中国后说，现代战争的一条戒律就是：不要进攻中国。我想这位西方军事文化的杰出代表可能是读过并且读懂了《孙子兵法》和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作为中国人应继承和发扬《孙子兵法》和毛泽东军事理论，不仅要研习军事理论，而且要研习现代世界的战争规律。

第二节　战争与人类社会新文化

我们反对战争，热爱和平。战争可以毁灭文化，但战争也会产生社会新文化。

列宁说：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常常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必然要经过长久的阵痛的。恩格斯分析世界战争的种种结果时，简单明了地描写了一个不容争辩的明显事实，即紧跟着战争而产生的、同战争相连的革命（尤其是——我们还要补充一句——在战争时期爆发的并且不得不在包围它的世界战争时期生长和支持下去的革命）是特别困难的分娩。恩格斯清楚地认识到这个事实，特别慎重地说到在世界战争中死亡的资本主义社会会产生出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说，只有一个结果（世界战争的）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造成条件。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从上述关于社会变革阵痛的两则经典论断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推论：

第一，新社会的诞生都要经过阵痛，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要经过长久的社会阵痛。

第二，战争，同战争相连的革命，就是一种旧社会向新社会过渡的社会阵痛。

第三，战争和革命的阵痛产生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制约新的社会文化的发展。

关于战争与新文化的关系，在古往今来众多的政治家、军事家中，似乎再没有人像马克思和列宁这样作过科学的探索和论述，并得出过这样积极的

结论。

归根结底，一切战争是压迫者、剥削者和侵略者挑起来的，而压迫阶级、剥削阶级和侵略集团与势力的代表人物，总是歪曲战争与文化的关系，他们或者硬说文化的差异是造成战争的根源，或者认为战争只能毁灭文化。那些战争的制造者同时又往往是战争的恐吓论者和悲观论者。历史唯心主义者总是跳不出这个怪圈，东方和西方、中国和外国都一样。

归根结底，一切战争灾难和痛苦的承受者是人民，是被压迫阶级、被剥削阶级、被侵略者。人民，是天然的反战论者和天然的反战力量。但当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武装了人民，武装了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和被侵略者，并且他们宣称只有消灭压迫、消灭剥削、消灭侵略者，才能最后消灭战争时，那些掌握庞大战争机器、动不动以战争威胁人类和平的战争大亨们，却指责人民是“好战分子”，是“世界不安宁的根源”。这在东方和西方、中国和外国也都一样。

20世纪是战争与革命的世纪。健忘、有意忘记或蓄意掩盖，都不能否认鲜血淋漓的历史真实。冷战与热战都是战争。和平与发展是被压迫者、被剥削者、被侵略者即弱者的美好愿望。世界恶霸的穷兵黩武和好战成性都在不断提醒善良的人民放弃幻想，准备以正义战争对付战争的罪恶。不要战争，又不怕战争，随时准备以正义战争粉碎非正义战争，伴随着压迫者、剥削者、侵略者的衰竭将是新世界、新社会、新文化的曙光，这是善良的人民和一切有正义感的人们的逻辑。东方和西方、中国和外国都是一样的。

中国当代一位东方文化专家说：“是文化使人们形成了偏见，互相敌视和仇杀。在人类历史中，因为文化的差异、偏见或傲慢所带来的动荡、战争和各种形式的龃龉实在太多太多了，和平、发展、幸福几乎被人为的文化冲突断送殆尽。”[①] 我是不赞同这种理论的，这种理论是不可相信的。

尤其不可相信另一种理论：“这个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危险的冲突不是在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之间的冲突”，“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方寻求一种霸权地位”，“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②]

在这里，东方的教授和西方的教授、东方的文化专家和西方的政治学专家站到一起了。他们共同论证：战争的根源是“文化冲突”。不同的是，那位西

---

① 《21世纪中国教育的文化使命》，见《中国教育报》，2000年4月15日。

② 参见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页。

方专家由此推论中国的崛起是“战争的潜在根源”，而这位东方专家由此推论“必须竭尽全力从小培育青少年儿童学习经由文化对话而不是对抗的途径达到文化理解的目的。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在这里，这个关系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问题，我们已不能要求这两位专家提供真理和事实。只能在他们之间比较，哪一个错得更少些。

参考资料

1 毛泽东选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孙子兵法．北京：中华书局，1981
3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 中国古代兵法精粹类编．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
5 中国兵书在国外．羊城晚报．2000－01－27
6 21世纪中国教育的文化使命．中国教育报 2000－04－15

第十七章　中西文化与知识经济

当我们还在传统的农业经济条件下为解决亿万人的温饱和小康而艰难跋涉，为实现传统工业化目标而拼命奋斗的时候，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已经在西方世界兴起。一种全新的经济正在形成、发展，爆发性地向全球扩张，也有人说是“悄然兴起”。这就是知识经济，也有人称之为智能经济。

“知识经济”的内涵是什么？它同传统的“工业经济”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它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它同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如何，离得很远还是就在眼前？国内外有不同的认识。中国人为了不重蹈“落后就要挨打”的覆辙，对“知识经济”的宣传这几年升温到可以点火。1998 年春天，一位热衷于知识经济的学者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接通了因特网（internet），通过一个网址查询网站“雅虎”，用关键词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查询网上相关文献，一下子返回了 1960 篇文章。截止到 1999 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已出版了“知识经济丛书”计 16 种，其中《知识经济》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日报和中国科学院有关人员编选了国内外国家领导人和专家、权威人士的文章 101 篇，计 47 万多字，自称“基本涵盖了国内有关知识经济的文献内容和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这几年在关于知识经济的探讨和宣传中，人们推出了三个新的概念：知识经济、信息高速公路、数字化地球。

知识经济是世界经合组织（联合国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英文简称 OECD）于 1996 年开始使用的名词。这一年，世界经合组织发表了一份年度报告，题目叫《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简称为“知识经济”。知识经济认为，知识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源，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该报告指出，在世界经合组织的主要成员中（实即主要发达国家），知识经济所创造的产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0% 以上。迄今为止，关于知识经济的各种阐述，皆以此为基本依据。

信息高速公路的正式名称是“全美信息基础设施”（NII），是美国克林顿政府于 1993 年上台时提出的计划。其目的主要是建设一个遍布全美的高速光纤通信网络，其末端将要伸入美国的每一个基层单位、每一个家庭，构成四通八达的通信“交通网”。克林顿政府上台后不久便正式开始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并一直支持发展信息产业，特别致力于因特网的改进和普及。其一系列措

施使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失业率降到24年来最低点，通货膨胀率降到30年来最低点，把原来咄咄逼人的日本和西欧国家抛到后头。这一经济发展战略被誉为“网络新政”。它也为知识经济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

数字地球就是把地球上各个角落所有的信息都收集起来，按其地理坐标进行加工整理，然后存放起来。这样做，既便于看清各种信息的有机联系，又便于检索利用，所以数字地球是在信息爆炸年代充分利用信息的有效手段。正如有了公路就需要有载人载货的汽车在其上奔跑才有充分的效益，有了信息高速公路就需要尽可能多的又便于利用的信息，所以建立数字地球是顺理成章的。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信息高速公路正在建成、知识经济的特征最为明显的美国，各种建立数字地球所需要的高超技术的水平已达到要求，1998年1月美国副总统戈尔在一次演讲中第一次提出了“数字地球”这个新概念。

由此可见，知识经济是根本，信息高速公路、数字地球是手段，是为了发展知识经济所需要的手段。搞清这三个新概念，是了解知识经济的基础。而这三个新概念的陆续出现，都和近二十年以信息技术为首的高技术应用不断扩大、影响日益深刻有关。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人们对未来经济提出了许多说法，先有美国的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出“后工业经济”，奈斯比特1982年在《大趋势》提出的是“信息经济”，再有英国福斯特1986年在《高技术社会》中提出的“高技术经济”，1990年联合国研究机构提出的“知识经济”概念。1996年经贸组织（DECD）在国际组织文件中首次正式使用了“基于知识的经济”（knowledge based economy）这个新概念，并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作了界定：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1997年克林顿（可能是在世界各国领导人中首次）提出“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是对经合组织报告的发展。1997年6月23－25日在全球知识大会上主要讨论全球知识经济的发展。1998年世界银行报告的核心内容也是知识经济。

如果说知识经济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一样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形态、独立的社会发展阶段，那么根据政治、经济、文化必须均衡协调发展的规律，知识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形态与之相适应呢？它同文化发展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它同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会出现怎样的互动演变呢？

第一节　知识经济与文化“断裂”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决定因素的形成和其作用的实现，关键不取决于知识本身，而取决于知识的创造、加工和运用。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无可置疑地在知识经济时代处于举足轻重的地

位和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知识经济时代，不仅意味着生产力的突飞猛进，而且意味着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和完善，意味着民主法制更加健全，精神文明更加进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广泛。应当预料，正如工业经济代替农业经济的情景一样，知识经济取代工业经济，对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必然产生强烈的震撼。知识经济的科学精神对人类文化价值观的冲击将是异常强烈的；对传统文化，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传统文化系统都将产生剧烈的冲击力，迫使人们的观念同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发生断裂；在科学不够发达且民族传统文化又十分浓郁的国家和民族尤为敏感。发展中国家对此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中国正致力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此目的，要警惕传统文化的强大惯性，而知识经济的科学精神同传统文化的断裂过程是痛苦的，有时甚至要经过多次反复。从1919年五四运动至今，科学与反科学的较量起伏的历史足以证明，有时候科学的发展反而加强了反科学的反动势力。且不说，发明火药的故乡制造不出先进的武器弹药（因为火药只是用来庆典、娱乐），发明指南针的伟大民族用它来看风水，就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中国科教兴国已成为鲜明的口号，科学已成为现代生产和生活的决定力量，国家创新工程已经启动，科学与反科学的较量也没有终结。在现实生活中还存在不重视科学、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的现象；贴着科学标签的伪科学仍然像幽灵一样游荡在中国的上空，欺诈善良而缺乏科学知识的人们。好在中国人没有忘记一百年前八国联军从天津打到北京的历史，也还记得一百年来对科学的呼唤和对科学力量的信念贯穿于为民族独立、民主自由、人民解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全部进程。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科学精神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力会越来越大。我们坚信科学精神终将冲破落后文化因素的束缚而奔向蓬勃发展的未来。

知识经济的故乡——西方文化圈是否可以高枕无忧呢？也不是。工业社会人的异化，表现为人和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成了资本增值的工具，拥有财富成了人们不顾一切的奋斗目标。人成了财富的奴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金钱关系。这与人的本质是背道而驰的，故称之为人的异化。人的劳动不仅仅是为了物质财富，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人的价值和人的自我完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但西方工业社会不可动摇的价值信条是以物为中心，对物的追求淹没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地位。马克思早就指出商品经济下的工业社会的本质是“人对物的依赖”的社会形态。随着工业文明的衰落，探索人类新的发展目标与发展模式迫在眉睫。因为西方发达国家总计人口约十多亿，只占世界人口的1/5，欠发达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5。发达国家却消耗世界总产量4/5的原料、能源及其他资源。如果欠发达国家以昔日发达国

家的模式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以高耗能源、牺牲环境为代价，那么小小地球将不堪重负，人类将无法在地球上生存，发达国家也不例外。这不是无知妄想，而是经过科学测算得出的结论。人们指望知识经济时代，消除工业经济时代带来的消极后果，使人类放弃单一物质财富至上的价值定势，代之以追求人的自身完善化的价值趋向，如净化社会道德，提高人的素质，丰富人的精神生活，营造人与人之间的互尊、互爱、平等、和谐关系等。这种由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转变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性大变革。这一变革带给西方传统文化的挑战，将是十分严峻的。信息技术这一新的社会生产力要求生产方式的新调整。金融风暴和科索沃危机表明，西方世界的平衡是危险的、脆弱的，随时有可能被打破。

第二节　知识经济与文化重建

断裂之后就是重建。知识经济时代对传统文化价值观造成某些方面的断裂，是科学精神对它发生冲击的结果，与此相伴而生是诱导重建效应，即依靠科学精神的力量，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诱导并重建某些新的文化价值观。

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既是第一生产力，同时科学本身依然是一种文化。科学活动的进程，就是创造科学文化的进程，科学已不再仅仅是一种理性创造、一种逻辑过程、一种“范式”、一个“研究领域”或一个“信息域”，也不只是一种社会建制。对社会生产、生活起普遍决定作用的科学拥有自己的文化规范，积淀出自己在过去时代未曾有过的文化精神。在这里，科学精神是科学文化深层结构中所涵括的一整套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是科学文化的核心结构。它不仅是科学工作的行为准则，并内化为科学工作者的良心，而且渗入全社会的深层意识，内化为广大人民大众的科学意识。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这个民族存在的核心和生活的基本框架。但是要使民族充满活力，就必须不断注入新的、积极的文化因素。科学精神便是最具积极意义的、先进的文化价值体系。因此，科学精神是诱导传统文化更新和重建的先导。这个重建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传统文化是共同的。

然而，这个重建的效应在东方和西方，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传统文化，又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在知识经济和科学精神诱导下的文化重建，对科学欠发达的东方民族的中国来说，是同过去告别，扬弃的是历史；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说，是同现在告别，否定的是现实。

中国的思想家面对知识经济和科学精神，敏锐而坚定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思想是第一精神力量”；“科学决策、科学规划、科

学管理是第一组织力量”。①

西方思想家对这一重建的描述是：“一个新的文明正在我们生活中出现。它到处遭到了一些视而不见的人的压制。这个新文明带来了新的家庭形式，改变了我们工作、爱情和生活方式，带来了新的经济和新的政治冲突，尤其是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意识。这个新文明今天已局部存在。许多人尝试着使自己的生活适应明天的节奏。另一些人对未来则心存疑惧，陷入绝境之中。他们迷恋过去，妄想重振自己熟悉的那个重要的世界。”②

第三节　知识经济与文化融合

知识经济时代，也是文化平衡和融合的时代。这种融合效应，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科学精神，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可以冲破地区、国家、民族和语言的局限，加速世界范围内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的文化交流，从而使多元的民族文化或区域文化在科学精神的渗透下，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在整体上成为更加优越的体系。

第二，在科学精神的作用下，在各种文化价值中出现一些共同的新质。这种新质无不打上科学精神的烙印，但这种新质又因其附生的文化基础不同而有所差异，如计算机文化。

第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进一步融合。知识本身也好，知识的生产、分配也好，智能资源的占有、配置也好，由这些方面导致的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也好，毫无疑问蕴涵着深刻的思辨、价值、伦理、法理、文理以及社会规范等人文精神和社会科学的内涵。它将使全社会进一步认识到“单单有自然科学技术知识，远远满足不了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不仅双峰并峙，分别解决不同的问题，而且愈来愈在许多方面共同发挥作用以解决同一个问题，互相不可取代，但必须融合；自然科学技术知识的创造和运用有赖于人文社会科学，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虽然伟大，但它只能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应当如何的价值目标却在它的视野和职能之外。”③

---

① 参见《知识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103页。

② 阿尔文·托夫勒著《第三次浪潮》，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③ 《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页。

第四节　知识经济与文化霸权

知识经济同知识产权制度有天然的联系。-国、-民族、-企业，假如不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就没有竞争力，就搞不了知识经济，或在竞争中失败。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士吴澄撰文强调"知识产权是知识经济的核心"①。

所谓知识产权制度，是在承认知识是一种财产，对其进行保护的基础上促进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的一种制度。知识产权的主要内容和表现就是：专利、商标和版权。

知识产权制度是工业社会后期的产物。一百多年前，一些西方国家适应现代工业化的需要先后建立了这一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激发了人们发明创造的积极性，大量的发明创造和知识成果涌现出来。由于知识产权受到法律强有力的保护，以科技尤其以高科技为核心内容的知识，在西方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出传统生产要素不能比拟的重要作用。有些自然资源的穷国成了经济上的富国，而有些自然资源的富国却一直处于贫穷状态；建立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高技术基础上的全新产业以惊人的速度和效益发展。残酷的现实使人们看到：发达国家之所以具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拥有众多价值连城的知识产权，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穷，之所以缺乏竞争力，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或者基本没有自己像样的知识产权。西方国家的文化霸权主义，首先表现为知识霸权，这是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知识产权意识十分淡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知识产权制度有很大发展，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还需要不断完善，以维护所有者或持有者的权益，以促进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把尊重知识落到实处。何况，21 世纪，我们迎来的是网络世界，反对知识霸权必须在开放环境下进行，不能闭门自守，不能陷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必须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抵制和约束恶性竞争力量的侵入，直面从未经历过的竞争强权。一方面防范文化霸权、不屈服于文化霸权，另一方面保护已有的知识产权，在对外合作中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知识产权，增强知识的实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与其说是知识经济带给中国经济的机遇，不如说是知识经济带给中国新文化的"增长点"。

参考资料

1　知识经济.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

① 参见《光明日报》，1998 年 11 月 14 日。

2　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焱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

3　知识霸权的阴影．光明日报．1999-06-02

4　赛博文化　新华月报．1999（04）

第十八章　中西文化与科学技术

面对古代：中国有没有科学？西方自古就有科学？科学同文化是什么关系？

面对近代和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西方？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科学技术同文化又是什么关系？

面对现实和未来：在科技竞争中，中国能赶上世界（实际上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技水平，成为科技强国吗？科技竞争同文化特别是传统中华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又有什么关系？

虽说不争论，却一直在讨论，讨论主要在海内外知识分子、学者、专家和大学师生中进行，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也卷进了这个讨论，在香港、北京、南京连续作专题报告。可见文化与科技的关系，东西文化与科技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文化与科技的关系，已成了讨论的热点。

第一节　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及其与文化的关系

中国最早的一份现代科学刊物《科学》创刊于1915年，创办人任鸿隽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说中国无科学的原因》一文。1922年哲学家冯友兰又在《国际伦理学》杂志上用英文发表了《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在他的影响下外国人开始研究这一问题。1944年，吴藻溪把德国籍的犹太历史学家魏特夫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译成中文，再度引起讨论，同年，气象学家竺可桢发表了《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竺可桢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自然科学。其后，英国学者李约瑟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他发现，中国古代不是没有科学，而是科学很发达，从公元前1世纪到15世纪，中国在许多领域领先于西方。与李约瑟同一时期，科技史家萨顿在厚达4000页的《科学史导论》中，从古代研究到14世纪，相当于中国的明朝初年，在书中列举了大量的科学家的名字，中国科学家就有249名，其中研究天文学的最多，医学和数学次之，而真正搞技术的只有5人。

应当说，中国人提出的问题，外国人回答了。李约瑟和萨顿的研究表明：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或者说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的论断就不攻自破了。说中国古代文化不利于或阻碍科学发展的立论也就站不住了。

既然事实如此，那么关于“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说法，从五四运动提出到现在，为何争论了一百年呢？

把科学和科学方法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了，是原因之一。任鸿隽、冯友兰、竺可桢说中国没有科学，或没有自然科学，实际上是指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实验方法，而不是没有科学成就。如果严格按近代意义的科学，即科学实验、数学描述、逻辑推理的自然科学，是经由16世纪至17世纪的科学革命，在17世纪的欧洲形成的。这种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古代中国没有，古代的西方也没有，与文化优劣何干？科学史已经表明，科学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文明发展过程。每一个古老文明都有某种科学因素成长的历史。古代希腊、古代罗马、古代阿拉伯、古代中国，都有各自的科学成就、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在16世纪以前，东方人和西方人大体上一样，各自企图探索解决同样的问题，又都未能达到今天人们熟悉的科学水平、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不可用今人的标准去衡量古人。

第二节　科技革命与中西文化的关系

为什么在近代的西方发生了科技革命，产生了近代（现代）科学，而在中国却没有发生？同东西方文化是什么关系？

首先，科学革命在欧洲发生，并非由于他们有古希腊优秀的文化传统。恰恰相反，欧洲近代自然科学是在反对和突破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激烈斗争中诞生的。欧洲近代科学史是以16世纪中期即1543年为开端的，这一年出版了两部伟大的科学著作，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维萨斯的《人体结构》。这两部著作，恰恰是向以希腊托勒密和盖伦为代表的古希腊天文学和医学传统宣战的。显然，近代科学革命发生在欧洲的根本原因，主要是由此时此地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不必到此前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古希腊文化传统里去找。同样，16世纪的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也不必把板子打在孔子、孟子、老子的身上，到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上找原因，落后的原因主要也是由中国当时当地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

其次，比较一下16世纪中叶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这300年的中西历史，是西方崛起并开始全面进步和中国衰落并开始全面落后的历史，岂止科学而已。16世纪中叶，中国同西方一样，开始了由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转变。西方由农本而重商，中国农本经济也出现了商品化的倾向；西方商品经济取得了对农本经济的突破，中国农本经济也受到了商品经济的影响；西方资本主义产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西方发展水平大体均衡，西方资本主义迅速长成参天大树，中国资本主义仍处在萌芽阶段，西方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欧美，中国仍停留在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基础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中国仍在

封建社会中动荡。300 年过去，西方由后而前，迅速进步，中国由前而后，急剧衰落。当 19 世纪来临，中国被西方称作“东亚病夫”，中国落后了。

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的进步与落后，都是互为动力、互为因果的。在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数百年中，我国发生了从宋朝到元朝、明朝又到清朝的更替，两次被生产力落后和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征服。宋朝时，中国已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但不久元朝的高度专制统治使得这一萌芽胎死腹中。到了晚明时期又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也出现了李时珍、宋应星、徐光启、徐霞客四位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但清兵的入关又使新生的资本主义幼苗夭折了。在欧洲、亚洲、非洲历史上，都曾发生过落后的、野蛮的、游牧民族发动毁灭性的侵略战争，扫荡以至完全摧毁先进文明的悲剧。中华文明未被毁灭，而且同化了落后的少数民族，然而这种同化的代价是历史的停滞与倒退。因为一个落后的民族，如清朝统治者为了统治文化先进的人口众多的汉民族，就必须通晓汉文化。他们要通晓汉文化，又必须从基础开始，这就是清代经书的训诂考据特别发达的原因。明朝的遗老和清朝的新贵，在帮助清朝统治者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时，认为宋明以来王守仁、朱熹的学说引导士大夫空谈心性，导致了国家的灭亡。而空谈心性是违背孔子六经的教导的。所以，他们的代表人物，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一致提出把回到六经作为清朝的学术目标。这样，清代统治者实际上为科学工作划定了一个界限：从为了理解经书开始到理解经书为止，不是我注六经，就是六经注我，这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学术圆圈，清代乾嘉学者以及他们的先驱所从事的科学工作，就是在这样一个圆圈中运动。这个运动把中国引向何方？

国家民族的创新精神被窒息了。尽管康熙皇帝本人爱好科学，但他不可能像俄国彼得大帝那样到西方去学习新科学，也不可能像法国路易十四一样建立国家科学院，恰恰相反，对有头脑的知识分子采取不信任态度；尽管清朝初年，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有一定的发展，如天文学、地理学的发展非常迅速，但发展的目的都是为了理解“神圣”的经书，因为经书中广泛涉及天文、地理、生物知识，而有了一些科学知识，就可以更好地学经、用经了。近代科学创新精神就这样被“述而不作”的思想禁锢了。近代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也悄悄地从封闭的“学术圆圈”外面，从中华帝国的门槛前跨过去了。

国外和海外的新的科学成就也无须学习了，无须引进了。因为六经中已包括了一切真理，西方迅速兴起的科学技术，都可以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找到根源。清初天文学家梅文鼎，是当时学界泰斗，居然提出了著名的“西学中源说”。据此，当时人们认为，传入中国的以欧几里得几何学为核心的西方数学、天文学，都源于中国上古的勾股术，不足为奇；至于地圆说，也在我国经书中早有记载。总之，西方科学技术算不了什么，它们的祖宗都在中国。这

样，一个完全可以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就学习西方，革新中华科学、文化乃至政治经济的历史机遇，也被骄傲自满、盲目自信、荒唐追求“回归六经”、自我封闭的古老民族抛弃了。明朝之前，世界上重要的发明创造和重大科学成就约有300项，其中中国的有175项，占57%。经过清朝两百多年，中国科学技术全面落后于西方、中国在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生物学等方面，比西方几乎落后了两个世纪。这个历史的责任是可以追究的吗？追究谁，难道要“六经”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负责？显然不是。

第三节　科学技术的未来与中西文化

在众多关于文化与未来科技关系的资料和观点中，我认为以下几种意见是可取的，是可以引发我们思考的。

第一，在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或者说经济社会向智力社会的转变中，科技的重要性即科技作用的广度和深度，会更加突出。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也不可能再沿着17世纪确定下来的，即欧美科技革命的路线前进。如何建构“后现代科学”，已成为全世界学者关注的话题。那么，中国文化（包括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主要是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包括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主要是现代文化）是否具有后现代性，都面临着时代的检验。具有后现代性的，不管是东方的、西方的，还是中国的、外国的，都会得到继承与弘扬；反之，都得遭到废弃。完全具有后现代性的或完全不具备后现代性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最大的可能是各种文化中的后现代性互相融合，前进创新，人类才有希望。

第二，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有利于促进社会秩序与自然秩序的互相融通与和谐，结束人类与自然的疏远和对立。20世纪是科学技术获得伟大进步的世纪，也是血与火的动荡不安的世纪。人、社会、自然环境三个层面的不安全性已尖锐地展现在人类面前，人类需要重新分辨自己的智慧和愚昧。在探究宇宙和谐的奥秘，寻找社会的公正与和平，追求心灵的自由和道德完善这三个方面，东方文化起什么作用，西方文化起什么作用？儒家、道家、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有马克思主义各起什么作用？不仅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个实践问题。说个谁胜谁负，有人不高兴。但适者存，不适者亡，大家都是相信的。实践会回答的，它不管谁高兴不高兴。

第三，“科学必须人性化”问题。因为人类总是有人用科技成果做灭绝人性的勾当。从1920年萨顿提出“科学必须人性化”，到1988年世界上活着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2/3在欧洲聚会发出呼吁：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和现状都要求未来科学技术必须以伦理道德为最高目标。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更富有

人性，是什么人性？“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以伦理道德为最高目标”吗？那么，宣称博爱为怀的基督教是否也是以“人性”为最高真理呢？有人说，“儒家科技思想有四大特征：理性与价值合一的生态自然观，自然与人文统一的学问观，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治学方法，求理与致用并重的学术目的论，对后现代科学精神的产生会有重大意义”。我认为，严格地说，“科学人性化”的提法不准确，也不科学；说哪一种文化更能促进“科学人性化”更不准确、不科学，科学本身是人创造的，为人所利用。科学被用于非人道、反人道的原因不在文化。使科学不用于邪恶，而用于正义，也不是文化所能办到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属于同一文化的人，有的用科学造福人类，有的用科学造灾难于人类。只有全人类正义的力量，包括文化正义力量，可以制约、束缚非正义力量时，科学才会只用于人类的正义事业。

第四，对未来科学的发展，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对优势，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成分的现代性对未来科学的作用，不少专家们发表了不少精辟的意见。例如：近代科学发展几百年，建立了庞大的分析型科学体系，在很多方面较精确地研究了自然界，但是它也有不足之处，为此发展综合、非线性、复杂性、开放性系统的研究，已成为当代改变观念、推动科学发展的最强音，而这类研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对优势；又如，与西方传统文化主张无限掠夺自然的思想相反，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对当代环境科学、区域开发和技术发展有明显的积极意义；再如，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对许多自然现象特别是天文现象、气候现象、地震现象的观察时间之长、记录之详，均为世界之最，对人类不断探索未知世界有重要作用，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课题；还有，把中国传统科学作为目的基因转入现代科学中，使现代科学获得新的发展，如数学家吴文俊院士将中国传统数学方法用于定理的机械证明而获得成功等。显然，这种作用是巨大的，必然会推动未来科技的发展。而这种优势，是西方文化和其他文化传统所欠缺的。

第五，中国在21世纪能成为科技强国吗？杨振宁1999年12月3日在香港中文大学讲《中国文化与科学》时，回答如下：

“20世纪中国文化的特点总地说来，是传统文化加上现代化。今天，到20世纪的末年，我们回想一下，这个现代化使我们所有能想到的地方，都受到重大的影响：衣、食、住、行、人际关系、政治、经济、语言、文字、哲学思想、教育、音乐、雕塑、建筑、人生观、宇宙观、文学、艺术、医学、科学技术，没有一项在20世纪的中国不因为现代化而受到巨大的影响。而这个变化，我想到了下一个世纪，是还要加剧的。那么，我想指出一点，是关于科学技术在20世纪中国有什么发展。在1900年，我想没有一个中国人懂微积分，1900年是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后两年，那个时候没有微积分的课程。1905年，

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废除了科举。然后，大举留学，先是到日本，然后到欧美。这以后，到了1925年，少数大学才开始筹办算学系、物理系——那时候不叫数学系，叫作算学系。我去查了一下，得到一个结论，这个算学系、物理系的名字，1925年前没有。比如说，我比较熟悉的清华大学，就是在1926年到1927年之间，才正式成立了算学系，到了1938年我进大学的时候，西南联大的教学水准已经达到世界级，这是一个极大的现代化。到1964年，中国成功地制造了原子弹，而制造原子弹所需要的人数之多，知识的方向之广，是很难想像的。再到了1970年，中国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卫星，到了1999年，前一些时候，大家知道，"神舟"成功地发射与收回了。你看，这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进步。"①

展望21世纪中国科技，杨振宁说："答案很简单：中国想以100年的时间，追上西方700年的成绩，不可能一下子就达到第一线。我们对20世纪中国的这一历史有所了解，我们才可以对下一世纪的中国科技作出展望。"他又说："下一个世纪中国科技的前景如何？我的结论是，中国要想追到世界第一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我对于以后50年、以后100年中国科技的发展前途，是非常乐观的。"②

让我们重复一遍杨振宁的话："总地来说，是传统文化加上现代化。"这是20世纪"中国文化与科技"的特点，也将是21世纪中国文化与科技的总结吗？这里有事实，也有预言，事实和预言之外，还有什么？

我认为，中国的命运、中国科技的前途，决定于中华民族的创新力量和创新精神，以及产生和养护这种力量和精神的社会制度与社会实力。文化渗透其中，但又不仅是文化而已。

参考资料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　杨振宁教授论中国文化与科学问题．光明日报．2000-03-20
3　科学与传统文化．中国文化报．1998-11-05
4　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和全局观念．安徽大学学报．1998（05）
5　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思考．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03）
6　中西500年比较．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991
7　高科技时代伦理学的新观点．中国教育报．2000-01-23
8　落日的辉煌．光明日报．2000-06-19

① 参见《杨振宁教授论中国文化与科学问题》，载《光明日报》，2000年3月20日至21日。
② 参见《杨振宁教授论中国文化与科学问题》，载《光明日报》，2000年3月20日至21日。

第十九章　中西文化与中国教育现代化

任何中国人，尤其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以及教育管理和研究工作者都有责任，而且完全有必要和可能，带着竞争的意识，立足于创新社会主义中国教育理论和事业，大胆地吸收借鉴世界各国可取的东西。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成年人、儿童）对教育问题进行讨论时，都在把中国现在的教育同国外比较一番，特别是同西方相比较。讨论的范围涉及很广，从教育体制、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系统比较到具体案例比较，既有专著、专文、专刊和系列丛书，又有一人一事一议的杂感轶闻，多得无法统计。但是，从总体上比较、认识和把握中西文化对教育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同特征，从而探索中国国情决定的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文化战略者却不多见，而这正是我们要探讨的课题。

第一节　中国传统教育的人文精神是西方教育所缺乏的

中国是教育的故乡。据说世界上最重视教育的民族有二：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自古而今依然。但犹太民族太小，又几经丧国。形成数千年教育传统的是孔子以后的中国。儒学浸透了中国的一切领域，尤其是教育，可以说儒学文化传统主要保存在中国传统教育中，尤其是儒学的人文精神。

其一，忧患精神，一直贯穿在中国古今教育之中。从孔子到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中都渗透着：对国家生存和人民生命的关怀；对个体和整体人类生命存在的命运的关怀；对未来的责任和使命的关怀。尽管在不同时代这种关怀有不同的历史内容，但正是这种关怀一脉相承，铸就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从孔子的“士志于道”，孟子提出“忧患”的概念，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到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都孕育和灌溉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意识和承担意识：拯救社会于无序的宏愿，面临危难而不屈服的悲愤，救民族于危亡的慷慨、救人民于水火的奉献，居安思危、处兴思亡的辩证理性。这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神，也永远是中国教育的博大情怀。

其二，乐道精神，也一直渗透在中国古今教育之中。这是一种以求道、得道为快乐的精神。人总是向往理想、追求真理的。要实现理想、掌握真理，就要有乐于坚守的信念和原则。道，就是从所追求和坚持的理想、真理、信念和

原则的总和。为了求道、得道，应当“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做到“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种忠于理想，皈依真理，坚持自己的信念和原则，不被富贵、贫贱、威武所迷惑、动摇和屈服的精神，从古代贤哲到中国共产党都大力提倡，更为历代教育宗师所推崇。

其三，和合精神。它首先是中国儒学对人所生存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的思考，认为和合是天地万物存在的原因，是存有的方式，是动态的、开放的过程，是心情宁静、心绪和平、心灵愉悦的境界。两千多年来，它是中国知识界、教育界普遍认同的理念，影响和决定他们的伦理道德、心理结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审美感情。说到底，和合精神就是天人合一，就是天道与人道合一，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心灵冲突融合而和谐的精神。对儒学来说，它既是宇宙精神，又是道德精神，也是价值理想。它引导知识分子把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和对精神世界的追求统一起来，塑造真、善、美的高远和谐的境界，因此而成为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核心。经数千年的传承和陶冶，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国社会的改造、民族的更新、教育的进步与改革，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传统社会的现代化，都受到这一传承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其四，笃行精神。在知与行、言与行的冲突中，儒学主张转知为行，知行统一的笃行精神。孔子看到了知与行、言与行的矛盾和冲突，主张听其言、观其行，在教育和选拔人才时，重视对“行”的观察，“君子不以言举人”。两千多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崇尚实事求是、埋头苦干、能干实干，鄙视空谈误国误身，憎恶阿谀奉承和言行不一。儒学认为，忧患精神、乐道精神与和合精神的实现和弘扬，都有赖于笃行精神的实践来支撑。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入世品格和刚健精神。这种精神通过教育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激励中国人奋发进取，自强不息。

有人认为，人本精神也是中国儒学、中国文化、中国教育的基本精神。我认为，人本主义主要是西方近代文化的基本精神。与其说是精神，不如说是科学。既指西方研究人类起源、人种演化的科学，又指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以自然感性的人为基础的哲学。至于中国古代的管子提出的“人本”，孔孟提倡的尊重人格，历代儒家提倡的如何做人，“泛爱众，而亲仁”之说，已包含在或者充分生发在忧患精神、乐道精神、和合精神和笃行精神之中，这才是中国文化所给予和形成的中国教育传统中所特有的无价之宝。而对西方教育来说，至今依然是陌生的、稀有的。

第二节 西方教育传统的科学精神、批判精神和宗教精神是中国教育传统中所缺乏的

首先，关于科学精神。杨振宁先生于2000年4月在南京作了《中国文化与科学》的演讲，也访问了南京大学，他在回答人们提出“诺贝尔奖何时落在中国?”时说：“中国有很好的传统，中国人的遗传因子很好，又有数目巨大的可以造就的年轻人，因此，中国拥有占据世界科技领域重要地位的先天条件。”至于中国大陆至今未获诺贝尔奖，“我认为不是教育制度上有什么缺陷。诺贝尔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对于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评选的方法和成绩，我不认为是正确的。关于物理、化学和医学方面，中国大陆到现在还没有人获诺贝尔奖。这个原因非常简单。第一是没有足够的经费。今天，不论是做生物、物理或化学研究，设备是非常宝贵的。中国现在追上来了，可是与先进国家最好的设备相比还差一截。第二个原因是学术要有传统，学术传统的最重要一点，是可以使年轻人知道哪个问题是值得做的，哪个问题有发展前途。中国科学的传统一时还发展不上来，我认为这是最主要的。”

我们扪心自问，杨振宁先生说的这个“最主要的”科学传统，为什么在中国大陆一时还发展不上来呢？西方是近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的故乡，近代科技史上的两次科学革命和三次技术革命都发生在西方（即哥白尼、伽利略、牛顿掀起的日心说对地心说的革命揭示了宏观物体低速运动的规律；普朗克的量子力学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揭示了微观物体高速运动的规律；蒸汽机的革命，电革命，以电子技术为中心，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标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也发生在西方。它们为什么没有产生在中国或东方呢？这在前文已有详述，这里要强调的是，科学与迷信是对立的，西方的现代科学和马克思主义是在同神学和各种迷信的殊死斗争中取胜的，而在中国或东方，形形色色的古代迷信、现代迷信、洋迷信、土迷信还少了吗？科学与民主开放是孪生兄弟，西方科学技术是在民主开放的国内外环境中发展的，而中国或东方，形形色色的专制与封闭，禁锢得还不够残酷与愚顽吗？中国人回顾一下五四运动以来近百年的苦斗、成就与教训，就能回答杨振宁先生提出的问题。

其次，批判精神。“大学批判精神是西方近代大学的基本理念，……那种理智的、独立的、无功利的、富于创造性和想像力的精神是大学一贯的理想和追求。那么这种精神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这就是大学的批判精神。……大学批判精神是近年来大学理论研究和思想研究的热点。”① 实际上，这种批

① 赵婷婷 邬大光：《西方大学批判精神探析》，载《国际高等教育研究》，2000年第1期。

判精神不仅集中体现在西方高等教育中，而且渗透在西方全部现代各级教育之中，是西方教育的基本理念，也是近代西方文化的思想传统。这种精神的基本内涵是：提倡独立思考、坚持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不满足于现实世界，不断向未知世界挑战。这种精神的立足点是承认和培养独立的个性，出发点和归宿是创造和超越，本质和动力是对社会群体和个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精神，在西方文化和教育中的发展和成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曾经历了16世纪至18世纪的“冰封期”和20世纪的“失落期”。直到20世纪末革命性的经济方式——知识经济的出现、社会反思浪潮的活跃，又激起对它的热情。至于中国，这种批判精神在少数先进的思想家、教育家头脑里是清醒的，而在整个教育体系中，还是陌生的。

最后，宗教精神。西方文化有两个源头即“两希文化”（古希腊文化、希伯来文化），而基督教精神构成了西方文化的精神内核。不了解宗教和宗教精神，就无法深刻认识西方文化与教育。

马克思曾经指出：基督教曾经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上为剥削制度辩护。列宁在批判东正教时也曾指出：正教的圣物所以宝贵，就是由于它教导人们“服服帖帖”地忍受痛苦！宗教教导人们“服服帖帖”地走过地狱，为了所谓升上天堂。我们认为，宗教的本质是有神论，是唯心主义，是对客观世界的虚幻的反映，它同科学精神、同批判精神是根本对立的。但宗教精神为什么也成为西方文化和教育的基本特征，而且源远流长呢？这是因为宗教在道德和道德教育上具有神圣性、精神性和文化性。

宗教道德和道德教育的神圣性在于：诉诸人的终极信仰和精神支柱，这种信仰和支柱又以神的“恩准”的形式，具有价值规范的效力，成为实在的实践力量，并赐予虔诚的信徒。

宗教道德和道德教育的精神性在于：诉诸生与死这个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尤其是面对死亡之后进入“天堂”或“地狱”的“最后审判”，制定善与恶的各种信条和戒律，实际上构筑了维系社会的最强大也是最后的精神防线。

宗教道德和道德教育的文化性在于：其庞大的理论体系和基本经典，想像非凡，文风优良，蕴含丰富，感染力极强，诱人思考，永远有咀嚼不完的精华；其祭祀、祈祷、讲道、节日以及涉及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的各种圣事的宗教仪式，典雅深沉，其目的是强化宗教信仰和宗教道德，实际上成了无处不在的社会课堂；其建筑宏伟壮丽、金碧辉煌，外部构造给人一种神圣、庄严、肃穆的感觉，内部神塑浮雕、油画壁画和图案花纹，栩栩如生，甚至精美绝伦；开展活动时常伴有音乐、合唱，营造一种超凡脱俗、缥缈欲仙的神圣氛围，可以说利用人类一切文化成果宣示宗教真理。

两千年来，这种宗教精神直接渗透在西方社会生活和教育的一切方面，几乎所有人终生都受其束缚与熏陶，而且“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同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找到了畸形而巧妙的结合点，使得宗教精神和批判精神、科学精神和平共处，并行不悖。这是中华文化所没有的，也是不可想像的。

第三节　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文化背景

为使中国现代化，先要使教育现代化。教育现代化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基本战略，但中国教育现代化却处在三个严峻的文化背景之下。

其一，中国本来有世界上最优秀、最丰富的古代文化传统，但是160年来，它遭到各种社会势力和社会思潮，包括革命的和改良的、进步的和反动的，国内的和国外的、文明的和野蛮的冲击和批判。在人们心中，传统文化已经被批得体无完肤、面目全非了。加上古籍文字艰深，大多数人直接读不懂，有如隔世珍宝。中国现代文化、现代教育，不是在古代优秀文化的土壤里自然生长的，是断了奶的。现代教育，从体制到内容，所谓新学，是从西方移植的。现在要根据时代的需要对古代文化和教育传统重新认识、重新挖掘、重新养护和利用，任务十分艰巨。

其二，近代西方先进文化，风靡世界500年。近200年来，特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学西方，成绩卓著。发源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占领了中国的学术讲坛，也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但是，我们对西方的学习远远不够。必须大力加强对西方文化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学习。要特别注意信息技术将引起的教育革命。这种革命可使教育摆脱被称为“最落后的工业”的困境，而且可以冲击教育的不平等状态。而西方文化作为一个体系，作为工业文明的一部分，已暴露出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进入了“疾病多发期”和“衰老期”，本身需要转型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后，不少弱国、小国独立、解放了，努力学西方，想富强起来。结果，富国愈富、穷国愈穷，穷国在经济上、文化上很难独立，教育上学西方的国家是“基础教育无基础、高等教育难高等”，文盲充斥，优秀人才外流，有重新沦为经济文化殖民地的危险。

其三，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的结晶，是人类大多数劳动者和先进分子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正如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生命力最强大一样，它遭到的敌视和攻击也最强大。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为标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在世界上陷入低潮。

第四节　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文化战略

我们的战略本来是“落后就要挨打”的哀兵战略，是冒着“被开除球籍的危险”的赶超战略，是多灾多难的泱泱大国在坎坷路上长途跋涉的持久战略，是“团结起来到明天”的悲壮战略。在思想上、文化上、教育上，这个战略的核心就是正确对待辉煌的古代文化，正确对待先进的西方文化，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低潮。邓小平说：“最大的失误在教育”，我认为就是指没有把这样一个战略思想的特点及其实质告诉人民和青年，让他们真正懂得什么是中国现代化和中国教育现代化，特别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其一，确立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教育的新途径。任何市场经济的有效调控，都只有在法律、法规与道德规范的共同作用下才得以实现。马克斯·韦伯在论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新教伦理原则时，就曾指出过这一原则是“超乎资本主义与功利之上的”，何况社会主义呢？就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个性而言，要引导和确立符合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导向的道德规范体系，这个体系不可能全部由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及思想意识形态的先进性所决定。就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处的中国文化历史环境而论，开掘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也是十分重要的。不仅以“仁”为核心确立的诸如诚、义、礼、智、信、廉、恭等具体道德规范，对于消除坑蒙拐骗等消极现象具有规范作用，而且注重人生、长于伦理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对于调控市场经济的趋利性无疑是必要的。英国学者汤因比甚至断言：“和为贵”的东方文化精神，是拯救因盲目竞争而必然导致衰落的西方文明的最好出路。关键在于确立借鉴与吸取传统文化取舍的标准，我们认为这个标准只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本身。而千万不可相信“河东河西论”。自高自大的文化老大主义取代不了西方文化霸权主义；中国古代的辉煌，无论多么重要和显赫，也取代不了中国的现代化。

其二，培育中国式的科学精神。同西方国家比较，中国缺乏现代科学传统和科学精神。培育科学精神，是中国素质教育的重大课题。西方的科学精神、批判精神我们要学，但同西方文化一样，不可照搬，也搬不过来。我们要把西方之长同自己之长相结合，培育中国现代特有的科学精神，即彻底实事求是的精神、超越精神、开放精神和牺牲精神。实事求是凝聚着崇尚科学、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刚直不阿的修身特质；超越精神是要求把握创新的机遇，而不墨守成规、思想僵化、视野狭窄、趋同从众，要反对想问题、办事情首先想到的是前人、外国人的权威，然后是建立自己的小庙的古国遗民精神萎缩的传统；开放精神、是适应科学的开放性，科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开放中形成

了独特的风险意识和冒险精神，科学史上的每次突破都表现为对以往权威的"冒犯"，科学真理认识过程每一阶段的开始，几乎都是遵循多数服从少数的规律，科学需要宽宏大度、明智通达的高尚心境，任何偏见、主观、固执、自私都会带来科学的倒退；牺牲精神就是奉献，人类曾为科学进步付出血的代价，给科学精神涂上了悲壮色彩，不为神权和强权所屈，不为愚昧和野蛮所欺，自觉奋斗，锲而不舍。中国人要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用到科学上，才能超越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的后代，换来科学昌明、思想解放和民族复兴。

其二，埋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中国人要继续埋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这是中国现代化和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文化活水和永恒的生命力。如果没有这样做，一失足成千古恨，我们不仅无法向历史和未来交代，而且也无权责怪任何人。

任何人都不会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完备战略恩赐给我们，岂止是教育现代化。因为，任何独立生存的文化，都有一种为人类生活与其生态环境提供平衡的世界观。我们不能无视文化深层的世界观，不加深思和区别地引进或拒绝西方文化。且不说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文化的破坏性，我们要坚决抵制，即使是先进的，也要依据中国国情而确定引进的必要性和步骤。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经济全球化、文化网络化、教育产业化，还有国际化、大众化、普及化等，其逻辑是只要同西方一"接轨"就是"现代化"。有的城市干脆宣布已于某年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其实那里的基础教育仍在"贵族化"，倒是文盲还保存大众化的格局。我们无须评估这些，我们要牢记当代世界的基本特征是国际竞争，竞争的基本力量是人才尤其是优秀人才，而人才竞争的动力和实力的源泉是世界观。2000 年 5 月 5 日出版的香港《亚洲新闻》一期的文章《吸引人才回来》，介绍新加坡总理的演讲，提到"美国硅谷新创办的公司有 40% 是华人和印度人开办的"、"中国最聪明的毕业生中有 3/4 去了美国"。"如果他们走了，就如同亚洲把强大的武器送给了敌人。不用说，这样就无法在新经济战中取胜了"。人才为何外流，这里无法全面评估。但渴望公平竞争是原因之一。有才能有骨气的优秀人才，宁肯在公平的竞争中失败，也不愿在不公平的竞争中取胜。"一场早已安排好比赛结果的竞赛最终会把所有参赛者赶走。"我们不仅要培养优秀人才，而且要创造比过去的中国和现在的西方更适宜于优秀人才公平竞争的文化生态环境，使优秀人才不走，走了的愿意回来，为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中华大地上竞赛、竞争、竞自由。这才是中国现代化和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希望和战略目标。我们能办到吗？应该能，必须能。

参考资料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 杨振宁．中国文化与科学．中国教育报．2000－04－27

4 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发展的正确方向

5 于光远，刘学文．教育和培养二十一世纪的人

6 刘立文．儒学的人文精神．光明日报．2000－02－22

7 赵婷婷，邬大光．西方大学批判精神探析．国际高等教育研究．2000(1)

8 基督教文化与现代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9 中国文化通论．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10 简明国际教育百科全书．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

11 毕淑芝主编．当代外国教育思想研究．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12 国际教育纵横——中国比较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第二十章　中西文化比较与文学比较

第一节　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作为两个独立学科的形成过程

有交流就有比较。文化交流与文学交流，在古代各民族、各国家之间就有了，这是人所共知的。如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在诗人在世时已传到日本。而交流本身就是比较。但是，大规模的交流和比较，特别是东西方之间大规模的文化与文学的交流和比较，是近二三百年的事。中西之间大规模的文化与文学的交流是近一百多年的事。至于比较文化和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或中国，迄今也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在西方，早在1877年匈牙利人创刊了《比较文学杂志》（两年后更名为《比较文学学报》）。1886年，英国的波斯奈特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比较文学专著《比较文学》。1896年，泰克斯特在法国里昂大学开设了比较文学讲座。189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比较文学系科。就是说，在西方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法国学者罗力耶《比较文学史：自滥觞至二十世纪》和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先后出版，标志这门学科的成熟。而比较文化学则更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蓬勃发展起来。

在中国，1898年发生了文化史上的两件大事。一是甲骨文和敦煌遗书的发现，为中国近代文化学术打开了新的视野，使之与国际学术界的沟通成为可能；二是京师大学堂的创立，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树立了第一块丰碑。这两件大事，使得中国文化进入了中外碰撞，古今对接，有了实质性内容，有了真正的现代性批判与创造的新世纪。它以几种重要的学术著作和文章在此前后的出版为标志，例如：严复翻译《天演论》的时间是1894年至1896年，出版于1897年；1902年梁启超出版了《新史学》；1904年，王国维发表了《红楼梦评论》。这些论著的文化思想、学术观念、文学主张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或倡言学术独立，强调学术本身的价值，或借鉴西方哲学和美学的观念诠释中国古代名著，传统学术的范围已经无法包容它们的内涵，可以说，它们表明中国学术、文化、文学的现代期已经开端，中国的比较文化学和比较文学也已经诞生。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蓬勃兴起和不断

高涨，才出现了比较文化和比较文学的高潮。鲁迅、郭沫若、胡适、茅盾、朱自清、许地山、郑振铎、朱光潜、钱锺书、傅东华、戴望舒等学者和作家承前启后，作出了各自的贡献。此后几十年中因苏联视比较文化学为资产阶级科学，中国随之，故无建树。直到改革开放后，再次成为“热门”的“显学”，专著和刊物出版发行，学科迅速传播发展。

无论西方国家还是中国，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和成熟，孰先孰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原因和意义。从原因看，有着共同的历史背景：一是“全球意识”和“地球村”的概念，随着各国各民族的交往日趋频繁而逐渐增强；二是“文化寻根热”随着各民族的觉醒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深层的文化交往也日显需要和迫切；三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促进了世界性的文化更新；四是冷战结束后，文化冲突与融合，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作用和地位更显突出，甚至成为世界多极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

事物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事物的意义。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有两种必需的土壤和气候：一种是自然的，即陆地、海洋、河流、森林等；另一种是文化的，即语言、历史、哲学、文学、科学、价值观等。前者滋养民族的肉体生命，后者哺育民族的性格灵魂，二者缺一不可。前者是自然的存在，永不消失，只需要恰当的耕耘、利用和保护；后者是人的创造，没有新文化的创造，就没有民族和国家新的性格和灵魂，就意味着精神的暗淡和消亡。许多民族的衰落和消亡，不是肉体，而是文化的衰落与消亡。这种衰落与消亡，又是在不同文化的比较、冲突、融合、竞争甚至征服中发生的。只有善于借鉴、善于学习、善于吸纳的文化才能成为优胜者。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都是优胜者。西方近代启蒙主义文化，就借重了中国古代文化；中国近代文化启蒙、文化现代化，更是借重了西方先进文化。没有这个文化的现代化为先导，就没有中国的近代和现代史。比较本身不是目的，比较是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发展。

第二节　比较文化中的文学与比较文学中的文化

文学是文化的一种形态，比较文学是比较文化中的一个子系统。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工作，必须积累各方面的文化知识，例如思想、科技、学术、宗教、教育等，知识面越宽越好。法国的艾金伯勒教授曾经告诫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人：“我希望我们的比较学者尽可能博学多闻；我甚至希望他具有百科全书编纂者那样的雄心。”① 如果不能从宏阔的文化背景上研究各国文学，不仅缺乏

① 王喜绒等著《比较文化概论》，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10页。

历史的、时代的，阶级、阶层、民族或社会集团的涵盖力，而且也很难开掘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使研究进入新的层面。如法国18世纪启蒙主义文学就是启蒙主义文化的一种表现形态，文学上的主要代表作家卢梭、狄德罗、伏尔泰等同时也是启蒙主义思想家；而19世纪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和诗人惠特曼作品中的浪漫主义——无论带有悲观色彩（对美国文明社会里贩奴者、强盗、吸血鬼所进行讽刺和批判），还是带有乐观主义色彩（对以个人为中心、敢于冒险、不断开拓前进的精神所作的肯定），都体现了美国建国时期实用主义的基本思想和对抗欧洲文化遗产的传统，表现了开辟新大陆的宏伟气魄。所以说，要从宽广的社会文化背景上，才能把握文学现象的本质。

文学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同其他文化形态相比，它反映社会生活最广泛、最直观，揭示人（民族、阶级、社会集团）的性格和灵魂最深刻、最生动，影响人类社会生活的方式和效果最敏感、最普遍，而且以激动人心唤起美感的潜移默化的形式，深入千家万户，进入心灵世界的深处。因此，各国比较文化的研究，往往从文学开始，甚至有人认为，作为一门国际性的开放型的学科——比较文化是比较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为，当人们打破国界、族界，把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宏观综合比较时，必然要分析和解剖产生某国某民族文学现象的全部历史文化的复杂性，才能了解世界文学发展的总趋势与规律，认识各民族文学的独特价值、意义及其在世界文学总格局中的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文艺作品中所反映的文化，不同于社会存在的文化原型，它是客观存在的社会文化在作家、艺术家头脑中的反映。文学作品可以帮助和引导人们认识异国、异民族的文化心态，而不能作为历史考察的现实的可作社会统计的事实依据。

第三节　中西文学的同质与差异

完全相同的事物，没有比较的必要；完全不同的事物，没有比较的基础。东方和西方，中国和外国，文学一般指的是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还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中国常简称为文论）。文学比较的方法，既有综合比较，又有诗歌比较、小说比较、戏剧比较等不同文学形式或体裁的比较，还有文论比较；也有断代比较、流派比较、作家比较和作品比较等。世界文学的同质性是文学比较的基础，而各民族国家文学的差异性使比较成为必要。我们这里要从文化的视角对中西文学进行比较，从中西不同的文化背景看中西文学的同质性和差异性，重点是差异性。因为差异性决定各民族文学的个性，决定世界文学的多元性、多样性和丰富性。但文学的同质性和差异性不像河水和井水可以

分置两处，同质性中包含差异性，差异性中体现同质性。

一、中西文学的同质性举例

同质性之一是文学的内容。文学的内容是社会生产生活和斗争在文学家（诗人、作家等）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写文学作品的是人，文学作品中所写的也是人；人为喜怒哀乐而写，写的也是人的喜怒哀乐。然而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恩格斯语），人总是离不开一定的物质生产的关系即社会关系；在阶级社会里，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不站到这个或那个阶级方面来，能够不为这个或那个阶级的胜利而高兴，为其失败而悲伤。各个时代、各个阶级、各个民族、各个社会集团和阶层的文学家，在他们各自的作品中所描绘的“人间万象”，不管如何丰富多彩、光怪陆离，都是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古今中外皆然。这就是文学本质的同质性。中国文学或西方文学都无例外。但在如何反映的问题上，中西文论和文学却有很大的差异。西方文论、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到18世纪，坚持“模仿说”，认为“模仿是出于人的天性”，“人对模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感”（亚里士多德），“天才的力作固然有其独创性，但也不过是一种模仿而已”（理查德·赫德），“模仿是诗人的标志，是诗人艺术的精髓”（拉辛）。在中国，自古以来坚持“物感说”，认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①]“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②]“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③]。“物感说”贯穿中国文学流脉之始终，同遵循“模仿说”的西方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差异。中国文学重抒情，重表现，感物抒怀，更具抒情韵味；西方文学重叙事，重再现，强调真实地惟妙惟肖地描摹、刻画，更具欣赏色彩。这使得同质而相异的中西文学分道扬镳几千年，直到现代才开始融合。

同质性之二是文学的社会作用和发挥作用的途径。古今中外的文学家都认为：文学具有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文学通过欣赏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功能，发挥自己的社会作用。对此，中国和西方国家只是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中国从孔子以来，把文学的社会作用和发挥作用的途径概括为“兴”、“观”、“群”、“怨”。“观”，就是“观风俗之盛衰”；“群”，指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促进理解与和谐；“怨”，是指倾诉人间的不平与悲伤；“兴”，是

---

① 《乐记·乐本》。

②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

③ 陆机 《文赋》。

指“托物兴辞”，“感发意志”，“引譬连类”，也就是精神的寄托，感情的宣泄，哲理与诗情的联想。西方一般都认同艾布拉姆斯的概括，即文学的功能及其发挥有四种状态：反映客观世界（包括他人的主观世界），以模仿为核心；具有道德教育和文化娱乐的作用；缓解作者的痛苦，抒发作者的感情；审美，即文学欣赏活动。西方的概括与中国大致相同。这是文学的文化本质和文学自身的特质所决定的：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是以社会生活为基础，具有鲜明的社会性质，如民族性、人民性、阶级性等；而社会意识一旦形成，又反过来影响社会存在，影响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但文学不同于哲学、经济学和其他科学，它是借助读者的审美感受即文学欣赏来发挥其社会作用的。就是说，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特别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时，全神贯注于文学意境之中，心驰神往，被形象和情感所打动，被生活哲理所征服，从而产生精神愉悦，受到启迪和教育。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同质性之三是文学创作的思维活动，都遵循“形象思维”这一共同的客观规律。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的形式，对客观世界进行科学的把握，是逻辑思维；运用形象的形式，在个别的、具体的，具有特征的事件和人物形象中揭示生活的本质和规律，是形象思维。形象思维不仅是文学创作的思维规律，而且是文学的生命。没有形象思维就没有文学的一切。形象思维就是把形象作为思维运动的形式，“永远从形象出发”（屠格涅夫），“用形象进行思考”（别林斯基），“把最高的思维自由地转化为生动的形象”（杜布罗留勃夫），把“眼中之竹”经过“胸中之竹”画成“手中之竹”（郑板桥）。形象思维是饱含着强烈感情的思维，巴尔扎克在描写高老头死后几天自己感到心情不愉快，福楼拜描写包法利夫人服毒时“感到自己嘴里有砒霜味”，姚雪垠写《李自成》，“常常被自己构思的情节感动得热泪纵横和哽咽”。形象思维是按照“审美规律”进行审美评价的思维，体现真、善、美的和谐与统一，感情与理智的统一。对此，古今中外的文学，不仅理念相同，而且表述也是相同的。

正是上述几方面文学的同质性，提供了文学比较的基础。

二、中西文学差异性举例

考虑到中国现代文学受西方文学的普遍影响，在比较文学差异性时，中国文学局限在五四运动以前。考虑到语言文字差异为人所共知，也存而不论。

差异性之一是关于文学的主题。爱与死、罪与罚是西方文学“永恒的”的主题，而忠与奸、义与不义是中国文学常见的主题。经常阅读中西文学作品，尤其戏剧、小说这种生活画面广阔、时空跨度较大、人物关系复杂、人际冲突激烈的文学作品时，只要我们稍加留心，就会觉察出这种明显的区别。当然这不是绝对的。中国文学也有类似爱与死为主题的，如《梁山伯与祝英

台》、《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但不占主导地位。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在文学史的长河中，忠与奸、义与不义的主题，始终占中国文学的主导位置。在西方文学中，也有写忠与奸、义与不义的，如《哈姆雷特》中那个杀兄淫嫂、篡夺王位的叔父，但在众多的文学作品和文学发展的历程中，居于从属地位。居主导地位的主题还是爱与死、罪与罚。这是中西文化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所决定的。在西方，爱是人性的本能，爱是生命的本质，爱是神圣的权利，没有爱就没有人生的意义和尊严，更没有人生的价值；只有死亡才能终结生命与爱；由此引发了无穷无尽的爱与恨、生与死的人生的欢乐与悲哀，伟大与渺小，崇高与卑下。在西方，还有宗教渗透一切，人是上帝的造物，上帝的子民，上帝爱一切人，降福于一切人，指引和保佑一切人；而人生来就有贪欲，不免要做出违背上帝旨意的错误，铸成大小罪过，上帝就要给予惩罚，让他（她）们遭遇劫难；人生就是不断爱上帝、爱他人、爱自己，不断感恩赎罪的历程。因此在西方，人生从呱呱坠地到最后去见上帝，爱与死、罪与罚本身就涵盖生活和生命的全部，描写社会人生的文学怎么能离得开它呢？而中国则不同，人生的意义总是忠与义联系在一起，对国家、对民族、对氏族、对家庭、对祖先、对朋友，都要讲忠义二字，不忠不义非人也。忠与奸的斗争、义与不义的矛盾，构成中国社会生活的主题，从闺中愁怨、仕途沉浮到沙场征战，产生了无数生离死别的慷慨悲歌。中西文学主题的差异性，反映了中西文化思想的差异，也是由文化差异所决定的。

差异性之二是关于文学作品的情节、结构和人物命运。在中国常常是大团圆结束，在西方总是由命运安排一切。中国人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一切都报；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最后审判在人间完成；儒家的入世思想，从来没有被佛家、道家的出世观念所淹没。西方则不同，相信彼岸世界，人间的正义与非正义，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最后审判在上帝的“裁判所”，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服从命运的安排，灵魂才能到达彼岸，有幸者进入“天堂”。因此，中国很少有大悲剧，即使有，如《窦娥冤》，最后也可平反昭雪，美好的东西虽然撕裂了，心灵的伤口流血了，又缝合了，康复了，万事大吉了。西方则常有大悲剧，从古希腊的悲剧到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李尔王》，直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美好的东西撕裂了，毁灭了，邪恶的东西胜利了，或同归于尽了，心灵的伤口永远在震颤中流血……命运如此，上帝的安排如此，人是无能为力的。上帝呀，怎么会这样呢？命运的悲剧是永恒的？

差异性之三是关于文学作品对自然界的描写。西方文学倾向于对原始自然的真实的描摹，中国文学呈现的是“人造的自然”。西方文学，尤其是西方小说和长篇叙事诗中，乐于和精于对特定的时空里的自然景物，进行精致的逼真

的描绘，如油画，如照相，如盆景。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中倾向于并善于对浩渺无边的大自然，融进丰富的感情和想像，进行大手笔的写意涂抹，如山水画。在西方文学作品中，自然界只是情景，一种衬托，很少能读到“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种意境和气势。在中国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里，很少能读到西方小说中那样对自然风景的大段的长廊式的白描。西方文学中的自然，外在于人，根植于“主客二分”的自然观；中国文学中的自然，内化于人，本身似有情于人，根植于“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也是不同的文化使然。

差异性之四是关于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刻画。西方重典型、重个性、重心理描写，中国重类型、重脸谱、重气韵。中西同样遵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创作规律，但塑造人物的方法有很大差异。独特鲜明的个性，是西方文学作品人物形象的生命，无个性则无生命，司汤达的《红与黑》中的于连，巴尔扎克的《夏倍上校》中的上校，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的宝尔康斯基公爵，他们身上吸引读者的闪光点都是自身性格的矛盾，而这种独特性格的塑造又是通过环境的典型性、细节的真实性特别是心理描写来完成的。而特有的“气韵”主要是人物内在的“气质”、“气度”、“胸襟”、“神韵”，是中国文学作品中主人公的生命，没有“气韵”，人物站不起来。单刀赴会的关羽、负荆请罪的蔺相如、施空城计的诸葛亮、煮酒论英雄的曹操、打虎上山的武松以及葬花的林黛玉等形象，都凝聚和宣泄一种“蓄之已久，发之则烈”的“气”。在中国文学形象的塑造中，也不是绝对没有细节与心理的逼真的刻画，但更多的是常用类型化、脸谱化的方法，忠臣良将与乱臣贼子，才子佳人与奸夫荡妇，文人骚客与市井平民，君子与小人，善与恶，贵与贱，文与武，都有类型，戏剧中则有脸谱，有生、旦、净、末、丑与之对应。人物一登场，穿戴、坐骑、须眉，先要交代清楚，已经程式化了，但只是从外形上标志人物的身份和类型，而人物形象吸引读者的闪光点，则是人物特有的“气韵”。“气韵”就是人物的生命。人活一口气，这是中国人的活法，也是中国文学形象的活法。而“气韵”比“个性”更难写。

差异性之五是海洋意识与高山风骨。就文学整体气质而言，也就是整体风格而论，我认为西方文学具有海洋性格，中国文学具有高山风骨。不仅是文学，而且包括文化，甚至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民族的心态和性格，首先渗透了这种区别。西方文化发源于欧洲。欧洲陆地面积1 016万平方千米，中国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千米，大小相近，但欧洲的海岸线是中国的十倍。欧洲文化发源于地中海的古希腊、古罗马，是海洋文化；中国文化发源于黄土高原，是高原文化。从远古时代起，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西方主

要国家、特别是现代发达国家，其政治、经济、军事利益都首先是从海上的冒险和扩张中获得，同海上霸权和优势联系在一起。相反，中国历代中央和地方统治者，很少从海上获得巨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利益。当西方列强把海洋开放、海上竞争作为基本国策的时候，中国明王朝却在大力推行“海禁”。中国并非不具备海事能力，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的。许多人为明王朝错过了融入世界大潮的历史机遇而扼腕叹息，其实，15、16世纪中西海上政策的差异是自然环境的影响和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结果。西方各民族长期形成的强烈的海洋战略思想、海洋价值观念、海洋精神，不得不反映在文学艺术中。伟大的荷马史诗下半部《奥德赛》就是海上漂流十年的记录，直到20世纪美国作家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许多文学艺术的形象同海洋联系在一起，同海洋精神和海洋性格联系在一起。果戈理、契诃夫、格林等著名作家还有拉斐尔、列宾等著名画家都在海上之城威尼斯生活和创作过，圣马可广场的一家咖啡店里至今挂着一块牌子：“福楼拜先生曾坐此椅”。另一家旅馆门口刻着“拜伦1816—1820年在此居住、创作《唐璜》”。中国的许多文学艺术形象则同大山大河联系一起，许多名篇名句也是同登山、登高、登楼联系在一起。名山大川，风云际会，是帝王朝拜之地和公子王孙、文人骚客寄情之所，而不是大海。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一个在大海的惊涛骇浪中搏击呼号，一个在高山大河上攀登吟咏。不同的处境、不同的心态产生不同的风格、不同的魅力。虽不是所有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如此截然不同，但就整体的文学气质而言，这种差异却极为明显。江山可改，秉性难移，至少这是个值得研究的差异性。

差异性之六是关于“两为”与“两式”，这是文学历史发展与流向的问题。这就不仅包括古代和近代文学，也涉及现代文学了。自古以来，中国主张“文以载道”、“诗以言志”。“嘲风雪，弄花草”的也有，但不是主流。中国古代文学的光辉传统是“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两为”方针。五四以后的新文学运动本身就是社会革命和革新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建国以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文艺方针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可以说是新的“两为”方针。中国的新文学，纵向继承了古代文学的传统，横向借鉴了西方文学的传统。西方文学自古以来，有人概括为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代表了西方文学艺术两个基本的源流，一条是现实主义，重“客观再现”、重“摹写”，简称“荷马方式”；一条是现代主义，重“主观感情”，重“表现”，简称为“圣经方式”，合称“两式”。西方文学史上，“荷马方式”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但20世纪10—20年代，“圣经方式”以现代派为旗帜，一度崛起成主流之势，30年代现代派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重新抬头，“两式”互相融合、渗透。现实主义流派

产生了一批世界一流的作家，有着强大的传统，中国新文学受其影响较大，受益匪浅；现代主义虽猛烈冲击西方文坛，但未出现卓越的、举世瞩目的作品，而现实主义流派却向它学到一些新的表现手法，丰富、提高了适应新潮流的能力。现代派是有贡献的，开拓了新的描写领域，探索了新的表现方法，反映了现代生活的节奏，对中国当代新文学有较大影响。然而现代主义的消极影响，如反现实主义、厌世主义，以及下意识、色情等一笔抹煞传统，走上了反文学、反文化的邪路，不符合文艺规律，也为社会良知所忌。中国新文学应引以为戒。

中国和西方国家，三千多年历史积淀下来的丰富的文学遗产，是中西灿烂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文化和文学交流的历史也有数百年。二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世界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再次引起世人瞩目。包括以儒家为代表的政治伦理文化，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军事文化，以《周易》、老庄哲学和以墨翟、张衡、祖冲之为代表的中国科技文化等，引起各国人民高度的兴趣。而中国文学题材广泛、意境开阔、内涵丰富、意蕴深远、文字精美。对中国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已成为全球人文科学的一大热点。中国人也将全方位地研究世界文化，特别是西方。我们无须轻信“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但中国要加速了解世界，世界要加速了解中国，文学——反映了各民族生态环境，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独特的民族心理和审美情绪，充满艺术魅力的精神明珠——将继续担当第一文化大使的重任。

参考资料

1 王富绒等．比较文化概论（文学部分）．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

2 罗可群，伍芳裴主编．中外文化名著选读．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3 舒春年．意大利人文主义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4 狄百瑞．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何兆武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5 徐松岩．海洋意识与西方古典文明．光明日报．2000－01－21

6 外国文学教学参考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

7 外国文学作品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

8 余怀彦．星条旗下的文化．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8

9 今天的威尼斯商人卖什么．每周文摘．2000－06－30

第二十一章　中西文化与我国大众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大众文化来势迅猛，人们还来不及做出恰当的反应，它就涌进了城镇千家万户。对此，社会各界肯定者有之，批评者有之，忧虑者有之。

第一节　什么是大众文化

这里所说的“大众文化”，是一种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信息化、商业化、产业化的现代文化形态。它不是我国传统意义的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

大众文化，在20世纪初还是少数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现象。现在，大众文化已成为世界性的普遍现象。

在我国，大众文化的兴起，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事。改革开放，不仅是经济行为，也是文化行为。既要改革开放，就不可能筑起“文化隔离墙”，境外、海外的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不可避免地向我们涌来，涌来最快的是大众文化。流行歌曲、摇滚音乐、时装表演、现代舞蹈、畅销小说、卡通片、警匪片等在市民大众中很有市场。青年成为这类文化的主要消费者。夜总会、酒吧、录像厅、歌舞厅、卡拉OK厅、台球房、电子游戏厅、音乐茶座在中国城镇、大街小巷如雨后春笋，随处可见。据《中国文化报》1998年4月21日载：截止到1997年底，全国共有文化产业机构31.3万个，从业人员167.4万；全国文化娱乐业共有机构17.7万个，从业人员94万；全国文化市场经营机构共8万个，从业者22万人。据《人民日报》1998年5月7日载：全国文化市场各类经营单位固定资产原值426.9亿元，主业营业收入198.8亿元，实现利税47.9亿元，文化产业已成为第三产业中举足轻重的一个部类。这就是大众文化的现实。不管喜也罢，忧也罢，大众文化作为一种现代文化形态，终归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

第二节　大众文化产生的原因

大众文化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时代的潮流。当人类的脚步跨进20世纪的时候，随着科技的进步，

市场经济成为一种潮流席卷世界每个国家，商品之光普照每个角落。工业化、城市化、商业化成为这个时代的表征。于是，在世界范围内，古典的、宗教的、启蒙的、浪漫的、批判的、政治的、严肃的文化传统，受到猛烈冲击；一个以文化工业生产为特征，以娱乐和消遣为目的，以市民大众为消费对象，以现代传播媒介为手段的大众文化产生、推广、蔓延了。随着中国实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步伐，大众文化也像潮水一样漫上华夏大地。

第二，文化工业的创造。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述："生产创造消费者"，因为"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在客体方面，而且在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①] 大众文化的兴起导致了文化工业的出现，文化工业的兴起又促进了大众文化的繁殖。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已失去了创造者的个性，生产手段标准化，产品批量化，主要已不是精神的劳动，而是复制与拷贝。大众文化产品的接受者，不是憧憬田园生活的淳朴的农民，也不是恪守高雅传统的知识分子，而是追求娱乐消遣的城镇市民大众。马克思关于商品生产与消费关系的论述告诉我们：生产与消费是互相依存的，生产为消费提供外在的对象，消费为生产提供内在的对象。生产创造了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而且创造了消费的主体。大众文化的消费主体，是文化工业所创造的。

第三，科学技术的推动。20 世纪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大众文化提供了便捷的载体。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视录音、录像，特别是微电子技术、卫星传送技术、光纤通信技术、光储存技术的出现，使大众文化对时间和空间获得了更强的占有性，对消费者产生了广阔的吸引场和更大的强迫性。它毫不费力地摧毁了信息时代以前的文化传播的各种障碍：地区的、阶层的、民族的、国家的、自然的或人为的。

第四，消费的需求。市场经济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经济状况的改善和闲暇时间的增加，提供了娱乐消遣的普遍可能性。这种娱乐和消遣，只注重娱乐性，缺乏甚至没有对生活底蕴的理性思考；突出的是流行性和时尚性，追求瞬时的愉悦和轰动效应，不在乎有无文化积累价值；强调的是大众参与性，以满足众多消费者的需求为尺度。这种娱乐和消遣同大众文化的商品化、产业化互相适应、互为基础。故大众文化无论怎样平庸浅陋，只要能满足人们的娱乐和消遣，就可以大行其道。

第五，多元文化取向的宽容与接纳。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的文化观念上，人们的理想、信仰、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生活态度多元化了。在某些文化圈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消失已是时髦；"淡化政治"、"躲避崇高"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0 页。

已不够用，“告别革命”才过瘾。有人提出，一元文化已经分化为三个层面的文化：体现国家意志和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化；代表知识分子价值和立场的知识分子文化；反映市民文化精神的大众文化，并且形成了各说各话、互不对抗的文化格局。其实这个分析是不符合实际的，至少没有独立的知识分子文化。其实，无论是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中心文化和边缘文化，其生产制作者都是知识分子。“三个层面的文化”格局一说，与其说是文化的分析，不如说是文化的无奈，是对多元文化的无可奈何的宽容或心甘情愿的接纳。有了这种宽容和接纳，大众文化的生产和消费都可“一路绿灯”，免检通行了。

大众文化产生的根本原因很清楚：西方文化的影响是外部条件，市场经济的启动是内部的根据。

第三节　大众文化的社会评估

大众文化的出现，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倒退，是文化的繁荣还是堕落，利弊褒贬，应有公论。不可从某个抽象的原则出发，不能从个人的好恶出发，而要从国情出发、从是否有利于社会全面发展出发。

第一，大众文化的积极意义。

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与发展目标这一角度而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所蕴含的工业文化精神、商业文化意识以及世俗文化追求，对于推进中国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等现代进程，无疑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我国12亿人口，绝大部分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一部分现代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学技术水平落后的状况同时存在；生产社会化程度还不高，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仍占相当比重。我国完全实现工业化还要走很长的路。实行市场经济在我国刚刚开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意识还很薄弱。这是因为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农业文化所遗留的个体生产意识、封闭意识、非商品化意识还在阻碍市场意识的生成。而大众文化所蕴含的科技意识、信息意识、商品化意识、开放意识恰恰是对农业文明的文化批判，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推动。

大众注重现实的娱乐与消遣，追求情感的轻松表达和随意宣泄。这种文化的务实精神，对过去那种故作深沉的守旧文化心态和空泛许诺的文化理想，也是一种有益的冲击和否定，使某种过时的“贵族文化心态”出丑，应当说这也是一种进步。

所以，我们应当承认大众文化的出现和蓬勃发展，是一种社会进步和文化

进步的现象。在总体上，体现了对时代精神的趋附和追随。特别是让那些很少有条件去享受高雅文化的市民大众和青年，从唾手可得的大众文化中获得了对时代精神的某种理解和感悟。时代精神不是神秘的、高贵的、凡人不可接近的圣物，它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社会经济关系运动所决定的社会发展趋势的主流，其文化精神，包括理论的凝结、价值的取向、心理的倾斜。固然要通过高雅文化来体现，同时也能被大众文化所体现，尽管可能不如高雅文化那么深刻和庄重，尽管比较肤浅。大众文化所获得的对市场经济的内在适应性，有利于形成文化产业，有利于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旧文化观念、文化模式和文化体制；它能借助现代传媒，使文化的共享性得到真正实现，客观上使文化不再成为少数人的特权，而变成多数人的生活方式，这又是高雅文化所不及的。

第二，大众文化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所出现的消极倾向，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造成文化生态失衡。大众文化的生产、消费和传播受市场规律的支配，凭借其商业炒作的优势，实现了对大众文化生活时间和空间的占有。虽然打破了长期以来严肃文化独占文化领域的格局，但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和高雅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冲击，造成了大众文化对社会文化领域的垄断之势，导致社会主义文化生态的严重失衡。这对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极为不利。

二是导致文化人文精神的失落。本来，娱乐消遣是人类正常的精神生活。马克思把这种生活称作“享乐的合理性”的满足，并不以为精神生活与社会主义相抵触。但是大众把文化娱乐消遣作为主要价值加以实现，出现了“精神快餐”的消费模式，追求感官刺激，“跟着感觉走”、“潇洒走一回”、“过把瘾就死”、“玩的就是心跳”，这种非理性的文化享受在社会上流行起来，造成了消费的盲目扩张，为一些凶杀暴力、色情淫秽、愚昧迷信的文化垃圾提供可乘之机，毒化社会环境，吞噬了不少纯洁男女的青春和生命。

三是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国外特别西方的腐朽文化，得到了一条入侵的“高速公路”。电子技术使诉诸视觉与听觉的大众文化率先成为世界性的、全球性的覆盖网。精神产品的全球化比物质产品要快捷方便得多。它在给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娱乐方式带来变化的同时，也将给人的感性体验、认识方式、思维方式带来变异。其积极意义显而易见，其消极影响不可视而不见。五光十色、光怪陆离、令人目眩神迷的异国情调所提供的“精神产品”不仅是丰富多彩的，也是良莠不齐、扑朔迷离、不可预测的。各种趣味、各种嗜好、各种欲望——从精神到物质，从心理到生理、从低级到高级、从卑琐到高尚，不一而足。你选择什么？选择的自由和自由的选择，决定于你的价

值观。这是国际国内价值观念的挑战。这个挑战，不仅是国民个人文化生活的挑战，更是国家和民族精神的挑战。其正面可能风光无限，其负面则是触目惊心。在这个挑战面前，如何尽快结束力不从心、疲于奔命、顾此失彼的被动状态，是一个紧迫的课题。

第四节　大众文化建设的引导与规范

文化代表民族的形象。因为文化是社会发展的价值系统、智力资源与人文环境之所在。文化的性质与品位，直接决定社会发展的境界。当前，既要肯定大众文化的进步意义，引导其继续发展，又要制约其消极影响，确保其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方向健康发展。

其一，要确立大众文化建设的价值坐标。大众文化尽管是一种商业文化，有自己运行的特殊逻辑，但是作为文化现象，它应不同于一般商品。大众文化的价值坐标应是：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基本路线、基本理论为价值导向和思想指导，以培育“四有”公民为目标，以发展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为社会职责，崇尚真、善、美，摒弃假、恶、丑。

其二，要规范大众文化市场。要通过文化行政和文化立法与执法对大众文化市场进行调控与规范。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与文化市场管理规则，使严肃文化与通俗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协调发展，消除当前大众文化市场畸形膨胀、混乱无序的不正常现象。要依法、按政策规定消除暴力、色情、封建迷信的垃圾，用健康无害的娱乐取代那些浅薄、浮躁、媚俗、肮脏的东西。

其三，引导高雅文化、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互相渗透。在明确各自职责的前提下，消除文化的高雅性与通俗性之间的鸿沟。高雅文化在保持其人文精神与超越意义的同时，从内容到形式要增强其可接受性，把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统一起来，真正做到雅俗共赏、养性怡情，借助大众文化媒体和形式，寻求在现代文化背景下进行传播的更广阔的空间；大众文化应以主流文化为价值取向，在保持其通俗性、娱乐性、消遣性的同时，提高自己思想与艺术的品位，强化其人文意味与教育意义。

其四，教育和引导大众文化的创作者，坚持人文知识分子的道德操守，坚持文化正义，保持文化人格。教育和引导大众文化的生产者和经营者积极寻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最佳结合点，绝不可用低俗、丑恶的东西毒害大众心灵。同时引导和教育大众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和鉴别能力，懂得一点文化的理性思考和道德审视。

其五，正确认识大众文化“与国际接轨”的问题，既不可认为外国流行

的大众文化特别是西方的，一概都坏，拒绝接收，也不可以为一切都好，全盘接收。要如实介绍，正确分析消化，吸收健康有益的，抵制有害的。还要学会真正懂得异国风情，以丰富我国人民的民族艺术修养。

以流行音乐为例。我国以及东方各国的流行音乐，是从欧美流行到全世界的。这些年来，唱片店里琳琅满目的欧美音乐品种，一次次人山人海的国际音乐节，说明中国乐迷——大众文化的消费者们的欣赏兴趣正在与国际接轨。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东施效颦者甚多。结果，外国的好东西到了中国人手里，变了味，贻笑大方。有关部门和专家要做人民群众的指导工作。

学什么要选择。选准了也要弄懂才学。如布鲁斯（蓝调音乐），它是公认的当代欧美流行音乐的根源之一。它属于美国黑人民间音乐风格，早在南北战争之前就已定型，黑人奴隶们为它创造了独特的音阶和声，用它排遣苦闷、寄托思乡之情，带有很强的幽怨色彩，因此又被称为“怨曲”。学习者不懂，离开了“幽怨”情调，就变味了，变成了“四不像”了。

总之，我国大众文化出现的时间不长，但已成一道风景，又有许多失范之处。对其放任与苛求，均无济于事；对其引导与管理、则可助其成。应当做到，我们的大众文化既不是西方大众文化的移植，也不是中国传统通俗文化的复制，而是符合时代要求，适应国情，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吸取外国文化精华，为广大城乡人民喜闻乐见的新文化形态。

参考资料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　孙占国．论当前大众文化形态．新华文摘．1995（05）

5　对中国大众文化建设的思考．光明日报 2000－02－04

6　积极引导大众文化发展　光明日报．1999－11－26

7　警惕大众文化的低俗倾向．光明日报．1999－11　24

8　欧美流行音乐．南方日报．1999－03－10

9　我们所面对的文化现实．理论前沿．1998（17）

第二十二章　中西文化与社会礼俗

礼俗包括礼仪和风俗。各国民族的礼俗是在长期的人与人的交往中形成的，是同地理环境、物质生活、社会制度、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相适应的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随着国际交往频繁，在尊重各国各民族礼俗的同时，也形成了世界各国人们交往的一些共同礼俗。礼俗渗透在辞让、迎送、衣饰、饮食、婚寿、祭奠、日用起居的方方面面。人们必须以礼随俗进行社会交往，否则会被认为是“失礼”或“无礼”。必要的礼俗观念和行为，已成为人的生活方式、伦理风范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知识阶层和公务员又往往是国家和民族礼俗文化的主要代表。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走出国门和留在国内参与跨文化交际的人越来越多，需要了解和学习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的礼俗常识、原理礼节和实际技能。近年来，跨文化交际的理论教育和实践培训盛行。人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学习掌握各民族的繁琐礼俗，那是民俗学家、人类学家的事。但有必要在理论上了解礼俗的重要性，在日常交往中做到言行得体，礼貌待人。

第一节　礼俗的理论意义与实际意义

礼俗是世界观、价值观的标志之一。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根本看法，包括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等诸多哲学方面的概念。价值观就是判断好坏、是非的标准，它引导人的行为方向。对隶属于不同文化的人，是与非、好与坏的判断，受不同价值观的影响或支配。世界观和价值观，作为概念是抽象的，但在礼俗上可以具体看到。西方人结婚，在教堂行礼，因为信基督、敬上帝，中国人成亲，一拜天地、二拜高堂，是因为古文化中的敬天地、信阴阳、敬祖宗的观念所致。树上结满苹果，小孩不去摘吃。你问西方小孩，他会说：“我不能去摘，因为上帝看着我。”你问中国、日本的孩子，他的回答是：“那是人家的东西，我不能要。”西方人认为自己是上帝之子，无时无刻不受上帝监视与庇护；中国、日本多数人不信上帝，信古代文化中儒学道德准则：不取不义之财。“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家长从小教育小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礼俗反映语言行为的文化特性。如接待顾客，不同国家的商店，营业员使用的语言不同。

中国：你买什么？（或"您要点什么？"）

日本：欢迎光临。/いりつしいませ

美国：我能帮助你吗？/Can I help you?

中国的传统，营业员应该把顾客当客人尊重；日本的传统是，营业员必须把顾客当客人尊重；美国的传统是，营业员把顾客当作需要帮助的对象。

礼俗表现非语言行为的文化内涵。非语言行为又称体态语言。在跨文化交往中，它往往包含不同的意义。日本人的鞠躬、欧美国家人的拥抱接吻、拉美国家人的脱帽致意都表现了各自的文化特征。非语言行为传达的信息在不同文化之间可能产生误解。有一美国人在泰国旅游，休息时不经意坐在寺院一尊佛像头上，被人拍下来，结果被驱逐出境。身体动作特征、服饰穿戴、香水味道、房间摆设的光线和色彩等非语言交际因素的重要性已超过语言交际因素。

第二节　中西方的服饰文化

中国和西方的服饰文化各具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特色，它们都是人类祖先留下来的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世界文化宝库的瑰宝。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服饰文化越来越受重视。社会全员特别是女性，都是服饰文化的消费者和欣赏者，而且形成了专家、设计师等研究队伍和时装模特群体，成为各国民族社会生活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成为审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方和西方服装审美体现了不同的文化底蕴：

中国文化起源于大陆文明，文化本能比较封闭，服装上也具有固执"原休"意识，传统服装形制几千年比较稳定。

西方文化善于表现矛盾、冲突，在服装构成上强调刺激、极端的形式，以突出个性为荣。

中国文化重和谐，强调均衡、对称、统一的造型方法，以规矩、平稳为美。

西方文化是一种明喻文化，重视造型、线条、图案、色彩本身的客观化美感，以视觉舒适为第一。

中国文化是一种隐喻文化，重视抒情性、追求服装构成要素的精神寓意和文化品位。

西方崇尚人体美，重视展示人体性别差异，不忌讳表现性感。古典模式是表现女性第二特征，如露颈、露肩、露背、半胸，以紧缩腰围和垫臀来表现女

性胴体曲线；现代模式以简约形式表现人体自然身形，以短露和紧身为现代时髦。

中国传统文化漠视“性”的存在，服装不表现人体曲线，不具备感官刺激要素，宽衣博带，遮掩人体，表现的是庄重、含蓄之美。

由于审美心态的不同，几千年来，中国和西方服装，在式样、外形特征、结构特征和装饰、面料、色彩和图案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

就式样而言：中国传统服装的主体形式是前开型的大襟和对襟式。女子上衣下裳、男女上下连属的袍衫居多。西方从古希腊至中世纪，男女都以非成型或半成型的披裹式为主，4世纪，日耳曼族南下，其四肢分离的体型服装影响较大，从13世纪开始，体型占主导地位，男子上衣下裤，女子上下连属裙装。

就外形特征而言：中国传统服装的外形强调纵向感，自衣领部位开始自然下垂，不夸张肩部，常用下垂的线条、过手的长袖，筒形的袍裙，纵向的装饰等手法，使人体显得修长。西方古典服装的外形强调横向感，常采用扩张肩部轮廓、各种硬领、轮状领、膨胀的袖型、庞大的裙撑，使服装线条产生夸张和向外放射的效果。中国平顺的服装外形与中国人脸部较柔和的线条相适应；西方夸张的服装外形同起伏明显的脸部轮廓和高大体型相适应。

在面料、色彩和图案上：中国古代服装的面料，始以麻，继之以丝，用棉较晚（明清以后从印度传人）；西方服装面料古希腊、古罗马以毛和亚麻为主，中世纪以后引进中国丝绸。中国传统服装的颜色，上古时代，黑色被认为是支配万物的天帝色彩，夏、商、周天子冕服均为黑色。秦以后，人们把天帝崇拜转向大地（黄色）崇拜，形成了“黄为贵”传统观念，黄色为帝王专用色。对应阴阳五行观念，青、红、黑、白、黄五色为正色，其余为间色，正色大多数朝代为上流社会使用，民间则对蓝色有专爱，与黄种人肤色相配，产生柔和色比。西方古希腊以白色、紫色为主，白色象征纯洁，紫色象征高贵，上流社会常用，民间则用毛、亚麻本色；中世纪以后宗教盛行，追求斑斓神秘的天堂色彩；文艺复兴以后，朝野服饰均尚奢华，色彩明亮闪光，法国人喜欢丁香色和蔷薇色，迷恋含蓄的天蓝和圣洁的白色，西班牙人崇尚高雅的玫瑰红和银灰色调，英国人认为黑色神秘高贵，贵妇尤其首选黑缎和黑天鹅绒。在图案上，中国传统服装，从古至今崇尚吉祥，如龙凤呈祥，龙飞凤舞、九龙戏珠，晰龙闹灵芝，隐喻图腾崇拜，抒发“龙的传人”的情感，官服的图案重视标识作用，明清两代，皇帝穿龙袍，文官穿“飞禽”，武官穿“走兽”，历代民间则喜欢鹤鹿同春、喜鹊登梅、凤穿牡丹，团鹤仙寿、福禄寿喜、连年有余、吉祥八宝，寄托美满生活的愿望，可谓丰富多彩，各得其所；西方服装的图案古今变化大，古代多兴花草纹样，文艺复兴时期流行华丽花卉样，近代和现代

流行野兽派的“杜飞花样”，以星系宇宙为主题的迪斯科花样，利用几何错视原理设计的欧普图案，用计算机设计的电子图案等。

尽管当代世界，中西服装文化融合之势甚为强大，中国现代服装西化之势明显，但审美传统不变，服饰韵味仍然有别。西服东化之趋势，也时隐时现。服饰文化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时代，主要在中西之间或东西之间的互补互学。

第三节　中西方的饮食文化

衣食住行，衣为首，食为天。中国和外国，东西南北中，莫不如此。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及其他东西。”① 因此，服装文化、饮食文化、居住建筑文化，是人类文化的基础和前提。

中国饮食文化，堪称世界之最，号称“烹饪王国”。如今走遍世界各国餐饮业，到处有中餐馆，尽管已经受到西方现代餐饮业的很大冲击。

中国饮食文化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具有稳定特点的饮食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它是一种以素食为基础，讲究知味与养生、注重等级与和谐的素食——伦理文化。亚洲各国都受到很大影响。同西方饮食文化相比，它具有鲜明的特色。

其一，历史最悠久。中国饮食文化萌芽于夏、商、西周，到春秋至汉末已有雏形，唐代后期到元末就基本定型，明初至清代中叶完全成熟兴盛。鸦片战争前夕，西方餐饮文化传入，中国现代饮食文化也悄然兴起。上起文明初曙的夏代，下至文明发达的今日，数十个民族交流同化，共同创造，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这是世界各国所不及的。

其二，结构最系统、最完备。唐代定型之后，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各个层面发育完备。在食料方面，种类之多自不必说。在食品加工方面，磨、碓、杵已广泛使用，面条、包子、饺子、馒头、米饭已成为多数民族的通食，煮、蒸、炒、熏、炸、脍、炙等烹饪方法和油盐酱醋等调料已全，“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谚语，唐朝就有了。主要菜系如“南食”、“北食”、“川饭”、“回回食品”、“素食”等基本形成。食器食制，与今无异。此外，各类酒茶饮品，如黄酒、果酒、蒸馏酒、葡萄酒、茗茶、茉茶、腊茶也趋于定型。餐饮业长足发展，通都大邑都有各种茶楼酒肆、食店果铺，而且服务规范。还有引药入食，营养卫生、食疗保健。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中华民族有了高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页。

文明时，欧美不少民族还处在茹毛饮血时期。这也是世界各国公认的。

其二，饮食不仅是满足口腹之欲的个人行为，也是礼制精神的社会实践。高官显贵、文人学士不少人著书立说于饮食研究。一部《论语》出现“食”与“吃”71次之多，孔子不厌其烦地讲授饮食之道。《周礼》、《礼记》、《仪礼》、《吕氏春秋》《晏子春秋》、《淮南子》、《黄帝内经》等负有盛名的经典都有关于烹调的精辟论述。西晋以来，就有饮食研究的学术专著，晋代的《安平公食学》、南齐的《食珍录》、北齐的《食经》、清代袁枚的《随园食单》、朱彝尊的《食宪神秘》以及各种烹调专著达数十种之多，可谓世界之最。使西方人惊异的是，中国的皇帝、太子、宰相、达官贵人、文人淑女之中皆有名厨，并以此为荣。这是因为，儒家文化核心思想是以“礼”为本源，而“夫礼之初，始诸饮食”。饮食与礼起源相连，就给这一生活行为赋予了伦理的内涵。中国人习惯于把人生的喜怒哀乐、婚丧喜庆、应酬交际，导向饮食活动，用以礼尚往来，增进人与人的关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中国饮食思想与中国文化共生共长，成为世界文化的奇葩，受到世界人民的赞誉。这是西方饮食文化中所没有的。

在西方，没有像中国传统饮食文化这样是数千年发展起来的、理论与实践都极为系统完备的、同伦理相结合的、相对稳定的饮食文化。著名的意大利菜、法国菜，还有欧洲与俄罗斯的白兰地酒文化，在世界都久负盛名。但它们是彼此独立的，不成体系。西方各民族的饮食观念、饮食礼俗、食品加工、饮食器具传到中国，是近现代的事。西方的烟、酒、糖、罐头、点心以及当代麦当劳等，是同工业化和西方生活方式同步传入中国的。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垄断局面已被打破，一部分开始走向衰变，一部分走向现代机器生产，饮食文化的伦理也在淡化。但传统饮食文化不可能被吞没，会同中国的中医中药一样，经过新的改革与挖掘，通过中外的豪华酒楼、星级宾馆、现代饭店走向新的时代、新的世界。

第四节　独特、奇异的礼俗文化

旅游已成为当代世界性的新的文化现象和产业。现代化的大都市、名胜古迹和奇风异俗成为旅游观光的热点。尤以奇风异俗引人入胜。

据有关资料的初步介绍和统计，世界上约220个国家和地区中，具有独特的或奇异的、引起其他国家地区关注的礼俗的，约有50个国家和地区（约占全世界的22.7%）。其中亚洲有16个国家和地区，占32%；非洲有14个国家和地区，占28%；欧洲有10个国家和地区，占20%；南美（拉丁美洲）有6个国家和地区，占12%；大洋洲有4个国家和地区，占8%。就是说，发达国

家和地区保存奇异风俗较少，而不发达也就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保存较多。东方多于西方。

从宗教信仰为标志的世界大文化圈来看。在五十多个有独特和奇异风俗的国家和地区中，多数居民信仰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的29个，约占50.9%；信仰伊斯兰教的16个，约占28.1%；信仰佛教和藏传佛教的9个，占15.8%；儒学文化圈的3个，只占5.2%。西方多于东方。

从独特和奇异风俗的内容和形式看，同衣、食、住、交往关系最为密切。

同饮食有关的有：新加坡禁食节，马来西亚右手抓食，阿富汗只喝茶不喝酒，蒙古喝马奶，汤加人吃饭时禁止说话，瑞典禁酒，法国人爱白兰地，加拿大因纽特人以麋鹿和海豹为主食等。

同服饰有关的有：日本穿和服，印度妇女穿纱丽，也门男士爱穿西服配白色短裙，阿曼妇女除脚部外全身穿金戴银，牙买加人爱戴麦秆草帽，荷兰人爱木鞋，挪威爱穿红色，朝鲜人爱穿白色，马里人爱穿黑色，科特迪瓦爱穿艳丽多色等。

同居住有关的有：毛里塔尼亚以尖顶帐篷为高雅，肯尼亚人喜草顶泥筑屋，而萨摩亚人的屋似凉亭并四周挂草帘为佳等。

以上同吃穿有关的独特风俗已达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大约50个国家和地区中已占50%以上。

此外，同交往礼节有关的也不少：也门最隆重的待客方式是为客人熏香，喷香水；阿曼人做客时必穿圆领长袍，扎头巾、戴佩刀；波兰人爱行吻手礼；尼泊尔人摇头表示同意，点头表示不同意；马来人接触摩擦掌心而不准摸头；新西兰毛利人待客最高礼仪是碰鼻等。

还有同习俗有关的也不少：印度尼西亚米郎加宝人男嫁女娶，缅甸、柬埔寨先当和尚后结婚，印度妇女额上点吉祥痣，布基纳发索男子上下嘴唇穿孔插木和文身，西班牙人斗牛等。

直接同宗教有关的反而不多：巴基斯坦每天要向麦加方向膜拜五次，科威特平均900名礼拜者有一座清真寺，毛里求斯宗教节日多而且均奇装异服游行庆祝等。

少数国家保留古代动物崇拜的：贝宁尊蟒蛇为圣物，每年9月15日为蟒蛇节；马达加斯加，以蛇和鳄鱼为圣物等。

个别习俗世界上绝无仅有：玻利维亚的印第安人不能发声，即无发声机能，只用手势语交流。

这些奇异的独特的风俗，只在少数国家和地区可以见到。唯其少，而特别引人关注。人间万象，由少而来。人类认识自己，思考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既从普遍的众多的现象中得到人所共知的东西，也从罕有稀奇的现象中探索似知

非知的奥秘。人的本性是好奇的。

第五节 当代跨文化交往的礼俗提示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构成社会。国际间的交往，构成国际社会。国际关系的历史，始于国际交往。国际间的交往有的是跨文化交往，有的不是，但跨文化交往居多。跨文化交往不都是国际交往，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族之间的交往，一般也是跨文化交往。世界各大文化圈之间的国家交往固然是跨文化交往，同一文化圈内的国家交往也具有跨文化性质。这里要讨论的主要是当代国际间的跨文化交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形成，民主政治的推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大众媒体的高覆盖率，国际间跨文化交往日趋频繁。这里从中国人的角度概括地介绍和讨论当代跨文化交往的一般的约定俗成的要求。

一、入乡问俗，尊俗随俗而不媚俗

到某国、某民族从事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无论是个人的、组织的、集团的还是国家的交往，都要通过阅读历史资料、咨询有关部门或人士，了解或学习接受地的礼俗，特别是当代礼俗，尤其是当事人所重视和遵守的礼俗。衣食住行，该尊的尊，该忌的忌，不可造次草率。尤应注意当代新俗，如瑞士仅有700万人口，拥有25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对这些人的姓名，瑞士如数家珍，非常自豪。但在瑞士，如果你问国家最高首脑人物——联邦政府主席是谁，很多人回答是“奈”（德语“不知道”），在苏黎世大学和工业大学的雕像是本校的知名教授和学者，而不是官。瑞士民风是“爱国、爱知识、爱人才，不爱官”。①

又如《上海译报》载，“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文化性格和工作方式的差异”在各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经济交往中，双方会谈一开始，法国人个个谈笑风生，不是东道主也是东道主，德国人则严肃拘谨。作决定时，法国人很快由大老板一人说了算，德国人由下而上反复商量才定。决定后，德国人的实施工作计划跟着就出台了，而法国人只有五分钟热情，迟迟不落实，一有困难，不是修改计划，就是放弃目标。在日常生活中，法国人学不到德国人的严肃古板，德国人花钱也买不到法国人的潇洒轻松。故法国人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德国人活着为了工作，法国人工作为了享受”。

诸如此类现代风俗或称文化性格，还有古代礼俗，每到接受地之前或之

① 《青年参考报》，2000年2月

后，都要了解，要学习，为的是提高交往的质量，使我们自己做到不仅交往顺利，而且“善交友，不树敌”。但也不可媚俗，有个“人随我俗、我随人俗”的原则。凡违背我中华民族礼俗之义者，则要求人随我俗，而不可屈从。做到交往中不卑不亢，自持、自控、自重与尊人、尊己统一。

二、言行得体，可信可亲而不可辱

总的要求和原则是：相貌端正，精神饱满，衣冠整洁，举止大方，求真务实，公道正派，平等真诚，礼节规范。为此，首先要了解接受者即对方或对手的文化性格（主要是文化背景和文化心态），包括价值观、信仰、知识、经验、能力、需要、兴趣和态度。正是这些素质决定了对方或对手在交往中的“接收选择”，包括方式选择，内容选择，理解选择和记忆选择。其次要严格要求我方即本身或本团队在交往中表现出言行的客观性、亲密性和可信性。客观性是基础，如实介绍，如实评估，力求真实，不夸张渲染，不哗众取宠；亲密性是条件，如亲如朋，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友善相待，“买卖不成仁义在”；可信性是力度，是对交往内容所具有的专门知识的权威度、熟练度以及表达的准确度，不是一知半解，不是模棱两可的。再次，交往必须遵守跨文化的社交礼节规范，包括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两个方面。语言因素包括声音的高低大小（不妨碍别人）、礼貌用语（不涉及忌讳、隐私）和话题、话路，力求平易、深入浅出、有的放矢、有感而发、亲切、有趣、适度幽默等。非语言因素包括介绍、握手、致意、敬礼、拥抱、接吻、站坐姿、眼色、招呼，用餐时的座次、餐巾用法、酒杯持法、咀嚼态，对方出现令人难堪动作时的应对等。中外有关专家都重视非语言因素在交往中的重要性，《成功之道：言行得体》一书的美国作者苏珊·黑巴赫—格罗认为：“会议开始了—5分钟，我们对一个人的看法就已形成”，这印象55%来自身体语言、衣着、气味，38%来自声音，只有7%来自你谈话的内容。

重礼俗，并非庸俗。过分拘于礼俗，也可能流于庸俗。繁文缛节或形式主义更是俗不可耐。因此，礼节也要创新，礼俗更要创新。人类交往频繁，趋势是热情、高雅、方便、周到。中国是大国，又是多民族国家，跨文化交往日多，自古为礼仪之邦。交往之中，应不失礼，不拘礼，有遵守、有创新、体现泱泱大国风采，文明古国风度，现代化国家风貌。礼俗必尊，国格人格不可屈，要做到两者的统一。

参考资料

1　理宜．时代的呼唤与历史的反思：大学亟须礼仪教育．齐鲁学刊，1995（4）

2 吴小峻. 中国和西方服装文化比较研究. 中华文化论坛. 2000 (1)

3 曲玉镜, 邹本涛 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演进. 东方. 2000 (2)

4 刘志琴. 饮食与文化. 光明日报. 2000－01－21

5 陈俊森, 樊葳葳 跨文化交际与外语教学. 华中理工大学报. 社科版 1998 (3)

6 彼得·茹列夫科夫. 醉翁之意不在酒 俄罗斯总结周刊. 1999－12－28

7 杨福清. 中国茶酒传说初探. 民间文学论坛. 1997 (1)

8 言行得体, 助你成功. 读者文摘. 中文版. 1999－05

第二十三章　中国的港澳文化

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中国走出了殖民地耻辱的历程。但是主权的回归仅仅是港澳回归的第一步。中国恢复对港澳行使主权后，还有许多问题等待解决。粤、港、澳又具有特别亲密的地缘、亲缘、血缘关系。广东对解决未来的问题，负有特殊历史责任。由于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持续了一个半世纪，葡萄牙对澳门的殖民控制达400年之久，以及其他种种原因，我们不必讳言增强祖国内地与港澳之间的民族凝聚力与亲和力的任务，突出地摆在全民族面前。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文化上的完全认同。然而文化问题具有更深的层次，更带根本性，也更复杂。全面地、历史地、具体地认识和处理好文化认同问题，对于回归后继续保持港澳的稳定和繁荣，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第一节　多元与同根

港澳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多元与同根，既是东方与西方文化交汇的产物，是多元的。思维方式、宗教信仰、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城市建筑、音乐绘画、科技教育、语言文字、新闻出版、娱乐旅游，其内容和形式、风格和情趣，既显现出东西并立、中外同辉的特征，又无不表现与中华文化同根同源的本色。

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是观察港澳文化特征的重要“窗口”。香港和澳门都是“土神洋神，和睦相处”，“高楼大厦和庙堂香火，互相辉映”。在香港，人称“宗教三多”：一是教种多，世界的主要宗教都可找到，比如西方的犹太教、天主教和新教，东方的佛教、道教、印度教、锡克教，以及伊斯兰教，等等；二是教堂寺庙多，各种宗教场所共有一千两百多处，其中基督教（新教）堂833处、天主教堂和弥撒中心94座，佛道寺观350座，平均不到一平方公里就有一处宗教场所，堪为“世界之最”；三是信徒多，新教教徒约有28.5万人，天主教徒25.8万人，伊斯兰教徒约5万人，印度教、锡克教和犹太教徒各约有1.5万人。佛教、道教由于不重人教仪节，虽信徒众多，但无法统计。澳门虽小，但它是中国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的策源地，1552年圣方济·沙勿略首先到达广东省上川岛，1556年耶稣传教士公泽勒又被派到澳门，开始建立在中国的第一个立足点。1557年，澳门教区作为东亚第一个主教区正式成立，管辖中国、日本、朝鲜及中南半岛各分区的传教事务，因此澳门便

成了整个远东天主教的中心和教士的集散地，一度被称为“东方罗马”。1807年，基督教（新教）教士马礼逊到澳门，开始了基督教来华的历史。1746年清朝政府曾经“禁教”，但禁而未绝，据《中国丛报》1934年11月统计，至1830年，澳门已有教徒六千余人，中国华人神父就有7人。与此同时，澳门的大部分中国居民，仍信奉佛教和道教。“天主之母堂”的三巴寺，同妈阁庙、观音堂、普济禅院同时并存，互不干扰。世界上有过多次宗教战争，各宗教之间、同一宗教的各派别之间，为了争夺信徒、扩张地盘，互相残杀，中国内地也曾发生洋教、土教的冲突。但在澳门的各种宗教和五十多个教派之间，这种情况从未出现过。玉皇大帝和上帝、观世音和圣母玛利亚始终是“井水不犯河水”，和睦相处。一年四季，各宗教节日此起彼伏，热闹非凡。每逢礼拜日，教堂里传出管风琴的鸣奏、唱诗班的歌声和教徒的祈祷声。每逢“复活节”，供奉“圣体”的盛大游行出现在街道中吸引游人，而中国寺庙也同时香火鼎盛，举行佛教、道教盛典。

宗教如此，习俗更是如此。生活在港澳的中国人、英国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德国人、瑞士人、日本人、朝鲜人、印度人等，按照各自风俗习惯生活，明清以来中国历届政府未加干涉。春夏秋冬，时令、节气、历法，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丧葬仪式，饮食、服饰，重女轻男和重男轻女，婚姻自由和节烈观念、相近或相反的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长期和平共处、各不相扰、互相通融。宗教习俗是这样，其他方面也与此类似。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港澳一度执行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港澳文化特色依然。

特别值得研究的是，葡萄牙人控制和影响澳门400年，英国人对香港的150年殖民统治，没能挖掉澳门、香港的中华文化之根，尤其是爱国统一的文化之根。特别是经过鸦片战争，英国占领香港以后，港澳人民，包括港澳的西方进步人士，在19世纪末，在辛亥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包括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建设新中国等各个时期，对中华民族救亡、启蒙和现代化的事业，是情深意笃，前仆后继，进行过多种形式的斗争和努力。几千年来，中国国土几经分裂，分后必合，缺而复圆。大统一的思想，领土不可分割的思想，爱民族、爱国家、爱自己古老辉煌的传统文化，尊重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核心和精粹所在。港澳虽然在西方统治下度过漫长岁月，不可否认殖民主义和西方文化的消极面在一些人身上（包括一些内地人）不可避免地留下了烙印，但港澳文化的主流仍然是民族意识、祖国意识和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意识。在民族国家生死存亡或发生自然灾害的关键时刻，港澳同胞都心向祖国，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这是回归后、进一步实现港澳文化认同的根本保证。

第二节　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

在近几年的文化研究和交流中，港澳文化的历史特点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

在地理上，港澳处于两种文化的边缘，既处于中国传统文化本土的边缘，又处于西方文化传播的边缘，而不处于两种文化的核心地带，不是两种文化的发源地和摇篮。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价值观念，还是西方文化的中心价值观念，对港澳地区已是“山高皇帝远”，其影响都相对弱化了许多。它既不具有欧陆腹地西方文化的典型性和排他性，也不完全具有黄河长江流域中华文化的强烈而浓厚的本色。这一历史特点，反而使中西文化在港澳更容易交融渗透、和平相处、而较少摩擦和对抗。

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这种文化的边缘性，有利于两种文化的主流文化的相互交流，是主流文化的桥梁，而不是阻隔。在中国近代史上，以港澳为中介，欧风渐进，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和主流文化，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在港澳附近的珠江三角洲，产生了中国第一批有影响的留学人才，如中国第一位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著名教育家容闳、首位民国总理唐绍仪、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等。更不用说，南海诞生了康有为，新会诞生了梁启超，中山产生了一代伟人孙中山。正如孙中山、康有为自述所提到的那样，港澳是他们新思想的策源地。1879 年康有为 22 岁时游历香港后，“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此后他即“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1923 年孙中山先生在香港大学发表讲演，也说他的革命“思想发源地即为香港”。这些杰出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足以说明，港澳边缘文化对中国主流文化的现代革新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同样，在港澳的西方文化人中，也曾出现过第一批西方的汉学家，通过他们的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对欧洲 18 世纪启蒙主义思潮，特别是文学艺术和建筑，也发生过重大的影响。

港澳回归后，在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港澳文化的这一历史特点，可以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特殊作用。在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的情况下，港澳文化特有的边缘性，仍会在中西两种文化交流中，显示出包容性、共处性、快捷性和缓冲性，起到其他地区不能起到的独特作用。

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和举世闻名的大自由港，已经形成具有很大包容性的多元文化格局。它在文化上可谓是八面来风。尽管存在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精华与糟粕并存的现象，但它具有直接而敏捷地反映和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的良好条件是不争的事实。充分利用香港这个优势向国外介绍中国和中华文

化、增进与各国的相互了解，扩大我国的影响，同时积极主动地、有选择地吸收各国民族的文化精华，补充、丰富、滋养、提高中华文化，促使它更加现代化，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澳门既同香港相同，又有自己的特点。澳门实行的是多语制，除了葡萄牙语，它优先扩大应用其他语言，如西班牙文、法文和意大利文，以葡萄牙文为基础学习这些语言比较容易。因此，澳门有必要也有可能成为中国与拉丁语系国家之间自然的和特殊的纽带。澳门文化遗产的价值和潜力，也足以使它成为我国与欧洲及占全球人口1/6的拉丁语系国家和地区的距离拉近的中介。澳门的语言、法律、国籍（澳门1/4居民拥有葡籍及在欧盟任何一国居住之权利）以及历史文化关系较之香港同欧洲更为接近。因此，欧盟选择澳门为其远东基地，并于1992年签订了一项优惠协议，随后又在澳门设立了欧洲资讯中心。1996年2月澳门欧洲研究院落成，其目的是落实欧盟研究计划。澳门也是在中国唯一能令欧洲大陆人在感情上可以找到相近文化的地方。而在香港这种感情往往被严谨的金融和商业规则所淹没。

第三节　雅文化与俗文化

港澳文化内部结构的特点非常鲜明，既有雅文化（高雅文化），其主要标志是现代教育和科技，也有俗文化（通俗文化），主要是商业文化和娱乐文化。因此，港澳文化，既有阳春白雪，又有下里巴人，正谐兼具，雅俗共赏，多彩多姿，老少咸宜。

港澳的高雅文化，虽具有较高的水平，但主要是照搬西方特别是英美现代教育科技，缺乏自身的明显特色。而港澳的通俗文化，特别是香港的商业文化和澳门的娱乐文化主要是博彩业，则名传中外，著称于世。

“如果在香港呆久了，对它的文化会有更深入的了解。这里的文化与内地息息相通，中国传统文化在这里还有相当大的市场。同时，自西洋文化进入这块土地后，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浸润也已很深。……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这里的文化氛围中的商业气息远较内地浓厚，它扑面而至，无孔不入，渗透到各个角落，给香港社会和香港人，以至于香港的文学艺术、大众传媒都染上了一层商业的色彩。因此香港文化似乎不像内地的文化那样有着浓厚的历史凝重感、政治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它显得轻松、活泼、愉快、灵活，迎合市民心理，可以说带有一种色彩斑斓的通俗文化的特点。”① 就是说，香港文化所具有的通俗文化的特点是同商业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甚至有人直接把香港文

① 参见贺弘景主编《香港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化称作商业文化。

香港的这一文化特色，在大众传播媒介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香港早已享有“百报城”的美誉。香港每千人拥有300份报纸，而全世界的平均数是每千人拥有100份报纸。香港人均报纸拥有量三倍于世界平均数，是全球第一。由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图书构成的大众传媒，最大的特点是广告。有时，报纸的第一版就是全版大广告，这种唯钱是问，报纸门面也出售的做法，港人并不觉得有何不妥，因为广告也是资讯。香港报纸，人称念三经：“股经”分析股市的涨跌走势，反映了香港这一国际大都市的商业特色；“马经”即讲马评马，是为众多赌马迷服务的；“波经”是体育新闻和评论，“波”即英语“ball”的译音，指各种球类。娱乐新闻在香港报纸上大行其道，占的版面一天比一天多，报道的内容也越来越细。甚至连选美比赛参选佳丽们的穿着细节，也被当作新闻炒得沸沸扬扬。

这倒不是因为香港报纸的编辑们心理变态，拼命追求这类东西，而实在是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在英国殖民统治下，香港人政治上没有一点发言权，这必然使他们对政治和社会事务产生冷漠感。再加上生活节奏比较快，精神压力比较大，他们更愿意知道某个明星穿什么牌子的衣服，而不愿意去讨论香港政治应向哪个方向发展。因为明星人人熟悉，但又离每个人的现实生活很远，探究明星的一举一动，既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理，也不会引发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苦闷。所以，娱乐新闻走俏，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香港社会的本质。香港回归之后，港人治港，社会民主化程度提高，政党、政治渐成气候，社会和政治新闻越来越多，香港文化在变。

如果说香港的通俗文化是同商业文化结合在一起，那么澳门的通俗文化就是博彩文化的同义语了。要认识和研究澳门和澳门文化，就必须先了解博彩文化。

澳门，长期以来享有“东方赌城”、“东方蒙特卡罗”之称，同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摩纳哥的蒙特卡罗并称为世界三大赌场。这里已有400年的赌博史。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宋元时期生活在澳门的中国渔民，艰难困苦，同来自海上或陆地的野兽虫蛇和台风搏斗，创造了灿烂的澳门古代文化，到明代已成为中外贸易的集散地。捕鱼之暇，渔民往往以小型赌博打发漫长的岁月。葡萄牙人来到澳门以后，也把欧洲的赌风带到澳门。“土洋结合”，使澳门的民间赌博逐渐兴盛起来，但是还没有商业的赌坊。

赌博思维（如果可以这样描述），实际上是商品经济条件下商业思维的一种怪胎，也是冒险心理的一种特殊游戏和宣泄，不管它起源于何时何地。

由于赌博业在澳门历史悠久，极负盛名，不仅同澳门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同澳门的文学艺术关系密切。清代一些诗人在诗词里留下了澳门赌业兴盛

的记载。鸦片战争前后，澳门已是“赌馆林立，皆层楼可数，光怪陆离、供具无一不精，但入迷津，涸可立待”。诗人汪兆镛描写赌博的情景是：

弹棋六博剧欢娱，灯火楼台似画图。

太息黄金掷虚牝，误人毕竟是樗蒲。

英国著名画家钱纳利，由香港来到澳门。在清道光和咸丰年间，一住就是28年。为澳门强烈赌风所吸引，决定留在澳门作画。以赌场为题材，创作了大量的美术作品。他画中的赌徒，不仅有绅士，还有青壮年农民、脚夫、小贩、老人、小孩。更使作者吃惊的是竟然有许多妇女，从深夜一直赌到红日初升，仍然不肯罢休。

澳门赌业勃兴，一度与澳门苦力贸易的发展有密切关系。人口贩子把中国内地的无辜平民骗到澳门，与赌棍、流氓勾结，把这些无辜平民诱人赌馆，凭着熟练的赌技把他们的钱赢光，强迫他们卖身还债，沦为苦力，然后运往美洲大发横财。西方修道士约瑟，1742年至1745年在澳门生活三年，对澳门赌风印象颇深，曾挥笔写下澳门见闻，称澳门是一个“纵欲、抢劫、背叛、赌博、酗酒、吵架、欺骗、谋杀及其他罪恶的城市”。

澳葡当局看到赌博业带来的巨大收入，便在1874年宣布赌博合法化，赌业专营，由政府开设，使澳门的赌博业成为一种合法的商业活动。澳葡当局把从赌博业抽税列为政府财政收入；官府给予法律保护，使澳门赌博业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1896年，葡萄牙国内禁赌，但对澳门赌场采取立法管制措施。1911年，两广总督张鸣岐禁赌，反使澳门赌业坐收其利。1930年的豪兴娱乐公司、1937年的寿兴娱乐公司先后取得赌业的经营权。澳门政府在30年代末，每年可得赌税180万澳元，成为政府的主要财源。澳门也成为世界名副其实的赌城。

1961年2月，葡萄牙海外省颁布法令，准许澳门以博彩业作为一种“特殊的娱乐”，强调赌博业对澳门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此后不久澳门政府为加强对赌博业的管理，又颁布了立法条例和《承投赌博娱乐章程》，做出明文规定：“凡依幸运赌博获胜者，称为赌博娱乐。”1962年6月，澳门旅游娱乐公司正式成立，70年代中期起，赌博业成为澳门的重要经济支柱，赌饷成为澳门政府主要的财政来源。这个公司，除投资博彩业外，还向码头、地产、酒店、机场、电子传媒、金融、百货等各行各业投资，全面控制了澳门经济命脉，也促进了澳门经济的发展。80年代初澳门旅游娱乐公司以4.5亿澳元的低价，购入原本价值15.3亿澳元的澳门赛马车会，一统澳门博彩业的天下。1982年5月，澳门立法会通过的《澳门新博彩法》生效，澳门成为永久性博彩区。1986年澳门政府与旅游娱乐公司签署博彩专营合约的补充条约，批准娱乐公司的专营权延长5年，即从1997年1月1日至2001年12月31日、跨

越澳门回归的1999年。"近几年，澳门政府的财政收入的三成，税收的五成，都来自博彩业。澳门的旅客十有八九是慕博彩业之名而来。博彩业直接提供了澳门近万人的就业机会，养活了数以万计的人。"①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央人民政府在大陆取缔了所有的赌博业，对澳门实行暂维持现状、待时机成熟时收回的政策。因而，澳门的赌博业没有受到冲击。考虑到澳门的实际情况，1993年通过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18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根据本地整体利益，自行制定旅游娱乐业的政策。"

有人认为，香港文化与澳门文化不同。葡萄牙人同中国人交往的400年中，东西方的文化元素是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相互影响，葡萄牙文化无法同化中华文化，中国人亦无法拒绝西方文化，在科学技术领域西方占了优势。而英国人是用炮火敲开中国大门，香港的中国人是被迫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中葡文化交流具有象征共存、互相尊重和宽容的精神，中英之间的文化交流充满了冲突和摩擦。一个是以欧洲大陆的拉丁文化为基础，另一个是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为基础。这种意见虽有一定道理，但只是说明了交往方式的差别，而不是交往本质的不同。

本质是什么呢？当你站在香港的最高处，鸟瞰香港全城，欣赏"东方明珠"的朝阳暮色；或登上澳门炮台，放眼濠江全景，指点新桥老街时，心潮涌起的反思和展望，不仅在多元与同根，主流与边缘，雅与俗之间徘徊，而且在：海洋与陆地之间、西方与东方之间、过去与未来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撞击，历史的车轮没有在过去凝固，也没有在脚下停留，而在向前沉重地滚动。

参考资料

1 贺弘景主编．香港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2 刘存宽．香港回归与文化认同．文化研究．1998（7）

3 刘圣宜．澳门多元文化的历史形态．文化研究．1998（11）

4 魏美昌．论1999年前后澳门文化特征之保留及发展．文化研究．1998（2）

5 王俊彦．澳门赌场的故事．书摘．1999（6）

6 香港——多种文化并存的社会．文化研究．1997（7）

7 走出香港文化评价的误区．文化研究．1997（8）

8 东西方文化相容的沃土．文化研究．1997（8）

① 参见《澳门的故事》，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结束语

我们进行东西方文化比较，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什么启示？这是本课程最后要讨论的问题，并就此作一个简明扼要的小结。

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把握“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要具有“全球性问题”的历史新视野

本书的上编，用较多篇幅介绍了世界文化格局，就是为初学者了解世界文化视野提供一个粗略的轮廓。

本书在有关章节里曾反复提到，当今世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都日益关注文化问题。这是为什么？概括起来，基本原因有两个：一是当代人类文化面临具有本质意义的新转折点，“经济全球化”广泛而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生存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全人类文化的相关性、协同性和整体性问题，成为现代理论、后现代思潮、发展理论和未来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二是当代人类共同面对的生存困境和危机，如环境污染、能源滥用、原料缺乏、人口过剩、霸权主义、恐怖主义、种族歧视和种族灭绝、贫富悬殊、压迫剥削加剧等都不是孤立的，都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原因。

正因为如此，当代世界文化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系列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各种全球问题的最终解决都离不开文化，世界文化热的总根源在这里。这不仅是我们进行东西方文化比较的大背景，也是全部文化领域理论与实践的大视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怪事，而是以工业化和信息化为标志的人类现代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

17、18世纪，机器大工业逐步兴起，商品生产和流通逐步扩大，国际分工逐步深化，世界市场逐步形成。资本主义殖民化进程加速，通过军事征服、经济侵略和文化渗透，把西方资本主义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强加给全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工业化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这个以工业化为动力和普遍模式的现代化进程，使人类历史变成了真正的世界史，直至20世纪还在继续。到1935年，欧洲列强对全球的政治统治达到地球面积的85%，人口达到70%。

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以电子计算机，通讯卫星和光纤通信相结合的信息媒介系统，不仅在生产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和强化，而且在时间与空间、广度与深度上，将要或已经超越了工业化。信息化在人类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突出和强化，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文化整合的物质基础。同学们在大学数年，已掌握了这方面的系统知识，又身临其境，毫无疑问将成为驾驭信息化时代的弄潮儿。

一个工业化，一个信息化，几百年来，逐步加深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使地球变成了“小小的村庄”，也使我们，尤其是年轻一代面对文化上的“多事之秋”：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文化复兴与文化幻灭，文化交流与文化选择，文化霸权与文化保护主义，文化侵略与文化安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通俗文化与高雅文化，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文化市场与文化品牌，还有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的提出、探讨和实践都离不开“经济全球化”这个社会历史的大背景和新视野，都必须作为“全球性问题”来认识和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只能在世界多元文化并存、交流和竞争中前进。这是我们进行东西方文化比较得到的第一个启示。

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指导地位

我们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伟大的科学理论的知识；通过文化比较，又了解到世界多元化格局的过去和现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容易得多、深刻得多了。

多元文化是指世界不同源流的文化，沿着各具特色的道路平行发展又互相影响的格局。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和以后这个格局依然。一些人为什么总是纠缠和鼓吹马克思主义与多元文化不可共存，甚至不共戴天，至少也不能平等对待呢？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

特别是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类生活的样式和向度显示更多的可能性，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社会结构和变化更趋复杂；地球变小了，“个人”却变大了，人们的“世界整体感”反而削弱，彼此的沟通更难了，非理性的个性差异以不同的形式进入文化领域，改变人们的文化心态。人类的眼界更开阔，发现和遇到了过去闻所未闻的新问题，要求我们既要坚定、清醒，又要更宽容、更有弹性地面对现实和未来的多元文化视域。为此，我们应当努力去做的是从理论本质上把握人类发展史上已出现的和正在出现的重大文化现象，客观地、历史地、全面地分析其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

首先要深刻认识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

实践近百年，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我们已经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有条件全面准确地做到这一点。2003 年秋，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从四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作了系统阐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颖的思路：

第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理论特征；它涵盖着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辩证关系的原理；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动力的原理。它规定着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可能、内容和基本趋势。它决定着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的强大生命力。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应坚持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不断赋予它以新的时代精神和特点。

第二，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是共产主义社会。作为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的科学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根据对人类历史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揭示了世界的本来面目，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揭示了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大趋势。共产主义社会不是宗教思维里超自然、超社会的"天堂"或神灵世界，而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极大提高，个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没有剥削压迫的现实的物质世界里的一部分。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每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都能根据时代提供的可能性，把崇高理想和脚踏实地的奋斗相结合，实现阶段性的目标。20 世纪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又垮掉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还在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的格局，将是漫长的。这并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科学论断。

第三，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由于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以自然史的精确性考察人类生存的社会条件及其演变的原因，把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发现物质生产发展的程度是社会关系演变的根源；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生产方式依次更迭的历史，作为生产实践主体的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要体现者，是当之无愧的历史创造者。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就必然尊重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者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

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永远为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的生命力的源泉。

第四，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蓬勃生命力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要求，依据不同时代的主题和需要，研究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不同国家和民族的

社会主义运动的特殊规律，把基本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不断丰富、完善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它确保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在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征程中，能不断解决问题、开拓新境界，保持先进性。

上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典范，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具有伟大生命力的科学理论。历史已反复证明：这正是一些人总想打倒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所在，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总是打不倒的原因所在，更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核心指导地位的原因所在。

横看成岭侧成峰。马克思主义既是亿万人民信仰的主义，又是崭新的文化，它诞生于西方，远播全世界，是人类思想史、革命史和文化史上最伟大的丰碑。

我们可以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文化现象作一对比。

由于儒学是不是宗教尚有很大争议，我们先了解一下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三大宗教”为代表的宗教思维的特点。宗教思维的本质特征主要是：

其一，先验式思维。精神第一性、先在性是宗教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根本的不可动摇的基础。

其二，信仰式思维。追求的价值和理想，具有鲜明的信仰特征和意义性。幻象性和情感性又是这种信仰意义存在的心理特征，也形成了宗教思维的基本倾向。

其三，封闭式思维。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不管怎么变，佛祖、上帝、真主永不变，人类对佛祖、上帝、真主的信条也永不变。这个“永不变”，只可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既是神圣的，更是神秘的。因而永远是非开放的。封闭性是宗教思维赖以存活的护法的信条。

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在认识宗教思维本质的同时，要具体分析和充分肯定，在当时生产力发展程度和科技技术水平低下的时代背景下宗教特别是世界性宗教的历史进步作用。佛教相对于种姓制度，伊斯兰教相对于氏族神灵、图腾崇拜都是巨大的进步。基督教的创立阶段则是一个进步的伟大的群众运动。二是宗教本身和以宗教为思想旗帜的文化现象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宗教思维的本质是非科学的，但宗教覆盖下的文化实践是多样的，有不少是科学的或包含科学的因素。且不说笃信宗教的伟大科学家、思想家的存在，就说佛教医学、逻辑学、体育学，伊斯兰教的医学特别是外科学，都曾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而造福于人类，更不用说基督教笼罩的西方文化，至今以科学昌明领先于世界。三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宗教在政治思想上对人类历史特别是国际关系的发展，作用有正有反，效果有祸有福，至今难以简单评说，既要总揽

大局，又要评析个案，必须谨慎公允。

自古至今，宗教对国际关系和人类历史的影响，重大的有三次：第一次在中世纪，伊斯兰教兴起时大力向外传播，经常发动圣战，打遍欧亚无敌手，毁灭中断了印度南部的佛教文化；然后是基督教组织十字军东征，持续数百年，也是从欧洲打到西亚，长期战乱两败俱伤，造成了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动荡。第二次是近代亚洲国家反殖民主义的运动，常以本土国教为斗争的旗帜反对传教的殖民主义者，教案频繁而惨烈。在这两次重大影响里，人们可以看到宗教的非理性、非科学的本质表现得淋漓尽致。第三次是现在，当代世界国际关系中，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时，宗教的矛盾往往使原本得到平息和可以调控的问题，突然变得敏感而重要，加上有的国家有的势力，出于私利，以宗教自由、人权平等的口号干涉别国内政，使国际关系复杂化、尖锐化。而不少国家和地区经济贫困、政局不稳、穷富悬殊、人民灾难深重，又可成为宗教狂热及其煽动者的温床。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世界将来注定要发生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三大宗教，也就是三大文化的冲突，显然，塞缪尔·亨廷顿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我们既不要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也不要简单问题复杂化。因为任何文化现象，特别是重大文化现象都有独特性，但都没有独占性。我们既要坚定地、清醒地、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指导地位，又要具有尊重和宽容多元文化的视域，吸取各种异域文化对我们有益的成分，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这是我们进行东西方文化比较受到的第二个启示。

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正确处理中外传统文化与文化现代化的关系

在当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过程，是一个文化现代化的过程，而且不是一般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核心理念，支配着时代的思想行为，支配着所有重大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文化现代化问题更不例外。

现代与传统是相对的。文化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吸收借鉴中外文化观念、原则、思想及其优秀成果的现代化价值体系的转化的过程，简言之，是一个融会古今中外进行综合创新的过程。

反思中西文化交流比较的史实，如果走出历代帝后、王公大臣和思想家、学者的书斋，作为历史过程来考察，从欧洲文艺复兴算起500年，从鸦片战争后算起一个半世纪，就可以看到一个沉浮不定、扑朔迷离、莫衷一是的轨迹。举其大者有如：

“全盘西化”与“中体西用”，哪一样是真做到了，真实行了？没有。争

论之声不绝于耳，社会实践中少见实绩。其实，中也罢、西也罢，体用之争，去掉其政治背景，越搞越抽象、空洞，归根结底要看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在今天，都要由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整合。

有人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西方领先了500年该退了，西方的"分析思维"该让位于东方的特别是中华文化的"综合思维"了，21世纪因此必然是东方的世纪，特别是中国的世纪了！500年前，中华文化领先于世界，是"东化"。经历500年"西化"之后，又该轮到"东化"了。这也许是一种预言，不无道理，但这种说法臆想的成分太重。且不论以"综合"与"分析"区隔东西方思维是否科学，至少有无数事实说明，西方的综合思维方式和能力不亚于东方，东方的分析思维方式和能力不亚于西方。至少也有无数事实还说明，中国现代化特别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既需要"综合思维"，也需要"分析思维"。

有人说：西方文化是冲突文化，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华文化是融合文化。这是很有道理的，大体上符合历史事实，但冲突者为什么冲突，怎么冲突，融合者为什么融合，怎么融合，这才是问题的实质，何况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就没有冲突，西方文化发展史上就没有融合？难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无冲突、无矛盾、无差异的文化？其实，该冲突时你要避免办不到，该融合时你不愿意也不行。

历史发展到今天，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古代还是近代，综合还是分析，冲突还是融合，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有积极作用的就要吸收，反之就不吸收。但也不要绝对排斥甚至予以毁灭，有的还得妥善保存。今天这一代人不能借鉴的，可能下一代能借鉴，南方用不上的，也可能北方用得上。更重要的是要把鉴别、选择、吸收利用的空间和过程同广大人民群众——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体相结合。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到旗帜鲜明、胸怀广博。专家们、思想家们有了坚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以人民的是非为是非，可以更好地争鸣，各抒胸臆，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自己的精神和人格发扬光大。这是我们进行东西方文化比较得到的第三个启示。

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充分认识文化的根本特性，把握建设的重点

文化的根本特性在于精神性。

人类文化发展史证明：经济是经济，政治是政治，文化是文化。

古今中外，三者关系不管如何紧密，但三者各自的根本特性不变，文化的根本特性是精神性。

本书分别对东西文化的具体领域进行专题比较时，着眼点是在这些领域里

积淀和体现的文化精神，比如当我们把东西方教育进行比较时，并不是也无必要对东西方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方法本身进行详细具体考察和对比，而是比较东西方教育所蕴含和体现的文化差异。其余经济、科技、军事专题的比较，均是如此。

当我们在强调文化是综合国力，是竞争力，是生产力，是奋进的号角，是政党的旗帜，实际的落脚点还是文化的根本特性，即精神性。东方和西方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包括所谓“物化”的文化如建筑和雕塑，首先表现为一种审美观念、哲学理念、情感寄托和道德精神，其价值仍然在于文化的根本特性——精神性。

为什么呢？真正的文化是人类本质力量——通过人的智慧、道德和感情——的外化；反映民族性格和心理特征，反映时代文化的精髓。影响当代，流播后世，唤起愉悦，塑造情怀，既产生经济效益，更创造社会效益。而且文化的经济效益又是因为它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而实现的。

2004 年 9 月 10 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把文化发展的着力点放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这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观，正确把握文化的根本特性，按文化建设的规律办事。这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途径和方法问题，而是关系到方向和指导思想的原则问题。

有一种现象：一提文化资源就是遗产保护和旅游；一提文化建设就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一提文化事业和产业就是大搞娱乐城和广场。这样，文化建设的“着力点”或多或少被冲淡了，文化的根本特性即精神性的理念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从近期看，忽视了文化建设的长期性，犯了急功近利的毛病，也忽视了投资效益的久远性，犯了短视症。从长远来看，离开了文化建设的“着力点”，不站在时代的高度，通过文化创新去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创造全面发展的一代又一代新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目标一定会落空。我们很难成为文化的开拓者和创造者，倒很自然地成为单纯的文化消费者和终结者，最多成为合格的文化遗产的看门人和文化产业的从业者，这决不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时代主题，也不符合古今中外文化发展的规律。充分认识文化的根本特性，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着力点”，是我们进行东西方文化比较得到的又一个重要启示和基本观点。

后　记

这个本子从专题讲座的讲稿，到选修课的讲义，再到正式出版，历经八年。

1988 年前后，珠江三角洲青年，包括部分大学生中出现了一股宗教热。就此，一位物理学教授建议我就什么是世界三大宗教，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有何联系与区别，给学生和青年教师开讲座。由于我幼年读私塾，念四书五经，大学时期在武汉大学学中外文学，毕业后在湖南大学教过五年西方文学，我便答应一试。

正值此时，教育部成立了全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委员会，把东西方文化比较列入了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教材之一，邀请复旦大学历史系朱维铮教授担任该教材主编。我把讲稿的详细提纲寄该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张岂之教授和朱维铮先生。张先生是我的旧交，他热情回信，信中强调讲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只讲儒学，而是儒、释、道三家。朱先生也热情回信，表示因另有重任，已不任该书主编，建议我把讲座的讲稿写下来。

1999 年底，我把讲义寄给朱先生。朱先生希望尽快修订成书。此后四年中，讲义在校内四次修订印刷，很受学生欢迎。因报名该门选修课人数过多，学校限定每年选修人数不得超过 300 人。

现将最新一稿讲义修订出版。特此对张先生、朱先生深表谢忱！

离开湖南大学以后，我再未涉足学问，勉为其难，抛砖引玉，只求对青年有所裨益。请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作者

2005 年 5 月